苏联剧变研究

主编/江流　徐葵　单天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苏联剧变研究

主编　江流、徐葵、单天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028号

苏联剧变研究
江流、徐葵、单天伦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

850×1168 1/32开本 12印张 298千字
印数 00001—2000
1994年2月第一版 1994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505-7/D·112 定价：7.80元

主　编　江　流　徐　葵　单天伦

编　委（按姓氏笔划）

于本源　江　流　张椿年　张　森　陈筠泉

单天伦　罗肇鸿　郝时远　徐　葵

撰稿者（按姓氏笔划）

于本源　王大成　王金存　朱行巧　许志新

肖桂森　李静杰　陈建樾　陈联璧　郑天星

果洪昇　赵常庆　贾泽林　戚仁卓　潘德礼

前　言

1991年下半年发生的苏联剧变，使整个世界为之感到惊愕并受到强烈震撼。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后果，正在历史地表现出来。这场剧变，使一个具有90多年历史和拥有1900万党员的大党——苏联共产党，旦夕间丧失了执政地位并陷于瓦解；一个拥有2.8亿人口的统一的苏维埃联盟大厦，顷刻间坍塌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在这块广达二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飘扬了74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旗帜转瞬之间悄然落地，不少新独立国家迅速选择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雪崩式的冷酷现实，许多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提出了种种疑问：为什么一个拥有74年波澜壮阔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演出“红旗落地”的悲剧？为什么曾取得过辉煌业绩的苏联共产党，竟会脆弱得如此不堪一击，轻易地从世界的政治舞台上跌落下来？为什么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庞然超级大国，一夜间便不攻自破、土崩瓦解？苏联的失败，对人类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味着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由于一时难以对之作出全面而透彻的解答，曾使我们的不少同志和朋友思想上陷入了困惑和迷茫。面世界上一些长期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则欣喜若狂，借机掀起了诬蔑社会主义的舆论宣传，似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已因苏联的剧变而告终结。鉴于这种形势，对苏联剧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这不仅是理论上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当前观察世界局势的变化和研究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客观要求。

苏联的剧变无疑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但它

决不意味着这一伟大进步运动的终结，更不能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说，苏联发生的剧变只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这场剧变可从反面为人们提供认识建设社会主义和深化改革的客观规律的无比丰富的思想材料。当着人们深入地认识了剧变的原因并从中足够地吸取了经验教训，社会主义事业经过这一严重的挫折，必将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并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新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放在历史长河中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苏联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在苏联实践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事实上，对苏联模式及其存在的重大缺陷和危害，早在本世纪中叶，许多国家就已开始有所察觉并逐渐取得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了程度不同、规模不等的改革。正因如此，社会主义运动才逐渐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框框，而呈现出本身的多样性，在其发展处于低潮的今天，仍保持着自己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弄清了苏联剧变的根源，总结出它走向反面的深刻教训之后，当代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更好地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向前发展。

苏联剧变是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既有复杂的现实直接原因，又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导致剧变的现实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以后苏共领导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这条路线没有引导苏联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反而加深并最终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全面危机，致使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并且全面爆发。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导致苏联剧变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个社会长期潜伏着未能在后来各个历史时期及时得到缓解和克服的各种深刻矛盾和危机，这些矛盾和危机在80年代后期的条件和气候(包括内部和外部条件和气候)下，便十分剧烈地迸发出来。

《苏联剧变研究》作为一本探讨性的学术著作，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对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从现实和历史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去进行研究，并分别从政治、经济、政党、意识形态、对外政

策、民族、宗教等七个领域或侧面，具体地加以剖析和说明。但这仅是探讨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一次初步尝试。

在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就确定把《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作为1992年度重点研究课题之一。为此从六个研究所抽调有关研究人员组成七个课题组，分别按七个专题，从上述七个领域或侧面，分头进行研究。同时在七个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另组成一个综合课题组进行综合研究。在研究撰稿过程中，曾组织过多次学术讨论会，其中有的研究报告如综合研究报告和关于苏联共产党的专题研究报告，还专门邀请院外研究机构的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各课题组写出初稿和组织讨论之后，由徐葵、单天伦、张森作统一修改加工，最后由江流定稿。

尽管，我们作了努力，但它仍仅是一个初步的、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个课题涉及苏联七十多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模式以及改革等大量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这一巨大的历史性课题的深入研究，决不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所能完成的。另外，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苏联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比较封闭的社会，克里姆林宫之"迷"迄今尚未完全揭开，不少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尚有待于澄清，要想对七十几年的苏联历史作透彻的分析，还有待于材料的积累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因此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只是依据于现有资料作出的最初判断。目前，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围绕苏联剧变都在倾注巨大的努力，潜心加以研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互相启发。

我们在这本书中总的是想从总体上和从不同的侧面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但本着学术探讨的精神，我们不要求各篇作者立论的统一，而是坚持百家争鸣，文责自负。因为在我们看来，研究和探讨这样的重大课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和看法，是不可避免、很自然的事，且不同观点的存在和切磋正是深入研

究所必须的。因此我们在统编全书的过程中，只删简了各篇章内容相互重迭的地方，作文字上的修改加工，至于每一篇所提出的重要学术观点以及写作体例、风格，则原则上不作改动。这样做旨在推动研究。

虽然《苏联剧变研究》只是初步尝试和阶段性研究成果，但我们仍然希望它能够给关心苏联问题的广大读者提供某些思考问题的线索与答案，能对学术界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有所裨益和推动，能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某种借鉴和启示。同时衷心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同仁，能够对本书存在的缺点、错误，给予珍贵的批评和指正。

1993年8月

目　录

苏联剧变的基本原因和教训

苏联剧变是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剧变集中表现为：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执政地位；统一的联盟国家解体；社会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剧变发生以后，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专家和学者，都在探索这场剧变所由发生的根源和教训，这无疑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我们在本文中试图从现实和历史两个大的角度去寻找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总结其基本的经验教训。

一、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

苏联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的内外交困局面：在国内，经济停滞，社会政治气氛死气沉沉；在国际上，因推行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而空前孤立，而且越来越难于承受同美国的激烈军备竞赛和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的重负。此时，苏联老人掌权的政治格局也出现了危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三位年老多病的最高领导人在80年代上半期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相继病逝。在这种局势下，苏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抱着要改变苏联面临的严峻局面的期望，把比较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推上了苏共总书记的位子。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迅即提出改革的任务。苏联过去已几次丧失了改革的时机，此时苏联社会确实面临着进行深刻改革的迫切需要。这次苏共如能很好地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采取正确的路线、政策和战略策略措施，经过艰巨的努力，不是没有可

能使苏联面临的严竣局面和大量问题逐步得到缓解，而使形势逐渐好转起来。然而，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这次改革中却在各方面都犯了重大错误，以致于不仅未能达到改革预期的目的，反而触发了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危机，造成了全面的混乱和动荡。戈尔巴乔夫那一套错误的路线，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剧变。戈尔巴乔夫在执政的几年中究竟是怎样把苏共引向垮台，把苏联引向解体的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得对他搞改革的全部过程和在改革过程中所犯的主要错误作一番分析。

（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过程

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至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为止，苏联的改革历时6年零9个月，其间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1985年3月至1988年上半年为第一阶段。这是戈尔巴乔夫从经济体制开始进行改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苏联的改革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

戈尔巴乔夫一上台便强调苏联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生活下去了，要加速社会经济发展。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肯定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二十七大制订了《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必须对苏联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革。他认为苏联现行的生产关系形式、经营和管理体系，基本上是在30年代经济粗放发展时期形成的，已“渐渐过时”，其经济决策的高度集中性等弊病已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还批判了过去在苏联理论界长期流行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生产关系能自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点，指出为改革经济机制，需要在思想理论上有所突破。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民主化”和“公开性”，企图以此作为发动和吸引群众支持和参与改革的手段。

1987年6月苏联制定了进行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文件，即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苏联最

高苏维埃通过的《企业法》。其基本思路就是给企业放权让利，使企业实现“三自一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企业自治、完全的经济核算），国家对经济管理逐步从行政管理为主的方法向以经济管理为主的方法过渡。苏共中央全会的文件中规定了经济改革的主要步骤，要求从1988年起普遍实施企业法，从1988年至1990年对计划、物资供应、价格、财政银行等方面的体制进行配套改革，1991年起在新的体制基础上制定和实施新的五年计划。

为配合国内改革需要，这几年中戈尔巴乔夫还提出外交“新思维”，对苏联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在苏美关系中实现了从对抗走向合作，从紧张走向缓和的转变。这种调整和转变受到了国际上的欢迎。

戈尔巴乔夫在这一阶段中对改革的发动和对“民主化”、“公开性”的宣扬，在苏联国内打破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死气沉沉的局面，引起了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在国际上也受到了各国的关注。然而，由于对“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宣传上有片面性，“公开性”、“民主化”的“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一些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思潮和舆论在支持“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旗号下开始活跃起来，社会上也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非正式组织”。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头两年苏联经济虽然略有上升，但从1985至1988年的四年中，经济改革未能取得实际的效果，总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出现好转，而经济结构却更加失调，国民收入的增长进一步放慢。1986—1988年期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仅为2.8%，低于改革前1981—1985年期间的3.2%。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制订的经济体制改革计划到1988年初尚未按规定步骤全面实施，就面临重重阻力和困难。1987年底，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在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主要是在改革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2. 1988年中至1990年初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苏联的改革重点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导致改革进程的逐渐失控和

社会的全面混乱与动荡。

第一阶段经济改革受挫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苏共领导人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他们片面地把加速战略和经济改革未能取得成效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现行政治体制，并根据这个判断主张转而把改革政治体制作为完成全面改革任务的先决条件放到首要地位。

1988年6月底7月初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标志着苏共将改革重点从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的重大转折。大会的报告和决定中认为十月革命后苏联形成的政治体制已"发生严重变形",已经变成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机制",并成为当前改革的障碍。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此时对苏联原有的政治体制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它说成是"官僚专制制度",后来又称之为"极权主义制度",并把改变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改组国家权力机构，通过自由竞选产生人民代表并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把国家权力重心从党中央转移到最高苏维埃，以"分清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能",实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这次党代会放弃了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的提法，而只说苏共是社会的"政治先锋队"。

按照上述总体方案，1988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先后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1977年通过的苏联宪法的法律(即规定在全联盟、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修改案)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接着在1988年年底和1989年初进行了全联盟一级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运动，1989年5月召开了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当选为新设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在经济改革受挫，人民经过三年改革没有得到实惠而社会意见日益分歧的形势下进行的这次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运动，以及

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初进行的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各州、市一级的人民代表的选举，变成了各种打着改革旗号的“民主派”同苏共争夺权力的一场激烈斗争。不少地方，苏共提出的人民代表候选人落选，而“民主派”提出的候选人当选。此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而苏共党内在党的历史问题和改革问题上产生的分化和分裂趋势则日益明显。1989年底，立陶宛共产党公开分裂，共和国的权力开始落入民族分立主义势力之手，接着，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相继发生了类似情况。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一年多改革所造成的结果，是苏联整个社会开始出现严重政治分化，各种矛盾和危机进一步显露出来：苏共党内和社会上的反对派(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立主义分子)势力迅速发展；社会意见多元化逐渐向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演变；人民阵线等民族主义组织以及许多“非正式组织”实际上已具有政党的特征，它们有组织、有纲领地同共产党展开了自下而上争夺各级政权的斗争。以这些组织为背景，一些反对派人士通过在竞选中获胜的途径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对苏共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

同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主观愿望相反，这场政治体制改革根本没有促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却造成了把经济改革当作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的局面，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1989年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降到2.4%，市场上消费品和食品的供应更趋紧张，导致了1989年夏煤矿工人的大罢工。此时负责经济工作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苏联部长会议及其下属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因受到最高苏维埃中和社会上各种反对势力的指责和抵制，工作十分困难。1989年底，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巴尔金和主席雷日科夫分别向最高苏维埃提出“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方案和“经济健康化计划”。前者因意见纷纭，争论不休而被搁置，后者虽被通过，但因受到政治斗争、工人罢工、社会动荡等因素的影响而

无法实施。

3．1990年初至1991年“8.19”事变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苏共完全丧失了对改革进程的控制力，1989年下半年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在这股强大冲击波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进一步加速向右转。

时至1990年，苏联的改革进程已开始失控，这在一些民族共和国中尤为突出，那里人民阵线等“非正式组织”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与苏共争夺领导权的政党并已得到相当多群众的拥护，其影响已远远超过本共和国的共产党，夺权只是时间问题了①。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发表讲话，承认了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多党制现实②，放弃了不久前他还在坚持的在苏共一党制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构想。2月苏共中央全会宣告放弃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随后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规定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的苏联宪法第6条。

经过这段政治体制改革，苏联国家权力结构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引起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原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了，可是新的权力结构却紊乱无章：苏共交出了权力，最高苏维埃没有能力行使权力，部长会议则没有权力，结果全国陷入了“权力真空”的局面。

此时，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并在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上当选为总统，目的是想采用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和扩大总统权力，以求控制这种混乱局面。尽管身兼苏共中央总书记

---

① 以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为例，该组织声势浩大，当时已具有了夺权的实力，在随后于1990年3月举行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该组织获得了2/3以上的席位，其领导人兰茨贝吉斯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

② 在波罗的海三国，各政党早已公开活动，地方当局或默许或已公开承认多党制为合法，如立陶宛最高苏维埃1989年12月7日修改了该共和国宪法第6条，使各政党有了合法存在和活动的权力。

和苏联总统二职的戈尔巴乔夫在法律上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但在苏共影响不断削弱和反对派势力日益壮大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已很难左右局势，而只能玩弄权术，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搞平衡、求妥协，总的是向反对派步步退让，企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和保住自己的地位。

经济状况的恶化、政治局势的混乱，使长期执政的苏共越来越成为各方面指责和攻击的靶子。而在此严峻时刻，身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把苏共进一步引向社会民主党型的议会党道路，使之进一步丧失已剩下不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新的党章和一系列决议，取消了有关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改变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会后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上又造成了列宁当年曾坚决反对的苏共"联邦化"的局面。

这一阶段中，各加盟共和国同联盟中央的权力之争同民族矛盾和各派政治力量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激化。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竞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获胜。他上台后，立刻在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代会上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向联盟中央的权威发起挑战。其他许多加盟共和国以及自治共和国为在国家的混乱局面中保护各自的利益，也频起效尤，纷纷发表各自的主权宣言。于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与不少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特别是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之间，爆发了持续不断的苏联的主权、法律高于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法律，还是加盟共和国的主权、法律高于苏联的主权、法律的所谓"主权战"和"法律战"。而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则通过了独立宣言，明确提出要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国家。

面对联盟解体的危险，为了维系联盟关系，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要求于1991年3月17日就联盟前途问题举行全苏联的人民公决，另一方面竭力争取同各共和国签订新的联盟条约。

在这段期间苏联经济形势越来越糟。1990年初出现了经济负增长势头。同1989年相比，1990年国民收入下降4％。1990年下半年苏最高苏维埃就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提出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可调节的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和在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搞出来的“500天”激进改革计划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991年春夏之交，围绕接替雷日科夫的帕夫洛夫总理的反危机纲领和亚夫林斯基等人搞的“哈佛计划”又进行了一场大争论。在政治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已变成了政治斗争的一张牌，什么“措施”、“计划”只停留在纸上和会议中，根本无法抓经济工作，在“改革”的争论和斗争中，经济形势变得愈来愈糟。

1991年初耍弄权术的戈尔巴乔夫拉开了同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的距离，向“传统派”靠拢，但到4月下旬又突然同叶利钦握手言欢，和叶等九个共和国总统共同签署了“9＋1联合声明”。中亚共和国等不少共和国的总统签署这个联合声明，是出于维护联盟的存在这一愿望。就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个联合声明的出笼则表明他已决意抛弃三月中他要求进行公民投票的初衷，并企图绕开已有的立法机构而由他本人同叶利钦等少数人来决定苏联的命运问题。在联合声明发表后，戈尔巴乔夫等人大大加快了关于新联盟条约草案的协商进程，并且决定在8月20日开始正式签署这个条约。按照这个新的联盟条约，联盟中央及联盟机构的权力将大大削弱，苏联将改变国名，成为一个松散的邦联性质的国家。但是这个条约尚未签署就引发了一场新的剧烈斗争。

4．1991年“8.19”事件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第四阶段。就在8月20日正式签署新联盟条约前夕，苏联爆发了“8.19事变。这是戈尔巴乔夫周围的传统派力量为改变事态进程，挽救苏联而进行的一次冒险的尝试。这次事变的失败沉重打击了苏共和联盟中央机构，壮大了聚集在叶利钦周围的“激进派”和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苏共被强行解散，戈尔巴乔夫开始事事仰息于叶利

钦。9月，苏联最高苏维埃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独立。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也宣告独立。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的总统在明斯克会晤，宣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21日原苏联11个共和国的总统在阿拉木图会悟，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宣言，从此苏联不复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而结束。

（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的主要错误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改革的六年多时间中犯下了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在后三年中，其错误越来越发展，性质也越来越严重。综合起来看，他的主要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经济改革起步，其失败也从经济改革的失败开始。在这几年中，苏联的经济由低速增长走向负增长，食品和消费品供应日益紧张，这大大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绪，也增加了群众对苏共的不满，加剧了中央与地方和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经济改革起步的失败同苏共领导人制定的错误的改革路线和战略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1）对苏联经济问题的症结缺乏深刻认识，在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战略目标和政策选择上有重大失误。

首先，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把加快发展速度作为战略目标，而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戈上台后未从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入手进行经济改革，而根据"加速战略"把加速机器制造业的技术更新放在优先地位，大大增加了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并主观主义地制定了到2000年在工业劳动率水平上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目标。这实际上仍然是走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片面追求速度的老路。在这几年中苏联农业生产每况愈下，经济结构的失调更加尖锐。

其次，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企图以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许诺来树立自己的形象和取得人民的支持，因而制定了超越实际

可能的社会政策，向人民许愿过多。如允诺大大加快住房建设，保证到2000年使每个家庭都有一套单独的住房。放开工资限额，造成职工工资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状况。再加上财政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和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下降，使财政金融状况大大恶化，市场商品供应愈来愈短缺和紧张。

（2）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在实践中急于求成，盲目冒进。

不论是1985年提出的“加速战略”，还是1987年制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都反映出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对苏联经济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思想准备，而又犯了苏共领导人在历史上常犯的那种不从实际出发，急于求成的老毛病。一是用主观愿望代替现实，不能在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弊病进行深入的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和目标明确的改革计划。二是在实践中不是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地去做工作，而是把改革看得过于简单和理想化，急燥冒进。1987年底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1988年社会经济发展国家计划草案时，在推进改革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和对立。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等人主张采取谨慎的、渐进的改革策略，而得到戈尔巴乔夫支持的雅科夫列夫等人则要求加速经济改造的速度，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认为部长会议提出的草案是保守的，是对改革的一种阻碍。戈尔巴乔夫也对计划草案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他的坚持下，政府的计划草案实际上被推翻。在这次争论中，苏共政治局实际上已出现分裂。戈尔巴乔夫支持的“激进派”开始在苏共核心领导中占了上风。这次争论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经济上的后果，即促使苏联在尚无配套措施的条件下在1988年就对处于高度垄断地位的许多制造业企业大大减少国家订货计划，从而使这些企业得以靠提高合同价格获取大量利润，并用以迅速提高职工的货币收入。结果1988年苏联居民的货币收入增加了400亿卢布，比80年代前七年的平均收人增长约二倍半，

大大超过了商品增长的能力。这不能不造成国家财政状况和消费市场供应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从而带来消极的社会影响。另一个是政治上的后果，即在经济改革遇到困难时，不能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原因，总结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而是片面的仅仅归罪于政治方面的阻力，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支持的“激进派”在主张推行激进的经济改革的同时极力夸大改革的阻力，把一切归咎于“管理机构的官僚阶层及与之有关的社会力量”的抵抗，同时也把苏共看作是“阻碍机制”之一。他们正是根据这种主观片面的判断，在1988年轻率地决定转换改革的重点，选择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进经济改革的“突破口”,从而转移了经济工作这个中心并冲击了整个经济改革。

2．意识形态和思想工作中的严重错误

苏共过去长期发扬民主不够，对社会思想控制过死，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时强调要实行“公开性”、“民主化”。从发扬民主，活跃思想，动员群众支持改革这一点上说，这是需要的。问题在于他在倡导“公开性”和“民主化”的过程中，把这两个概念绝对化了。他只讲“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意见多元化”,而不讲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原则界限。自从1987年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直接抓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后，他们对各种错误思潮一直采取容忍甚至纵容的态度，把一些有社会影响的报刊的领导权交给主张“激进改革”的“民主派”掌握。这些人利用党的报刊和其他各种媒介，大肆宣扬“民主派”的思想和主张，严重地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一些人自己因此成了名当了官继而又利用获得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反对苏共和社会主义，推进苏联的演变。

（1）掀起纠缠历史旧帐的浪潮，为反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的资本。

改革之初，为了“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理解改革的前提”,苏共及其领导人开始注意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

会议之前，苏共领导人考察历史问题时还主要着重于揭示妨碍苏联社会发展的障碍，指出经济管理中的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对继续前进道路的探索，从而使国家“处于危机前的状态”。按常理说，在揭露阻碍社会发展的那些问题之后，本应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向前看，去克服困难，开拓未来。然而戈尔巴乔夫却提出了要“在历史上不留任何空白点”的口号，苏共党内的那些“激进派”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报刊上大量揭露苏共历史上犯的各种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种种“罪行”。这种缺乏分析和缺乏引导地把各种历史问题公诸于众的做法，客观上使社会注意力集中到历史上的阴暗面这一方面，大大损害了苏共的形象，使苏共处于受审的境地。更为危险的是，为反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口实。他们从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

（2）把民主和自由绝对化，造成社会思想混乱，为反共主义、民族主义、复古主义等各种思潮和势力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土壤。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实践中把民主神化、绝对化之后，实际上他们的“民主化”就变成了不受任何约束的“大民主”。用戈尔巴乔夫宣称的这种“内容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主”（实质上就是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来冲击旧的僵化的思想体系和教条主义的结果，是形成了用一种错误倾向取代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局面，导致理论界的严重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完全失控。反共主义势力正是在“民主”、“自由”的旗号下兴风作浪。1989年以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言论纷纷出笼，成为“时髦”。苏共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战线上的主动权丧失殆尽。

（3）竭力鼓吹“瑞典模式”、“奥地利模式”，把苏联的社会主义贬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极权主义”。

苏联过去长期对外搞封闭，人民群众对外部世界了解甚少。这几年在纠缠历史旧帐，把苏联社会主义贬为“兵营式的社会主

义”和“极权主义”的同时，对西方国家的介绍和报道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苏联的理论界和报刊竭力宣传“瑞典模式”、“奥地利模式”，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鼓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论”，宣称共产主义是“乌托邦”，从而也在理论上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等人在思想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导致苏共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战线上的溃败，而人民群众对现实、对苏共政策的不满逐渐扩大为对社会主义的不满，在各种政治思潮大肆泛滥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受到极大的冲击，信仰危机已成为现实，从而为苏联的剧变准备了思想条件。

3. 政治体制改革的致命错误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致命错误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他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选择上、进行政治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上都有严重的错误。正是在他把改革重点由经济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后，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混乱和政治动荡。

(1) 政治体制改革时机选择上的错误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相互配合，同步进行，才能收到相辅相成的积极效果。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权力结构的改组，必然影响到国家的全局，因此对之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却在经济改革未取得实效的情况下，也就是在人民群众经过三年多的改革未取得任何经济实惠而开始对苏共和苏共领导改革的能力产生不满和怀疑情绪的时候，就一轰而上地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极大的冒险。这样做，根本不能推进经济改革，而只能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严重脱节，相互掣肘，使整个改革陷人政治斗争的泥潭。

(2) 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要“根本改造”苏联的“整个社会大厦”。他对苏联70年来形成的政治体制不

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把它看成是“官僚专制制度”、“极权主义制度”、“兵营式的社会主义”。他把造成“官僚专制制度”的原因完全归咎于苏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所以，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落脚到把党政完全分开，把权力重心从各级党组织包括苏共中央转移到各级苏维埃，实现“全部权力归苏维埃”。

苏共作为苏联的执政党，长期以来确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包揽一切，挫伤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积极性的问题。合理划分党政职能，是列宁晚年提出的重要建议，无疑是正确的，在改革中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必要的。但是实现党政职能的划分，必须以坚持、改善和巩固党对国家的总的领导为前提，而不能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在后来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今天没有共产党作为团结广大劳动群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核心来进行领导，也不可能顺利进行改革。但是戈尔巴乔夫所要实行的党政分开，并不以改善和巩固党的领导为前提，而恰恰是相反。

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几年中苏联出现的各色各样社会组织，包括从党内分化出去的“激进民主派”，都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苏共在改革中的失误以及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对苏共的自贬，大造舆论，给苏共抹黑，并竭力同苏共争夺对地方和国家的领导权。

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国家权力重心的转移，重提“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只能造成与1917年列宁提出这个口号时的宗旨完全相反的结局。它客观上为苏共党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执掌国家大权扫平了道路，并导致苏共完全丧失对国家、对苏维埃的领导权。

（3）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上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宣称民主化是进行改革的根本手段。尽管他也提出过“多些民主，多些社会主义”和建立“法制国家”的口号，但是大量事实表明，他所倡导的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而是抽象的、一般的民主，是不要法制约束的民主。

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和重要目的。苏联历史上有过严重破坏民主和法制的错误，所以在改革中需要加强民主建设，需要把民主作为重要手段。但是民主不是抽象的东西，民主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坚持不懈的扎扎实实的建设，才能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意识、习惯和机制，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自觉地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在真正的民主氛围中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去推进改革和经济建设事业。

从1989年后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的事实说明，这种“民主化”实际上无非是我们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中看到过的那种“大民主”。它给苏联人民带来的不是反映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真正的民主，而是充斥于苏联这几年出现的无数小报和街头集会上的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苏联70年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这种“民主化”过程中，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违反苏联宪法的言论成为合法，而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反而受到指责和嘲笑。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留社会主义苏联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所得的结果，可在一个早晨由少数几个领导人加以推翻。戈尔巴乔夫用这种“民主化”方法来搞政治体制改革，只会破坏国家安定，造成社会混乱。

（4）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上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宣称他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全部权力归苏维埃”所要建立的是“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1989年在把权力重心从党中央转移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最高苏维埃之后，他所追求的改革目标就是用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来改造苏维

埃制，他先后把西方国家的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内阁制照搬到苏联，使苏联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创造的苏维埃制只剩一个名称和空壳。他声称西方国家形成的这些政治制度形式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在建立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在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①] 但是把西方国家中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发展形成的这些政治制度形式照搬到苏联，并不等于这些东西就能自动地在苏联运行起来。戈尔巴乔夫打破了苏联原有的政治体制，但新体制并没有也不可能按照他的主观想像马上建立起来。这时在国家权力“真空”中出现的，是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的夺权斗争，是整个国家机器和国家管理体系的紊乱。

4．民族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社会变动时期，民族问题往往会变成十分敏感和尖锐的问题。对苏联这个民族关系特别复杂，过去在民族政策上又有很多失误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可是，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发动改革时对这个问题却非常盲目，后来他们在改革中的一系列错误，又引发了民族主义的泛滥，并导致民族危机的爆发。这是促使苏联解体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1986年召开苏共二十七大时，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潜在的民族问题毫无认识。他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仍重复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过去夸大苏共民族工作成就的调子，说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苏联人民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成的一个崭新的族际主义社会共同体”。到1987年11月，他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说“民族问题在苏联已解决了”。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某些新的民族矛盾的端倪，如1986年12月的阿拉木

①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

图事件[1]，他也缺乏警惕，只认为这是以往解决民族问题中遗留的消极后果。

这几年，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口号推动下出现的否定苏联历史的社会舆论气氛下，非俄罗斯民族中过去受到压制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大大活跃起来。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首先打着支持改革的旗号于1988年下半年组建了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戈尔巴乔夫却认为这些都是拥护改革的群众组织而表示支持。接着在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共和国中也纷纷出现了这类民族主义组织。

随后苏联民族关系上的一些历史老帐（如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领土纠纷（如纳卡地区）和经济利益矛盾都被翻腾出来，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波罗的海、外高加索和乌克兰等共和国中的地方民族主义都纷纷把矛头指向联盟中央和在其政策中所反映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在俄罗斯联邦则出现了“俄罗斯吃亏论”，说俄罗斯长期来成了养肥其他民族的“大奶牛”，俄罗斯的“民主派”人士乘机打出“救救俄罗斯”和“振兴俄罗斯”的口号进行煽动，并以保护俄罗斯利益为旗号同苏共和联盟中央进行夺权斗争。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和俄罗斯总统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更恶性膨胀，使苏联的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化，成为加速苏联解体的最危险的催化剂。

十月革命后70多年中苏联共产党是把苏联100多个民族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列宁非常重视苏共对维系民族关系的巨大作用，坚决反对苏共的“联邦化”。可是，戈尔巴乔夫这几年中所推行的恰恰是削弱苏共这个纽带的政策。1989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放弃了苏共中央对加盟

---

① 1986年12月16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哈萨克族人）被解职，换上科尔宾（俄罗斯族人）担任此职，由此引发了哈萨克族人的民族情绪，阿拉木图市数百人上街示威，喊出“俄罗斯人滚出去”、“哈萨克斯坦属于哈萨克人”等口号，发生骚乱。

共和国党组织在组织工作方面的领导，为苏共的“联邦化”准备了条件。1989年12月由布拉藻斯卡斯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独立，并因在竞选中失败而成为各共和国党组织中的第一个在野党，苏共“联邦化”已完全成为事实。这样，苏联也就丧失了从政治上维系联盟的重要保证。

戈尔巴乔夫最后力图打着革新联盟的旗号，通过同各共和国签订新联盟条约的途径，甚至不惜在联盟中央和共和国的权力划分上向各共和国的当权派作出最大的让步，来保住联盟，但为时已晚。此时他在自己引发的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危机面前已完全无力去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了。

5．在对外政策上从推行“新思维”外交走到完全倒向西方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外就开始推行“新思维”外交。“新思维”外交开初是想缓和同西方的对抗关系，改变苏联以往对外政策中的某些错误做法，为国内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戈尔巴乔夫在推行其“新思维”外交的头几年中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作了不小的调整，如决定放弃同美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承认1968年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错误等。这些政策的调整客观上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和稳定。

但是“新思维”外交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和“全人类价值”作为理论基础，否认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包含着调和论的思想。由于“新思维”外交的核心思想中所包含的谬误，由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在政治和经济思想逐渐认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再加上苏联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危机的不断深入，戈尔巴乔夫等人在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采取了迎合西方，乞求西方援助的做法。例如在1990年以西德向苏联提供大量援助为条件，听任西德吞并东德；在1991年表示支持把苏联改革同西方援助挂钩的“哈佛计划”；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以乞讨者的姿态到伦敦列席西方七国

首脑会议。戈尔巴乔夫等人在外交上完全倒向西方，对苏联国内的演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6．从否定苏共的政治核心作用到根本否定苏共

苏共过去长期不认真抓党的建设。戈尔巴乔夫1985年担任苏共总书记后，在这一点上比他的几届前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戈尔巴乔夫等一些苏共领导人已丧失了共产党人的立场，丢弃了无产阶级国家的观念，追逐权力和特权。当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问题时，他们便转向了资本主义。在这个演化过程中，工人阶级无力驾驭这一进程，只是在现有的统治集团中选择。而且戈尔巴乔夫任职近七年中，所走的是从否定苏共在苏联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到根本否定苏共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宣称"苏共是改革的倡导者"，但实际上他从未认真地依靠全党和党的组织来推行改革。他作为苏共总书记掌握着党的最高领导权，但从未领导苏共去认真总结党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制定明确的改革战略。他以"民主"的倡导者自居，但从不认真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党的各级干部在这几年历次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提出的批评和呼声。他大肆指责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但他自己实际上也一直凌驾于党之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

正是在他担任苏共总书记的这几年中，苏共在指导思想和性质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之后，苏共在苏联的地位由"政治体制核心"被降为"政治先锋队"。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等人开始把苏共看作改革的"阻碍机制"之一，把党的领导看作是"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广大的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看作是"保守势力"。1990年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取消苏共在苏联的法定领导地位。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在思想理论上否定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代替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在组织原则上放弃党的民主集中制。戈尔巴乔夫本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削弱和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一步一步把苏共引向社会民主

党型的议会党的道路。也正是他把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选拔到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的名义发布了宣告"苏共中央自我解散"的命令，其后他又在他所著的《八月政变》一书中声称"苏共是不可改造的"，从而宣告他对苏共的根本否定。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改革中所犯的上述主要错误，在性质上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和他的支持者在这几年中推行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结果，是造成了苏联社会的空前混乱、国家管理的全面失控和经济状况的严重恶化，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可悲结局。苏联发生这种剧变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在于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所犯的严重错误。

但是人们不能不问，列宁缔造的、具有近百年历史、执政达70多年和拥有1900万党员的苏共为什么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对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社会上出现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如此缺乏战斗力？在世界上已存在74年的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联盟大国这几年在民族分立主义思潮和势力的冲击下为什么会如此缺乏凝聚力，会如此迅速解体？当苏共遭到禁止时，广大的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群众为什么对苏共的命运会如此冷漠，如此无动于衷？在分析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之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弄清这些深层的问题，从苏共和苏联过去的历史中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二、苏联剧变的历史原因

苏联的剧变，从历史上看，其原因在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所包含的弊端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危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20、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又被称为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在30年代和40年代初苏联实现工业化、完成备战任务和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中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在

战后的历史发展中，这一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虽曾做过某些改革的尝试，但都浅尝辄止，结果不仅没有取得成效，反而在不少方面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随着积弊的加重，这一模式逐渐成为苏联社会进步的障碍。

（一）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形成

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无产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地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夺取了政权。但与预期的相反，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未接踵而至，俄国革命成了一花独放。在一个外部被帝国主义包围、内部工业落后、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成人文盲率占75%、信教率占99.5%、有100多个民族且因大俄罗斯的长年欺榨而民族关系异常紧张的国度里，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摆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的严峻任务。俄共(布)勇敢地挑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进行了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

列宁最初曾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当时形势促使实行的这一尝试的结果是造成了政治和经济危机。列宁总结说：“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① 从1921年起，根据列宁的倡议，苏联转向新经济政策，开始把经济同市场、同商业联系起来②。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承认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列宁后来又把新经济政策与合作制相联系，提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③。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③ 《列宁选集》第33卷，第66页。

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

列宁晚年提出的另一重要思想是“文化革命”思想。他针对第二国际一些人关于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论点，反问道：“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② 列宁并不反对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他创造性地提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政权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提高全民文化水平的发展道路。从俄国落后的条件出发，列宁认为要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③。

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实践，特别是他的新经济政策和“文化革命”思想充满了辩证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列宁从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而总是根据实践的结果不断总结经验，探寻前进的道路。尽管列宁没有来得及把他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进一步加以发展和系统化，但他在十月革命后短短几年中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创新，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

列宁逝世后，作为继承者的斯大林没有能很好地贯彻列宁晚年的思想，却继承了“战时共产主义”的不少遗产。他选择了一条与常规不同的发展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用行政命令加速农业集体化，通过剥夺农民和压低人民消费的办法进行工业的原始积累，同时放弃新经济政策，消灭多种经济成分，抑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推行这条工业化路线，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5页。

他开展了肃反运动，实质上就是用大搞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消除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的不同意见，并建立党内思想政治上的一致。这样，到30年代中期，在苏联就基本形成了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以中央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

这一模式的形成有斯大林个人因素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苏联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首先是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20年代末，紧张的国际形势和当时发生的一些外交事件，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斯大林认为“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战争的威胁（对苏联的威胁）是目前形势的基本因素之一”。① 他强调，“要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基础”，“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战争不可避免并日益临近，苏联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建立强大的战争物质基础，作好战争准备，这成为当时党内的共识。国际环境的压力促使苏共领导人认为必须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

其次是当时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依照原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应当消灭商品生产，由社会统一进行生产管理和产品分配。② 虽然新经济政策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但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仅仅视此为过渡时期的权宜措施，而仍把社会主义与产品经济相联系，产品经济思想在他们头脑中有很大影响。工业化客观上要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由国家统一调配，这一过程实际上成了实现产品经济的过程，同时也被当作在一国范围内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过程。

第三是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的影响。苏联是从沙皇俄国这个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脱胎而来的，它不可能在夺取政权后的短期内就消除旧俄国在许多方面留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下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这主要是家长制宗法封建主义思想、小农和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也是产品经济)观和平均主义思想，几百年皇权专制统治造成的缺少民主的文化意识，广大群众把改善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于“好沙皇”、“好领袖”的社会心理，以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传统。

在3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苏联广大人民也保持着很高的革命热情，并有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在这种条件下，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在第一个(1929—1932)、第二个(1933—1937)和第三个(1938—1940，因战争中断)五年计划中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深受危机的困扰，而苏联凭借自力更生和引进西方技术，迅速建立起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首先是重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以19.3%(一·五)、17.1%(二·五)和13.2%(三·五)的幅度迅速增长，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经受住了火与血的考验。尽管斯大林模式在初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是没有暴露出它的一些违背客观规律的不合理性，但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巨大成就和政治上的需要把事物的这一面掩盖起来了。特别是在苏联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候，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在胜利的颂扬声中变得更加骄傲起来，更加陷入了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经验的盲目性，把它们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而加以全面肯定和固定化。首先是1938年出版的《苏共党史简明教程》，后来又有1952年斯大林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对苏联经济问题做了系统的阐释，被奉为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最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括。思想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使苏共领导人长期不能超越他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不能正视斯大林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问题。

(二) 斯大林模式在思想理论上的特征

应当承认，在史无前例的条件下，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开创性意义。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把马列主义的部分设想具体化了，并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最初形态——苏联模式。但是，斯大林模式象新生儿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不成熟的烙印，这既表现在模式本身，也表现在思想理论方面。

斯大林模式的思想理论当时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但是由于不能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结果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思想上的僵化就成了它的主要错误。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凡事都要用教条和本本来衡量。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教条化，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看得过于简单，总是急于求成，盲目乐观和急燥冒进，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消除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等观点固守教条式的理解，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排除商品和市场作用，夸大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产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在时代观上拘泥于本世纪初出现的战争和革命形势的特点，一直用资本主义总危机不断深化的理论去看待资本主义，而看不到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看不到战后世界上出现的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产生的深刻影响，等等。

其次是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如强调苏联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完全适合"，"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①；强调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②而否定客观存在的矛盾；只看到成就和胜利的一面，而看不到问题和失误的一面。毛泽东在1957年对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有过深刻的评论，他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③。确实，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

② 见斯大林在联共(布)党第18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③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苏联不止影响了一代人，而且影响了几代人。

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必然导致脱离实际，脱离生活，固步自封，思想僵化。斯大林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加以绝对化，并把它作为普遍适用的共同规律强制推广到东欧各国，就是这种僵化思想的反映。

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表现则是对列宁提出的必须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这个任务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而把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战胜根深蒂固和影响深远的旧意识形态的事业看得过分简单，以为靠政权力量和行政手段加以推广，靠一般的宣传和"灌输"，靠出版大量的经典著作就能达到目的。而在实际生活中，意识形态斗争却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了党内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手段，斯大林所理解和解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论断被当作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和根据，这种做法反过来又在思想领域中导致教条主义更加泛滥、理论严重脱离实际、舆论千篇一律、思想封闭停滞和言行不一等等不良后果。

意识形态工作的简单化还反映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20年代上半期，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地位，俄共(布)曾把200多位知名学者驱逐出国。进入30年代后，为了把思想理论纳入官方的意识形态(实为教条主义)轨道，又有一大批社会科学工作者、作家以及艺术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遭到镇压，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不断掀起学术批判运动。在苏联几乎找不到未被批判过的学术领域。这种意识形态工作方针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给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造成严重后果。

(三) 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

苏联在斯大林模式下形成了由国家统制的准军事型的经济。从经济体制上看，这是一种基于产品经济观、以国家为核心、高

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产品经济；从经济结构上看，这是一种结构严重失调的超重型、消耗型经济；从经济战略上看，这是一种粗放型、数量“赶超”型经济。这种经济把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放在首要位置，而忽视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作为管理国民经济的唯一手段，强调计划就是法律，用行政命令方法对资源和产品进行集中调拨和分配；追求工业、商业企业的全盘国有化和集体农庄的准国有化，使大批全民所有制经济实际变成了“无主的经济”；在分配上推行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实践中越来越暴露出它的种种弊病：

(1) 缺乏内在的动力机制。由于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发展缺乏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内在经济动因，长期靠行政指令、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热情等经济外的驱动因素，这就难以保持和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增长速度。战前，苏联曾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苏联”的口号激励广大群众，他们忍受了物质的匮乏，焕发出巨大的劳动热情。但是，由于企业和职工同吃国家“大锅饭”，职工的劳动报酬与企业的经营成果缺乏联系，这使广大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不断下降；又由于实行全盘国有化和经济生活的国家化，创业变成了国家这个“大辛迪加”独家的事，全体职工都成了国家的雇员，因而大大束缚了各社会阶层的创业积极性。在战后新的形势下，继续使用这种动员号召的方法，就越来越难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了。

(2) 抑制科技进步。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企业只关心完成国家下达的总产值指标，而不愿承担风险去采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因而对科技成果的应用漠不关心，使整个经济技术水平提高缓慢。又由于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相互隔绝，军事工业中用大量

投资和科技力量取得的科技成果，不能推广应用于民用工业。①

（3）由于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资金、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取得的，这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消耗性质。经济规模越大，消耗和浪费也越大。出现了对国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随着资金、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不断减少，经济发展越来越缺乏后劲。

（4）除工业化初期曾引入较大数量的西方设备和技术外，长期自我封闭，与世界经济相脱节。苏联经济的产品经济性质，使之不可能与按照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原则运行的世界经济对接，只能自成体系地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战后成立的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的经互会，不过是这一自我封闭体系的延伸而已。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的理论更加强了苏联经济的封闭性。

上述弊端的总和，产生出苏联经济最致命的弱点，即高消耗、低效益。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既不能刺激、也不适用于经济的集约化发展，只能靠粗放因素，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来实现经济的增长。拼消耗、上产值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突出特点。苏联由于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相对多的人口，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能够维持这种发展模式，但一旦粗放因素恶化，就必然陷入停滞。事实也是如此。苏联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达到19.3％以后，在其后的各个五年计划中都是下降的，以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停滞，这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弱点的反映。

① 苏联党长期未能确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这突出表现为知识分子的待遇低下。除斯大林时期一度对知识分子实行过“赎买”政策外，随着“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培养，开始奉行消除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工资差距的政策。到1985年，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在工业部门为1.1：1.0；在建筑业中为0.98：1.0。同年苏联经济部门职工的平均工资为190.1卢布，而科研部门仅为202.4卢布，教育部门为150卢布，卫生体育部门132.8卢布，文化部门117.3卢布。

(四) 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

斯大林模式不仅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也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一统的经济体制需要有高度一统的政治体制的保证，所以苏联经济体制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的形成过程。同经济体制一样，苏联的政治体制也存在着种种弊端。

(1) 个人过份集权，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出现严重破坏法制的现象。

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制度上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发扬人民民主，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能够掌握国家权力，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由于俄国在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当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经过国内战争转向和平建设时，列宁特别重视党和国家的民主建设问题。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3年3月)到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924年1月)，他多次强调发扬民主的迫切性，要求以"工人民主制"代替内战时期因战争环境而实行过的"战时命令制"和"极端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质上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创造社会主义的"文明前提"的极其重要的内容。

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没有继续列宁在这方面已经开始的努力。他在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打了下去并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后，逐渐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个人手中，形成了个人高度集权、甚至可以说是个人专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这种领导制度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和法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如违背党章规定，从1939年到1952年，在长达13年的时间内没有召开过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总共只开过二次。在30年代进行党内清洗和"肃反"运动，把大批在方针政策上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成"外国间谍"、"人民敌人"，加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由于肃反扩大化和不断的清洗，大批党政军干部惨遭

杀害①。例如，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被杀；联共(布)十七大(1934年)选出的139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98人遇害；出席十七大的195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镇压。在军队将领中，5名元帅中有3人、15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3人、85名军长中有57人、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镇压。

在这种领导制度下，出现了长期搞家长制、一言堂，使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使党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等现象。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斯大林一个人说了算。随着个人专权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初期成就的取得，也开始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把斯大林看作真理的化身、最高的权威。

在这种领导制度下，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建设所极端需要的真正有效的监督机制，人治高于法治、权大于法、有法不依等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这种领导制度下，在干部政策上形成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和下级干部的委派制。干部制度中长期实行委任制的结果，是使大批党的干部明哲保身、唯上是从，有些地方在干部队伍中甚至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使一批阿谀奉承之辈爬上了各级领导岗位。这些人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有些人腐化堕落，而又得不到有效的监督，逐渐使党脱离群众，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

(2) 党包揽一切，苏维埃制度变成有名无实的形式。

由于对党的领导作用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由于机械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出现了党包揽一切，以党代政，党政职能严重不分的现象。这不仅导致党政机构重叠臃肿，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作风盛行，而且导致“党不管党”、大大削弱了党的自身建设。

---

① 原苏联克格勃副主席波罗日列夫称，1930—1953年苏联因反革命罪共判处377万多人，其中78万人被处决。

苏维埃制度是广大工农群众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创造的政权形式，是苏联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在党包揽一切的体制下，苏维埃变成了徒有虚名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几年一次的苏维埃代表选举，每年举行两次的最高苏维埃会议都成了走过场的活动，不能真正发挥人民政权的立法、执法和监督职能，使人民群众不但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实际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实践，错过了提高政治文化的大好机会，而且逐渐产生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疏远感。

（3）联盟制国家实际上成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民族平等的原则遭到破坏。

列宁从俄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出发，坚持采用联盟制国家形式，在1922年创建苏联，赋予各加盟共和国以较大的自主权。斯大林执政后，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开始受到削弱。由于中央高度集权制的作用，联盟制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以俄罗斯为中心（通过联盟中央的党政机构）的单一制国家。经济上实行中央的条条专政，少数民族地区的利益和积极性受到压制。

从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看，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大失误。一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认识，把民族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阶级问题，认为一旦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的社会阶级基础，民族问题就迎刃而解。二是由于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传统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对大俄罗斯主义视而不见，在不少方面执行具有大俄罗斯主义成份的政策而不自觉，在“肃反”运动中，加盟共和国的大批少数民族党政干部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镇压，许多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遭到迫害。二战期间，斯大林还以“不可靠”为由，把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等11个民族的300多万人强制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向中亚、西伯利亚等地迁移。所有这些留下了十分严重的后遗症。

（4）忽视党的建设，形成不良的党风。

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斗争不断，党内生活很不正常。从苏共本身工作来看，形式主义很多，很少抓党自身的建设，也很少认真总结经验。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常常表面化和简单化。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长期偏重于照本宣科，搞抽象的说教，而不联系实际生活。苏共执政后始终没有建立起反对官僚化和腐败的有效机制。领导干部特权化现象相当严重。官僚化和腐化现象的发展导致党严重脱离群众。

(5) 在国际共运中和对外政策上执行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

斯大林和联共(布)在国际共运中对各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提供过巨大的支持和帮助，但同时也有“干涉各党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的大党主义错误①。他们从苏联是世界革命中心这一观点出发，机械地要求各国共产党把捍卫苏联作为首要任务，支持某些国家共产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如中国的王明路线)，把苏联的清党和肃反运动扩大到其他党，使一些党(如波兰党)损失了大批干部。

二次大战后，斯大林大整铁托和南斯拉夫，把东欧国家当作苏联的卫星国，严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在国际上执行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

总起来看，斯大林执政的30年成绩是主要的。在外部强敌环伺、内部文化落后的条件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把国家引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使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些成就的取得极大地鼓舞了各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作为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的最初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存在或遗留下许多问题。首先，斯大

---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6页。

林所创立的苏联经济模式没有解决实现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依据产品经济观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商品经济要求，也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集约化、一体化的趋势，因而这种模式不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充分地解放生产力，并严重背离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突出表现为农业和消费品生产的落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由于这种准军事型经济模式仅仅在备战和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是必要的并起积极的作用，而不适用于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和平建设，长期固守这种模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落后甚至失败。

其次，斯大林时期也没有解决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问题。特别是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破坏，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第三，为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斯大林过于依赖行政和暴力的手段，这种手段在当时虽有一定的必要，但滥用权力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遗症。同时在国际上，由于对世界形势缺乏清醒判断，为了把各种力量集合在苏联周围与帝国主义相抗衡，斯大林也采取了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实力政策，这不仅对苏联外交产生了严重影响，也影响到苏联的内部建设。

斯大林最主要的问题，是把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模式固定化、绝对化了，搞教条主义。现在来看，斯大林不论在理论或是实践方面实际上都未能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问题。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应肯定斯大林的功绩，另一方面也应如实地剖析斯大林模式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弊端，弄清这些弊端对于苏联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模式积弊的加重和社会危机的深化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执政共达28年。他们在50年代和60年代两个十年的下半期虽曾进行过某些改革的

尝试，但都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他们在总体上都继承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加以发展。这28年的主要特征是苏联发展成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同时斯大林模式的积弊不断加重，社会危机逐渐深化。

赫鲁晓夫上台时苏联已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转向和平建设，人们期待着斯大林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不正常状况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高压政策会有所变化。赫鲁晓夫执政后首先在政治上纠正以往的某些过火做法。他强调恢复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和加强法制建设，在文艺思想领域中减少官方干预，实行所谓“解冻”，在干部制度上提出建立干部更新制度，实行任期制，50年代下半期，他还搞了一些经济改革，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组，在经济理论上开始强调“物质利益原则”，等等。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他猛烈地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批斯大林。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不仅当时就引发了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而且对苏共的后来，影响深远，后果严重。在对苏联演变的历史根源进行研讨时，不能不考虑到赫鲁晓夫时期在这方面的严重问题。赫鲁晓夫的下台，按当时苏联的说法是他作风粗暴，独断独行，而且主观随意、政策多变。结果既得罪了大批干部，又造成了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不安定，最终被勃列日涅夫等赶下台。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国内一直着重于保持秩序和稳定，在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上降低了批斯大林的调子，在干部政策上废除了赫鲁晓夫定下的轮换制和任期制。在经济体制方面，他在60年代下半期，实行过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其要点是在坚持集中计划和加强部门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对企业的某些计划指标，增加对企业的经济刺激。

尽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人在思想作风和对待一些具体问题的态度上有很大差别，尽管他们对过去的某些具体政策或多

或少地作了一些调整，但没有根本改变这套苏联模式和体制，而且在不少方面还加以强化和发展，使这种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加重。

(1)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进一步搞主观空想、急躁冒进。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了苏联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空想目标。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他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被长期颂扬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作为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思想的右倾发展，他们提出抹煞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的错误观点，完全无视苏联社会中在一定范围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

(2) 继续实行个人高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专权。赫鲁晓夫虽然大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本人后来也搞自己的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更喜欢对他的歌功颂德，处处为自己树碑立传。在这两个时期中，苏联因个人决定问题，多次出现过重要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3) 在经济领域中，继续在老体制框架中打转，困难越来越大。50年代和60年代进行的两次局部性的改革都半途而废。特别在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后，维护产品经济的僵化思想更占上风。随着军事工业的加快发展、农业的踏步不前和资源、资金和劳力等粗放因素的枯竭，原有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导致国民经济的消耗性衰退。28年中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使苏联丧失了过去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赛中具有的速度优势，在经济、科技、人民生活水平上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4) 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不但继承了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政策而且进一步否定民族矛盾，人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实质上是加快俄罗斯化的进程。如继续进行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讨伐；进一步强制推广俄语，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中减少使用本民族

语言的教学，对克里米亚鞑靼等遭受迫害的民族返回家园的要求拖而不决。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宣告苏联已形成了各民族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5年后在1972年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又宣布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事实上，由于存在着民族歧视和压制少数民族权利的现象，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5) 继续忽视党的自身建设，使党的肌体受到严重的腐蚀。本来斯大林去世之时和赫鲁晓夫下台之时都是苏共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弄清思想、修正错误、端正党风的良好时机，但是两届苏共领导都没有能把握住这种历史机会，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而只是采取简单化的方法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其前任个人。在这28年中，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工作的进一步复杂化，苏共实行的党包揽一切、以党代政的体制，必然使党的机关和干部更加专业化，愈益陷于专业业务之中。结果，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和组织战斗力日益削弱。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恢复了领导干部的终身职务制，强调干部的稳定，结果造成了党政领导干部严重老化的状况，到70年代后半期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已高达70多岁。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还严重地滋长了歌功颂德、互相吹嘘，盲目乐观、自安自慰，报喜隐忧、因循苟且等不良风气。同时，党的机关和上层干部队伍中的官僚化、特殊化和腐化现象也发展到惊人的地步，出现了不少同党的高级干部有牵连的贪污集团和骇人听闻的贪污腐化事件。到70年代中期，苏联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靠自己占有的职务而享用专门的供应商店、疗养所、狩猎场和其他种种优惠条件的、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的、不知普通老百姓疾苦的官僚分子或特权分子阶层。这时，苏共从表面上看似乎一切正常，平安无事，但实际上已到了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境地，而党内思想上也已开始出现潜在的分歧和分化，这为以后的分化和分裂准备了土壤。

（5）在国际上，苏联在这28年中，进一步投入了同美国的军备竞赛，每年几乎把大约1/5到1/4的国民收入耗费在扩军备战上。在对外政策上，由大国主义发展到霸权主义、扩张主义。60年代，对中国由撤专家、撕合同发展到搞军事威胁和战略包围。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入侵。70年代，同美国展开在第三世界的激烈争夺，向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竭力扩张。1978年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直接出兵侵占阿富汗标志着苏联推行霸权主义达到了顶峰。军备竞赛和对外争霸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而且加重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化、军事化，并严重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对外政策给苏联的内政建设尤其是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

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模式的轨道上发展起来的，并使其积弊愈益加重。综观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全部历史，虽然在赫鲁晓夫实行所谓“解冻”和全盘否定斯大林时在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也开始滋生右的思潮，勃列日涅夫时期，霸权主义更恶性发展，但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中，“左”的错误根深蒂固，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其危害也最大。这些错误和弊端不能不导致社会危机的深化。苏联社会从70年代下半期开始，特别是在80年代初，已呈现出严重的病态，其主要表现是：

（1）经济陷入停滞状态。具体表现为增长率下降到最低点，经济结构更加畸型，经济效益越来越差，生产要素资源日渐枯竭，生产设备严重老化，农业凋零、粮食不能不长期依靠进口，农产品和消费品越来越短缺，人民生活水平趋向停滞和下降，等等。

（2）信仰危机逐渐严重，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加剧。“左”倾教条主义的猖獗，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的否定，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排斥，使苏共的思想理论观念更加僵化。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只停留在对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美好明天的空洞宣传上，却解释不了社会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矛盾现象。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政策，无法替代

社会本身要求的对问题的解答。另一方面，所谓“解冻”以后，从60年代开始，在苏联党内和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公开的和暗藏的“持不同政见者”，文化上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也悄然兴起。再加上对矛盾现象的无法解答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怀疑，信仰危机先在知识界、后在一般群众中逐渐蔓延开来。

广大群众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年复一年地忍受着经济恶化带来的苦果，如商品短缺、住房紧张，到处排长队，生活水平呈下降之势等，而又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另一方面，又目睹一大批官僚化了的党政干部穷奢极欲和贪赃枉法，听到不少党政高级干部贪污受贿的丑闻，因而愈益感到社会的不平。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党的不信任情绪逐渐发展，党的威信大大下降。

（3）在同西方的对抗中面临被拖垮的危险。对外扩张和军备竞赛使苏联深陷困境：阿富汗战争的久拖不决使它付出沉重代价；美国“低烈度冲突战略”的实施使它在地区争夺中陷于被动；为维持对东欧的控制和在第三世界建立势力范围，使它背上了日益不堪负荷的包袱。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提出使它面临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在这场比资金比技术的竞赛中，苏联不仅难以取胜，而且整个国民经济还有被拖垮的危险。

总之，到80年代中期，苏联原有的内外政策均已难以为继了，严峻的形势要求苏共再度把改革的任务提上日程。这时对苏联来说已到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关键时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但是无情的历史现实很快就表明，在思想理论上长期由左倾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统治的苏共，没有造就出一批能够胜任这项艰巨的改革任务的领导干部。苏共领导集团中有些人虽能坚持维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但不具备在新形势下在党内外进行复杂斗争的才能。另有一些人，像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一些苏共的领导人，则沿着相反倾向的错误思路，从左倾教条主义转向了右倾机会主义，转向否定

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在这些人的操纵和影响下，苏联这次改革终于走向了绝境。这是苏联历史的现实，也是苏联历史的悲剧。

三、基本教训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拥有74年执政历史的苏共的垮台，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空前严重的损害，但是，它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苏联发生的剧变远比一百多年以前巴黎公社失败所包含的内容和提供的教训要丰富和深刻得多。在经受这场剧变引起的震惊之余，全世界共产党人会逐渐冷静下来，开始认真思考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全面而科学地总结苏共失败的反面经验，一定能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非常宝贵的大量新鲜材料，为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提供极为有益的启示。

这里就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某些带根本性的教训，在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无产阶级政党在推行改革时必须选择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

苏共在历史上长期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绝对化、固定化，不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改革的必要性，使苏联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到80年代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感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但是却选择了错误的战略和策略，在改革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成为导致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教训：

（1）改革应该从经济领域开始，始终抓住经济改革不放，同时也要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改革。但是，政治改革要同经济改革配套进行。政治改革正确与否，要以是否促进经济发展为标准。决不能在经济体制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

苏联

④

下，就把政治体制打乱。

(2) 在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进行经济建设，还是进行改革，都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建设和改革都不可能成功，甚至会走到斜路上去。改革是一场革命，会触及到各个阶层的利益。因此改革必须有高度政治权威的坚强领导核心，有能有效实施改革战略和措施的执行机构。共产党的领导，又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共领导苏联人民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从思想上瓦解了党的队伍，为各种错误思潮的泛滥和反共主义、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最后导致国家解体、共产党丧失政权。改革要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以使决策更加正确。但是决不能用戈尔巴乔夫那种“大民主”的办法推行改革。认为不管什么改革方案，只有征得多数人举手赞成以后才能去实行，这是乌托邦。真正的民主化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推行一切改革的方法。

(3) 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改革也不能急于求成。改革要有目标、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力求一切经过试验，先立后破，把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不能因为求稳怕乱，看准了的事也不敢去做，贻误时机。

(4)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都要集中精力，一心一意。为了解放思想，为改革扫清道路，对旧的习惯势力、保守主义、极端主义和自由化倾向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要避免无休止的争论。改革是史无前例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遵循。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改革的伟大事业中，要大胆地向前探索。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线，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对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是必要的，争论有时也难以避免，但是，切记列宁的教导，对于肩负着空前重担的党来说，千万不能沉缅于“过于奢侈的辩论和争执”①，坐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56页。

而论道，让争论冲击改革的实践，涣散队伍的团结，贻误改革的时机。

（二）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绝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正象恩格斯所说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性质。"① 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完备的物质条件，即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而且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了主观条件，即掌握了现代化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无产阶级队伍。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作了另外一种选择：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那样，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经济和文化也相当落后，有的国家还处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按照列宁的说法，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从"理论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即不是先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文化前提，无产阶级才夺取国家政权，而是无产阶级先夺取国家政权，然后再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同这个问题有关，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前后同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进行过激烈争论。但是，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当革命的形势到来的时候，无产阶级应不应该夺取政权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要不要"客观前提"的问题。相反，对于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列宁评价说，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② 列宁还说，"如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4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

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①]列宁曾经估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②]

按照列宁的观点，“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存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③]所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④]。列宁还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⑤]。可见列宁不仅把能够创造“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取胜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条件，而且把这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列宁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在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方针政策时始终坚持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

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很快改变了列宁关于要用很长时间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和文化前提的思想以及他所制定的新经济政策。1925年5月，斯大林宣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有克服所有一切内部困难而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须的一切条件”[⑥]。后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所谓资本主义展开“全面进攻”，其中包括迅速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人为地加快了向

---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8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⑤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列宁在这里讲的“共产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在内。——作者按。

⑥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41页。

"完全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1936年11月，苏共宣布，苏联"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共产主义时期。"① 苏联这时宣布建成的"社会主义"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应该承认，苏联领导人过早地宣布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刚刚获得解放的劳动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急切心情，对鼓舞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也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似乎只要改变了政权的性质和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改造，就算建成了社会主义，岂不知这里忽略了历史唯物主义一条根本原理：真正"完全的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之上。60年代初，赫鲁晓夫宣布要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其后勃列日涅夫又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同斯大林忽视社会主义必须具有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具有必要的物质、文化基础的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现在看来，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畸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未能很好掌握和一贯贯彻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坚持不懈地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和文化前提的重要思想。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强迫命令、个人崇拜、滥用职权、官僚主义，以及苏联人民不得不为建设这种社会主义付出昂贵代价等等，无不与此有关。

（三）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模式和"最终规律"可循，它是需要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把唯物辩证法彻底贯彻到对人类一切社会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析中。他们历来反对把社会主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331页。

义社会看作某种固定的模式，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恩格斯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的影子也找不到。"① 他又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 列宁特别反对从本本出发谈论社会主义，主张在实践中不断加深乃至校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十月革命经过近一年的实践以后，列宁指出，"对于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③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当列宁发现，能够把革命热情和"文明的商人本领"、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很好结合起来的合作社制度能够将小生产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时，他立即宣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④。

遗憾的是，列宁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采取的革命的辩证的态度到了斯大林时期就发生了变化。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接着又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第466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来这是不容许的”①。1952年，斯大林亲自指导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写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规定，这不仅是苏联人，而且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必读的教科书”②。社会主义本来应该是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不断变革的社会，但是这本教科书中却把苏联在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过的做法和途径，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都当成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看作所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律”，从而把社会主义变成僵化的固定模式。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都被奉作圣典，影响了几代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人们的思想长期得不到解放，改革被扼杀或中途而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教科书规定的概念上，即30年代在苏联形成的社会主义概念上。

（四）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保证社会主义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辩证的否定关系，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注意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益的东西。

社会主义既然取代的是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自然要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③，无产阶级在不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需要向发达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弥补自己的不足，这本来是非常简单和明了的道理。但是就是这个非常简单和明了的道理，长期以来被搞得极为混乱，并在实践中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

为了澄清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上造成的混乱，还必须温习一下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这一常识告诉我们，由于新事

---

① 《南苏关系1939—1973》，第357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物（社会主义）是对旧事物（资本主义）的否定，所以它和旧事物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任何新事物又都和旧事物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由于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并不是把旧事物内部的一切因素全盘抛弃，而是否定旧事物中那些过时的、失去了存在条件的消极因素。至于旧事物中一切积极的因素，则作为新事物发展的条件经过改造以后，加以吸收成为新事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新事物对旧事物决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在否定中有肯定，是既克服又保留，是扬弃。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辩证的否定规律的理解。按照这一原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是这样，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的关系，而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的扬弃关系。对于资本主义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对于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不仅不应该抛弃，而且要作为自己的发展条件，积极吸收并加以改造，变成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道理出发，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利用一切可能，大胆而积极地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有益的东西，这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合乎逻辑的、必不可少的任务。

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方面，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列宁把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提高到了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他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① 因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历史上是我们必需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② 列宁还特别强调，要把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任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572页。

务同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任务很好地协调和区分开来。他还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 为了向资本主义学习，列宁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②

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由于有了无产阶级政权，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对鼓舞苏联人民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和学习资本主义方面，却产生了消极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说，“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还断言，由于世界市场的瓦解造成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因此他本人在战前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以及列宁1916年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的论点，都“失效了”。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工业的高速发展，“很快就会使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的商品输往他国。”③ 在斯大林看来，不仅没有必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而且连同资本主义国家互通有无似乎也不需要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动辄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资产阶级分子”或“帝国主义代理人”帽子的政治气氛中，在教条主义统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情况下，谈论资本主义的优势和向资本主义学习，这不仅是不可能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350页。

② 《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1、562页。

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就使苏联长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

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为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以壮大自己，应该尽可能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战后40多年来，苏联始终同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对抗的状态。虽然在40年代、50年代和70年代，出现了东西方缓和的机会，但是由于苏联一直担心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流和合作会使国家主权受到侵害和带来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所以始终紧锁国门，拒绝对外开放。1947年，苏联应邀参加"马歇尔计划"。在讨论如何落实该计划的巴黎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大骂实施该计划将使"欧洲各国必将落入被监督国家的地位，并应放弃原来的经济自主和民族独立地位"①，会议进行一半，苏联代表团就扬长而去。苏联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也禁止东欧国家参加。有意思的是，经过40多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以后，苏联领导竟然于1991年公开呼请西方对苏联实施"新的马歇尔计划"，甚至连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规划，也恳求西方给以制定。苏联几十年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从闭关自守到仰人鼻息，从夜郎自大到崇洋媚外，从害怕外来渗透到主动请求外来"和平演变"这样一个历史怪圈，这是极其发人深思的。看来，这至少可以说明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关起门来搞建设，拒绝向资本主义学习和借鉴，看起来很有骨气，很革命，实际结果是作茧自缚，自己削弱自己。其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企图用构筑"铁幕"，锁紧国门的做法建立一个"无菌世界"，以保持自己的"纯洁性"，这完全是空想。由于这样做只能导致自己削弱自己，最后不仅无"纯洁"可言，而且连自身的存在也难保。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反复强调要积极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并且提出"开

① 《外交史》第5卷，上，第307页。

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①。他说，“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②。邓小平把对外开放提高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的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苏联剧变的教训，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邓小平这一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

当然，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也包含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这一面，和正确对待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这个问题。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无疑是促使苏联发生剧变的外部原因。但是如果把这个外因当作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那是不符合实际的。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是内因，这里包括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和历史原因。外因只是通过内因才起作用。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对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战略缺乏警惕，麻木不仁，无疑是错误的、危险的。对此，共产党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我们如果因为苏联的剧变而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惊慌失措，草木皆兵，那也是错误的、危险的。

（五）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也必须是民主的，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苏共之所以逐渐失去民心，到80年代末多数选民在选举人民代表时不投苏共候选人的票，其首要原因是：在苏共执政70多年间，苏联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而且在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年代，生活水平日益下降③，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

① 1986年11月14日，新华社讯。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77页。

③ 据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欧洲居第五位，70年以后则被排到最后几位，在全世界被排到第50位，苏联人自己讽刺自己的国家为“拥有核武器的上沃尔特”。
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职工工资的比重为36%，而美国为62%。按1991年4月1美元=1.3卢布折算，苏联职工月平均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18.8%（苏《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37期）。俄罗斯官方公布，1992年放开物价后，80%的人的生活处于贫困线下。

苏联人民的生活实际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苏联资源丰富，经济实力雄厚，本来有条件做到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但是苏共在自己的政策实践中始终没有把这件最重要的事放在优先的地位。由于长期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部类处于落后状态。所谓苏联领导历来重视经济建设，实际上是以国防建设为中心，把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在资源分配过程中，涉及人民生活时只按照“剩多少算多少”的原则来安排。结果是，国家虽然变得强大了，成了超级大国，但是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苏联的经验说明，在一定的时期内，人民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美好的明天”，可以忍受生活上的困难，但是这种忍耐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人们有可能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得知曾同他们处于同一起点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已远远超过他们的时候，这种反差在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强烈的，而对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反应往往是毁灭性的。

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共产党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如何使国家强大，而且要考虑如何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尽快地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① 他还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② 苏联剧变的教训和邓小平的论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的，富裕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里所说的富裕不仅包括综合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包括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特征，那么它所坚持的那种“社会主义”迟早要被人民所抛弃。

苏共的失败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否则也不可能取得广大群众的持久和坚定的支持。1991年“8.19”事件后，人们在苏联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苏共下台了，尽管上台掌权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4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78页。

的所谓“民主派”不仅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使人民的生活比在共产党执政时还遭，然而，即使这样，人民的大多数仍不愿回到原来的制度下去。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苏共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富裕生活，而且也没有给人民带来应有的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民主方面的弊端，我们在前面已作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从苏共在这方面的错误中，至少可以引出以下几点教训：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人民在政治上享受越来越多的民主。当然，这种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同法制、纪律和集中相结合的民主，而不是戈尔巴乔夫搞的那种“大民主”。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缺乏民主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民主”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第二，共产党不应该丢弃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旗帜。苏共的经验说明，丢弃这样的旗帜，其结果只能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地位，甚至丑化自己，增加反共势力的资本。人权、自由和民主，这是人类千百年来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批判资产阶级言行不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口号的虚伪性，但是并没有把人权、自由和民主作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理直气壮地举起人权、自由和民主的旗帜，而且应该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和文化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和扩大它们的内容。第三，加强法制建设。用法治代替人治，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是保障人民民主，防止滥用权力的根本途径，同时也是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包括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证。当然，这里所说的法制是社会主义法制。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盲目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离”体制，结果导致政权瓦解，国家解体。这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但是，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没有可以借鉴之处。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约也是

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如选举制度、司法和法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都包含某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六）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改造自己，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并且注意密切联系群众。

苏共丧失政权，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犯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错误，但是归根到底，问题还是出在自身的建设上。所以无产阶级政党要得到人民的拥护，保持自己的执政党地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特别要注意改造自己。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永远不脱离群众。苏共在党的建设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这里只举其要者。

（1）无产阶级政党要得到群众的拥护，首先必须永远保持自己思想的先进性。在革命的年代，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能够唤起千百万群众，能够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它的思想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并能够正确地回答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所以说，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胜利开始的。苏共在斯大林时期思想开始僵化，逐渐陷入了教条主义泥潭。教条主义者构筑的理论不能及时而准确地反映日益变化的现实，不能对人民群众真正关心的问题给以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此，不管苏共用多么强大的宣传机器向社会灌输它的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应有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人所共知的“信任危机”正是这样产生的。在苏联，早在50—6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信任危机”，那时是针对党的领袖人物的；到了70年代，对苏共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都产生了“信任危机”。苏共的教条主义理论长期是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支撑着。所以，这种理论在“改革”年代，在“舆论多元化”的条件下，在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进攻面前，一触即溃。人民群众不相信共产党的理论和宣传，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不相信共产党本身。

可见，苏共的失败首先是从党在思想理论上失去先进性开始的。

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思想的先进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正象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那就“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应当在各个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① 如果拘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欧洲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的论断，就不可能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不发展十月革命的经验，开辟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不突破对于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就不会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已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只要能够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并能实事求是地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就能够把革命和建设引向胜利；相反，搞本本主义，搞教条主义，就会使革命和建设遭受挫折和失败。

解放思想，这不是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本质表现。无产阶级政党要做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门学科推向前进，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条认识路线，不断总结和研究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还应该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必须吸收和掌握当代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学说来源于十九世纪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强调，“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同‘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② 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要求，吸收人类一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62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切积极的思想文化成果，用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第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非常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用科学发明和技术运用产生的效果来验证或发展自己的理论。在当今新科技革命的时代，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引起现代社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密切注意和认真研究的。

(2) 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在苏联演变的过程中，人们还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1991年“8.19”事件以后，俄罗斯总统下令停止苏共的活动。对于这个违背宪法的法令，这个掌权达74年之久和拥有1800万党员的党却很少有人出来抗争。这种奇怪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除了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外，还同党内生活不正常，党的机体不健康有直接关系。

苏共的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很多是在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形成的，没有根据党的任务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改革。苏共虽然一贯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但是，党内生活如同国家政治生活一样，都实行高度集中的制度，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被排斥在党的路线和方针制定过程之外，处在被动和绝对服从的地位。党内不能容忍发表不同意见和观点。《联共（布）党史》把联共（布）的历史归结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都视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国际共运中对持不同意见的党员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就是来源于苏共。党内生活如此不正常，必然会使生气勃勃的战斗的党变成万马齐谙的官僚化的组织。这样的党经不住大风大浪的考验就是很自然的了。从苏共的教训来看，执政党坚持民主集中制时，要强调民主的一面。要实行党内民主，关键的一点是采取有效措施，用党的组织纪律切实保证党员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只有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党员才会有高度的责任感，感到自己是这一组织真正

的战士。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在党胜利的时候或处在危难之际，都能够自觉而勇敢地为捍卫党而斗争。

(3) 把反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

苏共引起苏联人民极为不满意的事情是其内部的种种腐败现象。苏联的“民主派”在同苏共的斗争中正是打着反特权、反腐败的旗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而登上政治舞台的。这一事实说明，能否清除腐败，这对执政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决定它能否取得群众的信赖和支持的重要关键。从苏共的历史经验来看，清除腐败，一方面要靠执政党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要靠政治民主，把党和政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七)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必要条件。

苏共最后不仅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特别是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从苏联各个地区的情况来看，凡是在居民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即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那里共产党组织在选举中失败得也最惨重。这几乎成了普遍的现象。这说明，能否处理好知识分子问题，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兴衰，而且关系到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共产党在这里失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的支持，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不是偶然的。首先，在苏共在理论上始终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例如，把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包括长期从事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知识分子统统称之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知识分子”。这种提法显然失之偏颇。30年代后期，斯大林虽然宣布，在苏维埃政权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新型知识分子”，但始终不承认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二，在政治上，知识分子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在历次政治清洗和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第三，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其他限制，知识分子一直缺少发挥他们积极性和创造性所必须的宽松环境。第四，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抹杀

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知识分子的待遇相对地越来越低，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知识分子身上被扭曲得最严重。

苏共失败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处理好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首先必须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正确认识和确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在当今科技革命的时代，当科技成了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科技进步① 的情况下，作为现代科技载体和第一生产力代表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最有前途的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加入知识分子的行列。② 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那一部分工人阶级队伍将日渐相对减少。第二，知识分子的多数是从事创造性的科学劳动的。既然是科学，那就应该允许他们探索和试验，允许犯错误。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该创造有利他们大胆探索，发挥聪明才智的宽松的环境。第三，要把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确实落实到知识分子身上。

（八）在多民族国家中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结合本国情况制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苏联的解体是反共主义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结果。苏共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误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教训。

1）对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充分的认识。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是个自愿、自然和长期的过程，人为地加速这一过程，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即使阶级不存在了，国家消亡了，民族问题还会存在。苏联领导人（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长期认为，由于苏联消灭了剥削制度，法律上确认各民族一律平等，因此民

---

① 科技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20世纪初为5—20％，70年代超过50％，8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占60％—80％。（见《光明日报》，1992年7月23日，第版）。

② 1926年，苏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为300万，到1985年已发展到4200万，占就业人口的1/3还多。（见《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第1页）。

族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实践证明，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估计。此外，还必须看到，民族问题同阶级问题有联系，但又有很大的区别。民族问题远比阶级问题复杂得多，决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苏联的历史经验说明，如果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其结果不仅不能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反而会增加民族积怨。

2）要确实保证各民族平等的权利，保证各民族能够得到充分和自由发展的自主权。苏联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特别注意保证各民族利用本地区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权利。中央权力过分集中，使地方和各民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束缚，这势必引起地方和民族的不满，最后会导致地方民族主义的爆发，但是，盲目地迁就某些民族的不适当要求，也会助长民族主义的泛滥。这两种倾向都应该防止。

3）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剧变中，出现了这样的共同现象：在凡是按照民族属性划分行政区域的地方，一旦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必然导致民族分立和国家解体。这说明，第一，在民族地区实行“政治多元化”危险性更大。第二，共产党是联系各个民族的纽带。加强和改善民族地区的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威信，这是巩固各民族联合的关键。

4）加快经济的发展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政党要引导各族人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要分散了精力。只有在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能以较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发展和提高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对各个民族产生真正牢固的凝聚力。

撰稿者　李静杰　许志新　潘德礼

责任编委　徐葵

苏联剧变的经济根源

苏联的剧变既有外部原因又有内部原因，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它乃是国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交织激化的结果，而其中经济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则是最重要的因素。苏联经济矛盾的发展和激化集中反映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因此，我们对苏联社会剧变经济根源的考察，将主要着眼于分析其经济危机的成因与后果，特别是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及其后果。

一、经济危机的特点和原因概述

危机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上台初说苏联国民经济已滑到了"危机的边缘"。但在他执政期间，各种经济矛盾不仅没有得到克服和缓解，而是不断加深和激化，致使危机全面爆发。这表现为：生产发展从过去的低速、停滞演变成急剧滑坡、倒退；财政从资金困难演变成整个财政金融体系的崩溃，巨额预算赤字、恶性通货膨胀、卢布急剧贬值；消费市场从供应紧张演变成市场的全面混乱、瓦解；外贸从入超演变成进出口全面萎缩和外债剧增；人民生活水平从缓慢提高、停滞演变成大幅度下降；等等。总之，苏联的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状况极剧恶化，这除了战时共产主义和卫国战争这些特殊时期外，在苏联乃至俄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危机的直接原因 苏联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近因也有远因。从近期看，戈尔巴乔夫和苏共政治路线错误和由此带来的政治动乱无疑是苏联经济危机从"边缘"演变成全面、恶性爆发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可以说是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自此之后，苏联改革的方向和性质以及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首先，改革的重心从经济转向了政治，改革的方向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转向了瓦解社会主义制度。这主要表现为：思想上的“多元化”演变成政治上的多元化；一党制变成了多党制；“民主化”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经济改革方案的争论转化成了政治斗争，权力之争取代了经济合理性的考虑，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权力斗争的附属物和牺牲品。其次，经济改革本身的方向从挖掘社会主义经济的潜力转向了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非国有化”、“私有化”的方针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面临全面解体的现实威胁。

上述种种变化不仅从制度上瓦解了苏联国民经济长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而且直接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社会经济条件。这表现为：旧体制业已破坏和瓦解，从联盟到地方经济管理体系遭到破坏，失去了起码的权威，从而造成了“管理真空”；各共和国和地方割据和封锁，生产联系和协作关系遭到破坏，从而造成了经济无政府和全面混乱局面。上述种种原因加之罢工风潮以及广大群众劳动积极性和纪律性普遍低落，从而使生产急剧下降。如果说从前苏联经济形势的恶化主要表现为增长率下降的话，那么自苏联共“28”大之后，经济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停滞演变为倒退。“28”大召开的1990年，苏联社会生产战后第一次出现负增长，1989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2.4%，而1990年则变为-4%，1991年进一步下降15%。社会生产的这种急剧滑坡，越出了苏联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则，这无疑是苏共领导的错误的改革政策导致政治动乱的直接后果。

危机的基本特点　我们在指出政治动乱严重后果的同时也应看到：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向由来已久。经济危机也是各种矛盾积累和深化的结果。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不同，苏联的经济危机经历了一个由潜伏、渐发到全面暴发的长期

演化过程，具有潜伏性特征。早在50年代末，苏联的经济发展已出现了个别危机的征兆。这表现为整个经济机制开始运转不灵，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已相当严重，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不仅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制约着重工业本身的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恶性循环；进入70年代，各种矛盾加深，生产资源日渐枯竭，靠增加投入而增产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已难以维持，生产增长率明显下降，危机已从个别征兆发展到全面萌发期；进入80年代，各种生产要素资源已接近枯竭，旧经济体制的各种矛盾已极其尖锐，经济发展的动因几近丧失，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不再提高，危机已到了爆发的边缘；到80年代中期，各种储备差不多消耗殆尽，市场危机和财政危机已经爆发，人民生活明显下降；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危机进入了总爆发期，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相互交溶，演化为社会危机。

苏联工业化以来经济增长的轨迹相当清楚地反映了其经济危机从潜伏、渐发到全面爆发的过程（见下表）。

苏联各五年计划时期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年平均，%）

	1929—1932（一·五）	1933—1937（二·五）	1938—1940（三·五）	1941—1950（四·五）	1951—1955（五·五）	1956—1960（六·五）	1961—1965（七·五）
国民收入	—	—	—	5.1	10.2	10.2	6.5
社会总产值	—	—	—	—	10.8	9.1	6.5
工业总产值	19.3	17.1	13.2	5.6	13.1	10.4	8.6

	1966—1970（八·五）	1971—1975（九·五）	1976—1980（十·五）	1981—1985（十一·五）	1986—1989（十二·五）	1990	1991
国民收入	7.7	5.7	4.3	3.2	2.7	-4	-15
社会总产值	7.4	6.4	4.2	3.3	2.8	-2	-17
工业总产值	8.5	7.4	4.4	3.6	3.4	-1.2	-7.8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数据计算。

由上表可见，自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实行国家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苏联国民经济特别是作为整个国民经济主体的工业，其增长率基本上是不断下降的，而且下降的速度除了战时和战后恢复时期之外，大致每隔五年下降1—2个百分点。按照这种轨迹和趋向，到90年代初经济出现负增长是符合逻辑的。这种逻辑恰恰反映了苏联危机的潜在特征。当然，1990年特别是1991年经济指标的急剧下降具有特殊性，它超出了苏联经济发展的常规，主要是政治动乱造成的。

危机的深层原因 那么，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为什么出现上述递减趋向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全面的分析。长期以来，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都存在许多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积累和深化使得整个经济机制的功能递减乃至衰竭，这乃是苏联经济增长率递减乃至危机的潜在的深层原因。概括说来，苏联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有如下三个主要方面：(1)经济发展模式的扭曲及其潜在的矛盾；(2)经济改革和调整长期推不动，使矛盾积累、发展和激化；(3)作为国家领导核心的苏共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偏差和错误。这三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

二、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潜在矛盾与经济危机

模式的基本特点 从总体上说，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战略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从经济体制上看，是基于产品经济观、以国家为核心、高度集中的指令计划经济。其基本特点是：(1)经济生活的国家化，在城市，国家占有一切、支配一切、包办一切，在农村，集体经济“准国营化”，力图把集体经济改造成国营经济；(2)企业与国家关系行政化，企业是国家行政隶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经济上没有任何独立性，经营成果最终由国家包干负责；(3)经济管理集中化

和指令化，计划是管理国民经济的唯一手段，而指令又是推行计划的唯一手段；(4)经济关系和经济联系的实物性，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认为商品、货币、市场、贸易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不能不加以利用，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实质和内涵，只保留其外壳。这实质上是一种产品经济体制，产品经济又是与国家独家经营和管理的高度集中相互联系的。

从经济结构上看，是超重型和消耗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在工农业之间的关系上工业为主导；在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上重工业优先；在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速度第一；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生产第一，消费服从生产。

从经济战略上看，是粗放性和“数量赶超型”经济，也就是靠不断增加投入来增产，以便在社会产品的数量上尽快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以此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上述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都是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又是为这种“赶超”目标服务的。

上述三个方面的综合形成了苏联准军事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主导思想和灵魂是：军备优先；速度优先；政治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优先。一句话：经济为军事服务，为政治服务。这就是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质和内涵。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准军事型性质，不仅表现在其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上述种种特征上，而且更为突出地体现在长期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在苏联经济发展的70余年内，凡是与民用有关的发展计划和目标大都未能顺利实现，而与军备有关的发展计划和目标却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保障；在苏联赶超资本主义方面，民用方面的赶超目标几乎无一实现，而在军备赶超方面却实实在在地争得了领先；苏联的军工生产也并非始终以正当的保卫和防御为目的，而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就包含有对外扩张的意图。

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 这种准军事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中苏联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当时苏联所处

的历史环境是：资本主义包围，一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国际反动势力力图通过战争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本身刚刚结束国内战争，国民经济刚刚恢复，经济基础特别是大工业十分薄弱，不足以抵御外来侵略。在这种情况下，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突击发展重工业，及时建立起强大的防御体系，保卫苏维埃政权，是国家面临的头等战略任务。当时斯大林反复强调，"落后就要挨打"，"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要在10—15年的时期走完资本主义上百年的路程"。总之，当时苏联所处的军事、政治异常严峻的历史环境是形成上述准军事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原因。

但同时也应看到，苏联这种准军事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和背景。众所周知，沙皇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悠久的对外侵略扩张传统。而且与其他帝国主义不同，沙皇俄国文化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它的侵略扩张缺少商品和资本输出以及文化渗透等条件和手段，而是赤裸裸的军事入侵。斯大林以及以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事实证明，上述准军事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单纯出于防御动机。当苏维埃政权站稳了脚跟，经济特别是军事实力有所增强之后，这种侵略扩张传统立即表现出来。战前和战后苏联军事扩张的事实已为人所共知，这里无须赘言。

模式的历史局限及其潜在矛盾 上述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适合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它的最突出的优点是便于国家集中资源突击实现某种经济目标。在战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及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种模式还是相当有效的。例如，在战前短短的十几年内，苏联建立起部门相当齐全的大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建成了数千个大型国营企业。这种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其历史作用不可抹煞。但是，这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模式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即使在其取得成功的时候也隐藏着许多

严重矛盾。首先，上述经济战略重速度轻效益，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消耗性质，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其次，上述经济结构重工轻农，片面发展重工业，造成了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使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稳。第三，上述经济体制注重行政指令，忽视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原则，使经济发展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因。这三方面的矛盾相互作用造成了苏联经济发展模式一个致命的弱点：高消耗，低效益。

应该指出，任何国家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经济体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制定和形成的，又是根据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问题就在于，苏联从来不承认上述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反而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将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混为一谈，甚至说成是必须永远遵循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同时，随着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其军事扩张的倾向就更为强烈，这种准军事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更加难以改变，以致成为几十年不变的既定国策。

总之，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其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而在于其长期呆滞和僵化。这就使上述种种矛盾非但不能及时得以克服，而是不断发展、加深乃至激化。其结果是：经济战略和经济结构的矛盾不断积累和深化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消耗性衰退；经济体制的矛盾不断积累和深化造成了经济体制功能性衰退。正是这两种衰退相互配合构成了苏联经济危机的基因。

下面让我们具体考察苏联这种准军事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发展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三、经济战略和经济结构矛盾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消耗性衰退

如前所述，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突出弊端是高消耗低效益，这一弊端表现在经济战略和经济结构的各方面，给国民经济

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

财力、物力日趋枯竭，经济增长失去了资源保障 “速度第一”长期以来是苏联经济发展的突出战略方针，历届领导人无不把速度视为经济发展的头等任务。直到戈尔巴乔夫，在其执政伊始提出的经济发展方针也还是称之为“加速战略”。速度是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苏联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是靠多投入、高消耗取得和维持的。这就形成了速度与资源保障之间的矛盾。

首先，苏联的经济增长是靠追加投资来维持的，而投资来源却日趋枯竭（见下表）。

战后苏联国民收入和基建投资增长率对比 （年平均，%）

	1951—1955	1956—1968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1986—1989
国民收入	10.2	10.2	6.5	7.8	5.7	4.3	3.2	2.7
基建投资	13.6	13.3	6.2	7.5	6.8	3.7	3.7	6.8

*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9年第7页；《经互会成员国统计年鉴》1982年第138页。

由上表可见，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基本上是与投资增长同步的，而且某些时期投资增长甚至大大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成为鲜明对照。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资产增长率大都低于生产的增长率。1980年根据苏联自己的计算，苏联每生产1卢布的国民收入所需投资比美国多50%。而且，长期以来苏联的高投资是靠高积累维持的，而高积累又是靠卡农业、压消费来保障的。但随着社会的变迁，人民生活压力的加重，这种高积累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战前，苏联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一直占30%以上，战后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下降为25～27%左右，而到80年代以来进一步下降到了23～24%左右。从1980到1988年的8年期间，积累基金统共只增长了20%，年平均增长率只为

2.3%。近年来苏联国民收入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部分不仅是相对下降，而且是绝对额下降，一些年份国民收入增长额全部用于消费还不够，实际上是在吃空额，国家预算是靠银行透支来维持的。总之，财源枯竭是苏联经济滑坡和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苏联国民经济的高消耗低效益不仅表现在投资的利用效益上，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物质消耗上。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就会看得更为清楚。例如，1980年苏联每生产1卢布的国民收入所消耗的电力比美国多20%，用钢量多90%，石油用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生产每单位农业产值的化肥用量比美国多40%，拖拉机用量多160%。如果考察一下个别产品的利用效率，苏联的差距就更为突出。例如，苏联的钢材在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利用率只有40—50%，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为80—90%。这就是苏联虽然是世界上头号钢铁大国，但却仍然感到钢铁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又如，苏联每年向农业提供的拖拉机和卡车80%左右用来抵销报废的，只有20%左右能够增加农业设备的保有量。这就是苏联虽然是世界上头号拖拉机大国，但农业每年还由于缺乏机器设备而大量减产和减收的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苏联依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了保速度不惜工本地打消耗战。早在70年代，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部和中部工业中心地区的自然资源已近枯竭，从而不得不靠开发边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这些地区的资源潜力虽然还相当大，但不仅开发费用高，而且利用费用也高，需要从根本上调整生产布局，面临着生产力的大转移。所有这些都需要巨额的投资，而苏联已是财源枯竭。到80年代中期，苏联不仅面临着消费品市场的全面紧张，而且面临着工业原料的全面紧张。缺煤、缺铁，缺电和石油，已经使得一些加工企业处于停工待料的境地。总之，资源特别是现实能够利用的资源相对不足，也是苏联经济滑坡的重要原因。

科技落后，集约化方针难以贯彻，经济增长缺乏新源泉 扩大再生产投人要素的日趋枯竭表明，靠高投人来保持高速度的粗

放、外延性经营方针已难以维持。因此，苏联自70年代初开始推行"集约化方针"。其核心思想是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社会生产的质量和效益，力图以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来弥补粗放性投入要素的不足。但是主要是由于经济体制上的阻碍，这一方针难以贯彻，更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社会生产不仅数量指标不断下降，而且质量指标也不断下降。例如，工业中1卢布生产投资的产品量（即投资产值率）1956—1960年期间为0.4卢布，而在1986—1989年期间则下降为0.33卢布，同期国民经济中1卢布固定生产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即基金产值率）相应从0.6卢布下降到0.36卢布。

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作为集约化方针核心内容的科学技术进步计划落空。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苏联的确做出了巨大努力。例如，苏联的科研费用自7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在国民收入的4%以上，有些年份甚至高达国民收入的5%以上，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科技队伍也不断壮大，到80年代科技人员总数已达世界总数的1/4。但是，苏联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并未取得相应成果。国民经济的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在战前，苏联国民经济总体技术水平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只为5—10年，现在世界比较普遍的估计为10—15年。在科学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尤为突出。例如，苏联的"科研—产品"周期为平均9年左右，而西方国家只为5年左右。苏联的发明创造在生产中得到利用的不到1/3，而西方国家则在1/2以上。

苏联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落后，纵使不惜工本也很难克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根本原因还是经济体制的制约。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对于西方国家的企业来说，不革新就意味着在竞争中败北和倒闭，而对于苏联企业来说革新却是额外的负担，产品越老越有利，越容易完成国家计划任务。而革新不仅占用人力、物力，承担风险，而且一旦成功又为上级追加计划任务，提高计划指标提供了依据。正因如此，企业千方百计地回避革新。用当年

勃列日涅夫的话来说，“企业对革新的畏惧就像魔鬼怕见正神那样”。至于产品技术上是否先进、是否符合消费者的需求，那是国家计划部门和上级的事。正因如此，自70年代以来，苏联不断增加给企业下达的“科学技术进步”计划指标，以迫使企业革新，从而普遍存在着“奉命革新”的被动现象。

此外，苏联的科技体制本身也有弊端。西方国家的科研人员有一半左右直接、间接受雇于企业，而苏联科研人员只有6—7%在企业工作，其余都集中于科学院和各部委的科研单位。苏联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国家预算和部门的拨款，科研人员的报酬与科研成果的实际运用并没有多少直接联系。这也是苏联的科研成果、发明创造不算少，而真正在生产中得到利用的却不多的重要原因。

总之，科学技术落后，生产集约化方针难以推行，使苏联的扩大再生产缺乏新的增产源泉，这在粗放性投入要素日趋枯竭的情况下，对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影响尤为严重。

农业落后和效率低，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　苏联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表现为重工业，而农业和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并不高，其中农业实际上长期低速增长。例如，从1940—1985年，重工业增长了34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3%，轻工业增长了12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9%，而农业只增长了1.7倍，年平均增长速度只为2.2%。在战前工业化时期，农轻重之间增长速度的差距则更大，农业不仅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直到50年代初，苏联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还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的水平。例如，1913年俄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为540公斤，1953年只为434公斤。为了克服农业的落后，近几十年来苏联作出相当大的努力。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苏联在增加农业投入方面确实下了本钱。近20余年来，用于农业的直接投资均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20%以上，如果把为农业服务部门的投资计算在内，整个农工综合体的投资则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1/3以上。这在发达国家是最高的比

例，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

但是，与科技发展一样，苏联对农业的高投入也未带来相应的成果。粮食问题不仅没有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50—60年代粮食尚能勉强自给,而后来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自70年代以来，每年进口的粮食已从1000多万吨增加到80年代末的3600多万吨，进口量达全国城市需要量的1/2以上。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巨大浪费。70年代中期，苏联农业投资比美国多4倍,占用的劳动力比美国多近5倍,苏联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10个人，而美国为56人。据苏联自己估计，苏联粮食从收获到加工各个环节的浪费每年约占产量的20%，如果能够避免这种浪费就完全无需进口。

更为严重的是，过去农业是一个向工业提供资金的部门，现在则成了一个与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争夺资金的部门，而农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则比工业更低。根据苏联的统计资料计算,在70—80年代，农业的投资产值率和基金产值率要比工业低一半左右。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矛盾：农业长期落后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为了克服这一老矛盾不能不增加农业的投入，加速农业的发展，而资金和设备从相对高效的工业部门转移到更为低效的农业又使国民经济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进一步下降,使财力、物力更为紧张。总之，农业的落后和低效率是造成经济滑坡乃至危机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军工生产不断膨胀，成了国民经济的吸血鬼 除了效率和效益问题之外，苏联经济战略和经济结构方面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军工生产不断膨胀。长期以来,苏联军工生产消耗掉巨额国民财富，不能回到扩大再生产中来的军工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左右。苏联国民收入只为美国的一半左右，而据西方估计，其军费则比美国还要多10—20%。苏联机器制造产品中近半数直接、间接用于军需。这乃是苏联虽有庞大的机器制造业，但国民经济各部门设备陈旧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苏联国民经济固定资

产的折旧期仍长达25年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只为10年左右。军工生产不仅直接排挤了农业和轻工业，也排挤了民用生产资料的生产。庞大的军工系统是国民经济的吸血鬼，它是造成苏联财力、物力日趋紧张、经济滑坡的重要因素。

庞大的军工系统不仅是国民经济不堪忍受的沉重负担，而且也是苏联经济结构调整乃至经济体制改革的严重阻碍。苏联之所以重工业越来越重、轻工业越来越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备竞赛不能放弃，军工系统不能削弱。几十年来，鉴于日趋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市场压力，苏联历届领导都喊加速轻工业的发展，但没有哪个领导人肯于在发展轻工业上下硬功夫。结果是，直到1988年轻工业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仍只为25.2%。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长期推不动，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军工业系统作梗。这一点下面我们还要涉及。总之，恰恰是庞大的军工系统体现了苏联准军事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和实质，同时也集中反映了它们的种种弊端。

由上可见，高消耗、低效益是苏联经济百病丛生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苏联用高投入保证了高速度，而高速度在一定时期内又掩盖了高消耗、低效益这一严重弊端。但到80年代，苏联的财力、物力差不多已消耗殆尽，而集约化方针又未见成效，这就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依托和源泉，从而使生产的增长大幅度滑坡。总之，高消耗、低效益造成了整个国民的消耗性衰退，这乃是经济危机的重要基因之一。

四、经济体制的矛盾和经济改革的失败与经济体制功能性衰退

与经济战略和经济结构矛盾的发展造成国民经济消耗性衰退的同时，经济体制矛盾的发展又造成了经济体制的功能性衰退，这乃是经济危机的另一重要基因。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前

者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因素，后者又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人的因素。所谓经济体制的功能性衰退，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功能的衰退和经济体制运转失灵。

经济体制矛盾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瓦解 如前所述，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基于产品经济观、以国家为核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重实物产量轻价值核算，这与其经济战略和经济结构重速度轻效益的特点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经济体制从建立起，就把价值、利润、市场、竞争等商品经济的基本因素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加以排斥，而把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产量任务作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根本目标以及衡量企业和各级经济组织经营成果的根本尺度。在这种体制下，产量或产值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核心，国民经济计划的基础，是企业和各级经济组织的"硬任务"，而成本、利润等效益指标是"软任务"。因此，如果说高消耗、低效益这一突出弊端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上的话，那么经济体制则是造成这一矛盾的重要因素。

与此相联系的苏联经济体制的另一特点是，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上重行政和思想驱动而忽视物质利益原则。这就造成了经济体制上的一个严重弊端：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发展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因。长期以来，苏联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驱动机制，它包括如下三项基本因素：(1)行政指令驱动；(2)政治思想维护；(3)群众革命热情支撑。这三项因素相互配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是相当有效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抵销或弥补了物质利益和经济动因的不足。在战前和战后初期，由于国家管理机关威信和权威还相当高，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还很强，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也很高，因而苏联上述经济体制还相当有效，国民经济显示了相当高的活力和生机。但是，外在驱动仅仅是外在条件，没有内在动因是不能持久的，更不能完全取代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发展内在的经济动因。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上述三项因素的驱

动效用不断衰退。行政威信和权威不断下降，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削弱，劳动群众的命革热情不断减退。其结果是经济体制固有的内在经济动因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使这种体制的效用和功能不断衰退。

当然，苏联的上述驱动机制也包含有经济因素，这就是在强调精神鼓励的同时对于物质刺激也颇为重视。但是，主要表现为奖金等的物质刺激在上述驱动机制中不占主要地位，也未能全面体现列宁曾反复强调的物质利益原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发展的内在经济动因。而且，苏联在分配和劳动工资制度方面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不仅始终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例如，在30年代苏联工业化期间，工人1级工资与8工资的差距为1:3左右，工程技术人员的平均工资比工人的平均工资高50—100%。而到80年代，苏联工人1级工资与7级（最高）工资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为1:1.7左右，工程技术人员的平均工资与工人的平均工资基本拉平，有些部门甚至低于工人的平均工资。

经济发展的内在经济动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广大人民群众从切身利益产生的劳动积极性；二是广泛社会阶层从切身利益产生的创业积极性。从原则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这两种积极性的发挥都能提供广阔的余地和条件。但苏联经济体制却越来越成了其有效发挥的阻碍。从劳动积极性来看，由于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职工的劳动报酬与企业的经营成果缺乏联系以及平均主义等诸多弊端，日趋严重地伤害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使广大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不断下降，不能从切身利益上关心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经营效果。过去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主要是靠政治热情来维持的，但列宁早就指出过这种基于热情的动力机制的历史局限性。

从创业积极性方面来看，苏联的问题则更为突出。创业积极性主要表现为举办事业的利益冲动和经营进取精神。很明显，这种积极性的产生和发挥都需要一定的条件。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

性应表现为，能为更加广泛的社会阶层发展和发挥这种积极性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但苏联的实践却恰恰相反，由于实行全盘国有化和经济生活的国家化，创业变成了国家独家的事。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只能在国家兴办的企业中劳动，全体人民都成了“国家这个大辛迪加的雇员”。他们既缺少主动兴办事业的利益冲动，也没有这种经济条件。这不仅大大缩小了创业的社会基础，而且使广大人民群众除了7—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基本上是个消费者，社会消费基金不可能转化为生产积累基金，从而也缩小了创业的经济基础。综上所述，随着外部驱动机制效用衰退，苏联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就日趋枯竭，而这种衰退和枯竭比前面我们提到的社会生产物质投入要素的匮乏和枯竭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它使整个经济机制越来越运转不灵，使整个国民经济失去了昔日的活力和生机，造成了经济体制的功能性衰退，这乃是经济危机的另一基因。

经济改革的失败及其原因 应该指出，苏联的经济体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并非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它们之所以积累和激化，成为导致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主要还是由于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从1957年赫鲁晓夫发动“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企业“三自一全”，苏联的经济改革历时30余载，其间提出过各式各样的改革方案，但无一取得成功。

说苏联经济改革是失败的，并不意味着一无是处，毫无成就。但改革长期推不动，成效甚微，未能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同时又为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使改革越出了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轨道，以至瓦解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对旧体制的基本矛盾缺乏深刻的总体认识，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模式。

如前所述，苏联经济体制的基本矛盾是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

企业的发展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因。而苏联经济改革30余年，从未对这种经济体制的性质及其基本矛盾作系统、总体分析，而往往是着眼于它的个别矛盾。诸如："上级领导机关远离基层企业，官僚主义"；"计划工作有缺陷，计划指标不合理"；"上级机关对企业实行繁琐行政监督，束缚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忽视物质利益原则，经济刺激方法不完善"；"对商品货币关系有偏见，对其在计划管理中的作用估计不足"；等等。这些都是苏联不同时期官方改革方案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它们确也反映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但是没有触及到经济体制存在的最根本的矛盾。这些弊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传统经济体制个别环节不完善的结果，而是整个经济体制上的基本矛盾的具体反映，因而也不是靠采取个别、孤立的修补性措施所能解决的。解决这些矛盾需要综合性、相互联系的配套措施，需要反映现代经济发展要求、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来取代过时的基于产品经济观的经济体制。而苏联的经济改革历程虽长，方案虽多，却始终没有这种明确的目标模式。这就使得不同时期的改革、不同的方案互不衔接，每次改革都需另起炉灶，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整个经济改革零打碎敲，事倍功半。

第二，改革长期停留在运行机制的浅层次上，始终未触动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关系。

苏联传统经济体制在所有制关系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城市经济全盘国有化，农村经济准国有化，国家与企业关系的行政化。这是上述种种经济矛盾的重要根源。而苏联的诸多经济改革方案却无一触动更谈不上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赫鲁晓夫1957年推行的"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变"条条"管理为"块块"管理，只不过是管理机关搬家，它既没有触动国民经济的基础—企业的改革，更没有触动所有制关系和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对于解决经济体制的矛盾来说，这种改组犹如南辕北辙。

勃列日涅夫等人1965年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涉及到了企业体制，力图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但他们只看到了国家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繁琐行政监督，束缚企业手脚的危害，却没有深入分析造成这种繁琐行政监督的根源，只触及到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权力关系，还没有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不外乎是对企业让利放权。实践证明，在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没有得到根本调整，企业产权不明确，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国家对企业让利放权不仅不会解决企业与国家的矛盾，而且还会加重企业与国家的利益磨擦，使企业的行为更不规范，加重国家管理企业的困难。企业不是利用新获得的权力去改进经营管理，创造利润，而是作为与国家作斗争，压低国家的计划任务和定额，谎报成本，抬高物价，牟取“非法利润”的手段。这就迫使国家不得不重新收权收利，所谓新体制又变成了旧体制。总之，对于解决经济体制的矛盾来说，让利放权也不过是隔靴搔痒。

1987年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了企业“三自一全”的改革方案，其基本内容是调整企业与国家的利润（或收入）分配关系，企业实行“自我补偿”、“自我拨款”、“自我管理”和完全的经济核算”。其实质是要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比以前“让利放权”式的改革前进了一步，它不仅涉及到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行政权力关系，而且涉及到了二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但这一改革方案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突出表现为把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局限于财政关系也即利润分配关系，而未触动产权关系。事实证明，企业没有独立的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与产权虚置相联系的必然是责任虚置，而在产权和责任虚置的情况下，企业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不可能形成，传统的产品经济格局也就难以打破。而且这次改革也未能得到认真实施。

此外，苏联改革30余年，城市经济全盘国有化、农村经济准

国有化和国家独家经营问题也未得到解决。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长达20余年内，苏联的经济改革根本未涉及到所有制结构问题。1986年苏共“27大”虽然提出了发展合作社和个体劳动问题，但发展极为缓慢。直到苏联解体，除了出现了为数颇多的“倒爷”和非法的“影子经济”之外，真正的合作和个体经济还屈指可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实践证明：国家独家经营的局面不打破，就会形成垄断，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市场；不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和多种经营形式相互比较、相互竞争的局面，国营企业就很难形成外部压力，其经营机制也就很难转换；企业外无市场环境，内无转换机制的经济动力，也就很难把企业“推入”市场。这是苏联经济改革长期推不动、产品经济格局难以打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苏联的农村经济改革，长期以来不仅没有什么作为，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还在集体农庄推行什么“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实际上是由国家担保给农民按月发工资。这使本来还不吃国家大锅饭的农民也入了国家的伙，使本来就已成为“准国有化”的农村经济更接近了国营。

第三，产品经济观始终难以破除，成为改革深化的最大思想阻碍。

苏联的经济改革始终存在着多方面的阻力，其中最严重的是产品经济观。苏联的产品经济观根深蒂固，它不仅是造成苏联经济体制扭曲的重要因素，也是体制改革深化，克服这种扭曲的重大思想阻碍。从实践来看，整个苏联改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产品经济观与商品经济观斗争的过程。

1962年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大辩论，是产品经济观与商品经济观在改革过程中的第一次交锋。利氏《建议》的中心思想是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加强对企业的利润刺激，改进计划方法，扩大企业的权力。它的核心内容是改变以上级下达的产量任务完成程度来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传统办法，利用“盈利率定额”作为考核和奖励企业的标准，“企业利润越多，奖金越多”。可是，

就连这一肤浅、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试探性的改革建议，当时也招来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原因就在于，《建议》违犯了“计划是指令”，“生产计划是衡量企业工作成果根本尺度”这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而把利润、价值规律调节企业经营活动这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引入了社会主义企业。这场辩论只是由于赫鲁晓夫出面支持《建议》的基本精神才告一段落。

1964年围绕着“新经济体制”的制定和推行，有关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辩论再度兴起。这次辩论最初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成果。这就是理论界比较普遍地放弃了计划与市场不相容，国营企业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陈腐观念，承认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全部产品都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对生产起一定调节作用。但人们仍然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新的地位和作用”，“它已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调节者”，“生产基金不是资本，也不是商品”，“劳动力也不应成为商品”。正是理论上的这种局限性，注定了“新体制”的局限性。同时，在新体制的推行过程中产品经济观再度回潮。一些经济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再次批判“滥用商品货币关系的主张”，反对新体制预定的部分放开价格和物资等改革步骤，说什么“国家对价格和物资的计划管理是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基础”。放弃国家定价和物资的计划调拨也就放弃了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阻碍下，直到苏联解体前不久，95%左右的价格仍由国家规定和调整，95%左右的物资还是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除了少量农副产品外，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市场。

产品经济观与商品经济观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

60年代末，面对新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苏联的经济改革面临着是进一步深化还是走回头路这两种选择。苏联和东欧国家一些人士反对走回头路，主张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企业体制的改革。要求调整所有制关系以及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

把企业改造成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打破苏联传统的产品经济格局，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

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混乱现象又使原来就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进一步抬头，一些东欧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颇为激进的改革方案更加重了他们的疑虑。此外，当时苏联与美国的争霸又进入了高潮，靠上述基于产品经济观、国家为核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维持和发展的军工体系不断膨胀，其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勃列日涅夫等人在苏联掀起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以阻止改革发展的这种市场取向。

那么他们所说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当时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巴楚林对此做了批判性的归纳，这就是：“(1)给企业以生产上和商业上的完全独立，国家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2)把市场联系看作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基本联系形式，它最充分地表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3)国家不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放弃集中计划，似乎它是行政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形式；(4)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调节者，而竞争是这一发展的最重要动力；(5)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

从上述批判式的归纳不难看出，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维护产品经济观，维护上述基于产品经济观的经济体制，具体说来就是：以维护公有制的名义，反对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特别是反对寻求公有制的经济上合理的新实现形式，如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以维护计划原则的名义，反对把指令性的计划改为调节性的计划，反对放开物资和价格；以维护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名义，反对企业经营自主，自负盈亏，反对把企业改造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深化改革，特别是企业改革的关键。

还应看到，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国家的情况都与现在不同，还没有人提出根本取消公有制，实行非国有化、私有化和完

全的市场经济。勃列日涅夫等人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批判什么“市场社会主义”,除了阻止苏联改革的深化之外，还力图阻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使其控制在他们所能接受和允许的范围之内。而这一点也是他们与美国争霸所需要的。

这种批判给苏联乃至东欧国家经济变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它压制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寻求改革新途径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批判的压力下，苏联一些主张深化改革的人士纷纷检查，连利别尔曼教授也不得不为当年的《建议》“不适当地强调了利润指标的作用”而做自我批评。自此，苏联的经济改革也就偃旗息鼓。

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伴随着企业“三自一全”改革方案的提出，如何对待商品货币关系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在苏共27大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偏见”问题，继之又承认了“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这在理论上无疑是一种新的进展，但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理论仍然认为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是由计划规定的，市场仍是从属于计划。同时，把市场关系仍然视为只是在流通领域起作用的一种经济调节手段，根本没有提出用商品经济取代产品经济的命题和任务。1988年以前，在苏联的经济文献中只提“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回避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并没采取什么实际措施来建立和发展市场关系和市场机制。其结果是,直到苏联解体,苏联的产品经济格局可以说还是原封不动。

总之，根深蒂固的产品经济观已深入到了苏联经济体制的各个环节，渗入到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这种陈腐的观念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成为改革深化的“拦路虎”,

第四，缺乏一个坚持改革，能带领群众打改革攻坚战的坚强领导核心。

苏联的经济改革困难虽多．但并非不能克服。改革之所以难以推动，根本原因还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持改革，能带领群众

打改革攻坚战的坚强领导核心。赫鲁晓夫主观盲动，他发动的管理机关搬家式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它支持的利别尔曼建议还在试验阶段就被勃列日涅夫等人基本否定。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在新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矛盾，改革急待深化的关键时刻鸣金收兵，从而严重贻误了改革的时机。戈尔巴乔夫坐而论道，空喊不干，在改革遇到阻力，企业机制转换的关键时刻又玩弄权术，放弃业已开始又刻不容缓的经济改革去搞政治改革，从而又使一场本来尚有希望的改革中途夭折。而且，改革的领导核心始终没有统一的意志和方向，经济改革始终伴随着政治和权力之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我们还要涉及。

经济改革失败与改革方向根本扭转 苏联经济改革失败的最直接后果是经济改革思想和方向的根本改变，企业“三自一全”式的改革方案被非国有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所谓激进改革方案所取代。这意味着改革已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自我完善变成了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既是改革失败的重要标志，又是改革失败的直接后果。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他发动的政治改革导致反社会主义势力当政当然是重要的政治原因。但从经济上看，改革长期推不动，始终不见成效不能说不是重要因素。恰恰是由于改革长期推不动，始终不见成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失去了信心和耐心，甚至对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信念发生动摇。这就为反社会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的种种攻击提供了口实和社会条件。恰恰是由于改革不见成效，各种经济矛盾不断加深和激化，国家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人民群众急于摆脱困境，才使得“激进改革派”或“民主派”泡制的所谓“400天纲要”、500天规划”之类的所谓激进改革方案得以蛊惑人心。总之，改革的失败为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滋长和传播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苏联的实践证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苏联这种建立在产品经济观基础上、以国家为核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

经济体制，其功能已经耗尽，必须以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更能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的新体制来取代。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或占领不善，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乘虚而入。这也是改革战线上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逻辑。

这里需要指出，苏联经济体制失败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处于瓦解之中，只能说明苏联的经济体制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没有生命力，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没有生命力和优越性。这里应该分清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之间的界线以及苏联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之间的界线。

首先，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经济制度从总体上反映了经济形态的本质和内涵，而经济体制则是体现这种本质和内涵的形式和载体。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而经济体制则是实现这种目的和原则的经济决策和经济运行机制。当然，经济体制的功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对经济制度的消极体现和实现，它还能能动地完善和发展制度。经济制度对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适应，也这是它的功能和生机，基本上是靠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实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成熟的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经济制度潜能的发挥和社会经济的进步。相反，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适应的不完善或陈腐的经济体制也会阻碍经济制度固有优越性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从经济运行和管理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发展中人的能动作用，首先体现为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正确地选择并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不断调整和改革经济体制。苏联的问题就在于：体制与制度不分，把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很大特殊性和局限性的那种建立在产品经济观基础上、以国家为核心、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混为一谈，将其固定化、模式化，未能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加以改革和调整，直到苏联解体这种已经陈旧、

失效的体制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就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苏联的生机及其优越性的发挥。

此外，苏联这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很大特殊性的经济体制不仅未能合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而且在许多方面恰恰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扭曲。

第一，苏联城市经济全盘国有化，农村经济准国有化，经济生活国家化，没有正确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解放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这一根本目的和宗旨。这表现为：所有制形式的单一化，不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这一客观现实，违背所有制形式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从而限制了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国家占有一切，包揽一切，违背社会主义建设是全体人民的事业这一原则，限制了广泛社会阶层的创业积极性和主动性，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国家独家经营，生产单一化，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特别是对小商品和生活服务等方面的需求。总之，它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不是人民群众的实际要求，而是一些人“一大二公”观念的产物。

第二，全部企业国有化，政企不分，企业与国家关系的行政化，企业经济上没有独立性，未能正确、全面体现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本质，使全体职工都成了“国家的雇员”，造成了生产资料与生产者事实上的分离，在经济上不能充分体现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人翁积极性和责任感，这是苏联经济发展缺乏内在经济动因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职工的劳动报酬与本企业经营成果脱节，而由国家规定和包发，造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以及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盈亏不分和贡献大小一样，这又没有正确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按劳分配原则。

第四，经济联系的实物性以及计划管理的指令性，形式上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实际上是损害计划管理。它使计

划管理的方法单一化和行政化，排除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也就降低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性质。

由上可见，苏联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一解放生产力，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公有制，消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按劳分配一之间不仅存在着重大差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实质性的扭曲和背离。总之，苏联的经济危机是苏联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的危机，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危机。

五、苏共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偏差和错误与经济危机

上面我们揭示的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种种矛盾以及经济改革失败的种种原因，固然是酿成苏联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但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是作为整个国家领导核心的苏共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偏差和错误。因为，从我们前面的考察中已不难看出，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的扭曲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种种阻碍以及近年来改革方向的根本扭转，都是与苏共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紧密相联的。苏共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既有左倾教条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有右倾投降主义性质的问题，但从总体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则长期占主导地位。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坚持产品经济观，拒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 如前所述，产品经济观是苏联经济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由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种种原因，从苏维埃经济创建之始，布尔什维克党就把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分割、对立起来，认为商品、货币、市场、贸易等均是资本主义经经的残余，与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必须随之将其铲除。

早在1919年3月俄共（布）"9大"通过的党纲就明确规定，要"准备取消货币"，"继续有计划地组织全国范围内的产品分配以代替贸易"。党的一些理论家们则纷纷论证消除商品货币关系、建立产品经济或自然经济的必要性。例如，1919年波格丹诺夫写道："社会主义的基础不是交换，而是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与消费之间没有买卖市场，只有有意识有系统的分配"。瓦尔加指出："应当以生产价值的量度单位来代替陈腐的完全无效的货币核算"。布哈林在其著名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一书中也说："经济过程的理论面临着过渡到自然经济思维的必要性"。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失败的教训基础上强调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提出了"共产党员要学会经商"的著名口号。但在工业化期间，随着"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开始，产品经济观再度兴起，一些理论家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只能存在于过渡时期，在建成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应继续保留。他们不仅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甚至否定货币和经济核算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例如，斯特鲁米林1928年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情况下，社会产品将不是通过市场来分配。价格问题一般来说将失去任何意义和实际内容"。加道夫斯基1931年写道："必须坚定不移地强调指出我国经济核算范畴的历史局限性，它的存在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利用商品货币形式相联系的。某些同志不理解这一点，把经济核算和货币范畴搬到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去，而社会主义本质上固有的是直接的无货币分配制度"。

由于实践中的碰壁，上述主张不可能完全实现，货币、价格、交换、经济核算、局部的商品交换未能取消，但斯大林在其去世前不久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仍然认为：国营企业之间交换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商品流通是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并竭力提倡城乡"物物交换"以缩小商品流通的范围。

在尔后的30余年的改革过程中，上述产品经济观虽然不断受到冲击，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并未解决。例如，承认了产品是商品，却不承认制造产品的劳动力和生产基金是商品，认为劳动力和生产基金成为商品就是资本主义；承认有市场但不承认作为市场要素的竞争，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承认商品生产却不承认商品经济，认为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等等。总之，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这种旧观念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碰壁，步步退却，但始终不能根本放弃。70余年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思想的变化不外是以“改造论”、“利用论”取代了“取消论”。这乃是苏联经济体制陈腐、僵化，难以改造，最终被根本推翻的重要原因。

追求公有制的“纯洁性”，提倡“一大二公” 城市经济全盘国有化，农村经济准国营化，集体经济向国营经济靠拢，消除一切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实现“一大二公”也是苏共经济建设重要指导思想之一。长期以来苏联坚持认为，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而个体经济乃至各种合作经济都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要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必须实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这里判断某种所有制形式是否合理一不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不是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而是公有制观念的纯洁性。

众所周知，鉴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把小工业和手工业收归国有造成的种种问题和损失，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方针。而在工业化时期，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的“退却”，因而随着“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开始，又把这些小工业和手工业重新收归国有。对此，当时提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们与国营企业争原料、争资金、争人力，妨碍工业化的发展。其实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按苏联当时的统计资料，在工业化开始的1925/1926年度，私营小工业企业雇佣的职工人数只占全部工业职

工人数的9.6%，占用的流动资金为全部工业流动资金的1.4%，但却提供了27.1%的工业产值。1927/1928年度的相应数据是6.3%、7.8%、1.0%和19.4%。这就是说，这些小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比整个工业高两倍左右。它们用如此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创造了如此可观的社会财富，这怎么能说与国家争人力、争资源，从而影响工业化呢？如果考虑到这些企业向国家缴纳的高额税赋，那么它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则更为明显。当时私营企业的税率比国营企业高得多。例如，1924/25年度它们共纳税2.9亿卢布，1929/1930年增加到6.22亿卢布。至于这些小工业和手工业在满足城乡人民生活、促进农业发展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更不待言。

又如，在农业方面，长期以来苏联集体农庄庄员的宅旁园地只占全部播种面积的2—3%，而提供的农产品却占全部农产品的25%。庄员的收入30%左右来自个人副业。除了粮食之外，农民的主要食品（如土豆、蔬菜、肉、蛋）70—90%来自宅旁园地。很明显，这种个人副业效益是相当高的，是集体经济的重要补充，也是集体农庄很难取代的。但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无不对农村的个人副业采取限制的方针，特别是在收成不好，农业困难的时期。其理由是它们的妨碍集体经济的发展。

即使对于集体农庄本身，苏共也一直采取限制其发展，力求将其改造成国营农场的方针。在斯大林时期不准集体农庄拥有拖拉机等大型生产资料，不准集体农庄经营工业、商业和其他非农业经营活动。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开始大规模地合并和改组集体农庄为国营。1957—1970年有27%的集体农庄被改为国营农场。所有这些措施都体现了把集体经济改造成国营经济意图和方向。

苏联这种在城市搞全盘国有化，在农村搞全盘集体化以及集体经济向国营经济靠拢政策几十年未变，直到戈尔巴乔夫才重新提出了发展各种合作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必要性问题。但与此同时又在整个社会掀起了所谓“反非劳动收入”运动。在此口号下，

对尚在萌芽状态的合作和个体经济征收高额赋税，各级政府、各种机关对其刁难、卡压乃至敲榨勒索。结果是一些合作和个体经济知难而退，另一些则转入地下，变成了所谓“影子经济”，专搞非法的投机倒把活动。

恪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把先发展轻工业说成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　是突击高速发展重工业还是兼顾轻工业和农业，这本来只是一种经济政策问题，但由于围绕着工业方针的党内争论演变成政治对抗，这一问题就上升到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于是就出现了“先发展轻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之类的理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一社会扩大再生产理论被绝对化，变成了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特有的而且是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循的规律。

斯大林去世之后，接替斯大林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鉴于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人民生活困难，于1953年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压缩重工业发展计划，加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新方针。但当时任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立即举起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这根大棒向马林柯夫打去。所加的罪名是“极端错误的反马列主义见解”，“布哈林右倾路线的翻版”，“违反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结果是，这场已经是姗姗来迟的“生产结构调整”还在规划阶段就被取消。随之，它的发起者马林科夫不得不把部长会议主席的位子让给“规律”和传统的维护者赫鲁晓夫。此后，苏联历届领导人虽然不时强调一下发展轻工业的必要性，但没有一个领导人肯在发展消费资料生产方面下真功夫，更没有一个领导人敢于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些传统理论提出质疑。勃列日涅夫一直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共不可动摇的总路线”。直到戈尔巴乔夫，在他上台后提出“加速战略”的同时也还是强调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预定的机器制造业的增长速度数倍地高于整个工业。

急于求成，对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始终没有清醒的估计　对于

社会主义发展水平和阶段的估计是涉及到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全局构想的重大问题，然而苏共长期以来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始终存在急于求成，左倾冒进的倾向。早在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其标准是：在生产关系方面，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城市经济的国有化和农村经济的集体化；在生产力方面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至于生产力实际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等就不在考虑之列。60年代赫鲁晓夫进而宣布"向共产主义迈进"，提出20年建成共产主义，"我们这一代人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其标准更为简单，就是"土豆烧牛肉"，在人均主要食品方面达到发达资本主义的水平。由于这一简单的共产主义标准看来也很难达到，于是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又改为"已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此后，勃列日涅夫的继承人安德罗波夫又改为"进入发达社会主义时期"。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又从"进入"改为"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继之又改为"完善社会主义"时期。作为一个执政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社会主义建设搞了70余年，竟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准，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而完全是以主观愿望代替现实。其理论混乱到了如此地步的党，很难设想还能够洞察和掌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去搞什么"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上述理论和实践都是苏联经济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我们前面考察的苏联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战略方面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大都与苏共上述指导思想紧密相关。苏共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上述种种偏差的根源就在于：不是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作为教条不分时期，不顾条件地加以机械搬用，甚至把苏共自己一定时期执行的方针政策上升到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高度加以固守。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教条主义。

从"左"倾到右倾，在并不强大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面前举手投降 如前所述，苏共自28大之后领导集团中右倾思想又逐渐占了主导地位，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针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国内外政治、经济多种因素促成的。但从经济方面来看，苏共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方面长期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性质的偏向和错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列宁早就指出过，"左"不过是右的一个转弯。左倾之中包含着右的因素，为右倾的滋长提供条件和温床。从左倾转向右倾在苏共历史上并不乏其人。苏联经济改革方向的扭转，十分鲜明地反映了苏共领导人从左倾转向右倾的内在逻辑。例如，戈尔巴乔夫之所以从经济改革转向政治改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企业"三自一全"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推不动。之所以推不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思想阻力。如果说过去国家对企业让利放权式的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上层国家机关的话，那么这次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上层，而且来自基层企业。那些亏损和低盈利的企业宁可吃旧体制的大锅饭，而不愿承担自负盈亏和市场的风险。在苏联这种企业相当多，特别是庞大而有权势和影响的军工综合体的企业。二是实际困难。由于改革长期推不动，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长期止步不前，已经延误了改革的时机，使各种矛盾积累、激化，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各种矛盾的激化，要求加快改革的步骤，加强改革的力度，而经济形势的恶化又使改革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加重了改革的困难。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苏共领导集团不是团结一致，从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带领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而是坐而论道，争论不休。一些人认为改革方案仍很保守，难以克服旧体制的深刻矛盾，因而对改革方案的推行不感兴趣；另一部分人则求稳怕乱，对方案的推行畏首畏尾，甚至偷梁换柱。而戈尔巴乔夫等人则改变改革方向，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民主化，调动和借助于所谓"激进改革派"或"民主派"来抵制所谓保守势力。其结果是被一些持资产阶级政治主张的人

所利用；党内的意见分歧演化成了政治对抗，政治改革演化成为政治动乱。这样政治改革非但未能帮经济改革的忙，反而使经济改革变成了政治改革的牺牲品和政治斗争附属物。

当然，经济改革方向的根本扭转并非简单地由于改革出现了困难，更为重要的是苏共的领导层不仅没有克服的勇气，而且对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前途失去了信心，相当多的人甚至对社会主义本身也失去了信念。这乃是苏共领导层大多数成员从接受什么“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到接受“非国有化、私有化”所谓激进改革方案的主要原因。即使反对这种改革方向的某些领导人，如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人，要么委曲求全，要么保持沉默，即使反对也拿不出可以吸引群众与之抗衡的经济改革纲领。总之，不是个别人而是苏共领导层的大多数已经严重蜕变，这是苏共无论在政治战线还是经济战线上在并非强大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面前毫无抵御能力、节节退让乃至举手投降的重要原因。

六　经济危机的社会结果

经济危机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损害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为国内外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进攻提供了条件和借口，成为引发政治危机、信仰危机、民族危机的重要因素。正是各种危机相互交织、相互推动构成了整个社会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剧变。

苏联在经济竞赛中的失败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　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建设一直处于国际阶级斗争的环境之中，经济战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较量的一个重要战场。

战前，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两度击败了国际帝国主义的

武装进攻。战后，帝国主义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也被击退。军事进攻的失败，迫使国际帝国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势力调整其与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策略：在不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将其进攻的战略重点由“军事演变”转移到了“和平演变”上。国际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包括思想渗透和经济竞赛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配合，而且经济战线越来越成为国际反动势力与社会主义力量斗争的主战场。

应该说，对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苏联历届领导人都是相当重视的。但长期以来，苏联始终把速度、数量和军事实力量的增强放在经济竞赛的首位，把“赶超”首先理解为速度和数量上的赶超，力争速度第一和速度优势。而且，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苏联逐步走上了与美国争霸世界的道路，这又刺激进一步加强军备，经济竞赛实际上变成了军备竞赛。

在经济竞赛的速度和军事实力方面，苏联确实长期以来处于优胜者的地位。例如，根据苏联的统计，在1960—1985年期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了2.9倍，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只增长了1.5倍，其中美国只为1.2倍。同期，苏联国民收入占美国的比重由58%上升到66%，工业由55%上升到80%，农业由70%上升到85%。当然，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明显有水分。如果按官方统计提供的增长速度计算，苏联工农业产量早应超过美国了，而不是现在的80%和85%。而按现在苏联学者的计算，苏联工业产值只为美国的48%，农业产值只为美国的64%。根据美中央情报局的估算，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速度在1950—1981年间只为4 6%。尽管如此，苏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其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但是，如前所述，苏联的高速度长期以来是用高投入、高消耗来维持的。因此，如果考虑到经济效率特别是经济效益，那么，苏联在速度上赶超则相形见绌了。例如，按照苏联官方的统计数

字，苏联的工业劳动生产率1985年只为美国的55％，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应只为25％。而且，这一比重自70年代以来就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数据仍然是在上述增长速度基础上计算的，如果按照苏联学者近年来的数据计算，上述比重则为38％和9％。至于在这劳动生产率提高，也就是活劳动相对节约背后掩盖着的巨大物资和设备高消耗，前面我们已经涉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在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科技成果的利用和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已如前述。

科学技术落后，国民经济的高消耗低效益，就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经济竞赛中的速度优势。事实上，苏联经济增长的速度优势也是不断减弱的，到了80年代中期，其速度优势已基本丧失，到80年代末已变成了劣势。例如，按苏联自己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平均产增长率，1981—1985年期间为3.2％，1986—1988年期间为2.8％，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平均相应为2.6％和3.3％，更不必说进入90年代以来苏联经济从负增长到急剧滑坡的情况了。

科学技术落后，国民经济的高消耗低效益，最终的后果是阻碍人民生活的提高。70年代以来，苏联已成为世界军事和重工业超级大国，但人民群众的总体生活水平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根据西方的计算，1979年苏联职工的月收入只为美国的30.5％，西德的24.9％，法国的28％，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水平只为美国的1/3。苏联自己也认为到1975年，居民的实际收入只为美国的一半左右。现在苏联的人均住房面积只为16平方米，而发达国家则为20—30平方米，苏联城市每百个家庭拥有小汽车15辆，而发达国家则为60—70辆。至于诸如彩色电视机、音响、录相机、摄像机等现代化家用电器则更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落后于我国。应该看到，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到小康水平之后，人们就越来越重视上述现代化的生

活资料，将其视为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而苏联恰恰是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了。

由上可见，苏联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经从局部性的速度优势演化成科技、质量、效益、人民生活水平乃至速度本身的全面劣势，唯一保持赶超势头、甚至达到了领先地位的是军备竞赛和军工生产。军事超级大国地位取得了，国民经济也被拖跨了。这一现实充分反映了苏联“唯军事”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局限和深刻弊端。

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 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赛中的失败，一方面暴露了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矛盾和弊端，同时也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从而成为诱发全面的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

首先，经济危机导致了相当多的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于共产党的信任危机。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之所以产生和得以传播，他的错误路线之所以提出和被人接受，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之所以在苏联推行，共产党之所以被迫放弃在国家的领导地位乃至被解散，一些共和国的共产党之所以要改名，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经济危机导致的信仰危机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其次，经济危机是诱发民族危机的重要因素。苏联的民族矛盾早已存在，这固然是长期以来苏联民族政策失误以及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结果，但之所以酿成民族危机，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经济危机。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苏联几乎所有民族、每个加盟共和国无不抱怨自己在这个“大家庭”中“吃了亏”，“受剥削”，一些共和国说自己是“殖民地”，而俄罗斯联邦则说自己是“奶牛”，是“输血者”。原因并不在于分配不公，谁剥削了谁，而是苏联经济总体效益低，缺乏吸引力，只有牵制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闹独立性最凶的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而恰恰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共和国，因为恰恰是后者最不愿吃大锅饭，受牵制。

第三，经济危机为苏联国内外反动势力“和平演变”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前所述，国际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图谋由来已久，之所以今天在苏联得手，主要是因为苏联在经济竞赛中败北，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只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种种反社会主义宣传和思想渗透才能奏效，才得以蛊惑人心。也只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才能乘人民群众的迷惑靠国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支持而上台。

撰稿者　王金存　朱行巧

责任编委　罗肇鸿

苏联剧变的政治根源

本文旨在通过苏联剧变的政治根源的探讨，主要从苏联政治体制的角度去研究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政治体制系指苏联的党、国家、社会团体等的体制和职能，它们的相互关系、运行情况以及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还包括构成苏联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政治规范以及统帅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苏联的政治体制是十月革命后，主要是在斯大林执政时确定的。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数十年间，它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所变化，但总的来看，没有离开斯大林制定的模式。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苏联的政治体制有成绩，也存在许多问题。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对苏联几十年形成的政治体制全盘加以否定，并且把西方政治体制的一整套做法生吞活剥地搬到苏联，结果引起严重的政治混乱，最终导致：国家解体，苏联共产党垮台，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废黜。苏联政治体制的剧变主要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后三年中，但与苏联70年形成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病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不准备对苏联政治体制作全面的评述，而主要通过分析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和苏联政治体制中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揭示导致苏联剧变的政治原因，以便我们从中吸取教训。

一、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是导致苏联剧变的最直接原因

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这六年多时间中，苏联的剧变是在戈尔巴乔夫于1988年把政治体制改革

词和主要内容。第三，提出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广泛运用经济管理方法，抛弃发号施令和行政命令的方法”①。后来又认为在经济中形成的行政命令制度也“扩展到了上层建筑，限制了社会主义民主过程”②。第四，在干部政策上确定“对改革的态度，对实行改革采取的实际行动，是评价干部的决定标准”③，并以此为主要依据撤换了大批党政领导干部。

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开始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曾说，这“不是改变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以便确保我们社会的胜利发展”④。

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之前，尽管戈尔巴乔夫改革政治体制设想中已存在一些错误端倪，但总的来看，他还是强调改革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在苏共领导下进行。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发动人民群众投身改革的途径，对政治体制上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阻碍机制”进行改革，重点放在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的疏远”，影响人民群众积极性发挥的弊病上。

2、后期：走向全盘否定苏联过去的政治体制，主张以“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全面改造苏联社会。

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6月底7月初举行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宣告苏联全面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并以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战略目标。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

---

① 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真理报》1987年1月28日。

② 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真理报》1987年11月3日。

③ 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真理报》1987年1月28日。

④ 戈尔巴乔夫1988年2月18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真理报》1988年2月19日。

革》长文，进一步提出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苏联开始了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进程。

这时戈尔巴乔夫已把苏联70年形成的政治体制看成是“官僚专制制度”、“兵营式社会主义”，强调当时改革搞不下去是由于“管理机构的官僚阶层以及有关的社会力量”和“官僚专制制度”的抵抗，因此他转而认为，以往的体制并无任何可取之处，必须对之进行“根本改革”，并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作为改造苏联社会的目标。

鉴于传统社会主义在苏联深入人心，为使自己的提法不被人视为异端，戈尔巴乔夫一再引用列宁讲过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句话，为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造舆论。这时候他对“社会民主党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表示巨大的兴趣，一再表示准备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全面改造苏联社会的思想。首先，他进一步宣扬他几年前曾讲过的以人为核心的思想，声称“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人的面貌”[①]，并把实现人权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第二，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思想来源多元化的观点，并把它写进苏共28大文件中。第三，在国家问题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的概念，强调“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②]，实质是否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和暴力机关。第四、接受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多党制、议会斗争的观点。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开始逐渐向“西方”靠拢。最突出的是二月全会正式接受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形式，从根本上改变了苏维埃制度。

---

①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②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28大纲领性声明），《真理报》1990年7月15日。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已有70多年的历史，加之戈尔巴乔夫思想变化有个过程，因此，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一个混合物，其中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居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也在不断增多，而社会主义的成分却越来越少，后来则仅仅成为口头上、形式上的东西了。对于仅存的一点社会主义的形式，如人代会、苏维埃，当感到它们对他推行激进改革有掣肘作用时，也想方设法另搞一套来取而代之。

应该说明的是，到了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起，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预想的那样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的错误

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践也必然产生错误。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在党的问题上否定苏共在苏联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和领导作用，名为革新党，实质是削弱和取消党。

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针对苏共自身存在的问题，在划分党政职能，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因此受到广大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但是，自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之后，尤其是在1990年中央二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在党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错误的做法，把党的自身改革引上了错误的方向，使苏共的性质和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和苏共的瓦解。

首先是错误地划分党政职能。合理划分党政职能，是列宁晚年的重要思想和遗训，无疑是必要的。然而戈尔巴乔夫不是在合理划分党政职能和完善苏共领导，而是歪曲列宁的思想本质，不分具体历史背景机械地套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从政

党代政、党包揽一切的极端走到放弃党的领导的另一个极端。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确定，凡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部重大问题，都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去研究解决，党不再对国家机关直接下达指示。1990年中央二月全会决定放弃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紧接着召开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关于苏共领导作用的苏联宪法第6条。苏共28大更加明确规定，要"彻底完成全部政权交给各级苏维埃的工作"。从苏共28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来看，除戈尔巴乔夫外，凡政治局委员均不得担任包括副总统、最高苏维埃主席、政府总理及其部长在内的国家和政府领导职务。与此同时，党不再管干部工作，使苏共失去了执政地位的组织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党内各派斗争激烈，党的纪律松弛，国家和政府机关中的党员不执行党的决议。结果，党的总领导作用和通过党员在国家和政府机关执行党的决议来体现党的具体领导，统统化为乌有。

其次，在多党制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犯了致命错误。在1989年12月前，戈尔巴乔夫并不同意在苏联实行多党制。但是在党内"激进派"和非正式团体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1990年1月13日在立陶宛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为在苏联实行多党制打开了缺口。他说，"如果出现了多党制并且符合社会的实际利益，我没有看到多党制会有任何不幸"，"因此不应当象魔鬼怕神香一样地害怕多党制"。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的苏联宪法和1990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社会团体法》以及苏共28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以宪法、法律和党纲的形式把多党制固定下来。结果造成苏共分裂加剧，以反共、反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为宗旨的形形色色的政党、团体和运动大量涌现出来；在党内和全国形成了无法控制的政治局面。它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共。最初，在1990年上半年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使苏共在许多

加盟共和国和大、中城市丧失执政地位，后来，在1991年“8，19事件”后，则宣布共产党非法，没收其财产，禁止其活动，勒令其报刊停止出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戈尔巴乔夫一手断送了苏联共产党。

再加上戈尔巴乔夫在苏共自身建设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这就使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失去了社会主义方向，为苏共的瓦解和联盟的解体准备了条件。有关这方面问题在本书有关苏共的专文中有详尽论述，这里恕不展开。

2．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下把民主绝对化，促使随心所欲、不讲法纪的无政府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日益泛滥。

长期以来，苏联的社会政治生活严重缺乏民主，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有限。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对民主的要求日趋强烈。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最初提出的“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即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扩大民主，是顺应民心的，因此受到普遍欢迎。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始阶段，这对于发动群众，打破人们的思想禁锢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民主总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总是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民主有其不同的质的规定性。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不是用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是成为各种反动势力攻击甚至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1988年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充分证明这种“民主”的实质和危害。他们在1988年中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后引发的混乱局面，无不与戈氏倡导的“大民主”有密切关系。

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一面猛烈抨击苏联几十年来“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却是独断专行”，一面讲“给人提供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意见机会的政治自由”。联系到当时苏联国内已经出现的以批判斯大林主义、批判“极权主义”、“专制

主义”为名，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之实的情况，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民主”恰恰加剧了舆论界否定社会主义，否定苏共的倾向。当时社会上以及报刊上掀起的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的思潮是打着“民主化”、“公开性”的旗号或在这种旗号的庇护下出笼的。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提倡的“民主化”，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

在法制建设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偏差。(1)修改宪法第6条，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使苏共降低为与一些新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政党相同的普通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2)修改了苏联宪法第7条，抹杀政党、法律的阶级性。各加盟共和国的选举法、大众新闻媒介法、社会团体法都作了类似的修改。正是由于抹杀了法律的阶级性，不提法律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实质性问题，为形形色色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开了绿灯 (3)忽视法律应具有的连续性、稳定性和统一性。戈尔巴乔夫时期制订的一系列法规与以1977年宪法为依据制订的各种法规反差过大，许多重大法律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包括国体政体这样一些根本问题，社会和人民无法适应，引起了混乱。例如苏联宪法，从1988年12月到1990年12月的二年中连续修改、补充过四次，每次修改又引起其他法规的连锁性变化。苏联宪法和法规也逐渐失去统一性。由于民族问题的出现，各加盟共和国也不再以苏联宪法和立法纲要作为规范本共和国法律的依据，致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和运行失去准绳。(4)政治动荡、执法机制遭到破坏，法律失去强制性和威严性。由于各共和国、各地区自行其是，无政府主义泛滥，联盟法律不起作用。执法机关纵向机制中断，很难正常工作，往往对违法案件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消极态度，这是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基本上否定了苏联宪法，把西方的一整套东西生吞活剥地搬到苏联，违背了法律所固有的阶级性、连续性和长期性的规律，引起全国混乱，为形形色色的反

共分子上台创造了条件。

3．错误地使用“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导致苏共领导权的丧失，使苏维埃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场所，造成全国的“权力真空”和政治混乱。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了改革苏维埃制度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同样犯有错误。

(1) 错误运用“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致使苏共丧失对国家的领导权。

第一，戈尔巴乔夫片面夸大苏联政治体制集权弊病的一面，忽视这种体制的历史作用。他没有充分考虑到苏联70年的历史实际，即苏共作为权力的中心，实际上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机关转移的任务。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苏共撤消了领导经济的机构，却没有在苏维埃中建立起相应的机构。苏共交出了权力，苏维埃也没有掌握“全权”，国家出现了“权力真空”。苏联国家管理体系逐渐陷入全面混乱，经济失去了控制并遭受严重破坏。

第二，戈尔巴乔夫设想通过选举使共产党人掌权。可是，由于他一方面把苏共看作是影响改革的“阻碍机制”，在社会上煽起了丑化和诋毁苏共的思潮，另一方面又扶持各种社会团体与苏共竞争，其结果是各种社会组织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和戈尔巴乔夫煽起的思潮大造声势，抢夺苏共让出的苏维埃权力。1989年春苏联地方苏维埃选举中，反对派在许多地方得手。1990年3月苏共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在波罗的海三国议会选举中获胜，共产党丢掉了三国政权。“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造成了与1917年时完全相反的结果：苏共丧失了对国家、对苏维埃的领导权。

第三，议会成为各种政治派别的角斗场，社会经济政策议而不决，人民群众远离国家权力的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苏联国家权威受到削弱。1989年5月苏联改变了权力结构，人代会成为代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常设机关——议会。由

于人民代表的选举和议员的选举是在政治多元化和舆论对苏共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批苏共的反对派头面人物当选，这不可避免地把各种思潮、政治倾向也带进了国家权力机关。苏共内部政治上、思想上也不统一，形成了各种派别。党内自由派分子与苏共反对派沆瀣一气，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议会中形成了23个议员团。大多数议员醉心于政治斗争，对经济并不关心，经济改革无法正常进行。同时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其是，严重地威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立法权，人民与国家权力相脱离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2) 从苏维埃制度转到三权分立，使国家管理体制发生根本变化。

在苏联国家管理体系陷入困境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改革计划"是否符合苏联国情，而是逐步放弃苏维埃制度，机械照搬西方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权力结构，频繁变动国家权力结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第一，在具体执行"全部权力归苏维埃"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家失控，新的苏维埃权力体系不能正常发挥其管理国家的职能时，戈尔巴乔夫便把目光转向西方国家政体模式，幻想采用西方国家治理国家的办法来摆脱困境，并声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①。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表明，他已不再从人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上来考虑完善苏维埃制度，而是转向从权力制衡方面去寻找出路了。于是，开始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第二，频繁变动国家最高管理系统，缺乏相对稳定，使国家管理机构不能正常行使其管理职能。1985年以后的苏联先后四次修改、补充宪法，每一次都涉及国家权力结构这个重大问题。人

① 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真理报》1989年11月26日。

民代表大会制、议会制、总统制、内阁制不断出台。而许多职务和新建立的机构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又没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如总统制建立后，苏联总统和部长会议之间的权限出现重复，又未规定隶属关系，致使不久之后又修改宪法，把部长会议改为内阁，确定了对总统的隶属关系，这种不断的变动，不能不对国家管理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随着苏共领导作用的迅速消失，国家权力系统处于各种政治派别争夺的中心。首先，立法权的拥有者——议会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竞相斗争的场所，重大问题议而不决。在各共和国纷纷闹独立，宣布本共和国的法律高于一切的情况下，苏联的立法机关实际上已形同虚设。就连苏联解体这种纯属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也无须经由它的批准和宣布。其次，行政权的拥有者——苏联总统由于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自己最大的支持者——苏联共产党，而变得无足轻重了。本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后，拥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后来还掌握了一部分立法权。由于他自身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因此不可能运用手中的权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再次，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就遇到了各共和国挑起的“法律战”、“主权战”，根本无法正常行使护宪职能。该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等人搞的《9+1联合声明》这种显然侵犯苏联议会立法权的做法也无能为力，更无法监督和阻止宣布苏联解体这种从宪法角度来看明显违宪的行为了。

总之，戈尔巴乔夫“改造”苏联国家权力体系的实质是剥夺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权。由于国家政权失去了苏共这样一支政治力量的支撑，致使国家很快陷入了混乱，加之民族分立运动的出现和发展，致使苏维埃制度名存实亡。

4、提倡政治多元化，为各种反对苏共、反对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和政党的出现开了绿灯。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共领导人对群众团体基本上采取放任

自流的政策，从而为多党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错误是：

（1）苏共领导人片面强调个人、集团、群体的利益，放弃了无产阶级代表社会各阶层根本利益这一原则。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开放绿灯，而且放弃原则、妥协、迁就、避让。从1988年开始，苏联涌现出了大量"非正式组织"，只要这些组织标榜"支持改革"，苏共领导无不倍加欣赏，"大力支持"。至于业已出现的具有反共、反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倾向的组织，苏共领导人则认为"他们无关大局"①。当一些组织大肆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时候，苏共领导人却要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学会与之打交道，进行"有益的对话，合作"。

相反，苏共领导人对工会、共青团等原有的社会团体却作了不恰当的批评和指责，说它们不能反映自己成员的利益，指责它们行动缓慢，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从而加速了这些组织的分裂和瓦解。苏联官方甚至片面认为，由于"'合法的'社会团体常常变成官僚主义的团体"②，"现有的组织在工作状况、气氛和方法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③。事实上，改革之初，原有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等还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适当调整与苏共、政权机关的关系，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但由于苏共领导人错误的改革政策，使得局势千变万化，这些组织工作十分被动，对局势的变化无能为力，如1989年夏季爆发的大规模矿工罢工，就给各级工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2）苏共领导人以是否"支持改革"划线，把自发势力视为支持改革的力量，幻想以此推动原有的社会团体和苏共进行自身

---

① 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1988年6月29日。

② 苏《劳动报》1988年8月19日。

③ 戈尔巴乔夫1988年4月8日会见乌兹别克领导人时的讲话，《真理报》1988年4月9日。

改革。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之后，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阵线以支持改革为名相继成立。尽管当时已有不少人指出这些组织具有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的色彩，戈尔巴乔夫还是支持了它们。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人民阵线很快就成了苏共的反对派，以夺取政权作为自己活动的目标，最终导致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而独立，成为苏联解体的前奏。

各种非正式组织的出现，严重冲击了原有的社会团体，形成与其争夺群众的局面。有些非正式组织充当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非正式组织“民主联盟”1988年一出现便提出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即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要求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而在反共势力日益发展壮大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却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其思想基础，接受社会政治斗争中的所谓“自由竞争”原则，最终导致共产党垮台。

（3）一改过去严格控制群众团体的做法，取消党对社会团体的领导，致使苏共失去了联系群众的重要阵地和桥梁，甚至丧失了大批群众。改革之初，苏联还坚持社会团体都应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其职能的原则。但是，时隔不久，戈尔巴乔夫多次提到要在党和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新型的关系”，鼓励工会等社会团体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不要受党政机关的约束。苏共28大的纲领性声明中规定，苏共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运动和组织合作，同一切进步的思想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对话”和“伙伴关系”。苏共对待群众组织放任自流的方针，使群众组织包括共青团组织纷纷宣布“独立”，这无疑削弱了苏共的影响，同时又给苏共反对派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大肆攻击苏共，扩大自己在社会团体中的影响。甚至一些非正式组织和政党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大作文章，公开把反对苏共作为自己的主要口号，并通过与苏共的对抗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4）没有从法律上对社会团体的活动进行规范。首先，作为执政党，苏共领导并未依法对非正式组织的活动进行合理的和必

要的干预，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组织的活动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制止，而是对非正式组织违反现行法律的活动采取了姑息纵容的做法，实际上损害了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丧失了手中强有力的斗争工具。其次，法律的制订大大落后于现实生活。当各种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并积极开展活动时，长时间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当无政府主义已经在全苏蔓延起来之后，才于1991年颁布了工会法和社会团体法，而到此时，这些法律已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次，苏联修改补充宪法和有关法律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团体的存在和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总之，戈尔巴乔夫“调整、改革”苏共和社会团体之间关系的结果是，各种社会团体和政党已变成少数政治家手中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权实行监督，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途径事实上已被切断。

5. 在干部政策上以是否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路线划线，搞大换班和打击一大片。戈尔巴乔夫错误的干部政策是导致苏共垮台和国家解体的关键因素之一。

（1）形而上学地对待干部的任用问题

这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戈尔巴乔夫上任前，苏联在干部问题上基本上采用委任制。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仍沿用这种做法，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主要负责人仍由中央任命，有时甚至不征求当地组织的意见就由中央直接任免。1986年12月，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市发生骚乱，这同撤销库纳耶夫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和由中央直接任命俄罗斯人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这一干部任免做法直接有关。戈尔巴乔夫过份强调以对待改革的态度为标准取舍干部，忽略了民族关系等一系列复杂因素，招致了严重后果。早在1985年5月，他就指出，凡是不想改变工作方法的，尤其是阻挠解决新任务的干部，应该走开。在1987年1月召开的研究改革与干部政策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把如何对待改

革问题视为取舍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对干部队伍进行了大幅度调整。1985年2月至1987年2月州委以上的干部约有160人被撤换。到1988年10月，苏共中央政治局中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仅仅以对待“改革”的态度为标准取舍干部，造成了严重后果。

1988年戈尔巴乔夫先后撤换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对改革“不积极”，随后换上了对改革待“积极态度”的布拉藻斯卡斯(立陶宛党中央第一书记)等人。这些人上任后，以“改革”为名，积极支持分立主义活动。一年后布拉藻斯卡斯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率先宣布脱离苏共独立，并最终导致共产党在这个共和国丧失政权。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发生的问题有复杂的原因，其中同戈尔巴乔夫的干部政策有一定关系。

(2) 后期对干部任用放任自流

这主要是指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之后。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曾强调，选拔、配备干部和对干部实行监督是苏共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党政职能分开，“全部权力归苏维埃”。全苏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苏维埃代表的选举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当选者即掌握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全权”。戈尔巴乔夫设想，通过党委第一书记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来行使苏共的领导。然而，由于苏共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戈尔巴乔夫批判苏共所造成的影响等原因，导致一些地区共产党第一书记纷纷落选，使一些地区的权力和平地落到苏共反对派或苏共党内自由派分子手中。根据1989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行动纲领，各加盟共和国有权独立解决干部问题。这就实际上放弃了苏共中央对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组织方面的领导权，使党的统一失去了组织上的保证。1990年2月苏共宣布放弃“垄断权力”，同年3月召开的全苏人民代表大会上取消了宪法第6条，宣布多党制合法之后，事实上苏

联共产党已完全丧失了对国家干部的任免权。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改革失去了领导核心，失去了正确的方向，而且使党政大权旁落，束手待毙，就连戈尔巴乔夫也被这种干部政策推出的一批人所推翻。

6．在联盟和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上分权不当，在民族分立主义的分权要求压力下步步退让，为联盟的解体准备了条件。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并没有对联盟与加盟共和国权限划分问题予以多大的关注，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才逐渐重视起这个问题。这种变化是由于：第一，戈尔巴乔夫在批判高度集权体制时，无法回避联盟对加盟共和国的严密控制，使加盟共和国很难自我发展的事实；第二，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民族问题开始爆发，在寻找民族问题发生的原因时，他也不能回避原来联邦制中的弊病。为了平息少数民族的不满，戈尔巴乔夫从1988年起许诺要重新划分联盟与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并把这个问题与改革联邦制放在一起考虑。1989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行动纲领，对联盟与加盟共和国的权限作了明文规定，1990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与联邦主体权力划分法》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思想是在维护联盟存在并拥有国防、外交和对涉及全苏利益的经济部门拥有全权的前提下，扩大加盟共和国对其内部政治、经济事务的自主权。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在联邦委员会上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联盟”的构想，并正式提出缔结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从此，划分联盟与共和国的权限问题又与签订新联盟条约连在一起。在实践中，各加盟共和国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缩小联盟的权限。由于各种原因，新联盟条约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签成。戈尔巴乔夫设想通过分权达到联盟与加盟共和国权限的最佳分配，结果却适得其反，由过去联盟集权发展到联盟丧失一切权力，直到最后解体。在分权问题上，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错误表现为：

（1）思想反复多变，缺乏始终如一的标准，并且逐渐放弃了必要的原则。在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苏共领导决定由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对于改革联盟与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却考虑不够。戈尔巴乔夫只是含糊地说："各加盟共和国在完成对全苏的义务之后"，可以自行发展以满足其需要。此后，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建立强大的联盟，强大的共和国"的设想。这一提法在遭到某些人的批评之后，在《苏共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行动纲领中又作了修改，提出了这样的公式："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也就没有强大的联盟"。这意味着把突出联盟的地位变成了联盟与加盟共和国平等重要。民族行动纲领通过后不到半年，还没有认真贯彻实施，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联邦联系多样化问题。到了1990年7月，在苏共28大上，他又提出："联盟……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在分权的问题上变化无常，步步退让，逐渐放弃了必要的原则。

（2）分权是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之后，苏共权力开始削弱，执政地位开始动摇。苏共党内派别以及派别斗争公开化、表面化，苏共实际上已处于分裂状态。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独立；1990年3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共产党在共和国的大选中均告失利，苏共在这些共和国中丧失执政地位。此后，苏共在其他一些共和国中也左右不了形势。联盟与加盟共和国的分权进程刚好与苏共丧失权力的过程同步进行。

众所周知，统一的苏联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的是因为有统一的苏联共产党的存在。从1922年苏联成立到此后70年的苏联历史，都证实了苏联共产党对维系苏联联盟国家的重要作用。苏联共产党自身的瓦解和分裂，等于剪断维系联盟存在的纽带，加速了联盟解体的进程。

(3) 对违宪行为斗争不利，致使分立主义者和民族主义分子有恃无恐。

戈尔巴乔夫执政前，苏联的一切权力集中在联盟，形成事实上的单一制。这是一种极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提出了“分权”设想。由于缺乏始终如一原则加之政治上逐渐失控，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极端，这就是加盟共和国的某些人，利用宪法中有关“加盟共和国主权”的规定，肆意扩大“主权”的内涵。他们借恢复“加盟共和国主权”之名，行民族分立活动之实。1988年9月，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聚会里加，利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提出扩大加盟共和国自主权之机，搞了一个名为《共和国经济核算协商基本原则》的文件，其中不仅提到要把共和国境内的一切自然资源、国家的动产和不动产收归共和国所有，而且提出了发行货币和自定汇率的要求，明显具有分立主义倾向。针对这种情况，苏联当局本应根据联盟宪法规定采取断然措施，制止这种违宪的做法，并引向正确的分权轨道。可是，戈尔巴乔夫竟然接受了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的要求，致使分立主义者利用戈尔巴乔夫的这一错误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如果说，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的问题尚属局部问题，那么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则对联邦解体起了催化的作用。该宣言称，俄罗斯联邦宪法和法律在本国境内高于一切，对于违犯该国主权的联盟法律可以不执行。这实际上是宣告，联盟成员可以不执行联盟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联邦的带动下，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也发表了类似的宣言。戈尔巴乔夫虽然意识到这一宣言的危害性，但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致使分立主义进一步泛滥，最终导致联盟权力的丧失。

戈尔巴乔夫设想通过分权，建立“主权国家联盟”达到“联盟的更新”。由于他的一系列错误不但没有达到合理分权，最终却导致联盟解体，这一教训非常深刻。

二、苏联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病是导致苏联剧变的历史原因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是造成苏联演变的最直接原因，这是勿庸置疑的。同时也应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戈的错误之所以能够付诸实践，殃及全党、全国，是与苏联政治体制方面多年来存在的弊病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弊病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戈尔巴乔夫开始提出改革时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其原因就在于此。

苏联政治体制是在30年代形成的。这种体制的特点是高度集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曾起过积极作用。这种体制保证了当时苏联政局的稳定，也是保证当时苏联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比较适合当时苏联的实际需要，能在非常时期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保证了苏联在30年代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从而为保证苏联在卫国战争开始后迅速把国家转入战时轨道，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并在战后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打下基础。一个"工业化奇迹"，一个"打败希特勒德国"的纪录，曾给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争得了巨大荣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在世界劳动人民中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对苏联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所起的历史作用，需要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与此同时，高度集权体制本身确实存在许多弊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些弊病暴露得更加明显，这主要表现为：

1．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党的工作命令化、官僚化。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

的建立、发展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与失误，都同苏共息息相关。苏共执政70多年，成绩很大，同时问题也不少。从政治体制角度来讲，主要是党政机关职能不分，以党代政，党的工作命令化、官僚化。这是苏联中央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病之一。苏共成为执政党后，就逐渐出现了党包揽一切，党政职能严重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党组织把自己混同于苏维埃政权组织，包办代替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务。列宁晚年曾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提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能”，严肃批评党的某些领导人“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行政方面”，“太热衷于行政手段”①。但后来的苏共领导人并未认真贯彻列宁的指示。其结果造成：

各级党委代行各级苏维埃政权和管理机关的职能，苏维埃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了“装饰品”，不能充分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造成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工作上推下卸，不负责任。

党政机构重叠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行政命令盛行。如1934年改组后的联共(布)中央机构增设了与行政部门相对应的党中央农业部、工业部、运输部、计划财政贸易部等。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的部级单位进一步增加到20个，比1948年增加一倍。结果部门林立，各成系统，人员庞杂。由于机构臃肿和缺乏有效的人民监督，党的机构逐渐官僚化、工作命令化。

党组织琐事缠身，无暇深入调查研究和妥善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妨碍党进行“总领导”。同时，也使各种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党，群众的意见和不满情绪便直接向党组织身上发泄，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这就削弱了党组织在各个阶级、阶层利益之间的协调作用和及时调整政府领导人、改变政府政策的应变能力。

党政机关职能不分，以党代政，最终导致“党不管党”，影响

---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617、623页。

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自身建设。

2．苏维埃制度形式主义化，立法、行政机制长期不健全，造成人民与政权机关的疏远。这表现在：

党政不分使国家政权机关很难独立解决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国家政权机关实际上变成了党的执行机关。苏维埃甚至无权决定属于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事情。

另外，苏维埃及其执行机关之间的关系出现倒错，苏维埃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执行机关。苏联多年的实践是：第一，各级执行机关的领导人有很多同时是同级苏维埃的代表，这使得苏维埃对执行机关的监督变成了某些人自己对自己的监督；第二，地方苏维埃的执委会身兼两种角色：既是苏维埃的执行机关，又是苏维埃的常设机关，苏维埃闭会期间，它们行使苏维埃的部分权力，而且苏维埃会议由它们召集，甚至连日程安排也由它们确定，实际上造成了执行机关决定立法机关的行动的局面；第三，由于受部门领导原则的影响，地方苏维埃长期以来无权过问其管辖地区内上级管理机关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经济社会活动，这就使苏维埃对政府的监督流于形式。

由于党的机关侵占了苏维埃的部分立法权和监督权，行政机关侵占了苏维埃的部分执行权，使苏维埃的权力大为削弱，在某种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根据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每年举行两次会议，每次会议2—3天。由于会议次数少、会期短，待集中审议的提案和待通过的文件很多，只能走走过场，草草了事。人民代表不能充分发表意见和行使权利，苏维埃成了纯属履行批准党政机关决议的工具。

由于苏维埃选举制度存在问题，人民难于通过自己的代表机关对国家实行管理。苏联长期实行等额选举制，选民没有选择的余地，候选人由上级确定，因此，往往缺乏代表性。这种代表往往不对人民负责，而只对上级领导人负责。一些代表议政能力不强，影响了苏维埃本身的质量和活动。

由于苏联历届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问题认识不足，使苏维埃权力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而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造成人民对政权的疏远。

3. 损害了联邦制原则，引起加盟共和国的不满，积累了严重的民族关系问题。

1922年苏联创建时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享有的权限规定比较明确。斯大林执政后，特别是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开始受到削弱。1936年宪法将削弱加盟共和国权限的做法固定化。各加盟共和国在许多问题上逐步丧失自主权。丧失了安排自己事务的可能性，从而引起各加盟共和国的不满。30年代一些加盟共和国中曾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皆被以“民族主义”罪名镇压。

赫鲁晓夫从1955年开始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经济管理、立法、行政区划、司法等方面的权限，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加盟共和国的积极性，同时，却又引发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赫鲁晓夫发觉各加盟共和国存在谋求分立的潜流之后，从60年代开始，又将分散的权力逐步集中起来。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基本上维持了将权力集中于中央的做法。采取条条（部门）管理为主的方式加强联盟集权。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戈尔巴乔夫执政乃至执政后一段时间。

中央高度集权，加盟共和国权利甚微。198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中联盟企业占58％，联盟兼共和国所属企业占31％，共和国所属企业仅占6％①。经济大权完全操在各部委手中。中央各部委在加盟共和国修建新项目竟可以不经过加盟共和国批准，甚至有时连商量都不商量。而不合理的建设所带来的移民、环境污染、住房和公用设施紧张等问题却要共和国自己解决和承受。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之间权利失衡，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很少考虑民族地区

① 《苏维埃国家与法》1989年第1期第36页。

的需要和利益，共和国甚至无权过问中央决定的涉及本共和国的事务，这一切极大地挫伤了加盟共和国的积极性，伤害了各民族的利益和感情，违背了列宁以联邦制原则组建苏联的初衷。在这种体制下，即使在民族地区建起了很多厂矿，经济有很大发展，民族矛盾却并不因此而减少。相反，在民族自我意识增长的情况下，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矛盾只会日益加深，冲突在所难免。

4．缺乏民主，影响人民积极性的发挥，造成广大人民群众与政权疏远。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人民享有广泛民主的社会，列宁十分重视民主问题，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因为战争环境和其他因素迫使他采取了许多集中的措施，在晚年他仍把发扬民主作为政治体制建设的基本方针。总的来看，列宁时期苏联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比较正常。斯大林执政后，民主风气日渐淡薄，到了30年代逐渐发展到个人迷信、个人专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对斯大林的错误做法作了某些修正，也讲了不少发扬民主的话，但仍未进行扎扎实实的民主建设。苏联社会严重缺乏民主主要表现在：

党内民主很差。长期以来，苏共把民主集中制的重点放在集中上。斯大林利用掌管的权力压制不同意见，把党内意见分歧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用开除、流放，甚至用肉体消灭的方法处理，逐渐形成了一言堂和家长制。集体领导原则遭到破坏，党内权力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一段时间党内连形式民主也没有。党章有关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期限的规定遭到严重破坏。一切重大事务都由政治局、书记处，主要是总书记本人决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会议定时召开，但每次中央全会会期很短，很难充分讨论问题，往往流于形式。一言堂、家长制仍很盛行。

由于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中，造成决策不民主，通过的决定常常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的东西很多，不能真实

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决策失误也给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带来消极后果。

国内政治生活不民主。由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国家政权机关的权力过分集中在党的手中，使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在中央手里，不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上述情况导致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

社会生活不民主。尽管苏联宪法和法律中对人民参加管理作出了若干规定，但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享有的民主权利受到很大限制。例如，苏维埃代表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官方指定。人民对党政机关的监督流于形式，对不称职，甚至违法乱纪的官员也只能听之任之。人民群众在这方面感觉不到民主。

在科学和文化领域中垄断言论，甚至连正当的学术讨论也横加干预，使苏联学术界死气沉沉，科学发展受到阻碍。

监督流于形式。尽管多年来苏联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监督机构，也通过了大量的决议、决定，但监督效果却十分有限，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监督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那些受监督的组织和公职人员，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这些监督人员不愿意得罪领导。另外，干部的委任制和终身制使一些干部拥有“铁交椅”，犯了错误的干部通常只是换换位置而已。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对“人民监督”、“发扬民主”一类宣传持冷漠态度。久而久之，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漠不关心，与政权逐渐疏远。

5．破坏法制，滥用专政，留下严重的社会创伤。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70多年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法规体系。它对维护社会主义的革命成果和保障社会主义建设起过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苏联法制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有的还十分严重。如立法质量不高，法律不完善，立法工作受“左”的思想影响很大等。

苏联宪法中缺乏对国家元首不称职时如何罢免的规定，使国

家最高领导人的行为处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之外，致使有的领导人独断专横、践踏法律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在其执政期间无法得到制止。另外，苏联三部宪法中都有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退盟的规定，可是却一直没有对退盟程序作出明文规定。只是到了1990年才匆忙搞了个《苏联解决与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然而，由于事态发展到严重地步，该法并没有发挥作用。不管当初立法者如何考虑，关于自由退盟的规定为一些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提供了法律依据。

苏联立法工作受"左"的思想影响很大，这突出表现为苏联法律过分强调法律的惩罚职能，而忽视教育职能，不能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过大。例如，1934年6月8日通过的"叛国罪法"竟规定，对"叛国罪人家属剥夺选举权并流放五年",1936年苏联宪法第131条规定："凡侵犯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者即人民之公敌。"根据这一条文制定的法令，当时竟将废品生产者、生产废品的企业领导人、盗窃犯、投机倒把者，不论情节轻重均处以重刑。由于这种"左"的规定，造成打击面过大，并株连一大批人，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苏联法制工作中最大的问题表现在有法不依，滥用专政，造成严重的社会创伤。

苏联是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法律完善要有一个过程，这是可以理解的。苏联法制建设中严重的问题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对已制定出来的法律不认真遵守，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人治大于法治，甚至发生滥用专政工具，草菅人命的情况。这极大地玷污了社会主义形象，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严肃性产生怀疑，同时为一些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口实。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强制搬迁11个民族就是其中两个非常突出的例子。

1934年基洛夫遇刺后，苏联专政机关以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为借口，绕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对所谓的"人民的敌人"进行大逮

捕、大镇压，1937—1938年达到高潮。据原克格勃副主席波罗日列夫透露，1930年到1953年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有377.8万人，其中786098人被处决。不能说这些人都是错判，但无辜受戮者确实占绝大多数，其中包括许多党政领导人。如果加上集体化中被惩罚的农民以及遭到株连的家属，在斯大林执政期间竟有近千万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种无故杀戮竟发生在和平时期。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毁掉了大批国家栋梁之材，而且毁掉了社会主义形象，少数人物的错误决定使共产党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

苏联发生的另一起不遵守法制、滥用权力的事件是1937—1944年间把11个民族从世代居住地强行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西伯利亚等地。这几乎涉及300万人。搬迁过程中因条件恶劣、气候地理条件不适应等，大批人员死去。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苏共作为执政党，完全可以通过立法形式维护自己的统治，运用法律打击反对派。法律一经通过，就应遵守，否则后患无穷。人们在当时的暴力下不敢讲"不"，可是一遇机会总要提出来。加上长期不进行认真的平反，人们对30年代的错杀无辜的做法一直不能容忍，积怨已深。所以当有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是"极权制度"，大肆宣扬西方民主时，很容易在人们的心目中引起共鸣。极"左"的历史错误为戈尔巴乔夫推行"右"的东西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6．苏共过多干预社会团体事务，使其不能充分发挥应有职能。

长期以来苏共对社会团体的领导并未坚持列宁倡导的政治上的领导，而是对社会团体章程的制定、组织原则和活动方法、干部的挑选和配备大包大揽。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曾提出发挥社会团体作用和扩大其职权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在70年代，苏共中央、政府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就有关社会团体所管辖的问题共同发布命令、决定的做法被广泛采用，并被称为是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创举”。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实际上没有加强而是削弱了党对社会团体的政治领导，并造成社会团体的干部推诿、依赖情绪，不能担负起积极、有效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重任。

此外，社会团体活动单一化、形式化、行政化、官僚化，以苏共组织原则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忽略群众团体自身的特色，使社会团体不能代表和维护其成员利益，充当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的使命。工会虽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肩负着生产、生活、教育、维护四大职能，然而，却往往忽视维护职工利益这一职能，在职工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出现纠纷时，不能理直气壮地维护工人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与官僚主义者作斗争，弥合工人群众与企业行政领导之间的裂痕。许多工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都把主要精力和财力用在搞福利上，使社会团体看起来更象是一种社会福利机构。

7．干部人事工作中的事实上的委任制、终身制，造成广大干部思想僵化、官僚化、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

列宁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开始主张委任制。晚年他在对苏联革命进程进行认真思考的同时，提出干部工作要逐步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

可是，从斯大林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干部工作并没有按列宁要求去做，存在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第一，苏联多年来采用的干部委任制使干部形成了“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不良倾向。一些人阿谀奉承，哗众取宠，不讲真话，追逐私利。委任制还常常导致以我划线挑选干部，“一朝天子一朝臣”，不能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干部一道工作，这不利于党内民主、不利于纠正错误倾向，对社会主义事业危害极大。第二，干部领导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不仅使干部队伍老化，思想也容易僵化，并使大批有才干的中青年干部被埋没。由于干部的待遇不取决于他们的政绩、劳绩，而取决于他们的官职，因此，许多干部为保

住官位，不愿意冒风险、搞改革，往往明哲保身，不求进取，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干部犯了错误或不胜任工作，也只是调换一下位置。干部终身制还容易形成领导干部的家长制作风，个人专权，造成决策失误。第三，在干部教育和干部管理方面，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多。对干部考核和监督的一些规定，往往流于形式。在监督方面，对一般干部多，对高级干部少，对领导人更少。在干部培训工作中长期偏重于教条主义的灌输，不能使干部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第四，接班人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接班和交替问题没有解决好。苏联领导人的更换都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绝大多数是因为领导人的死亡，只有一人（赫鲁晓夫）是被赶下台的。这种接班方式往往使党内和社会上对领导人的更换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比较充分的酝酿，容易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又很难及时纠正。第五，干部特殊化很严重。长期以来，苏共高级干部在住房、医疗、休假、购物等方面都享有特殊待遇。在大多数人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条件下，这种做法极易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苏共干部制度和干部工作中的失误在戈尔巴乔夫等人身上得到了最明显的反映。这些出生于30年代初的干部受到苏共长期的教育、培养和重用，却成了推动苏联演变的急先锋。这不能不说是苏共干部政策的大失败。

高度集权体制的最大弊病在于缺乏民主，一切事情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说了算，这就很容易造成决策失误。长期以来，苏联领导人"左"倾思想严重，迷信教条，思想僵化，不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政策，在经济领域对商品货币关系、市场与计划关系、所有制问题等的看法凝固化，并扼杀人们的有益探索，结果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对外关系领域推行霸权主义，大搞军备竞赛，出兵阿富汗，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在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中苏联吃了败仗，这是高度集权体制弊病带来的严重后果。

苏联社会民主空气淡薄，领导人的话即被视为真理，各种思想得不到交流。领导人满足于表面上的“一致”，实际上问题很多。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说教充斥苏联报章，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不解决问题。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生活和理论上也处于停滞状态。苏联社会后来发生剧烈动荡，与苏联社会长期缺乏“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无关系。

苏联政治体制弊病及其带来的后果使社会主义的形象受到玷污，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减弱，动摇了社会主义在许多苏联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给一些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口实。

三、基本教训

通过对苏联政治体制和戈尔巴乔夫改革错误的分析，面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惨痛现实，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看法：

1．必须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方针。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30年代形成40年代定型的，这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巨大作用。战后，世界形势和苏联国内情况都发生了变化，继续维持这种体制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和变化需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不同程度地对这种体制进行过改良，但成效不大。这种体制仍然对经济社会发展起某种阻碍作用。戈尔巴乔夫对高度集权体制进行改革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客观形势的需要。如果改得好，将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苏联发生的问题不是出在要不要改革上，而是出在如何改革上。

改革政治体制的终极目的应该和改革经济体制一样，主要在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过，作为政治体制改革还应有它的特殊内容和目标。例如，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改革应该有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使各民族能够得到共同的发展和繁

荣。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应该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加强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要求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是搞好经济改革的重要保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恰恰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与后者的关系，在改革的目标选择上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逐渐抛弃了党的领导，结果导致作为国家支柱的苏共垮台，苏联国家解体，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群众为此蒙受重大的损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该进行改革。苏联如不改革，仍象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那样停滞僵化，迟早也会被排除在世界进程之外，甚至不排除苏共垮台和联邦解体的可能。但改革方向错误也会导致出现历史的倒退。因此，坚持改革，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和方针，这才是达到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

2．加强党的领导是确保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运行的关键。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纵观苏联历史可以看到，苏联的成立和苏联70年的兴衰都与苏共的领导息息相关。苏联共产党的任何变化都会对政治体制产生重大的、全局性的影响。

70年来苏联共产党执政期间，不重视自身建设，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思想僵化，党内缺乏民主，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以党代政，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这些弊病带来严重的后果。事实证明，苏共本身处在不断的蜕变之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未能从实际出发，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正确措施，治愈患者，而是采取了错误的“治疗方案”，使患者丧了命。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把一个拥有90多年历史，1900万党员的大党葬送，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责。

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各国的实践都表明，一个国家是否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党是否执政有密切的关系。一旦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制度也就随之会被抛弃。因此，加强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是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

3．必须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苏联政治体制中长期

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发扬民主的问题。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大问题。在世界形势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显得尤其重要。从苏联情况看，70年前苏联有70%的文盲，农村人口占82%，当时采用高度集权治理国家的办法可以为人民所接受，并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发展。80年代苏联情况变了：不仅消灭了文盲，而且，城乡人口比例发生了变化，1989年城市人口已占66%，城市人口中15岁以上的人有94%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农村人口中15岁以上的人有86%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仍因袭70年前治理国家的传统做法，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生活和参政议政的合理要求，就很难得到人民的拥护。1990年后，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明显下降了，人们虽有不满，但未见广大群众出来进行有力的反抗和斗争，原因很多，其中与人民对精神领域的禁锢被解除感到满意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当戈尔巴乔夫等人滥用职权，把党和国家引向崩溃并导致亡党亡国的时候，人民群众却又无力起来阻止这一进程的恶性发展，说明一个严重脱离群众、长期没有民主基础的国家政权，又是何等的脆弱！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何等的重要。

与民主相关的还有法制问题。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如果自己制定的法制自己不遵守，就会在道义上失信于民。加强法制建设，变人治为法治，这是苏联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种情况也最容易败坏共产党的声誉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

4. *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机关工作的监督*。不能说苏联不重视监督工作。从列宁时期开始，就把监督工作列为党和国家

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70年来，无论是对党的监督，还是对行政部门的监督，都采取了不少措施，这对防止党政部门滥用职权、官僚主义和腐化变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可是，与此同时人们也注意到，这种监督的效果有限，特别是没有能够制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蜕变。这与监督体制本身有很大的关系。实践表明，苏联的监督对下重于对上，对党外重于对党内。特别是苏联党政高级领导人往往置身于各种监督之外。这就使得苏联所发生的许多破坏法制、滥用职权、搞特殊化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监督，甚至还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解释。有些问题即使认识到了也无法及时纠正。人民群众对此十分不满，久而久之，导致了人民对政权的冷漠。人们不再把党的干部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公仆”，而把他们视为“老爷”。有90多年历史的苏共倾刻间垮掉，人们对此却反应冷漠，这不能不说明，长期拒绝人民监督者到头来势必遭到人民的遗弃。搞好监督工作是防止党政官员腐化变质、防止特殊化的重要手段，也是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的有效手段之一。

5．必须重视干部人事制度建设尤其是接班人的选择。苏联的变化是共产党内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曾经身居苏共重要领导地位一些人带头搞起来的。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带头反对共产党，这是苏联干部政策的一大失败，是苏共长期执行的错误干部政策的必然结果。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一班人在苏联剧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苏联70年后垮掉了，不是垮在老一代人的手中，而是垮在一批没有经历战火考验、在和平年代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手中。这批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治理国家的新的战略和任务，甚至运用新的思维方式，采用新的工作方法，表现出更具有新的时代特色，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是在他们面前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课题，这就是如何对待党的历史、国家的历史，如何对待以往国家领导人的功过，即如何妥善地把握和处理好发展和继承的关系，从而引导国家继续前进。由

于主、客观上的种种原因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一些前领导人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历史事实，共产党人理应正视。问题是作为后来者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看待这些错误，是从总结教训出发更好地领导人民群众前进的立场批评这些错误，还是借批评错误为名一古脑地否定历史，这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会导致截然相反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就出在不能辩证地、历史地看待以往的问题，他从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开始，最后发展到批判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的历史。其结果不仅造成思想上理论上的极大混乱，使改革无法进行，而且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

6．必须处理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不久便提出了进行经济改革。应该说，在一个实行了半个多世纪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的大国进行经济改革，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事情，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是不足为怪的，改革出现反复这是很难避免的。而戈尔巴乔夫对此估计不足，急于求成。更为错误的是，当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和阻力时，戈尔巴乔夫简单地把经济改革搞不下去完全归罪于“党政行政官僚保守势力”的抵制，企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出路，打破这种“阻力”，甚至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取代社会主义体制，推进改革。结果引起全局性的剧烈动荡和混乱，经济改革根本无法进行，社会大乱，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得到任何实惠，相反却蒙受重大损失，自然对改革失去信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在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上的失误，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联的实践从反面表明，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是搞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在社会动乱中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当然，为了稳定而不去改革政治体制中那些明显阻碍社会发展和改革深化的东西也是不对的。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相应跟上，这才能保证经济改革深人进行。

苏共因处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关系问题失误，引起严重的后果，这再次提醒我们，执政党应该重视改革的战略和战术设计，把握改革时机。应该把经济改革置于首要地位，同时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

撰稿者：赵常庆、肖桂森、潘德礼

责任编委：徐　葵

苏共瓦解的缘由

一

苏共的错误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存在了近百年，拥有近两千万党员，并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巨大贡献的苏联共产党在“8.19”事件后顷刻瓦解，引起了世人的深刻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的瓦解？作为一个执政党，长期以来苏共未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搞上去，无疑是促使苏共瓦解的最根本原因，但是，这决不是唯一的原因，苏共瓦解是各种原因“交互作用”的结果。

苏共瓦解与苏共自身建设上存在的问题直接相关，本文主要是从马列主义党建学说的角度来探讨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苏共决不是凭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意愿就能被摧毁的。今天活跃在独联体诸国政坛上的许多实权人物，绝大多数是原苏共的高级干部和著名人物。他们中不少人有着共同的经历：从苏共基层步步高升，进入高层权力圈，运用已有的权力和影响向社会主义和苏共反水，成为各种实力派的代表人物。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苏联的变化是社会性的，但核心问题却出在党内，特别是出在党的高级干部中。为了探讨苏共瓦解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对苏共党的建设作一简要的历史回顾。

1．党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病

从19世纪末起，以列宁为首的革命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

斗争，夺取了政权，奠定了共产党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地位，以后又单独承担起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新国家的任务，由此逐步发展为一党执政，以党代政，权力集中于苏共中央和苏共总书记手里。

苏共一党执政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起过积极作用。各加盟共和国均确立了苏共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有力地排除了苏联内部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各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干扰，保证了苏共中央的决策有效地得到贯彻，成为集中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资源，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组织保证。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苏共以党代政，高度集权带来了一些弊端，主要是斯大林时期及其以后的个人迷信，个人意志盛行；领导管理机构臃肿，官僚主义泛滥。在培养、选拔接班人和干部任免等问题上都由上级任命和决定，缺乏群众基础和基层组织的考核和认可。领导干部形式上由选举产生，而实际上都是上级委任的。同样，免职与否也由上级决定。在干部任免问题上的这种不民主的做法，促使一些干部习惯于只对上级负责，看上级眼色行事。这些干部无视群众的利益，却能得到提升甚至走上党的高级职位，而那些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则受到打击。

苏共是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列宁认为党必须按这个组织原则进行工作，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废。苏共依靠这个原则夺取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由于持续不断的党内斗争，造成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民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17大，大幅度地修改了党章。民主集中制被归纳成4条："1)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上到下都由选举产生；2)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和上级机关)报告工作；3)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4)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①

因为一切由上面说了算，候选人名单由上级机关指定，大会

---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4分册，第398页。

选举已失去主要意义。"报告工作制只不过是单纯地对上负责"。"少数服从多数"也只是个形式。第4条中的"绝对"字样只说明党内生活的自觉性和民主基础被削弱。从1939到1952年，长达13年之久没有召开过党的代表大会，只举行过一次代表会议，两次中央全会。1934年党章后来历经第18次、第19次、第22次、第24次代表大会修订，但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却毫无变化，直到戈尔巴乔夫继任总书记。

2. 教条主义所造成的危害

多年来苏共在宣传马列主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教育、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体系和宣传系统，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但以后在高度集权和"个人崇拜"的风气下，在学习、宣传和运用马列主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其主要表现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凝固化和教条化。

教条主义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苏共长期拘泥于"资本主义进入总危机阶段"的提法，没有正视战后国际形势已从战争与革命时期转为和平与发展时期的变化及资本主义经过自身调整，在一定时期也能获得相应发展这种情况，仍不断大规模扩充军备，四处扩张出击，使国民经济发展严重畸形，大量财力物力耗费在军备竞赛上，在生活水平上拉大了同西方国家的差距。

教条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不加分析地彻底否定。苏共多年来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姓"社"姓"资"的争论。片面追求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纯结性"，拒绝接受"价值规律"、"市场调节"、"商品经济"等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使苏联自我封闭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这是造成苏联经济长期搞不上去，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发展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教条主义把一般真理绝对化，不考虑不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方式模式化，在国际共运中"唯我独尊"，强求各国共产党唯苏共马首是瞻，粗暴干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有特色的建设方式。苏共长期以来在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时往往陷入片面性，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毛泽东同志曾尖锐批评苏共在认识论上的片面性。他说："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的统一。因此在政治上犯错误"。①赫鲁晓夫执政时，在政策上朝令夕改，随心所欲，用行政命令取代经济规律，使一度兴起的改革以失败告终。戈尔巴乔夫对干部的大撤大换，也是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

苏共在思想领导工作方面的一个严重错误是，从20—3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极"左"思潮引导下，以所谓"纯洁马克思主义"为旗号对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采取粗暴干预的高压政策。动辄把不同观点宣布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动学派"，甚至定为"人民的敌人"，无论在哲学界、文学界、史学界还是音乐界和生物学界都发生过这种冤案。

干预和压制的结果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千篇一律的局面。表面上似乎马列主义占据了阵地，实际上禁锢了马列主义的发展，群众不能识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甚至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成马克思主义，如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批判等等。使马列主义不能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削弱了生命力。

意识形态的高压为在苏联危害极重的"个人崇拜"创造了条件，"个人崇拜"现象又使理论研究成了为领导者讲话作注释的工具。群众只能根据领导人，而不是根据事物本来面目来判断是非。而由于领导者本人脱离实际，把马列主义凝固化、教条化，往往使意识形态偏离真理的轨道。

在政治和思想压制情况下，很多理论工作者为求自保往往回避对重大现实或尖锐理论问题的研究。回避现实只能使矛盾越积越多，一旦真情暴露，如平反30年代大批冤假错案，人民群众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7—348页

往缺乏足够的承受能力。

一个极端往往导致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公开性”、“民主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可说是对苏共长期存在的那些错误的一种反动。

长官意志，官僚主义必然束缚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缺乏民主，长期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压制必然在群众心里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从而破坏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教条主义，理论僵化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不能掌握真正的马列主义，失去了对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免疫力。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推行其主要表现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时，党内外群众非但没有识破它的实质，很多人反而成为其支持者。

二

一条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

苏共始建于1898年，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亲手缔造的党。列宁逝世后，苏共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虽然犯有种种错误，但一般说来，仍然坚持上述的建党原则，领导各族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针对苏共的失误提出了改革的口号。应该说，改革给苏共提供了诊疾治病、焕发生机的机遇。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非但没有振兴苏共，反而使这个曾是强大统一的政党以惊人的速度土崩瓦解。因此，要探讨苏共剧变的原因，必须剖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总的来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导致了苏共的瓦解。这条路线恰好同苏共过去坚持的几条基本原则和奋斗目标背道而驰。

1．抛弃社会主义道路

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一阶段（1985年3月—1988年6月），苏共仍然坚

持改革目标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苏共的执政地位。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思路已露端倪。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4月，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即著名的“四月全会”。会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阐述了他的以“加速战略”为核心的施政纲领，表达了通过改革“争取达到社会的新质状态”，①即要对苏联社会模式进行重大改革的意向。四月全会是苏联改革的开端。

由于苏共几十年来执政的传统影响，由于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理想多年来在苏联人民心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加速战略”还是在“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口号下推行的。所谓“加速战略”，即是苏共“旨在对苏维埃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进行质的改革的战略方针：在科技革命成就的基础上根本革新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深刻改变劳动的内容和性质，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使政治、社会和思想设制的整个体系更加积极起来”。②

“加速战略”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如提出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所确定的经济改革的一些措施和目标上，如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快发展消费资料的生产等，对激发苏联人民的改革热情起过一定的作用。然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加速战略”已表现出严重的方向性错误，如推行缺乏阶级性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强调“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模糊了人们的思想，再如，“加速战略”以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使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加失衡；“加速战略”对苏联多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盲目乐观地断言“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胜利解决”，③使多年积压的民族矛盾在“公开性”的气候下冲突叠起，危及联盟国

① 《戈尔巴乔夫言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页。

② 《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莫斯科1986年版，第23—26页。

③ 《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莫斯科，1986年版，第23—24页。

家的生存。这些方向性的错误使“加速战略”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随着“加速战略”的实施，“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在1987年1月27日—28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论述改革的方针时提出，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最充分地揭示我们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民主是改革的“实质”、“主要手段”、“主要动力”和“改革不可逆转的保证”。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作为实现民主化的舆论前提。在苏共27大上，戈尔巴乔夫在提到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问题时，强调要“扩大公开性”。使之“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其次，戈尔巴乔夫又把“苏联社会不应有不能批评的禁区”，“历史不应有空白点”作为推行公开性方针的具体内容。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又提出舆论多元化的口号，鼓励人们自由发表各种见解。1988年1月8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舆论及意识形态机关以及创作协会的领导人时说：“我们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①虽然戈尔巴乔夫口头上把上述民主化方针限制在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但是在实践中却是逐渐取消社会主义的政治界限。

1987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抽象的、超阶级的性质更趋明显，是年年底，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提出了国际关系人道化的思想。并且为人道化做了注解：“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命题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下是可以成立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曾联合反对灭绝人类种族的法西斯主义，但这是矛盾的特殊性。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则是矛盾的普遍性。戈尔巴乔夫实质上是用“阶级合作”的特殊性

① 《当今苏联情况》，新华社《国内参考》编辑部出版，第110页。

来代替阶级斗争的普遍性。这是诱发机会主义思潮泛滥的一个根源。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会议。会议认为“加速战略”之所以未能实现,阻力来自苏联的政治体制。因而,会议对社会主义弊病的批判带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称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严重变形”,“独断专行”。据此，第一次提出苏联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人作为“万物的尺度”而存在。①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文中戈尔巴乔夫不仅进一步全面阐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构想，并且阐述了这一构想的理论基础，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与模式已经定型。

1990年7月，苏共召开28大，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新党章以其它各项决议,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行动纲领和政治路线。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认为:“公有制占主导地位是经济垄断”,导致“人与生产资料异化”,因此它主张非国有化、私有化和各种所有制平等的市场经济。1990年10月19日通过的《关于稳定国民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中，集中体现了这一纲领。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应占主导地位，同时在政治上放弃苏共的执政地位和无产阶级专政，它要把社会引向何处已经十分明显。

2．放弃苏共的执政地位

共产党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后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必然随之改变党的作用。

①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97页。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共权力转移和削弱的开端。因为第一，苏共的职能发生了变化。代表会议规定：党的职能应是政治先锋队，而不是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实施直接的领导；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苏共的政治方针”，“党不能作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即苏共不再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和领导者。第二，党的权力开始转向苏维埃。19次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并且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第三，苏共的领导系统做出相应调整：撤销了与政府部门重叠的党的机构。1988年9月，苏共中央决定另成立6个常设委员会，执行咨询和研究职能。这些委员会在政治局领导下，依靠与之相应的部以及党的学术机构和教学机构，为中央各部制订工作方针。与此同时，各加盟共和国、州及市委、区委的机构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此后，中央书记处几乎停止了工作。中央在党内的组织与监督作用大为削弱。

19次代表会议以后，权力的转移立即付诸实践。1989年3月，进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由于代表会议赋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名符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争取当选人民代表成为政治角逐的目标。激进派主动出击，竭尽浑身解数同苏共竞争，他们利用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中批判原来的体制为苏共历史上的错误，丑化苏共，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一些著名的激进派代表人物都以优势选票当选。这次选举是激进派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其代表人物因当选为人民代表，从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跃为执政者的身份，踏上合法问鼎国家最高权力的道路。

在1989年5月和11月第一次和第二次苏联人代会上，激进派代表萨哈罗夫坚持提出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内容。早在1989年5月苏联第一次人代会后，激进派组织就举行了要求修改宪法第6条的大规模示威游行。

1990年2月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是苏共权力消亡的第二个

转折点。全会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苏共28大的苏共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同苏共19次代表会议相比，纲领草案有三点明显的变化：1)放弃了苏共的领导地位。纲领指出："必须根本改变苏共在社会中的地位"，今后苏共将作为"一个自治的社会组织而存在"，"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行动纲领确认通过立法程序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有关苏共的领导地位的条文。2)承认了多党制的合法性。3)提出了包括政治、经济、国家体制、对外关系等领域的具体方针策略。上述内容是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演化的界定，使之成为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

二月全会后一年时间左右，苏联建立的全国性政党有20多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有500多个。这些政党建立后，立即打出了从中央到地方向苏共夺权的明确的政治目标。每一次苏维埃选举都是一次政治较量。在这些较量中，苏共一个个地丧失了自己在地方上的政治阵地，激进派则一个个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阵地。1990年5月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获胜，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从而使苏共失去对苏联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权。随后苏共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三个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失去执政地位。加上此次选举前已被反共势力夺取权力的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苏共已在近半数加盟共和国丧失政权。同时苏共还在某些加盟共和国的部分地区(如乌克兰西部)和早在苏联两个最大的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失去执政地位，所以在"8.19事件"之前，苏共在全苏的统治权力已失去大半。

苏共瓦解前夕，人民群众对苏共的态度已由不信任发展到严重不满和完全丧失信心。这一阶段，经济混乱已发展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1990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由前几年占全苏人口的1/7增加到1990年占全苏人口约1/3。如此众多的群众不仅未从改革中获得实惠，反而陷入贫困与绝

望。苏共不仅在政治力量对比中失去优势，而且失去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民的支持。根据“8.19事件”前一个月全苏舆论研究中心对全苏33个城市17个农业区关于苏共前途问题的调查表明，这时已有36%的人认为苏共无存在的必要，应该解散。

3．放弃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保卫社会主义社会最有力的武器，然而戈尔巴乔夫实施的超阶级的民主，必然毁坏这个武器。1987年一月实施公开性方针后，社会上涌现出大量非正式组织。其中许多组织表现出否定苏共的倾向。但1987年底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却对这些非正式组织不分阶级性地加以肯定，说：“民主化进程不排斥这种社会活动的自发表现，我们已告别了那种时代，那时这种自发活动会引起官僚们的恐惧并遭到行政当局的禁止”。①

改革第一阶段苏共举措上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一方面为苏联社会上崇拜西方社会制度的思潮和力量提供了发展的温度和土壤，使极端民主化的激进势力得以破土而出。同时，又把对苏共历史的反思引导到对苏共历史的全盘否定。这一阶段，报刊上开始出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文章。苏共采取这些举措还为崇拜西方社会制度的势力迅速集结并成立非正式组织提供了条件。1987年底，这些非正式组织已近3万个。它们组织游行、集会，打出了要求实行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口号，表现了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这在苏联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对苏联社会上出现的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的势力，戈尔巴乔夫却视而不见。在苏共19次代表会议的政治报告中，戈尔巴乔夫正式承认了从1987年后迅速增加的社会团体，称“代表多种多样的社会利益的社会团体迅速增加”，“这是人民的首创

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精神的出色表现，值得大力支持”。①同时低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破坏作用，认为“远离改革的目标和人民的利益”的社会团体“无关大局”。②这种超阶级民主化的方针给苏联国内非正式组织的发展大开绿灯。在苏共19次代表会议后，非正式组织的数量迅速增加，至1989年2月，非正式组织已达6万个，比1987年底的3万个增加了一倍。

东欧剧变以后，激进派吸取“东欧的彻底变革不是始于议会，而是始于游行集会”的经验，迅速增加了游行集会的次数，规模也迅速扩大。1989年，苏联发生5300次集会，参加者多达1260万人次。1990年仅头两个月，全苏集会已达1500次之多，近700万人次参加。苏共19次代表会议后，激进派还竭力扩大舆论。他们控制的小报和一些大型报刊逐渐左右苏联的舆论导向。这些报刊刊登苏共历史的“内幕消息”，“爆炸性秘闻”或内容尖刻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论文章，在群众中影响甚广。

苏共和激进派力量对比的消长，使党和人民群众的政治心态和立场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于激进派兴风作浪，苏联社会上逐渐形成谴责、围攻苏共的气氛，反共、反社会主义在某些人看来几乎成为一种时髦。在许多集会上，“同志”的称呼在台下引来一片“嘘”声。“苏共”一词会伴随一阵歇斯底里的“打倒！”的呼叫。然而面对反共的势力。苏共仍拘泥于民主而无所作为，不敢进行斗争。

1991年“8.19事件”，给右翼政党摧垮苏共提供了政治籍口，事变后苏共中央虽进行了挽救苏共的努力，但已无回天之力。事变刚刚过去第5天，戈尔巴乔夫一纸解散苏共的声明，便使苏共土崩瓦解。随后，在苏联国土上飘扬了74年之久的红旗黯然落地。

---

①②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三

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

党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基础。能否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关键在于党是否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执行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以其背离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前导的。

1．鼓吹“新思维”，宣传“全面民主化”，否定阶级斗争学说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民主是有阶级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注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对敌对势力必须坚决打击。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概念中，我们看到了他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1986年1月15日，在关于苏联销毁核武器的建议中戈尔巴乔夫首次提出了“新思维”的概念，认为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论”。①应该指出的是，主张和平共处，裁军、撤军，主张消除冷战和缓和，是对苏联错误对外政策的正确总结，但这并不是国际上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和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了。“新思维”最初仅仅是同对外政策相联系的，后来扩及到国内政策，成了对苏联“实行改造的普遍哲学”。“新政治思维还包括具体的思想、实在的政治内容——国内的和国际的”。②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正式出版后，“新思维”由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方向迈出重大的一步。在这里，它宣传“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③戈尔巴乔夫从“核时代”的毁

①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夫：《新政治思维：起源·潜力·前景》，莫斯科1990年版，第7页。

② 同上，第18页，

③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灭性后果出发，认为核装器的威力决定一切，既决定人类生存与灭亡，又改变着人类的相互关系和思维方式，由此进一步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认为必须“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以实现国际关系的伦理化、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和两大社会体系的“一体化”构想。戈尔巴乔夫否认马列主义关于在阶级社会中没有空洞、抽象的人，只有具体的、划分为阶级的人的原理，无视世界上存在的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尖锐阶级对抗及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的行径，公然鼓吹大家都是乘坐在诺亚方舟上，都是拴在一起的登山运动员而具有共同命运的“阶级合作”思想。①列宁在指出机会主义论调的基本错误时说道：“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阶级合作的思想”，②“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共同的’‘社会’进步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是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这个社会主义的理论”。③“新思维”的这个论调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抵制，为苏联全面倒向西方进行了舆论准备。也为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崛起，最终使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提供了理论前提条件。

“新思维”在国际关系上鼓吹阶级合作思想，在国内则奉行“全面民主化”的思想纲领。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他不厌其烦地说道：把“改革重点放在发扬民主上”，“需要整个社会生活的广泛民主化”，“发挥民主的全部潜力”云云，最后正式提出了“苏联社会全面民主化”的纲领。④所谓“全面民主化”，即指“舆论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和“公开性”。戈氏认为这种“民主化”和“公开性”“没有限度”、“没有禁区”，严重抹杀了民主的阶级性。

---

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第1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第64页。

③ 《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④ 《改革与新思维》，第62页。

社会主义绝不排斥民主，民主是社会主义应有之义，但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全面民主化”是把“民主”作为其改革的“实质”和欲达到的主要目标。民主既是思想体系，也是政治制度。由于戈尔巴乔夫把改革重点放在他所强调的“民主”上，把这种“民主”作为改革的实质和目的，他的思想逻辑必然会促使他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首位。①

“新思维”所提出的“政治改革”，其实质是针对共产党的领导权。苏联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证明，无论是革命或改革都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党内已形成一个“障碍机制”，表现在“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②“新思维”把苏共党内多年来确也存在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夸大为党内已形成一个“官僚阶层”，从而成为一个“障碍机制”必须坚决打破，把矛头指向共产党，使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新思维”要求“社会政治思想界要来一个急剧转变”，“历史科学也要来一个根本的改革”，改变旧的思维。从1987年初起，苏联舆论界开始了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尽管这当中在恢复历史未来面貌，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是应该而且必须做的，但却有相当部分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趁机丑化和歪曲苏共70年的历史。戈尔巴乔夫本人就用“荒芜破落的农村”，“我们森林和河流的惨状”③等词汇来描述过去苏共领导下的苏联的历史。全盘否定苏共历史模糊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全面民主化”的思想纲领严重削弱了共产党的威信，动摇了共产党的地位。它不仅为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历史的言论大开绿灯，也为各种旨在攻击苏共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活动创

① 同上书，第61页。

② 《改革与新思维》，第52页。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4页。

造条件，为滋生各种反共政治势力大开方便之门。原俄共领导人后来总结教训时指出："改革一开始即出现重大失误；……拚命攻击党，人为地培植反对派，本应从党抓起，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改革有力工具，本应用加强组织性来促进民主化"。①美国学者詹姆斯·P·斯坎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新思维"的实质："表面上看新思维似乎只涉及物质刺激、私人企业，合作财产、没有阶级敌人的革命，民主化问题以及改革的其它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目睹的是马列主义正在从一种阶级的意识形态变质为一种承认个人、集团和普遍利益的权力及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而不顾及这些个人或集团的阶级属性。"②

2．反对马列主义的建党学说

以1988年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为标志，苏共改革方向发生重大转变。"加速战略"总路线逐渐演变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在1990年苏共28大上正式确定为党的行动纲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折？前苏联领导人谢瓦尔德纳泽1991年9月8日答法国电视台记者问时曾坦率谈到："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的进行彻底改造。"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既是行动纲领，也是思想纲领。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理论体系，有其基本政治主张、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等内容。这里仅仅指出其对马列主义党建原则的重大背离。

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改革之初制定的苏共纲领还载明："苏共的全部活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苏共是

① 《真理报》1992年11月16日。

② 詹姆斯·P·斯坎兰，《意识形态与改革》，转引彼得·贾维勒等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1988年纽约版。

用马列主义武装的党"。①1990年初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载文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是社会主义学说之一"，②否定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唯一思想基础。在苏共23大上戈尔巴乔夫已谈到马列主义"过时"的思想，1991年7月在苏共中央审议新党纲时，他明确说道："过去只承认马列主义是自己的思想源泉"，"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包括国内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所以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中，取消了马列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提法。

放弃党的领导地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纲领主张"苏共坚决舍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垄断地位"，"排除任何政党的专制独裁"，③并修改了规定"苏共是社会领导力量、是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关核心"的宪法第六条，放弃苏共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主张"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

改变党的奋斗目标。苏共纲领过去一直郑重声明"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在我国建成共产主义"。④现在则主张建立"自由的人们的公民社会"，⑤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

"极端民主制"代替"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纲领声称："苏共坚决否定在行政命令体制下形成的那种民主集中制，那种僵硬的集中制"，⑥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已"声名狼籍"，用"全面民主制"实质是极端民主制取而代之。

改变党的职能，使苏共从国家体制中彻底退出，使党"非国

① 《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1986年莫斯科版，第1页，第12次。

② 沙赫纳扎罗夫：《思想更新和更新思想》，载《共产党人》1990年第4期。

③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63页，第78页。

④ 《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第22页。

⑤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第2页。

⑥ 同上，第84页。

家化",党不再有干预苏维埃行政机关的职能，甚至"没有权利对企业和单位行政机关的活动进行监督"。

否定马列主义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能把党同一般工人组织混同的党建学说，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等群众团体看作是"伙伴关系"。……

十分清楚的是，在一系列问题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已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党建学说。

这条背离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对苏共的影响极大，严重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西方学者戴维·萨特在《苏联不稳定根源》一文中写道：苏联过去的稳定取决于三个因素：没有严重的民族矛盾、工人阶级相安无事和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而所有这些条件都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统治来保证。在公开性的压力下，意识形态的瓦解使所有三条件都受到了破坏，①苏联解体、苏共瓦解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

一条自取灭亡的组织路线

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是共产党发挥政治领导作用的保证。工人阶级政党一旦失去这种保证，党的战斗作用也就无从谈起了。列宁说:"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②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以来，苏共不仅在政治和思想上走

① 戴维·萨特：《苏联不稳定根源》，载《亚洲华尔日报》，1991年9月23日。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510页。

偏了方向，同时也在重大组织原则和实践方面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终于使这个执政了70多年的大党变成了一盘散沙，直至瓦解。这里有许多教训需要记取。

1. 从“重新解释民主集中制”到彻底背弃这一原则

民主集中制是由列宁提出并成功地运用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质，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在决策之前充分发扬民主，一旦形成决议便要求实行集中。民主和集中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用组织的统一来体现和巩固思想统一的目的。

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总书记的初期，形式上仍维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的基调是“有计划地全面完善社会主义”。这次代表大会对党章作了修改。除第1条改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下到上都由选举产生”外，还增加了第5条：“党的所有组织和领导机关的工作实行集体制原则，每个共产党员对履行自己的义务和党的委托承担个人责任”。①这一原则本是斯大林死后由赫鲁晓夫提出的，当时主要是为了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再次提出并写入党章，按戈尔巴乔夫在27大所做政治报告的说法，是为了维护“党组织的健康生活”，为了“防止主观主义的盲目性”，为了防止再出现“共同制订决议被个人命令所取代”的现象。

从总体上看，这一设想并没有错。但是，党的领导原则是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密切相关的。在改革时期，它首先是同改革路线及其成效紧密相关的。既然在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下，党的性质、宗旨、地位、指导思想等均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字面上恢复集体领导原则的提法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所作的决议中，也有“彻底恢复

① 《苏联共产党章程》(苏共27大通过)载《真理报》1986年3月7日。

列宁主义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解”的字句，但是，苏共当时已经不具备贯彻这些决议的条件，因为它的总体改革战略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从那以后，曾经在苏共和苏联社会热烈展开的关于恢复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辩论，实际上变成了向自由民主派的“一般民主”的靠拢和向实行政治多元化的步步退让。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应当重新思考民主集中制原则”①，在同年7月召开的苏共28大所通过的纲领性声明中写道：“苏共坚决放弃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硬性集中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原则即坚持选举制和更换制、公开性和报告制、少数服从多数、少数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包括在党的舆论工具对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②显然，民主集中制在这里已被分割，只剩下民主制部份，集中制已荡然无存。

在党内派别活动的问题上，28大通过的党章虽然写上了“苏共内部不允许建立具有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的字句，但又自相矛盾地强调“并不限制共产党员在辩论过程中在立场方面进行联合的权利”。③28大通过的苏共纲领性声明还写着：“保证建立横向组织和横向组织活动的自由”。④这就是说，此时的苏共中央在民主与集中的问题上，片面强调民主，使集中徒具虚名。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此时的苏共已是派别林立，组织上已经开始分裂。早在苏共第19次党代会之后，苏共内部就已开始出现派别活动。1989年上半年，围绕着人民代表的选举和继之而来的第一届人代会的召开，党内的派别活动日渐活跃。1990年1月，阿法纳西耶

---

①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文件，载1990年2月13日苏联《真理报》。

②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28大纲领性声明，载1990年7月13日苏联《真理报》。

③ 苏联共产党章程(苏共28大通过)，载1990年7月18日苏联《真理报》。

④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28大纲领性声明，载1990年7月13日苏联《真理报》。

夫同波波夫等人在苏共内部组成“民主纲领派”，并于同年3月发表《向苏共28大提出的民主纲领》，主张实行多党制，要求把苏共彻底改变为议会党，放弃民主集中制以及按地区及生产单位建立党组织的原则。放弃苏共对政府、军队、安全部门和舆论工具的领导，等等。以人民代表大会“联盟议员团”和“共产党议员团”为代表的传统派则“赞成恢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主张“消除把苏共作为‘兵营式共产主义’党的现行模式，但不取消共产党本身”。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主流派则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自己的纲领，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戈尔巴乔夫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时而利用激进派压制传统派，时而又利用传统派制约激进派，戈氏的主流派实际上采取的是中间偏右的路线。

在28大召开之前，这三派就已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所以，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28大尽管维持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这个至此时仍拥有1500万党员的大党事实上已陷人分裂。28大上选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局，已不是全国的权力中心。它只是由各加盟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组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机构，从构成上进一步削弱了苏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8大召开之前，立陶宛共产党已于1989年12月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三个月后爱沙尼亚共产党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会上作出爱沙尼亚共产党脱离苏共的决定。拉脱维亚共产党则于1990年4月召开的第25次代表大会上因是否独立于苏共的问题发生了分裂。在苏共28大上，围绕党的结构问题也发生了争论，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外高加索一些共和国的代表主张把苏共变成“各主权国家独立的党的联盟”，各共和国的党应有自己的纲领和章程，主要应维护本共和国的利益。这是明显的联邦化的倾向，同列宁的建党思想是根本背道而驰的。列宁从建党初期就明确地反对党组织的联邦原则。俄共建党初期崩得派曾要求把联邦制引人党的组织原则，遭到了列宁的拒绝。苏联成立后，联共(布)是

维系各加盟共和国团结和联盟统一的核心力量。党的联邦化趋势必然会进一步削弱苏共的实力。

28大成立的新党纲起草委员会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一项工作。1991年7月全会讨论了这部新党纲。里面只字未提苏共要取得执政党地位，同时，也不再提民主集中制。至此，苏共中央已经公开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

2. 任意撤换党的干部

党的事业要想取得成就，一个重要条件是党内充分发扬民主使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戈尔巴乔夫当政以来，苏共党内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虽然戈尔巴乔夫曾批评苏联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也曾大声疾呼要发扬民主，但除了走到否定历史的另一极端之外，干部政策上原有的弊病依旧存在。戈氏和他的前任赫鲁晓夫一样，在干部任免的问题上大搞长官意志论。

1985年以来，苏共组织路线的变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过程，6年中，干部换班如走马灯一样，其中既有为推进改革而实行的必要更替，也有权力之争的党同伐异，更有在反共势力进攻下的主动溃退。要害是改革路线和战略方针既已向错误方向演化，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也就谈不到了。

戈尔巴乔夫当政6年零9个月。这几年里，苏共将对待改革方针的态度和改革的实践，作为衡量干部优劣的首要标准。但由于改革的方向性错误，戈尔巴乔夫把不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而抵制错误改革路线的干部作为“保守势力”撤换下来，从而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失。以边疆区、州直辖市（莫斯科、基辅）这一级委员会书记的更选为例，在苏联的6个边疆区、142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书记中，截至苏共28大召开时为止，被撤换的人员已达到92.5%，1988年以后被撤换的占60%之多。许多被罢官的干部不过是刚刚

提升上任不久。至于说到苏共中央领导机构干部更换的情况，连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承认："在四月全会(指1985年4月)以后的短短时期内，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大部份成员和党中央各部部长换了新人……"① 在6年多的时间里，苏共中央总共被做了5次"大手术"，每次中央的人事变动，都要伴随中下层人员的大换班。第一次是从1985年3月戈氏上任到1986年2月苏共27大。第二次是在1988年6月第19次党代会之后的九月全会。第三次是1989年四月全会(解除了122名中委、候补中委、中检委的职务)。第四次是在1989年九月全会，第五次则是在1990年7月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

28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由24名委员组成。中央书记处由11人组成。新班子的显著特点有三：1)切断了同27大的连续性。27大时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戈尔巴乔夫1人(伊瓦什科是在1989年12月才进入政治局的)，其余23人全部是"新人"；2) 15个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全部是政治局当然成员，表面上看来是加强了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发言权，扩大了代表性，但实质上是倒退到列宁激烈反对过的党组织"联邦制"上去了。苏共在政治上放弃宪法第6条规定的领导地位之后，这种组织安排更助长了队伍的涣散状态，这一点在1991年特别是"8.19事件"时表现得尤为突出。3)政治局的实际地位更由于政府官员不再兼任党的职务，而呈一落千丈之势。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首脑和政要，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等人，都脱离了苏共高层领导核心，政治局实际上也对他们失却了约束和影响。

3. 党的基层组织陷入涣散状态

党的基层组织是实施党的政策、联系和团结广大群众的战斗单位，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使党的组

①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的讲话，载1987年1月28日苏联《真理报》。

织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和凝聚力。

在28大召开之前，苏共有44.2万个基层党组织，52万个车间党组织，73万个党小组。①过去这些基层党组织每采取一个行动都要经上级机关同意，工作中毫无主动精神。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后，曾提出把中央机关的部份权力下放到基层党组织，28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基层组织“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它们的决议，只要不违背党的纲领性目标，并且在苏共章程授予的权限内通过，上级机构不得予以撤销，但有关人员问题的决议除外”。“50%以下的党费可用于基层党组织的活动经费”②。但是，由于苏共的改革路线已发生了战略性的错误，党的力量已被严重削弱，这些规定已无力给苏共的基层组织增添活力。相反，28大召开后的苏共基层组织比以前更加涣散，党的纪律更加松驰了。

首先是大批党员退党。据苏联官方统计，1990年的退党人数多达180.9424万。以莫斯科州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市为例，1990年的10个月之内就有1156名党员退党，比1989年该市的退党人数多6倍。③退党的原因是各不相同的。1990年11月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曾在全苏作过一次社会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因“对共产主义理想失望和不信任作为政治力量的苏共”而退党者占被调查人数的36%；“不愿意为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而退党者占30%；“不赞成当前的政治路线”而退党者占24%；“担心苏共党员身份会使自己倒霉”——23%；“失去了党的特权”——17%；“不愿履行党的义务”——11%；“对党组织内的关系不满——9%”。④

其次是党员对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看法上有分歧。苏共中央

① 参见《苏联东欧国家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② 《苏联共产党章程》(苏共28大通过)，载苏联《真理报》1990年7月18日。

③ 参见苏联《党的生活》杂志1991年第3期。

④ 参见苏联《党的生活》杂志1991年第3期。

社会科学院社会调查中心另一次规模较大(1991年2月对俄罗斯等8个加盟共和国的1600名共产党员作了题为“党内团结潜力”的调查)的调查表明，共产党员对土地所有制法令意见不一致，46%的被调查者赞成，40%的人反对；对波罗的海沿岸事件的评价不一，35%的人认为，这是中央实行不正确政策的结果；33%的人认为，这是地方政权机关违反宪法的结果；30%的人则认为，这些事件是挑衅行为；在苏共的构成问题上，有40%的被调查者主张苏共转变为完全独立的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联盟；有39%的人反对；在对党员思想状况的评价问题上，36%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的队伍的思想越来越不一致；38%的人认为，意识形态多元化是有益的。只有50%的被调查者支持苏共28大的方针。①

与此相联系的是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效率在28大召开之后继续下降，在劳动集体中的威信也越来越低。基层组织对党员的要求和建议漠不关心，有的党组织竟然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没有开过一次会，更不用说做党员的思想工作了。苏共中央收到不少党员的来信，反映基层组织的党员看不到中央发出的文件，“中央的许多文件都压在州委、边疆区委，甚至都传达不到区积极分子这一层”。②对那些不交纳党费、不履行义务的党员，不少基层党组织漠然处之，不闻不问。党的纪律松弛已成为普遍现象。实际上，早在28大召开之前，苏共就有1/2的党小组停止了活动。28大召开之后，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活动能力明显减弱，已接近瘫痪状态。

4．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党不管党

为了保证执政党不变质，党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建立党的有效的监督机制十分重要。

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尽管口口声声要恢复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在1988年九月全会后合并了党的两个监察机构

① 见《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4期。

② 见苏《真理报》，1991年3月2日。

苏共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

苏联的成就向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名声大振，人民由此看到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

苏共犯有严重的错误，在党的自身建设上曾出现重大失误。对于苏共的错误，应联系历史作具体的分析，要了解这些错误的产生原因、发展过程，危害程度，还要了解后来成为弊端的东西开始时是否也起过积极的作用。

政党和人一样，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苏共的主要问题在于，对于自己的错误长期不能正确认识，不能正确总结经验，不能正确吸取教训。苏共由于理论上的僵化，由于在成绩面前产生骄傲，不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完善制度。不仅如此，还把自己一个国家的经验模式化、固定化，把它们视作不可更改的典范，以致在新形势下，被自己制订和早应修订的政策与制度束缚住手脚。

苏共在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方面的错误削弱了它和群众的关系，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一批假马克思主义者得以走上领导岗位。这些消极因素早就存在于苏共内部，影响着苏共的威信，动摇着苏共的领导基础，只是由于苏共的执政地位而未被人们所察觉，因面，苏共一旦瓦解，人们自然地感到吃惊和突然。

苏共在历史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苏共必须进行自我改革的任务，但并不说明苏共早就注定灭亡，因为苏共党内自始至终存在着健康力量，共产党存在的基础依然存在。

苏共瓦解的直接原因，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全面地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戈尔巴乔夫不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上进行改革，而是否定七十年来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就，无视苏联的国情，照搬西方的一套，搞公开性无节制，搞所谓的“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由小到大，导致苏共最终瓦解。

苏共的瓦解告诉我们，共产党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抛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毁灭了党本身。因此，一个执政党如何培养千百万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如何永远保持冷静头脑，警觉和纠正在成绩掩盖下的缺点与错误，根据形势的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作出科学的决策；如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调动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把经济搞上去，是党的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撰稿者：　戚仁卓
责任编委　张椿年

苏联意识形态演变的原因和教训

苏联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但它已经丧失了它从前在全苏联范围内所占居的统治和主导地位，丧失了它对广大群众的统率和指导作用。

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解体，主要原因来自于诸种社会矛盾的长期积累和得不到及时解决，来自于近年来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日益加剧。苏联意识形态作为这种矛盾重重、危机加剧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其在近年来在性质上发生的急剧演变，更加速了苏联的全面而彻底的崩溃。

苏联意识形态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国范围内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形成不能不受到该国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和民族传统的影响，打上本国国情的深刻烙印，因而必须把苏联意识形态看成只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变绝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其他国家中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条件下是有生命力的，它能够对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做出创造性的回答。

苏联意识形态当前所发生的性质上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或者说发生目前这种演变的可能性早就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然而导致苏联意识形态性质演变的最直接原因，当然是1985年以来苏联各种事态的发展。

苏联意识形态：
形成的阶段和特点，演变的过程和原因

一、1917年——20年代末：形成和确立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面临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一方面必须竭尽全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惨遭战乱破坏的经济，发展生产，为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创造能够长期生存下去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权为后盾，尽速改变俄国文化普遍落后的状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社会主义创造不可或缺的"文明前提"。

历史事实表明：苏共不仅对上述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而且在实现上述任务(尤其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上)方面还犯有许多错误，产生过一些严重的弊端。

1．苏联意识形态从其形成和确立时期起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情况。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是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文化水平较低的国度里发生并取得胜利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对这种不利的历史条件是有清醒认识的。列宁在1923年曾指出："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但列宁同时也明确指出，可以利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文明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并认为只有在"实现了文化革命"之后，"我们的国家"才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革命通常都不是在一切条件均已具备的情况下开始的。"理论所规定"的历史顺序是一种理想情境，不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往往是常见和正常的。然而事物的发展毕竟有自己的逻

辑，曾经颠倒了的历史顺序理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再颠倒过来，使自己的行为顺应事物本身固有的逻辑。

遗憾的是：无论是在列宁在世的时候，还是在列宁逝世后的斯大林领导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外有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武装干涉，内有严酷而尖锐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惨遭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等等)，以及由于苏共及其主要领导人指导思想上的模糊和失误，社会主义"文明前提"的建设没有象列宁教导的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也没有为这一建设提供充裕的时间和良好的环境。由于苏联当时所从事的建设是史无前例的、开创性的，所以也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2．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当时俄国共产党人，无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对社会主义物质前提和文明前提的理解，都不够完整、准确和深刻，有待于实践和取得经验。1921年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被誉之为苏联历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纠正原来想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作法，强调要尽可能快地"把苏维埃共和国引上经济建设的轨道"。现在看来，"新经济政策"是符合当时俄国国情的政策，是有利于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政策，但却被一些人看成仅仅是一种"退却"和"让步"，因此后来匆匆忙忙地结束了它的实行。而列宁认为，通过新经济政策把人们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一二十年")。同样，为了给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发展阶段"。在论述批判地吸取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的意义时，列宁指出过，"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① "如果不学会利用资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② 在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斗争时，列宁强调过：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04页。

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这些正确的提法，其内涵后来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揭示，如何“吸收”也没有得到确切的说明和深入探讨。

3．对为社会主义创造“文明前提”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还表现在：把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战胜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的旧意识形态的事业，想象得过分容易和过分简单。

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权的确立，使得从前处于地下和非法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凭借政权的支持而获得合法和公开的地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当时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使马克思主义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先进阶级的思想体系，从党内扩及到党外，从无产阶级扩展到全体人民，从有限范围推广到全国范围。而要使从前只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接受和掌握的意识形态变成为人民群众普遍掌握的思想武器，其艰巨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众所周知，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之所以能够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存在决定的。要想使由不同阶级和阶层组成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首先必须改变他们的社会存在，而且即使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存在，旧的意识形态依然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作用。认识不到这种长期性和艰巨性，仅仅靠政权力量，从法律上规定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靠行政手段强行推广这种思想，靠一般的宣传和“灌输”，是难以达到这种目的的。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方面，苏共和苏联政府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出版了几千万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举办了无数讲习班和讲座，许多大学开设了马列主义课程等等。这方面的成绩无疑是巨大的。但这却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已经真正深入人心、成为他们自觉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

苏联在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时期，曾遇到

过极其复杂的局面。20年代中期以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虽已丧失了从前的统治地位，但却依然保留着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唯心主义和宗教哲学以及文化艺术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流派还相当活跃和有较大市场，相比之下，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占绝对优势。面对此种严峻局面，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曾经采取了强硬的行政措施，把二百多名学术界著名人士强行遣送出国①，他们的作品被列为“禁书”，从而开了用行政命令手段处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先例，把本来应当用思想斗争和理论教育解决的问题做了简单化的处理。这种做法在当时曾经产生过一定效果，但后来的历史却证明这是不成功之举，其造成的消极后果(80年代末期苏联兴起的“俄国哲学热”等等)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二、30年代——1953年：巩固和加强；僵化和教条化逐渐发展

在苏共和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使苏维埃国家强大起来，胜利地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苏联的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就是在这段时期中得到巩固和加强的，而其僵化和教条化的趋势也在这期间逐渐抬头和发展。

1．纵观整个斯大林时期，即从1924年到1953年3月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一种现象，苏联在联共(布)和斯大林的领导下，长期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上(这当然是对的，不过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理解却片面而狭窄，即把它主要理解为发展重工业)，但却没有按列宁的教导给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前提”以同等程度的重视。1925年联共(布)14大把实现国家“工业化”、1927年联共(布)15大把实现农业集体化、1930年联共(布)16大把在各条战线上发动“大规模进攻”确定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斯大林代表联共(布)中央在这些代表大会

① 参见A·古雷加，《B·C·索洛维约夫》。《文学报》1989年1月18日

上所做的报告中，极少或根本不提文明建设的问题。在被称之为“胜利者的代表大会”(1934年)的17大上，斯大林在总结成绩时指出：“苏联在这个时期内根本改变了样子，抛弃了落后的中世纪的外貌。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它由个体小农业的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国家。它由愚昧无知、不识字、没有文化的国家变成了(确切些说，正在变成)人人识字的有文化的国家”。1936年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在苏联是已经获得和争取到了的东西”。从以上这些提法中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标准的理解，是较为狭窄和片面的；对什么是“有文化的国家”的标准的理解和要求也是比较低的，只限于克服“愚昧无知”和做到“人人识字”；这样势必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并不困难，急于求成和盲目乐观是那一时期苏联的通病。

2、从20年代后期起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和着眼点发生了转移，工作方式也起了变化。国内战争结束后，经济建设工作提到了首位，已经有时间和可能在从事紧张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工作的同时，加强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这时理应通过耐心、细致、说理的思想理论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自觉自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自觉自愿地以此为指导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准则，识别、抵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潮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理应把意识形态工作着眼点放在广大人民群众方面。遗憾的是，从当时联共(布)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实际工作来看，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这项工作，也不见他们曾就意识形态工作做过认真的研究，相反，意识形态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了苏共领导人进行党内派别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手段。斯大林关于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的错误思想，成了主导和支配苏联政治生活的主线索，而积极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实际上则被完全冲击掉

了。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的全部论断成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和根据。一些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作风浓厚的理论界"权威"，把意识形态当成他们粗暴干涉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工具。1931年斯大林发表的《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声色俱厉地"痛斥"《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讨论党史问题的文章是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的政治错误，宣布"决不能容许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进行文字上的讨论"。1930年12月斯大林宣布德波林学派为"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德波林的哲学观点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方法论和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对错误观点必须批判，通过讨论澄清是非，但从此时起，正常的学术讨论、不同观点的交锋、以理服人的争论，在苏联实际上已被中断。此后发生了一系列干涉自然科学（遗传学、生物学、物理学、控制论等等）、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对《星》、《列宁格勒》杂志和作家的批判，1947年对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批判、1949年对"世界主义"的批判等等）、政治经济学（对沃兹涅先斯基《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经济》一书的批判等）、历史学、法学等领域学术研究的事件；许多哲学家、文学艺术家、自然科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遭到不公正待遇（不准发表作品，不准从事正常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逮捕、流放、直到镇压）。而理论上的是非却没有真正弄清楚。

上述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列宁的有关教导，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报告中曾明确地指出过："理论上的争论是一回事，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则是另一回事"。"有些理论家经常向党提出有益的意见。这是很必要的"，但是，"这难道跟纲领上的斗争相同吗？""不要阻碍我们的政治工作，特别在这严重的关头，但是也不是要放弃科学的探讨。"① 联共和斯大林后来的一些做法，不是着重于分清理论是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0—243页。

非，而常常把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片面地进行政治批判，这不仅违背了列宁的明确指示，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3．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上述政策带来的后果是教条主义泛滥、思想僵化、精神压抑、万马齐喑、社会生活一潭死水、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相适合"、"民族大家庭业已形成"之类的空话，一方面掩盖了苏联社会生活中长期积累并已不断激化了的大量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则成为神圣不可触动的理论信条。理论界所能干的唯一事情就是随时应召为当时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言论(即使明知是直接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进行论证和作注解。在此时的苏联，全国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报刊出版物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然而这种舆论"绝对一致"完全是形式上的和虚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不研究不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涌现的大量新问题，不理睬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而丧失了活力、生命力和战斗力，它也因此而丧失了吸引人的魅力。在这些年代里，苏联意识形态取得的实际成果应该说是极其微小的。

4．苏联及其意识形态在1953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基本上是与世隔绝、封闭和孤立在一国范围内的。这固然同苏联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历史空间(被封锁、被包围)有直接关系，然而苏联采取的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则从自己方面加剧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列宁关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必须吸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著名论断虽然是尽人皆知的，然而苏共在实践中始终未能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文化与整个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始终不能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片面、狭隘的文化观根深蒂固：文化从来都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给与后人的，其中进步的、唯物主义的传统是与落后的、宗教唯心主义的传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然而苏联的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在一段时间里却只承认其中一种传统，甚至夸张

地认为他们只与其中一种传统有继承关系，似乎在他们的历史上根本不曾有过另外一种传统。

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政策：苏联曾试图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试图在绝对“净化”的环境中维护和保持自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因而长期采取禁止人们接触本国和国外非马克思主义东西的全封闭政策，其结果是：人们的视野窄小，人们的精神世界孤立、闭塞、贫乏，丧失比较和鉴别的能力，不能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东西直接接触、争论和斗争来增强自己理论的战斗力。与错误的、反动的、思想体系的斗争，始终是在与对手不直接交锋、对手缺席受审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总是可以不战即胜。

长期以来，苏联总是用超级大国的心态来衡量自己的优越性，妄自尊大，孤芳自赏，蔑视历史上和同时代的世界文明成果，养成一种不健康的民族心态。这种心态在一定条件下则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妄自菲薄、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盲目崇拜西方文明和本国的宗教唯心主义传统。1985年以来事态的演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总的看来，这段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虽然有很多缺点，甚至严重的弊端，但基本上仍然可以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之内的。然而，由于这期间在意识形态工作的政策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和错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真正牢固地把握，没有在他们思想上牢牢扎根，没有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这也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苏联意识形态演变的可能性早就以潜在的形式存在着。

三、1953年——1982年：演变的开始和教条化继续：短暂“解冻”时期的出现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新加强。

如果说，从1917年起到1953年止的36年是苏联意识形态形成、确立、加强和巩固，而在1953年前后的20多年中又是向僵化和教条化逐渐发展的时期，那么从1953年开始到1991年12月为止

的38年则是苏联意识形态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发生转变，直至到80年代末发生剧变和质变的时期。从这个视角来反观苏联历史，从1953年到1964年的赫鲁晓夫时期就显得格外重要，值得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琢磨和思考。

1. 从1953年到1964年10月：苏联意识形态长期潜伏着的演变可能性，因1953年以后事态的发展而逐渐突显出来并变成为现实。

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角度来看，赫鲁晓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既出现过以"解冻"为标志的短暂宽松阶段，也出现过重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阶段。但总的来说，无论宽松还是收紧都是有限度的，宽松没有闹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收紧也没有重蹈斯大林时期大规模批判和压制的覆辙。

综观1953——1964年期间苏联意识形态的状况，引人瞩目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此时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是依据苏共当时确定的"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和20年内（即指198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这一总路线制定的。那末这一总路线又是根据什么理论原则制定出来的呢？它的根据有三：（一）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阶段等学说）；（二）承继先前时期的基本结论；（三）依据新时期、新形势提出的所谓新的理论论点。这一时期是以清理、批判和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在实践和理论上造成的消极后果为开端的。"个人崇拜"时期的一些明显错误的理论虽然受到了清算，但斯大林就苏联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所作的基本理论结论却被当作是无可怀疑的定论而原封不动地因袭下来，如认为苏联于1936年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从那时起苏联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等等。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有时会逼使人犯错误。既然承认苏联已经走过了马克思指出的"过渡时期"，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在1936年基本建成并从那时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那末到了50年代苏联往何处去

呢？赫鲁晓夫及这一时期的苏联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们谁都没有能力依据苏联的实际状况来修正斯大林时期的结论。不仅如此，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创造性”，还通过苏共20、21、22大进一步“发展”了原有的结论，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消亡，国家变成了“全民国家”，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全民的党”；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除等等。这样的苏联，在国内不应再有阶级斗争了，然而“冷战”和帝国主义的存在毕竟是事实，于是他们便宣布阶级斗争已转到国际舞台上，同时提出解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可通过“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但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方面则不能“和平共处”。那么这一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工作方针是什么呢？

苏共中央根据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列·伊利切夫的报告通过的《关于党的思想工作的当前任务的决议《(1963年6月21日)中写道："目前条件下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保证苏共纲领的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新人，提高政治警惕性，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和人们思想中的旧残余发动全面进攻”。

任何方针的确定，首先都要对以往的成果、现在面临的状况和将来所要达到的目的做出评估。对此，1963年6月的决议是这样写的："党的活动的主要结果是：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正在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高尚道德原则的人，千百万人的世界观在历史上首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苏联人民现在有一个具体的、有科学根据的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从这些论断中不难看出，苏共对以往、现在和将来的评估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夸大了以往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所谓“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夸大了人民思想觉悟已达到的水平(竟然认为“千百万人的世界观”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基础上建立起

来”)。在这种错误估计的前提下，按照错误的思路制定出来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针不可能是正确的。从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列·伊利切夫)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把“社会主义新人”(能够担负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人)当成一个既成事实，对他们做思想教育工作，主要任务是克服他们思想上的“旧残余”。“旧残余”是1936年以后苏联一直沿用的提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向苏联人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做全面的进攻”曾成为当时政治思想工作中的主题。“旧残余”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可以依据不同时期不同需要做出各种解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使苏联的一些政治家、理论家陷入了不能解脱的悖论：要肯定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便不能不肯定苏联人从主要方面说已是社会主义新人，便不能不认定苏联人的意识形态主要的部分已是社会主义的，因此只能承认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克服“旧残余”。这样一来，意识形态的方针和目标只能定在克服“旧残余”这个界限之下，其结果必然是：(一)把意识形态工作想象得过于容易而简单；(二)无法强调国内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强调它的重要性就等于宣布“旧残余”已不仅仅是“残余”，而是极其严重的东西；(三)“旧残余”概念的灵活性，给人们留下做随心所欲解释的余地，既可把它渲染得极其严重，又可把它说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宣布它已被彻底消除。

由此可见，在虚假的、不实的前提下制定出来的方针，无论它显得多么完善，它在推行时取得了什么效果，它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它取得的效果完全是一种假象，这一方针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苏联80年代末期的情况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第二，这一时期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采用的方式、方法、措施则与斯大林时期不同。斯大林时期那种用粗暴行政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方式已经遭到批判，对其危害和后遗症也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一些因意识形态罪名而被错判的人和事开始得到昭雪，宣传、教育和理论工作中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烦琐

哲学和书呆子习气受到了批评，苏共呼吁理论工作要"敢作敢为"、要有"科学勇气"、要"大胆干预生活"和"创造性发展马列主义"等对改进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起到了作用，尽管从总体上说，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工作仍是被严加控制的，但这时苏联社会的精神氛围毕竟较斯大林时期宽松多了，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意识形态中问题的事例较前少多了。"严加控制"也只能起到极为有限的作用，因为苏共在这些年代里提出的一些所谓带"突破性"的"新论点"，其正确性及其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这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它也的确在一些理论工作者头脑里引起了疑问，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混乱。

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是从清理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给实践和理论带来的不良后果开始的。但从今天的高度来看，那时对"个人崇拜"的认识和揭露是极其肤浅的，触及的也只是表层问题。

对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苏斯洛夫，他在苏共20大上的发言中专门谈到"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认为"它目前的主要缺点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实际生活"，认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给予帮助，尽力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道德进行不懈的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劳动人民，首先是武装领导干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认为当时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是：工作做得"不准确"、"在很大程度上是落空的，变成死记一些大家知道的公式和原理，并且常常培养出一些脱离实际生活的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宣传工作的锋芒"针对过去"、"针对历史"（他引用一位收割机手的话，那位说："我在小组中学习党史已有13年了。现在是宣传员第13次向我们讲解崩得问题。难道我们没有比批判崩得更重要的事情吗？"）；人们不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把"权威人士"对某一问题的言

论当作“最高标准”。因此他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要尽快“转向生活，转向实践”。苏斯洛夫看到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了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弊病。

对这一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人是伊利切夫，他此时是苏共中央书记、宣传鼓动部部长，从1962年到1965年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的成立表明，此时苏共已把意识形态工作单独作为一个方面独立出来。伊利切夫的多次有关意识形态工作的讲话、报告和他参予下制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集中体现在1963年6月苏共中央决议中)中，都指出了以往这方面工作中存在过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夸夸其谈”、“学究作风”、“宣传主要面向过去，针对比较狭小的人民阶层”等缺点，强调今后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应考虑“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知识修养的水平、工作性质、学习兴趣”，在学习方式上提倡自学方法和自愿原则。

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都看到了以往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伊利切夫更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从把它作为党内派别斗争手段转到了对广大群众和干部做转变思想、确立正确世界观工作方面，他们都看到了意识形态工作脱离生活实际的危害。然而他们又都没有触及“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要害。其要害是：在那种情况下，谁都不敢从实际出发，不敢把苏联的实际情况和历史进程当成唯一出发点，而是把某个人、某个“权威”的论断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当成定论和前提。既然已经把一个不符合苏联社会实际状况的结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之类)当成了立论的前提，由此而引申出的任何理论、方针和政策都不能不是与苏联社会实际不符合的，因而必然从根本上脱离生活实际。这种建立在“空中楼阁”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能解决它所确立的目标，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在确立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所有的“旧残余”(即使沿用他们的提法)实际上

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里，甚至已经潜在地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强大。从这个角度看，后来发生的质上的演变，便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第三，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的所谓宽松只是相对于斯大林时期来说的。20大前后“解冻”所引发出来的一些后果，使得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感到恐慌，他们便马上转而采取收紧的政策。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多数情况下执行的仍然是对国内严加控制和防范的职能；对外在强调思想上不能“和平共处”时，除了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思潮、帝国主义势力之外，还把矛头也对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论点)，指责“双百方针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中离开阶级立场”，诬称这是“在实质上宣布了科学、文学、艺术和文化中的不同思想流派的和平共处”。硬说这是“要求给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给科学和艺术中各种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流派以充分的自由”。① 在哲学等领域内，仍然控制很紧。例如，1962年《哲学问题》杂志由于发表了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艾耶尔的《哲学与科学》的文章而被《共产党人》杂志指责为“逢迎”资产阶级学者，是把和平共处原则扩大到思想意识斗争方面的“反常”表现。

所有这些都表明，此时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针与斯大林时期相比并无根本性变化，只是在做法上有所区别，不再搞大规模批判和压制而已。正常的学术争论基本上开展不起来，教条主义虽然受到批评，但文章和作品中引经据典、死啃书本、为某个“权威”(从前是斯大林，现在是赫鲁晓夫)的论点进行注释、论证和恭维，千篇一律，形式主义，理论根本不触及现实存在的问

① 参见M·T·约夫楚克:《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的民族主义歪曲、左倾宗派主义和庸俗化》，载《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24辑;《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俄文版，1964年。

题，仍然是司空见惯的。领导人满足于所有舆论阵地都为他们所控制，满足于报刊书籍中充斥马列主义的词句，满足于表面上的“舆论一律”，满足于出版物上的虚假繁荣。在这种形势下，苏共1963年6月提出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工作方针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和字面上，而不可能得到实际的执行，因而也不可能取得实效。

第四，前面这三点是对1953—1964年期间苏联意识形态工作方针和总的状况所作的事实描述和揭示。那末，所谓“演变的开始”，具体说来指的是什么呢？

近年来，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陆续发表的一些材料表明，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变或者说深层的变化，的确是从1953年年中起对个人崇拜现象的批判、特别是从20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开始的。

揭露、批判、肃清个人崇拜现象及其消极后果对苏联社会的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达到分清是非，提高认识，加强团结，继续前进的目的。然而赫鲁晓夫采取的大反斯大林的举动非但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却在那一代人、尤其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里引起了空前剧烈而深刻的震动，并产生了严重的消极效应。

苏联过去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宣传，其宗旨主要有两个：一是千方百计地把斯大林塑造成为一个至臻完美、至高无尚、英明伟大、战无不胜的领袖形象；二是把苏联的社会渲染成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地上天堂。斯大林解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推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顶峰。当斯大林在理论上的许多错误被简单化地揭露出来时，就立刻动摇了他从前享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地位，“斯大林主义”的提法尽管在当时还不可能被接受，但从“马恩列斯”并列提法中删掉“斯大林”则已被普遍认同。在人们内心深处激发起来的必然是一股怀疑的潜流：斯大林的一些错误论点为什么长期被推崇为“马克思

主义的顶峰"？苏共20大提出的那些所谓"新"论点（"全民国家"、"全民党"、人道主义等等）与人们过去学到并熟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明显的差别和背谬，这时却被舆论界吹捧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究竟是马列主义过时了还是苏共修正了马列主义？如果说斯大林问题的提出是给苏联意识形态堤坝打开的一道缺口，那么苏共20大则使这个缺口成为完全不可弥补的了。用A·雅科夫列夫的话说，这叫做"赫鲁晓夫的报告改变了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状态"、"20大在人们思想和心灵中播下的种子是不可磨灭的"。①20大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些人注定要在80年代的苏联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20大在一代人的心里注人了一种与1953年以前大相径庭的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为意识形态的演变准备了思想基础。

2．从1964年10月到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开始了苏联历史上被称之为"停滞"的时期。在近20年的漫长的"停滞时期"里，20大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过的稍许活跃的局面此时已沉寂下来，社会生活表面上的平稳掩盖着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和冲突。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上存在很多问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拉大，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夸夸其谈、粉饰现实，安于现状，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所有这些造成了人们对政治的普遍冷漠，对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的厌弃。

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

第一，意识形态工作的总方针与赫鲁晓夫时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因为此时承继了对确定总方针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基本理论前提。苏共领导人仍然认为当时的苏联正走在全面展开共产

① 参见A·雅科夫列夫：《痛苦、读书、生活（改革：希望与现实）》，莫斯科1991年。1989年10月雅科夫列夫与美国记者赫·斯密特的谈话。

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他们已不可能由这一已向全世界宣布了的前提后退。赫鲁晓夫时期确定的建成共产主义的期限(这是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一起参与制定的)，即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成了一颗难以咽下的苦果，使这一时期的领导人感到难堪。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列宁曾经提出过“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他说：“在我国建成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有趣的是，在此后3—4年里理论界竟然异乎寻常地对这个“新”提法表示冷淡。这种“反常”遭到苏斯洛夫等的批评，1971年24大以后，“发达社会主义”被推崇为苏共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被定为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主题。理论界被硬性推上了为“发达社会主义”进行论证的轨道。为使“发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站得住脚而不致破绽百出，理论界只得绞尽脑汁，发挥想象，把现实中本未达到的境界描绘得内容充实，栩栩如生，甚至连其每一细节都被描绘得极为具体。于是一些虚假的命题，如关于在苏联已“形成了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等等，便成了许多专著的主题，成为宣传工作津津乐道的题目。

与赫鲁晓夫关于20年内苏联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的论点相比，“发达社会主义”论虽然向苏联社会实际靠近了一步，但这时的苏共领导人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和程度的估计，显然与苏联实际仍然相距甚远，以这种严重脱离苏联实际的“发达社会主义”论为依据制定出来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针不可能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第二，这一时期苏共通过其代表大会(23、24、25、26大)和中央全会一再强调“意识形态斗争问题越来越被提到首位”(25大)，强调苏联文化、科学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在世界舞台上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化条件下实现的，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两个世界体系的经济竞赛和科学技术竞赛这一领域内的阶级斗

争的作用大大提高了”。①此外还强调“响应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1969年)的号召，与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对理论和政策的歪曲，与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进行斗争”。②由此可见，苏共当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和主要矛头都放在和指向国际舞台。

那么苏共对国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工作抱什么态度呢？首先它仍然拘守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完全彻底胜利和“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理论前提，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和生活在这样一种最先进社会中的苏联人的思想觉悟和社会意识因此就不能估计过低，否则便等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和优越性。在此种情况下，苏共便只能把“反对异己的习俗和传统的影响的斗争，克服人们意识和行为方面的消极现象(有时则用“旧时代的残余”一词)”确定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任务。这里所说的“消极现象”或“旧时代的残余”指的主要是“贪婪、贪污、寄生、诽谤、匿名陷害、酗酒等等”。这些现象是从哪里来的？回答是：(一)来自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渗透，这种意识形态试图“在人们意识中复活以前的偏见和遗毒”；(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苏共在此问题上绝口不谈这些现象产生的现实原因，更不谈为什么从1936年起就一直在同“旧残余”做斗争而“旧残余”却始终存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苏共当时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艰巨性做了多么轻率的估计。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此时的唯一进步就是：开始试图从精神文化的广阔视野上看待意识形态，提倡研究意识形态工作的原理，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结构、手段、形式和方法，提出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统一起来，把思想、政

---

① 参见勃列日涅夫1971年在24大上的报告。

② 参见1971年3月7日《真理报》社论：《马列主义的伟大力量》。

治、劳动和道德教育统一起来这两个原则。① 但这也只是少数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学者们才关心的课题。

第三，苏共此时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方式仍是：通过党的决议及体现中央精神的社论来指导和指挥意识形态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使整个意识形态工作停留在一般号召和表面文章的水平上。对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发号施令，动辄警告和敲打，一旦发现有人"思想不纯"或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这些人便会遭到批判和谴责、被清除出科研和教学单位、禁止发表作品。这类事件在这一时期里仍时有发生。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固步自封，慵懒怠惰，平庸保守，普遍意志消沉；尽管"上面"号召接近生活、揭露矛盾、创造性地研究马列主义，但由于没有提供应有的政策保证和宽松的环境，这些号召只能流于形式；理论工作者要么逃避现实，谨小慎微，追求"保险"，要么躲在离政治较远的领域从事"纯"学术研究；那些不肯迎合和屈就于一时政治需要，不肯违背科学信念和良心的理论工作者，只能在"困境"中奋斗。这一时期苏联在理论上没有重大建树，没有涌现出称得上是思想家的人物，便是苏联意识形态建设没有实质性进展的证明。

围绕"发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作的宣传和发表的成千上万篇文章和著作，造成了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虚假的繁荣效果。迷信"宣传"，以为"宣传"万能，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特点。"宣传"可以转移人的对现实问题和矛盾的注意力，可以掩盖现实的消极和丑恶方面，可以封住人们的口，然而由于它"宣传"的是现实中本不存在的东西或者似是而非的东西，由于"宣传"本身既不能生产出人们需要的物质产品也不能解除人们的实际困苦，所以一当真相大白时，它便很容易被戳

① 参见M.约夫楚克：《苏维埃精神文化的发展问题和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哲学问题》1976年第3期。

穿，从而引起人们对意识形态本身的轻蔑和反感。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的正是这种情景。

四、1985年3月到1991年12月：苏联意识形态从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到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激变

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逝世后，苏联开始了从"停滞"向改革逐步转变和过渡的时期。这段时期(1982年11月—1985年3月)虽然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但苏联历史进程的节奏显然加快了，两位最高领导人相继逝世(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逝世)，年轻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正式登上苏共最高领导岗位。尽管安德罗波夫在1982年4月就以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的论点修正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发达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论点，揭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大量落后和丑恶现象，阐明了从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实干扭转颓势的抱负；在1983年6月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通过了《党的意识形态和群众性政治工作的迫切问题》决议，要求意识形态工作坚决转向社会实践，等等，但历史没有给他在苏联历史上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由于他的去世，在他倡议召开的全苏意识形态工作学术实践会议在1984年12月召开时，在会上做报告已经是戈尔巴乔夫(题目是:《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1983年6月中央全会和1984年12月全苏意识形态会议，反映了一部分苏共领导人当时的主导思路，即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形势，要求尽快正视现实的缺点和矛盾，讲真话、求实、不掩盖过失，实现深刻的变革，以改变苏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经济和科技上差距越拉越大的状况。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发表的一些讲话，包括他在1986年2月在苏共27大上的报告和1988年2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赋予革命的改革的革新的意识形态》，都反映了此时苏共领导人企图采用一切手段来推动改革，以改变苏联面临的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的急迫心情。

然而，在这6年多时间中，由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推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在处理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犯下了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他们不仅未能扭转苏联的形势，反而引发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的全面危机，并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他们正是在这几年中使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丧失了得来不易的主导地位，使意识形态领域成了自由化泛滥的温床，使苏联意识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

在这期间，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政策，他的“新思维”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观点，导致苏联理论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70年历史的反思变成了否定一切；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变成了对马列主义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检讨变成了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否定；反思以往对待现代西方学术和文化采取的一概排斥的错误态度变成了对现代西方思潮的盲目崇拜；检讨对待本国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变成了对“国粹”的盲目歌颂；纠正过去对待学术思想和学术争论的行政命令压制变成了无原则的放任自流和彻底的无政府主义。

在“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下，反对马列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逐渐成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潮流。各种错误思想、反动思潮、民族主义、宗教迷信到处泛滥。苏联意识形态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从整体上至此已经丧失。

1985年以后苏联各种事态的演变和发展是导致苏联意识形态在性质上发生根本变化的直接原因。具体说来这些原因有以下一些。

首先，对本国国情做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80年代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已经程度不同地取得了初步的成绩，改革已经成了时代的潮流。苏共领导人，尤其是从

安德罗波夫起，虽然迟缓，但也逐步地看清了这股巨大的历史潮流。1985年，苏共终于做出了改革的决定，试图通过改革来使苏联这种体制摆脱困境和危机。然而1985年以后的改革历程却表明苏共领导人并没有对自己所面对的改革对象进行严肃认真的、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对改革的目的、性质、方针和速度没有明确而清晰的认识，因此在实践中发生左右摇摆、大起大落、主次不分、前后矛盾、朝三暮四、虎头蛇尾的紊乱现象。

苏共及其主要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虽然意识到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经济)，但在考虑如何解决苏联的问题时，"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的观念仍在作祟，把这当成出发点和前提，因此才会出现改革之初把"加速"发展确定为改革的发展战略和方针的错误决策。到了1988年上半年，"加速"战略实际上已经破灭，因为苏联问题的症结本不在"速度"快慢上。苏联70多年里积累下来的是一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涉及全局和具有体制性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决不是一朝一夕、三五年内就能解决的；简单化地动大手术或"休克"疗法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然而苏联领导人对此并没有透彻、痛切的认识。在改革步履维艰的关键时刻，把注意力转到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去，把公开化、民主化、多党制、多元化等等看成是灵丹妙药。这些方针的推行，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上舞台，热衷于权力角逐，经济被抛在一边。发动和领导改革的苏共，在权力的激烈争夺中，节节退让，其结果造成了1989—1990年的全国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其次，苏共对国情判断的另一个严重失误是：对苏联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存在的问题和复杂性估计不足，把握不准，以新的错误纠正旧的错误。

1985年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苏共最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马列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通过批判教条主义、烦琐哲学、书

呆子习气、理论脱离实际、应时主义等等，解放思想，破除阻碍改革的保守观念；继而则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口号，并把这些确定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方针。但是，第一，苏共忘记了任何民主化、公开性等都应该服务于经济改革，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前提，都要以政治上的安定和法制建设的加强为保证；第二，苏共过高地估计了苏联人的马列主义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盲目地相信"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在苏联已经解决了。

这些方针的推行，带来了严重而不可收拾的后果。在取消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控制的做法之后，一大批人摆向另一个极端，即彻底的自由化和放任自流。很快在全苏的范围内出现了由怀疑、动摇马列主义，发展到批判、攻击、反对马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汹涌浪潮。苏共对各种错误的思潮乃至对反对苏共、反对马列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行为采取了姑息纵容的自由化态度，对坚持马列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选择的力量则采取不予支持的态度，其结果是造成整个意识形态战线的全线崩溃。

第三，造成意识形态战线崩溃的原因，除了苏共及其主要领导人推行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苏共中央本身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和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本身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动摇和背叛。

戈尔巴乔夫主政后启用了一批具有强烈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主张政治多元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他们自诩为20大和"解冻"的产儿，试图在"赫鲁晓夫的解冻"与1985年以后改革之间"架起一座桥梁"(Ф·布尔拉茨基)。他们把戈尔巴乔夫视为"整整一代的二十大的儿女们"的代表①。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曾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① 参见Ф·布尔拉茨基《领袖和谋士》，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418、434页。

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出谋划策、起草各种报告和文件，力图用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理论见解来影响苏共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制定，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确起到了这种作用。如Ф·布尔拉茨基的全民国家思想就被赫鲁晓夫纳入到20大的决议；他关于"政治上的多党制、经济上的混合所有制、文化中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等主张也在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

在这方面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曾一度(1985—1988年)担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书记的A·雅科夫列夫。他通常被看作是"改革之父"和"新思维"的主要倡导者。1988年秋，以反对斯大林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而著称于世的前苏共中央工作人员A·齐普科亲耳听到A·雅科夫列夫对他说："已经到这样的时候了，即必须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和错误的"，[①] 而且齐普科当时还得到一种印象，即雅科夫列夫的这一想法早就有了。而雅科夫列夫则在他的书中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它只是从科学那里借用了一些名词术语"；"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立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②]。指望这样一个根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来领导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实在是历史一大讽刺。A·齐普科在苏共中央工作时，凭他在那里接触到的实际情况，认为一些法国记者在苏联改革之初说的话完全是对的，那些人说：在苏联，反革命的中心就在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即苏共中央。[③]

象雅科夫列夫、布尔拉茨基这样一些从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

① A·雅科夫列夫：《序言、崩塌、结束语》莫斯科1992年，A·齐普科为该书写的前言，第5页

② 同上书，第127页。

③ A·雅科夫列夫：《序言、崩塌、结束语》，莫斯科1992年，A·齐普科为该书写的前言，第4页。

家，在改革的进程中却纷纷争先恐后地抛弃马克思主义，这种变化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从他们的变化来反观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变，便不会对这种演变感到不解和突然了。

苏联意识形态演变的教训

1. 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既然是从“理论规定”的另一端开始的(即在不具备应有的“文明前提”情况下开始的)，那么在革命胜利以后，就应当在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的同时也重视社会主义“文明前提”的建设，并对这种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非常关注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任务。他说，这方面的任务“不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地得到解决”，它的解决“需要一个较长时期”。而且根据我国的经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必须同步地、协调地进行。

2. 苏联一直不能对本国社会发展阶段和水平作出实事求是的、符合本国实际的科学估计，而是作了盲目乐观和超前的估计，在错误的大前提之下作出的一切决策都必然包含着错误的成分或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急于求成、一步到位的形而上学思维一直伴随着苏联决策者。从1936年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建成，到赫鲁晓夫宣布20年内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再到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反映的都是一种俄国特有的历史急性病和速成病。苏共领导人特别喜欢“建成”这个字眼，把“建成”理解为：在物质技术基础建设方面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认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不会束缚而只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相对于生产力来说，只有促进其发展的问题，而再无继续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认为苏联存在的只是旧的思想意识的“残余”，是受了外国敌对势力的影响，根本否认在自己的基础上也可能产生与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东西。对物质基础建设和对精神文化建设如此错误的理解，必然有碍于决策者洞察自己国家存在的实际状况和问题，制定不出正确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方针政策。

3．解决社会主义“文明前提”的建设必须采取符合文明和文化发展规律的方法和手段。意识形态工作首要的是争取人心，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来征服人心，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仅要使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划清界限，而且真正做到使他们心悦诚服。不能说苏联不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但这种重视的目的和着眼点却往往是有问题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和相当长的时期里，把意识形态变成了党内斗争的手段，服务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苏联意识形态的确立较多地依靠政权和领导人的权力地位，过分地依重于强制和行政命令，不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征服力；满足于表面上的所谓“舆论一律”，而不注重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的意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唯有在它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在它真正成为人们的世界观的情况下，它才能获得真正的生命力。

4．苏联的意识形态由于受到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影响而逐渐丧失了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不断进取，敢于迎接新的挑战，勇于探索和创造、研究和解决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的、迫切的问题，而决不能象苏联以往那样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粉饰现实、不容许发表任何不同观点、不容许正常的学术争论和理论讨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来就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今后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它的活力和战斗力是在斗争中获得的。然而，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使批判具有思想的深刻性、说理的透彻性和较强的说明力，摆事实、讲道理，真正说服人和征服人心，而不应象苏联以往那样用强制方法来进行压服和用大

帽子吓人。而且还必须把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同对现实问题的探索和理论上的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5.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发展不能在孤立和封闭的环境中进行。苏联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在一国范围内、在孤立和封闭的条件下生存的，它虽然一贯重视资产阶级思潮批判的工作，但这种批判大多不是在面对面交锋，而是在对手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没有真正的战斗，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因此这种“战无不胜”是虚假的。

6. 苏联在处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和继承关系方面始终不能正确把握分寸；在很长时期里苏联对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采取片面的形面上学的态度，只要其中进步的、唯物主义的，而对那些曾在人们精神生活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唯心主义和宗教思想则采取强行禁止，不许人们接触的方针。事实表明，这种不科学的态度和幼稚的作法无助于解决思想意识领域中的问题，从前强行禁止和彻底否定的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唯心主义和宗教哲学今天竟成了人们热衷和拜倒的对象，就是有力的反证。

7. 苏联和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变和崩溃说明一个问题，即苏联这种体制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其中一个最致命的弊端就是：它虽然搞了70年的革命和建设，在各方面也取得了许多不容抹煞的成就，但它却没能培养出一批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和弊端的可靠的后继者。没有能造就一批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家。有生命力的体制，必然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生长的能力。苏共曾胜利地经历过战争(国内战争、卫国战争)的考验，然而它却经受不住改革开放这种类型和性质的考验，而改革开放恰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看，苏联体制的崩溃不能不说带有某种必然性。

撰稿者　贾泽林　　责任编委　陈筠泉

苏联剧变与苏联对外政策

苏联在历史上长期推行错误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这方面的错误大大恶化了苏联的国际环境并对其国内建设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力图调整和改变苏联过去的对外政策，但他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战线，结果完全倒向西方。研究苏联历史上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在对外政策领域中所犯的重大错误，分析其根源，总结其深刻的教训，是探讨苏联社会剧变的原因和教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苏联历史上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及其后果

（一）主要错误表现

苏联历史上在对外活动方面犯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后和战后时期，具体表现如下：

1. 侵占他国领土。

1939年，欧洲战云密布。为赢得备战时间，苏联于8月23日与希特勒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的秘密附加议定书规定：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后来又加上立陶宛，）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双方还确定了在波兰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并商定对于是否保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将视事态发展而定。

条约墨迹未干，9月1日德国即大举入侵波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9月17日苏联出兵与德国合伙瓜分波兰，从而获得了约1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① 11月，苏联又发动对芬战争，从芬兰手中夺取了卡累利阿地区的大片领土。1939年底，苏联军队进驻波罗的海三国，并于次年完成了这三个国家同苏联的合并。1940年中，苏联用最后通牒的方式从罗马尼亚夺取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着苏军的节节胜利，苏联又把本属中国的唐努乌梁海②、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德国的东普鲁士、日本的北方领土等划归己有。除为重建波兰苏从1939年夺取的波领土中让出了大约10万平方公里外，二战前后苏联共侵占别国领土约70万平方公里。

2. 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地缘政治争夺。

苏德条约秘密附加议定书的签定，是苏建立势力范围活动的最初表现。二战期间，苏继续推行同西方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如1944年10月斯大林曾与丘吉尔达成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的协议，规定：在罗马尼亚，苏联的决定权为90％，其他国家为10％；在希腊，英国的决定权为90％，苏联为10％；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苏英的决定权各占50％；在保加利亚，苏联75％，其他国家25％。③ 这一协议实际是雅尔塔体制的雏形。此后，苏联与美英在势力范围问题上、特别是围绕波兰问题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斯大林力图控制波兰，同时作为交换，他把希腊和比利时划归英国的势力范围。④ 他在1948年对希腊人民的武装斗争持否定

① 这是俄国历史上第四次伙同他国瓜分波兰。
当时苏军曾俘获大批波兰军人，其中四千名军官在苏德战争爆发后被苏方杀害，这就是令世人震惊的“卡廷森林大屠杀事件”。

② 今俄罗斯联邦图瓦自治共和国。

③ 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译本第六卷上部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37、338页。

④ 参阅《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中译本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34页。

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显示他遵守关于势力范围的承诺，以免引起英美的不快。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苏联终于同美英确立起对战后世界政治有决定性影响的雅尔塔体制。当时，由于苏军在东欧已占据了难以动摇的地位，而美国尚未从对日作战中解脱出来、亟需苏联出兵帮助，苏联迫使美英做出很大让步，成功地改变了欧洲及远东的政治版图，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势力范围，其地理所及包括：

——东欧　在苏联势力范围中东欧(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一度还包括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地理范围内形成了后来"苏联集团"的核心——"社会主义大家庭"。苏联帮助东欧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在这些国家强制推广苏联的发展模式。1948年后又对"铁托集团"大举围攻，对东欧国家共产党内的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进行清洗和镇压。战后初期的这些事例表明：苏联在欧洲首要关心的是确立对东欧的全面控制，从一开始就不允许东欧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芬兰　战后苏联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附近设立了一个大型军事基地。① 1948年4月两国又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条约实际赋予苏联干涉芬兰内政的权利。

——外蒙古　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背着中国和蒙古族人民，与美英达成"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的协议②，随后压迫中国国民党政府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使其分裂蒙古和控制外蒙的行径合法化。

——远东　苏联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被日本控制的海峡所包围"为由，恢复了列宁曾宣告废除的沙俄在中国东北的特

① 50年代中期被赫鲁晓夫撤除。

② 见《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中译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8页。

权，“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等等①。此外，苏联夺回了1905年俄日帝国主义战争中失去的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并侵占了日本北方四岛。它还曾要求占领日本的北海道。

战后初期苏联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对外行动，如：在伊朗北部曾建立亲苏政权（后来在西方的压力下失败）；对土耳其与苏联接壤的地区提出领土要求，还要求在黑海海峡建立苏联海军基地；对扼居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北濒地中海的的黎波里、据守红海的厄立特里亚等地寻求托管。

势力范围的建立使苏联陷入了与西方的尖锐的地缘政治对峙。出于对抗和争夺的需要，以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为契机，苏联开始向“帝国主义外围地区”渗透。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苏联在中东、非洲、中美洲和亚洲为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70年代下半期，它进一步迈出了对外扩张、干涉的新步伐；1975年利用古巴军队在安哥拉大打“代理人战争”，1977年至1978的从军事上大规模卷入非洲之角的冲突，1978年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出动10万苏军直接入侵阿富汗。

3．卷入大规模军备竞赛。

从1947年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苏联发动冷战，面对美国的实力政策，为保障本土与势力范围的安全苏联采取了大力加强军事力量的政策，从而陷入同美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

在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军事上奉行积极防御战略，重点加强欧洲战区的常规武器优势，同时大力发展核武器，打破美国的核垄断。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改行火箭核战略，重点发展核打击能力。到1964年苏军已拥有洲际导弹200枚，为美国的24％；中程导弹700余枚，为美国的3.5倍；远程轰炸机190架，为美国的30％；

① 见《三大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中译本，三联书店1967年版，第258页。

潜射弹道导弹120枚，为美国的29%。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军事力量大发展时期。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取得了与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同时在欧洲战区仍保持着常规武器优势，其海空军力量亦有长足发展(祥见表1、2)。进入80年代苏美军备竞赛又扩展到太空领域。

军备竞赛的逻辑促使苏联投入大量资源形成并保持巨大的军事生产能力，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也未能摆脱这种状况(详见表3、4)。

表1 苏美战略武器数量对比

分项	战略核弹头(枚)		洲际导弹(枚)		潜射弹道导弹(枚)		远程轰炸机(架)	
国别	苏	美	苏	美	苏	美	苏	美
1962	300	4700	75	294	—	144	190	600
1965	600	5650	270	854	120	496	190	630
1970	1700	4000	1300	1054	280	656	150	550
1974	2600	7940	1575	1054	720	656	140	437
1985	10716	12846	1398	1010	944	640	160	260

资料来源：日本《调查月报》1974年12月号；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75—1976年军事力量对比》，

《1986—1987年军事力量对比》。

表2 1981—1982年度苏美军事力量对比

分项 \ 国别 数量	苏	美
总兵力(万人)	367.3	204.9
洲际导弹(枚)	1398	1052
潜射弹道导弹(枚)	989	576
远程轰炸机(架)	160	316

续表

项　　国别/数量	苏	美
（坦克）辆	45000	约11400
装甲战斗车辆（辆）	62000	约20000
火炮（门）	29900	14000
航空母舰（艘）	4	14
主要水面舰只（艘）	294	201
攻击潜艇（艘）	190	84
作战飞机（架）	约5300	约3200

资料来源：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81—1982年度军事力量对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1年2月9日。

表3　1987—1989年苏美基本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

分项　　年份/数量	1987		1988		1989	
	苏	美	苏	美	苏	美
战斗技术装备种类						
坦　　克	3500	950	3500	775	1700	725
步战车及装甲输送车	4450	800	5250	1000	5700	650
防火炮	100	0	100	0	250	0
野战火炮	2250	298	2500	273	1850	147
轰炸机	45	52	45	22	40	0
歼击/强击机	700	550	700	550	625	470
直升飞机	450	360	400	340	400	280
洲际弹道导弹	125	24	150	12	140	9
潜射弹道导弹	100	0	100	0	100	21
短程导弹	750	0	650	0	200	0
远程潜射巡航导弹	200	170	200	260	200	240
近程潜射巡航导弹	1100	570	1100	380	1100	180
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	2	0	1	1	2	1
攻击潜艇	7	2	7	3	7	5
其他水面舰只	8	6	9	3	11	4

资料来源：〔苏〕《美国》杂志1991年第5期。

表4　1989年苏美用于购买某些武器的费用

项目		飞机及引擎	火箭及战斗部	装甲技术装备	火炮
费用	苏联（百万卢布）	3098	3873	2169	431
	美国（百万美元）	26768	15123	2406	185
生产	苏联	1075	2240	7400	2100
	美国	726	630	1375	147
每件武器平均值	苏联（百万卢布）	2.88	1.73	0.29	0.21
	美国（百万美元）	35.13	24.00	1.75	1.26
卢布美元比率		1:12.19	1:13.88	1:5.97	1:6.13

资料来源：［苏］《美国》杂志1991年第5期。

我们估算：苏联年实际军费开支1948至1957年占国民收入15%左右，1958年至1964年占国民收入的14～20%，1965至80年代占18～23%。在70年代苏联扩军备战的高峰期里，苏联每年大约把1/5至1/4的国民收入用于军事目的。

4．在国际共运中推行大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推行大国主义。

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是苏联对外政策中相互贯通的两条线。其主要表现为：

（1）要求各国党服从苏共的领导，各国利益服从苏联的利益，在国际共运中粗暴蛮横地干涉别国内政和别党的内部事务。

十月革命后，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国际共运的中心地位，负有对共产国际各支部（各国党）的领导之责。但是，共产国际的“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

置代替原则指导，变成干涉各党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① 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曾使后者蒙受严重损失。正如毛泽东所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② 当时苏共把社会民主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思想支柱，在欧洲各国党内大反右倾机会主义，还把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推及整个国际共运，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直至肉体消灭的办法，使一些党(如波兰党)的领导层几乎损失损失殆尽，全党陷于瘫痪。苏德条约签署后，苏共要求欧洲各党贯彻它的对德妥协政策，放弃反法西斯斗争，而去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

二战胜利后，苏共为维护与美英达成的划分势力范围协议，要求法国、意大利、希腊、中国等国的党放下武器，到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使国际共运出现一股缴枪浪潮。冷战爆发后，苏共又指责法、意等国党右倾、斗争不力。1947年成立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是苏共手中的工具，其主要活动之一是对不愿听命于苏联的南斯拉夫党和政府大举围攻。接着，在苏共的指使下，又在东欧各国党内开展了对“民族主义分子”、“铁托分子”的大清洗运动，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匈牙利的拉伊克、保共的特拉伊乔·科斯托夫、捷共的斯兰斯基、罗共的巴特拉斯卡努、卢卡、乔盖斯库、波共的哥穆尔卡等都遭到清洗，或被处死，或被投入监狱。在这些国家中当时被清洗的共产党员共有几十万人之多。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霸道作风依然故我。为实现“苏美合作”，它要求各国党服从于苏联对外政策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放弃应有的斗争，并把坚持不同意见的中国、阿尔巴尼亚党“革出教门”，引发了国际共运的大辩论，破坏了世界进步阵营的团结。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进一步加强自己的“老子党”地位，它积极插手各国党的内部事务，怀疑和批判“欧洲共产主义”，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0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90页。

禁止社会主义国家党搞改革，强制各国党接受苏共那一套极为僵化的思想理论体系。

（2）强行推广苏联模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采取“顺昌逆亡”政策。

战后初期，为确保对东欧的控制，苏联竭力插手东欧国家的内部事务。在波兰，苏联坚决反对尚有很大影响的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支持共产党的卢布林政府，为确立对波兰的控制，还任命波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为波国防部长；在罗马尼亚，指名让共产党领袖格罗查担任政府总理，并警告罗国王：不这样做，“罗马尼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可能不复存在”；在匈牙利，逮捕了有可能在新大选中获胜的小农党领袖、政府总理纳吉·费伦茨和议长瓦尔加·贝洛；在保加利亚，清洗了农民党领导人佩特科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迫使非共产党的贝奈斯总统辞职。苏联的干预虽然使这些国家得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带有输出革命的性质。南斯拉夫事件发生后，苏联又得出一条重要“教训”，即执政的领导人不仅应是共产党员，而且首先要“亲苏”。在东欧各党开展的大清洗运动，目的就是要保证“国际主义者”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这种插手东欧国家人事安排的做法为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所继承。长期以来，东欧各国不仅最高层领导、甚至省一级干部的任命均需经苏联审查和同意。

在确立“亲苏”共产党人执政地位的同时，苏联向东欧国家强制推广苏联模式。斯大林在批判南斯拉夫时指出：“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是照搬苏联的经验和模式，还是坚持自己的建设道路，是苏南分歧的实质。其他东欧国家因照搬苏联模式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国民经济偏向重工业的畸型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这引起广泛的不满。1953年的东柏林群众闹事、1956年的波匈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70年的波兰危机及至80年代团结工会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体制的弊端及问题的长期积累有关。1968年的侵捷事件是苏联

不允许东欧国家改革原有模式、独立自主发展的最突出例证。1969年出笼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提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有关论"等一套东西。自我赋予干涉、侵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利，是地地道道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在对华政策上苏联长期采取极其蛮横的做法。最初中苏两党仅对一些问题持有歧见，这本来是正常的。但是，苏联为了压服中国，把中国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不惜把两党意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来。它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调集各国党对中国党大肆围攻，挑动我边民大批出走，制造边界流血事件，甚至扬言要对我核设施作"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实行地缘战略包围。所有这些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极不正常的对立状态。

5. 闭关锁国，不搞对外开放。

30年代中期以前，在列宁思想的指导下，苏联曾采用租让制、半租让制(合资企业)、吸收外国贷款、接受西方技术援助、招聘外国技术人员、发展对外贸易等多种方式，积极从西方国家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这种开放政策大大加快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高达16.8%，苏联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这一成就为后来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但是，从30年代下半期起，斯大林认为干部问题和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胜利，开始收缩与西方的经济关系。1939年的外贸额从1930年的16.43亿卢布降至2.7亿卢布，同时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纷纷回国。战后，出于对美国"马歇尔计划"的警惕，苏联又开始压缩战时曾有所增加的与西方的经济联系。1952年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使由"冷战"开始后的东西方关系在政治上处于敌

对状态，在经济上则陷入停滞半停滞状态。此时，苏联的对外经济联系集中在经互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仅占苏外贸总额的15％左右。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虽意识到“采用外国最新技术的必要性”,向西方发出“让我们贸易”的呼吁(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并着手引进西方技术发展化学工业，但与西方的贸易始终未超过苏外贸总额的20％。

70年代之初，苏联提出经济由粗放转向集约化发展方针，外交上提出“缓和”战略和“缓和物质化”口号。适逢美国战略收缩、企图与苏联以贸易换缓和，西德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加之世界石油危机使苏联出口换汇能力增强，东西方经贸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1975年苏联同西方贸易占苏外贸总额的比重从1970年的21.3％迅速增至31.2％，5年中苏联共引进177亿卢布的资金和进口290亿卢布的技术设备，兴建了一批现代化工业企业。但是，由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与世界市场难以融合，由于体制上的弊病导致缺乏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由于“反对外来剥削”的思想不允许外国资本在苏联境内建立独资和合资企业(与东欧国家合资的企业除外),出现了一些长期不得解决的问题：一、苏联经济与世界经济始终是低水平的衔接，即主要是互补性贸易和借贷关系，最多做些补偿贸易，技术引进基本处于购买机器设备的初级阶段；二、因技术消化慢、建设周期长，采用西方设备的企业刚建成,引进的技术即已过时,产品在世界市场没有竞争力，以致不得不再度引进新技术，形成“等距离追赶”；三、由于制成品难以打入西方市场，苏联的外贸结构始终处于第三世界国家水平,初级产品出口占换汇额的70％左右,机器设备出口则多是对发展中国家和经互会成员国。因此，70年代苏联与西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使苏联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不是对外开放，而主要是通过贸易和借贷方式来满足苏联经济对技术的需求，苏联经济仍是一种封闭式结构。它同西方的“等距离追赶”式关系不仅不会缩小双方的差距，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西

方技术的依赖。进入80年代，由于阿富汗战争后西方对苏实行经济制裁、世界能源价格疲软、以及苏联石油生产停滞和下降，苏联同西方的经贸关系日趋萎缩。戈尔巴乔夫虽欲打开国门、吸引外资，但内部混乱使一切都成为徒劳。

（二）错误的严重后果

由于苏联的上述错误行为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和平外交原则，这大大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声誉。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苏联侵占他国领土、建立势力范围、奉行武力和武力威胁政策、进行地缘政治争夺、搞霸权主义，无异于大俄罗斯民族扩张主义的卷土重来。这同时也使帝国主义有了大肆攻击社会主义的口实，西方宣传媒介竭力把社会主义同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相提并论，混淆视听。

对于苏联国内的发展，这些错误也带来极严重的后果。

1. 领土兼并加重了潜伏着的民族问题。如波罗的海三国、在夺取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建立的摩尔多瓦共和国，都是民族情绪最激昂、独立要求最强烈的地方。这些共和国掀起的激进的民族独立运动成了后来苏联解体的导火线。

2. 势力范围的建立使苏联成了“宗主国”，其内外政策开始带有“帝国”特性。苏联在安全、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都与其势力范围连成一体，它就很难放弃势力范围。而不放弃势力范围，苏联的外交便无法摆脱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属性，其错误不仅难以改变，而且对其内部政治发展（如民族问题的解决、民主政治的建设等）也带来了不利影响。

3. 对东欧的政策最终是自食恶果。如上所述，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带有输出革命的性质。东欧各国成了苏联的小兄弟，这些国家的党被迫听命于苏联的指挥，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从而背离了本国实际，脱离了本国群众，这为它们最后的失败埋下了祸根。而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象飞去来器，反过来又打到苏联自己头上。东欧剧变成为动摇苏联社会主义根基的一股猛烈的冲击

波，加速了后者的失败。

4. 对中国无端采取的武力和武力威胁政策，把苏联推入两线作战的境地。60年代以来，仅为加强苏中、蒙中边界的军事力量，苏联花费了约2700亿卢布。这对于本因苏美军备竞赛已不堪负荷的苏联经济，不啻雪上加霜。

5. 长期封闭、不搞对外开放，是导致苏联在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日新月异的世界科技革命面前，苏联经济的科技水平大大落后，从50年代接近世界水平落至80年代相差10至15年。

6. 对国内建设影响最大的错误是，苏联对外政策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国家的外部环境。对于周边国家，苏联是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对于世界，苏联霸权主义是导致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各国人民反霸斗争的对象。它与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处于交恶状态，与西方世界尖锐对峙。这种恶劣的外部环境大大加重了它的战略负担。

把大量资源用于与外部世界对抗，展开与西方的大规模军备竞赛，这给苏联内部建设带来极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首先，它把约1/5至1/4的国民收入用于军事目的，长此以往，形成了难以承受的巨大的资源国力浪费。其次，导致了苏联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型化和军事化。从60年代下半期起(即进入军备竞赛的高峰期后)，在苏联社会生产中第一部类的产量一直保持在近2/3的水平上，消费资料的生产则只占1/3。工业生产中甲类占4/5，乙类仅占1/5。①这种畸型的生产结构使苏联国民经济的改造和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增长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最后，消费资料生产不足，其结果只能是压低人民的消费。战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虽有明显提高，但提高幅度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80年代后，

---

① [苏] C·佩尔武申：《论苏联经济危机的一个深层原因》，载苏联《经济问题》杂志1991年第8期。

由于生产的停滞和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带来的混乱，人民生活水平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这激起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群众情绪的变化是社会发生深刻动荡的一重要根源。

二、苏联历史上在对外政策中所犯错误的根源

苏联历史上在对外政策中所以会犯上述错误，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根源。

（一）苏联同西方对抗争夺的战略成因

苏联历史上对外政策中的上述错误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它陷人了与西方的长期尖锐对抗。建立势力范围、进行军备竞赛和全球地缘政治争夺，都是这种对抗的直接表现。它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推行大党、大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这种对抗服务的；而东西方经济关系的缩小乃至停滞则是双方政治对抗合乎逻辑的发展。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诞生之日起便处于与帝国主义对抗的状态。二战后这种对抗发展为苏美之间的两极对峙。这种对峙既缘起于美国发动对苏冷战，同时也与战争结束前后苏联在东欧的势力扩张有关。

1. 建立保障本土安全的缓冲地带以防止帝国主义的再度侵略，是斯大林当时的战略考虑。

在经历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切肤之痛后，斯大林对未来苏联的安全做了认真的筹划。

他当时曾多次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规律，他不仅一再指出德意日轴心国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而且强调德、日等战败国迟早会“挣脱美国的奴役”、“重新站立起来”，并发动新的战争①。

① 《斯大林文选》，第598页。

他明确说："如果以为德国不会企图恢复自己的实力和进行新的侵略，那就太天真了。……历史表明，只要二三十年的短时期，德国就会从失败中复元过来，并恢复自己的实力"。① 他说："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②

斯大林认为，保障苏联未来的安全需从两方面努力。一是加紧国内建设，重点是发展基础工业。他说："我们必须使我国工业每年能生产生铁5000万吨，钢6000万吨，煤炭5亿吨，石油6000万吨。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不会发生任何意外事件的保证。"③

二是占领周边地区的战略据点。斯大林在总结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时得出一条十分重要的教训，即：侵略国通常更有作战准备，"爱好和平的国家将来可能又会措手不及地遭到侵略"，认为这是"历史的规律"④。因此，在考虑苏联未来的安全时，他要求"制定能够制止侵略的特别办法"，并提出："必须占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不让它们落在德国手里。不仅要在欧洲，而且在远东也应该占领这样的据点，使日本也不能重新发动侵略。"⑤ 斯大林特别重视防止德国的新侵略，因而在周边地区的"战略据点"中他最注重东欧。他说："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试问，这有什么奇怪呢?"⑥ 正是基于这种长期安全考虑，苏联不惜冒与西方关系破裂的风险、花大力巩固它在东欧的控制地位。

斯大林"占领战略据点"的思想为当时的苏联对外活动规定

① 同上，第399页。
② 同上，第599页。
③ 同上，第452页。
④ 同上，第400页。
⑤ 《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第72页。
⑥ 《斯大林文选》第464、465页。

了方向，并产生出苏联的地缘安全战略。侵占他国领土、尤其是建立势力范围，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

2．帝国主义发动冷战，势力范围成为苏联的包袱，苏联的外部环境开始恶化。

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使欧洲出现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在二战中元气大伤的西欧资本主义看来，共产主义（苏联）已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这既包括意识形态也包括军事威胁。西欧不得不寻求美国的庇护，藉以建立欧洲大陆新的力量平衡。此时，美国已从对日作战中脱身，称霸世界的野心急剧膨胀。出于巩固世界资本主义阵地和控制欧洲的目的，它于1947年发动了以“遏制”为名的对苏冷战。“遏战”战略又引申出两项政策，即当年名噪一时的“推回”政策（把苏联共产主义从东欧推回）和“解放”政策（把东欧从苏联控制下解放出来），其矛头所向就是要改变雅尔塔体制所划分的势力范围。

苏联与之针锋相对。从冷战开始后的第二年即1948年起，苏联便加强了对东欧的政治、经济控制，完成了东欧向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转变。1948年爆发柏林危机，针对美国把60架可携带原子弹的重型轰炸机调到英国，加强在欧洲军事存在，并于1949年建立北约军事组织等行动，苏联也开始扩军以增强在欧洲的军事部署，苏军总人数在从1945年的1136.5万减到1948年的287.4万后又迅速增长，1955年曾达到566.3万，为战后最高数。苏联的目的主要是在其核力量尚不足以威胁美国的情况下加强对西欧的军事威慑，即奉行国际上通称的“西欧人质政策”。至此形成了两大阵营在欧洲尖锐对峙的格局。苏联早时的地缘安全战略转变为阵营对抗战略。

苏联以保障本土安全为目的向外“占领战略据点”行动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这促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团结，使美国有了发动冷战的借口，北约的建立和美国在欧洲乃至全球加强针对苏联的军力部署表明苏联的外部环境开始恶化。而苏联则不仅要保

卫本土而且还要保卫势力范围的安全，战略负担大大加重。尽管苏联的本意是想创造一个国际安全环境，但对东欧的控制和对西欧实行"人质政策"，使它与西方的紧张关系难以缓和。加之两大阵营的尖锐对抗基本切断了东西方经济联系，这更减少了双方关系的回旋余地。

3．为抗拒帝国主义的压力，苏联极力谋求战略优势地位。

面对西方的实力政策，苏联采取以实力对抗实力的做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卷入军备竞赛。竞赛双方惧怕落后和都想压倒对手，使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规模越来越大。所谓苏美战略平衡实际是在双方谋求优势的努力下不断向上的平衡。

苏联是在经济实力长期落后于美国的条件下投入军备竞赛的，因而，如前文所述，它为自身军事建设耗费了巨大资源与国力。与此同时，它还非常强调调动其他有利于改变力量对比的因素，如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帝反美斗争，插手与西方战略利益攸关的地区事务，鼓励西方和平主义运动等等，以期恶化西方的战略条件。除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几年中赫鲁晓夫为追求苏美合作一度放松了对世界革命运动的支持外，苏联一直非常重视这些运动的发展，特别是积极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在它看来，"个别孤立的冲突是进步力量战胜帝国主义力量的关键所在"。

70年代，随着军事力量的飞跃发展和远距离投送能力的增强，苏联具备了进一步扩张的手段。而同时，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及其后遗症，"水门事件"、美元危机、石油危机等，使美国内外交困，被迫战略收缩。这一形势为苏联提供了在非洲和中东等广阔地区同美国进行争夺的机会。从1975年的安哥拉战争至1979年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苏联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大搞侵略扩张（输出革命）活动，在"帝国主义外围"地区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态势。

由上述可见：帝国主义发动的对苏冷战，虽主要产生于美国

称霸世界的野心，但客观上也与苏联建立势力范围导致欧洲一分为二的地缘政治形势有直接的联系；冷战使东西方关系呈尖锐对抗性质，大规模军备竞赛和苏联与帝国主义展开的地缘政治角逐，是对抗逻辑的必然结果。由于苏联所对抗的不仅是美国而且几乎是整个西方世界，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和地缘争夺的日趋激烈，把苏联推向了对抗过度且难以自拔的困境。

（二）对战后的时代特征和苏联在世界上的作用的错误估量

苏联所以长期推行错误的对外政策，所以陷入同西方的过度对抗，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战略指导思想的失误。

1．基于对时代的一成不变认识，苏联长期执行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

苏联共产党对于时代的认识主要来自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关于时代的分析。列宁曾对资产阶级历史做过这样的分析：1789—1871年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1871—1914年为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走向衰落时期；1914—？为资产阶级统治溃烂和社会主义胜利时期。[①] 他把这第三个时期界定为："帝国主义时代"[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③]、"各先进国无产阶级同不发达的、落后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斗争的时代"[④] 等等。这些定义后来被斯大林概括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⑤]。

这一时代观包括下列基本分析。

关于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等基本矛盾都已激化；资本主义已走向"垂死、寄生和腐朽"、"全面反动"；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难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4至12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4卷，第42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第54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63页。

利润的贪婪和对世界的瓜分与再瓜分必然导致一连串的战争，而战争将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这些分析构成了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基本内容。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质准备；二、工人阶级所处的"军事苦役营"的奴隶地位使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主观条件成熟起来；三、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这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少数甚至单个国家率先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四、一国革命的胜利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可能有什么界限"，俄国革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使得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①；五、帝国主义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联成一气，后者在十月革命后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在对资本主义矛盾、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主客观条件的分析基础上，苏共形成了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总决战"时期的结论。

基于上述对于时代特征的认识，苏联长期把俄国革命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斯大林曾反复强调，率先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在本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但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即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本主义，这有赖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共同努力②；因此，一国范围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③，胜利的无产阶级应有能力、有决心支援别国革命，推进世界苏维埃进程。

---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80、38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6、347页；第7卷，第140页；第8卷，第56、93、94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44页。

出于这种世界革命整体性考虑，苏共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共产国际，通盘指导各国革命运动，决定各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借助国际的力量促进和掀起各国革命的高潮。这点在战前表现得尤为突出。

战后苏联继续推进其世界革命战略。东欧社会主义的出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苏维埃思想的体现。此后，苏联在推动世界革命的方式上有所变化。由于一大批国家转入社会主义，苏联被帝国主义包围扼杀的危险已大大减轻，其对外战略的重心改为首先保持阵营对抗，在巩固已有革命成果的基础上逐步扩大世界社会主义阵地，同时提出从经济上挤垮和战胜资本主义的任务。这一变化的标志是斯大林"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和赫鲁晓夫"建设共产主义纲领"的提出。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结果，是统一世界市场的瓦解和"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即社会主义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苏联"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下，社会主义各国工业"高速度发展"，会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进而压缩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因此，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就表现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的缩小。斯大林还得出结论，认为他本人过去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和列宁提出的"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说来，资本主义比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的论点"，都"已经失效了"①。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又提出"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规定在1961至1970年的10年里，"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超过最强大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到1980年则要"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说："当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幸福时，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②

---

① 《斯大林文选》第593至595页。

② 《苏共二十二大文件汇编》，第1429、1494页。

这种从经济上挤垮和战胜资本主义的思想，作为长期的战略目标，那是无可非议的，但苏联却把它作为在近期即可实现的现实任务，而且又是以保持同帝国主义的阵营对抗、维持与西方的军事战略平衡为前提的，这就产生了同帝国主义进行军备竞赛与在国内搞经济建设两相争夺资源的矛盾。结果是军事对抗的发展排斥经济建设的发展。不仅如此，苏联领导人在提出这一思想时，既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及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抱有盲目乐观情绪。这种盲目性导致苏共把世界革命进程简单化并采取简单粗暴的做法（如强加苏联模式和输出革命等）。而高估自己必然低估敌人，这又成了促使苏联与西方过度对抗的原因之一。

苏[redacted]就提出过和平共处的概念，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极不稳定的均势”现象①，后来又长期视之为国际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他们一直把和平共处看作暂时的权宜之计。相应的是，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遵循国际主义、共同斗争原则，而与和平共处无涉。

总之，防止帝国主义侵略，同帝国主义进行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直到经济对抗，促进民族解放运动，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是苏联对外战略的基本内容。在1985年之前，这一战略贯穿于苏联对外活动的各个方面，不同的仅是阶段性目标和个别时期策略上的侧重点。

苏联世界革命战略的问题不在于列宁关于时代的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已证明，列宁对于时代的分析是精辟的。他揭示了帝国主义本质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了时代的重要特征，并提出基本符合实际的革命任务和口号。列宁的理论和思想不仅引导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而且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42页。

问题在于：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对列宁关于时代的论述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战略。战后世界发生了许多原先难以预料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是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在这两个进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不仅使它们的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它们调解自身矛盾的能力，使其内部矛盾得到缓解，彼此间发生战争的危险性极大地减少了。发达资本主义呈现经济、政治相对稳定发展局面。相反，在科技革命浪潮面前社会主义国家落后了，它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拉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虽然取得了民族独立，但由于发展水平滞后，短期内还很难摆脱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从属地位。这些表明，世界革命[redacted]很快获取胜利，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需经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但是，苏联领导人没有认清这些变化，仍旧墨守"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学说，仍在"总危机"和"总决战"的认识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这导致战略指导上的严重失误。

2. 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突出的是苏联大党大国地位和苏联的民族利益。

从世界革命整体性出发，苏共要求各国革命运动"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首位"①，为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共同奋斗。斯大林认为，这种共同奋斗的具体表现就是团结在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强大而公开的中心周围，组织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②，同时把巩固俄国革命成果作为国际革命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因为"这对于世界各国工人革命化具有决定性意义"③。他说："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6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8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44页。

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许多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进程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①

依据从苏联这个基地向外扩展世界革命的思想，斯大林把苏联的利益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的利益”②，并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组织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③

战后苏联依然奉行充当世界革命中心的思想。斯大林关于通过苏联提供“技术精湛的帮助”促进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最终使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缩小和崩溃的理论，所突出的仍是苏联作为世界革命“基地”的作用。赫鲁晓夫关于建成共产主义和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的思想，突出的也是苏联经济发展的利益和作用。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在决定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斗争的结局。……凡是想加速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人，他就应当首先关心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及其经济威力”；每一个共产党在制定自己斗争的策略路线时，“不能不注意到我们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以及这一运动在当前时期的总路线”(即苏共提出的与西方首先是美国“和平共处的总路线”——引者)。赫鲁晓夫路线的实质也是要各国革命运动服从苏联的利益需求。

按照苏联的世界革命战略，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其利益等同于世界革命的利益，因而也就高于其他国家革命运动和民族的利益；各国革命者都应围绕苏联这个中心结成有高度组织性的统一战线，各国党都应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或其他类似的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07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14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7页。

组织形式，如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等）成为莫斯科统一指挥的分支（支部）；国际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保卫苏联，有了苏联的利益实现，也就有了各国革命的利益。

按照这一逻辑，为了苏联的利益就可以损害其他国家、民族的利益。1939年的苏德条约、二战期间苏联与美英对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苏联的扩张行为，被堂而皇之地冠以“保卫苏联”、“扩大社会主义阵地”的美称。苏联对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霸权主义行径，也被赋予“国际主义”和“推动世界进步进程”的革命意义。

按照这一逻辑，国际共运各国党就被视为苏联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工具。当着苏联与帝国主义对抗加剧、安全受到威胁时，各国党应积极开展反对垄断资本、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起牵制作用；当着苏联需要与帝国主义妥协时，各国党则也应跟着妥协。

按照这一逻辑，苏共的大党主义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又推广到与这些国家的国家关系领域。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是“牢不可破”的，任何背离“国际主义”的“离经叛道”行为都应在被消灭之列。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干涉，对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的围攻，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等，均清楚地表明其大国主义。这种大国主义的逻辑归宿是“勃烈日涅夫主义”，其实质是：苏联的主权是无限的，其他国家的主权则是“有限”的，前者可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决定后者的命运。

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产生的原因，不仅仅是不了解别国情况的瞎指挥，而是它从根本上就无视别国革命运动和民族利益的存在，把苏联狭隘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总体利益混为一谈，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别国党和民族利益之上。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苏联对外战略中支援世界革命的一面尚占主导地位的话，那么从1939年苏德条约起其民族利己主义一面则开始抬头并日益膨胀，以致最终演变为霸权主义。

（三）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及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对苏联外交

的影响

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是在外部受到帝国主义严重侵略威胁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经济体制属备战型，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管理，偏重发展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在高度一统的经济基础上同时形成了高度一统的政治体制。

这种经济体制是很不成熟的和存在严重弊端的体制。而苏联却把自己的体制和模式绝对化，使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这不仅影响到它的内部建设，而且也影响到它的对外政策。

1. 体制的弊端推动并加重了对外决策上的失误。

在一个民主政治不完备的国度里，最高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对社会进程起着超乎寻常的作用。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只能靠民主机制来减少或纠正这种错误。但是，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个人专权和压制不同意见，使领导人的认识错误往往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事实表明，在苏联历史上，最高领导人的失误和错误都造成了严重后果。

体制的弊端不仅突出个人的作用，而且也推动着他们在对外政策上决策的方向。

(1) 紧张的国际环境是苏联模式的产生和存在的外部环境。这一模式产生于紧张的国际环境。生活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并面临有被扼杀危险的苏联，为了生存和发展，选择优先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有其逻辑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客观性。但是，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性质，决定了这一模式不适用于以满足人民消费为生产目的的和平发展，而只有在备战或战争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其最大效能。因此，紧张的外部环境既是苏联模式产生的条件，也是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苏联对外战略四面出击、同外部世界始终保持箭拔弩张的紧张对抗、夸大外部的“敌人形象”，都是与苏联模式的运行方向相一致的。越是夸大外部环境的紧张程度甚至制造紧张局势，侧重发展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生产的模式越有存在的必要。伴随而来的是，与模式的命运息息相通、享有特权地位的庞大的

军事——工业界集团对于苏联的内外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

(2) 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苏维埃”道路，是苏联模式唯一可能的对外战略选择，这种模式遵循的价值观念不同于社会主义所应有的使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原则，它追求高度集中，机械地要求局部服从整体，这不仅表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而且外在地表现在民族和国际关系方面，即各民族各国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苏维埃”道路与苏联模式本身的集中属性是吻合的。向外推广苏联模式、在统一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最符合苏联战略利益的选择。

同时，苏联所拥有的丰富资源也为它推广苏联模式提供了可能。除中国外，凡学习苏联发展道路的国家都是资源短缺国家，在原本落后的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造成的负担不仅使它们缺少参与国际竞争手段而远离世界市场，而且形成对苏联技术和资源的依赖。通过技术援助和提供原材料，苏联既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地位，又有了控制这些国家的手段。苏联模式成了把世界社会主义的“中心”与“外围”连接起来的纽带。

(3) 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式经济体制，其对外战略着重政治目标。由于经济运行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不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与世界市场难以融合。丰富的资源也使苏联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建成游离于世界市场之外、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经济体系。因对外经济需求低，这种自我封闭型体制把对外政治目标放在首位，本能地希望外部世界越乱越好。由于经济对政治的服从，随着与帝国主义对抗的加剧，苏联不仅奉行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外交路线，而且为此不惜耗费大量资源。

总之，虽然苏联与帝国主义不同，不存在经济上对外扩张的需求，但是，体制的弊端却影响了对外政策上决策的方向，加重了领导人决策中的失误，并规定了苏联以输出模式作为推进世界革命的行为方式。

2．体制的弊端为大俄罗斯主义提供了新的生长土壤。

沙俄帝国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莫斯科公国最初只有200多万平方公里。从16世纪开始，沙皇俄国东征西讨、大肆扩张，到本世纪初，建成了拥有2200多万平方公里、疆域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形成了强烈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列宁曾指出沙俄是除英国外占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监狱"，他发誓要同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① 。列宁在世时大俄罗斯主义受到遏制。但是，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没有继承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使大俄罗斯主义得以发展。如斯大林吹捧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② 。他还否定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中对沙俄侵略扩张的批判，批评恩格斯"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事实"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80年代，历届苏联领导人都把沙俄侵略扩张的鼻祖"伊凡雷帝"说成"人民的领袖和伟大的爱国者"，把彼得一世打扮成"民族英雄"，为苏沃洛夫、乌沙科夫等沙皇侵略扩张的干将涂脂抹粉。他们把沙俄侵略扩张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素材。苏联对外活动中的领土扩张、瓜分波兰、对中国东北的政策等等，都直接承袭了沙俄的衣钵。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同时承认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只有在新的社会形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传统的落后的文化观念才会逐渐削弱。大俄罗斯主义传统是相当顽固的。但是，这种顽固性不足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建成社会主义几十年后，大俄罗斯主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长盛不衰、并得到最高领导人的极力美化？

这里的关键是，大俄罗斯主义已找到它赖以生存的新的社会

---

① 《列宁全集》第36卷，第629页。

② 《斯大林文选》第428页。

③ 《斯大林文选》第658页。

条件，这就是苏联模式。苏联模式要求高度集权，就必然要求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在多民族的、且因历史原因民族关系异常复杂的苏联，民族至上只能是俄罗斯民族至上，它要求各民族都集合在统治民族——俄罗斯族的周围。这样一来，大俄罗斯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便服务于苏联模式内在的集中要求，二者相互需要、相互统一了。体制的弊端使大俄罗斯主义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大俄罗斯主义的严重存在对苏联的内政外交均造成恶劣的影响。

三、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外交：倒向西方

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他对内搞改革，对外推行新思维外交。新思维外交开初是想缓和与西方的对抗关系，改变苏联以往对外政策中的某些错误做法，为国内改革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后来由于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与西方价值观念的认同，加之内部危机日益严重以致把国内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支持上，苏联对西方的关系从对抗转为全面退让，进而又完全倒向西方。除了苏联国内改革的方向错误外，对外政策这种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的做法，也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最后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只要对戈氏新思维外交的提出、它的实质和实践结果作一番剖析，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一）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外战略指导思想的调整和对外政策新思维的提出

戈氏上台时苏联已是内外交困。在内部，由于技术进步缓慢、粗放发展因素大大恶化，国民经济的发展陷入长期停滞状态，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严重；在外部，与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提出使苏联面临被拖垮的危险，与西方地缘政治角逐也因美国“低烈度冲突”战略的实施而陷于被动，阿富汗战争的长期化已使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联原

奢的内外政策此时已难以为继，苏联社会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刻。戈尔巴乔夫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只有改革后的社会主义——明天的社会主义，才有助于人们进行社会选择。"①他不仅提出改革的任务，而且实际承认苏联在同资本主义长达70年的竞赛中处于失败地位。

为了配合国内改革，戈氏上台后为苏联对外政策规定了以下基本方向，即：

——尽可能消除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因素，消除与西方的冷战，减轻苏联的战略负担，创造缓和的外部环境；

——加入世界经济，消除以往游离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对于自身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确立与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关系，强调要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仅仅并且完全通过和平竞赛与和平竞争的方式进行"②。

这三个基本方向中，前两个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外交所始终坚持，后一个则随着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放弃而成为不必要。

与此同时，苏联领导人对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也做了大幅度修改。

首先，在对时代的看法上，他们放弃了苏共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戈氏说："与最初的预料相反，击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最薄弱环节'并不是'最后的决定性战斗'，而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开端。"③这一看法源于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戈氏认为："在历史螺旋的每一圈上，旧世界的势力都有可能消除当时最危险的矛盾，延长自己的统治"；资本主义没有"绝对停滞"，它还有利用科技革命的潜力。④另一

① 戈尔巴乔夫在会晤参加十月革命70周年庆典的各国党和运动代表时的讲话。
② 戈尔巴乔夫1988年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的报告。
③ 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④ 戈尔巴乔夫在会晤参加十月革命70周年庆典的各国党和运动代表时的讲话。

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他说："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纠正了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起作用的理解。"① 与这种认识变化相应的是：苏联领导人放弃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认为这"不能用于政治预测"②；放弃了把苏联模式和道路绝对化的观点，承认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多样性。

其次，他们否定了传统的战争与革命观点。认为：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只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在军备竞赛中也不会有胜利者；因此，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继续，"在战争与革命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他们同时批判了赫鲁晓夫和勃烈日涅夫时期提出的"新的世界大战将扫除和埋葬帝国主义"的观点。③

第三，他们否定了两个世界即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对立的观点，认为当代世界虽然还存在着四类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发展中世界的矛盾，以及涉及人类生存基础的全球性矛盾（指生态、资源、贫困等问题），但是，这些矛盾同时产生了人类的共同点，即：核时代的人类共同安全问题；在经济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扩大、相互依赖的加深、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经济、政治的不可分割性；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生存的共同威胁。这些共同点使各个国家和民族"谁也离不开谁"，加强了世界的整体性。④

第四，苏联领导人进而提出"全人类利益至高无上"的观点。认为既然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威胁"迫切需要人类把自己的力量联

---

① 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年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② 戈尔巴乔夫在会晤参加十月革命70周年庆典的各国党和运动代表时的讲话。

③ 有关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第173—187页。

④ 见戈尔巴乔夫1986年在苏共27大的报告和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合起来以保护人类自身"，那就产生了高于阶级、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人类共同利益。他们一再鼓吹"人类共同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观点，目的在于放弃"国际阶级斗争"学说，放弃苏联长期坚持的推进世界革命的战略。

正是在上述转变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苏联领导人以全人类利益观作为逻辑起点，提出了对外政策新思维。戈氏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① 其用意是要在放弃不合时宜的传统观念的同时，树立一种主要用于指导外交实践的新的价值观念。

戈氏的新思维包括两套相互贯通的政策主张。一是关于建立新的国际安全体系。他提出，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的安全为条件，在建立国际安全结构时应遵从"利益平衡"原则，即照顾到每一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利益。其实现方法是政治解决、裁军。戈氏说："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的道路，是裁军的道路。只有越来越低的战略平衡水平——其中必须完全排除核武器和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武器，才能保证我们时代获得真正同等的安全。"②

二是关于建立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人道主义化和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的国际新秩序。其要点包括：自由选择原则，即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不以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等等。

（二）调和论——新思维理论的实质

应当承认，戈氏上台后，在客观上苏联确有必要对过去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进行调整和放弃一系列已不符合今天实际的对外政策和措施。问题是戈尔巴乔夫为进行这种调整而提出的新思维存在着严重的谬误。

①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84页。

②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第177页。

1. 新思维的理论基础"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命题本身就存在理论谬误。

新思维承认，人类社会存在着许多矛盾，并由这些矛盾产生出人类共同利益。新思维在人类的不同利益和共同利益这对关系中，强调的是矛盾的同一性，而且把这种同一性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矛盾着的事物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没有矛盾的斗争性就没有矛盾的同一性。在国际社会中，正是对立着的阶级和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为不同的利益而进行的相互斗争，产生出矛盾的同一性即共同的东西。不同利益的相互斗争，是现实的国际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奢谈什么"人类共同利益"，是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麻痹。

新思维关于人类共同利益的主要论据，是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是，人类生存所以面临这种威胁，是由于超级核大国所推行的核威胁政策。不同超级核大国的核威胁政策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直到最后完全消灭核武器，所谓人类在核武器面前的共同的安全利益便无从谈起。新思维根本不问对人类的核威胁来自何处，而只强调在核武器面前人类生存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就是宣扬不要斗争就能实现共同安全的幻想，就是鼓吹对超级大国核威胁政策的调和论。

2. 新思维鼓吹全人类价值观，实际是要认同于西方的价值观。

新思维在"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基础上又提出"全人类价值至高无上"论。在俄文中，"全人类价值"与"全人类价值观"是同一个词。他们实际上就是要人们把"全人类价值"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也就是作为价值观。但是，"全人类价值观"却是一个超阶级的子虚乌有的概念。因为，至少在世界发展的目前阶段，人类并不存在统一的价值观。不同的阶级、民族和国家有可能在共同的利害面前妥协，比如在避免核战争问题上达成共

识，但这并不说明它们的价值观也趋于一致。

苏联领导人提出"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概念，目的在于解决他们构想的国际新秩序所应凭据的思想基础问题，似乎这种价值观同指导各国内部发展的价值观无关。可在实际上，对各国的国际行为具有规定性作用的是该国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世界上既不存在人类统一的价值观，也不存在与各国内部发展相脱离的抽象的价值观。这样，苏联领导人就不得不用现实存在的某种价值观去偷换所谓的"全人类价值观。

苏联领导人强调说，他们所理解的"全人类价值观"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全人类的观念和准则"，即"国际社会的准则，被国际社会称之为文明的东西"；"如果你希望为国际社会所接受，那你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和观念"①。这些议论表明，他们所讲的"全人类价值观"，无非就是目前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认为必须遵守的那些准则和观念，其实质也就是西方的价值观。苏联这几年的外交实践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事实已经说明，戈尔巴乔夫等推广新思维的过程就是他们认同于西方价值观的过程。

3．新思维在政治上只能放松人们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

能否建立新思维所主张的国际新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世界上尚占主导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能否接受新思维的政策主张。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用大段篇幅谈到西方国家接受新思维的可能性问题。他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以全人类价值为主的整体世界的规律性会限制资本主义体系以自我为中心的和狭隘阶级的规律性及其破坏作用"。理由是：一、由于战争已不可能，世界只能按"资本"来"和平地"划分，而不再能用武力来划

① 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7月25日在苏外交部科学实践会议上的报告。

分；二、因此，资本主义有可能摆脱军国主义，德国和日本的例子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非军事化条件下获得大发展，而美国则因军事投入过高而陷入相对衰落；三、发达资本主义不可能无止境地剥削发展中国家，否则就会发生危及自身的“爆炸”。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将会服从于“全人类价值”。

当代资本主义确有很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不足以表明它会放弃实力政策，放弃在世界上的特权地位，放弃对自身狭隘利益的追逐而与不发达国家共享什么“利益平衡”。相反，国际垄断资本仍在竭力谋求对世界的统治，来自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世界不得安宁的重要根源，西方大国对第三世界的经济盘剥、对不同种族的歧视、运用经济援助与制裁两手强制推广西方的“文明”、特别是它们奉行的武力和武力威胁政策，都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重问题。面对这种现实，戈尔巴乔夫只好搬出“在西方政治现实主义会占上风”① 这个论点以求摆脱他的理论同实际的矛盾。这只能进一步暴露出他的新思维理论的脆弱。把希望寄于国际垄断资本的“良心发现”，在世界政治中采取新思维的调和主义立场，这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要人们放弃对霸权主义和强权主义的斗争。

（三）新思维外交实践的第一阶段：战略收缩

新思维理论的提出及其形成主要是在苏联改革的初期。苏共27大的报告，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时的讲话及同时发表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以及1988年苏联领导人的一些讲话特别是谢瓦尔德纳泽是年7月25日在苏联外交部科学实践会议上的报告，可视为新思维理论发展的几个重要标志。如上所述，他们提出新思维是要树立一套用于指导苏联外交实践的新的价值标准，但是，新思维理论上的脆弱和苏联领导人对西方文明的推崇，使新思维从一开始便潜藏着认同于西方价值观念的危

① 戈尔巴乔夫1987年5月18日答总共《团结报》编辑部问。

险。这种认同最终果然于1989年底实现。此后，人们再也看不到苏联领导人从理论上系统地去论证新思维了，尽管他们曾宣称"新思维的科学探讨尚处在初始阶段"② 。这是因为他们既然已与西方价值观认同，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发展新思维理论了。因此，可以1989年底为界把新思维外交分为两个阶段，1989年底以前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苏联外交的突出特点，是实行全面的战略收缩。这表现为：

——放弃军备竞赛政策，签署中导条约。这个条约的签署是战后裁军史上的重大突破。东西方的裁军谈判还为后来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和苏美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奠定了基础。同时苏联还采取了单方面大量裁军行动；

——从世界一些地区撤回苏联的军事力量，如从阿富汗全部撤军，从非洲、中东、印度支那撤回或大大减少苏军顾问，对地区性冲突采取和解态度；

——缓和中苏关系，逐步承认并同意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三大障碍问题，为双方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贡献；

——承认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错误，对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做了反思，批判了"勃列日涅夫主义"，放弃了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霸主地位，同时不再谋求在国际共运中充当"老子党"；

——把经济外交提到重要地位，积极向世界经济体系靠拢，逐步放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和"以我划线"的传统做法。

在这一阶段里，苏联为消除与外部世界的对抗，逐步放弃实力政策和争夺政策，实行全球性力量收缩。这些行动大大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苏联所以实行全面的战略收缩，一方面是力量不足使然，过

②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月全会（1988年）上的报告。

度扩张和对抗所造成的沉重负担迫使它必须收缩力量，另一方面，这也带有改正以往政策错误的性质。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在尚未向错误方向进一步发展的新思维的初始认识中还包含着一些基本正确的东西，如放弃过时的时代观，放弃“总危机”理论和“总决战”思想，承认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多样性，否定军备竞赛，重新认识和平共处原则和经济外交的重要性，等等。这些基本正确的初始认识推动他们改正以往的错误，做出了客观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些政策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里，不论在苏联社会或是在苏共内部，新思维外交都受到普遍的支持，即使到了后来，新思维外交仍是苏联改革中争议最小的一个领域，利加乔夫等人对新思维的批评仅在很小的范围内引起共鸣。究其原因，根本的一点是新思维所主张的放弃对抗、战略收缩、缓和紧张局势等，符合苏联改革时期的利益需要，同时也符合因长期与外部世界对抗而深感疲惫的社会心理。

由于这一阶段新思维外交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纠正以往的政策错误，所以，使人们容易看到它缓和目前局势的积极一面，而不易看到它潜在的问题。如当时新思维外交中即已初露端倪的对美国单方面让步过多、调和主义色彩和价值观念的混乱等问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新思维外交实践的第二阶段：倒向西方

从1990年起至苏联解体是新思维外交的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和苏联内部危机的深化，苏联领导人采取了迎合西方，乞求西方援助的做法，同时开始放弃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支持。这造成严重的后果。

1．从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走向与西方价值观的认同。

戈氏上台后，随着他的错误的改革路线的实施，在苏联不断掀起批判十月革命后70年历史的浪潮，这导致了对苏联社会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及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的全盘否定，使人

们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也由怀疑转向否定。

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同时，苏联领导人力图从西方文明中去寻找建设"新"社会的答案，最终认同于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念。1989年11月和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前途的两篇文章①、以及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90年）和苏共28大抛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是实现这种认同的主要标志。戈氏一再强调"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苏共28大纲领明确地说："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官僚专制制度向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② 他们把传统社会主义视为"官僚专制制度"、把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作为建设未来社会的基础。1990年2月谢瓦尔德纳泽与来访的贝克共同强调：必须赋予有关人权的国际协议和准则以"真正包罗万象"的性质。苏联接过了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提法。

2. 国内危机的深化，使苏联领导人视西方为苏联改革的支持力量，在外交和内政上采取了一系列迎合西方的步骤。

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错误，苏联国内危机日趋严重，党内社会上的反对呼声日高。与此同时，由于放弃对抗和逐步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却有了极大的改善。结果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反差：戈氏在国内的威信不断下降，而在西方受欢迎的程度却越来越高。在西方眼中，戈氏是苏联领导人中有助于西方利益实现的最佳人选，因而大力支持他的"民主化改革"。国内外因素的这一变化，使戈氏等人视西方为苏联改革的助力，从1990年起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展开谋求西方援助的外交活动，企图藉此渡过改革的难关。

---

① 第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载1989年11月26日《真理报》；第二篇题为《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载《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杂志1990年第2期。

② 苏联《真理报》1990年7月15日。

从西方国家的对苏联政策这一方面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战后初期一直到80年代中期，也就是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最初几年，始终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其实质就是要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阻止苏联的对外“扩张”，并在此基础上促使苏联的内部制度发生变化。不过，直到80年代中，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对苏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的或直接的目标，还不是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而是更加地着眼于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但到1989年，由于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美国的对苏政策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标志就是美国总统布什提出的“超越遏制”政策。1989年秋，布什明确宣布苏联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1990年新年伊始，布什在向苏联人民发表的电视新年贺词中表示美国“支持”苏联的“改革进程”。同年3月，布什在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表示美国“坚决支持”苏联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进程”，并明确提出美国“期望苏联的体制和做法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些都表明，此时美国已开始把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即苏联的和平演变，作为美国对苏政策所追求的直接目标。

而此时，即在戈尔巴乔夫推行其新思维外交的第二阶段，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也已不再把美国对苏的“超越遏制”战略和西方的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为名插手苏联内部事务的种种活动看作是对苏联的什么威胁，相反却认为这些都是帮助苏联加入西方文明的有益举动。正是由于这种同西方价值观的认同，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苏联推行的名为支持改革，实为促进演变的政策越来越采取欢迎和肯定的态度。

随着与西方价值观的认同，为了进一步取信于西方，苏联领导人在允诺从东欧国家撤回军事力量的同时，指责当时尚处于执政地位的东欧国家共产党不搞改革；以西德向苏联提供大量援助为条件，听任西德吞并东德；宣布从古巴全部撤军并大大压缩双方的经济联系。

甚至在内政问题上苏联也往往看西方的眼色行事，对西方采取迎合态度，如：1991年初苏联曾对波罗的海共和国采取强硬政策，这引起西方的强烈不满，苏联立刻改弦更张，"8·19事件"后甚至迅即承认该地区三共和国独立，满足了西方多年的要求；通过自由移民法案为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洞开大门，旨在获取美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通过符合西方标准的人权宣言；在国内经济改革问题上迎合西方的意见直至赋予后者监督权。

这段时间中，苏联领导人在接触西方重要人物时，几乎言必谈援助和合作事宜。1991年5月戈氏甚至委派亚夫林斯基前往美国，与哈佛大学学者共同起草把苏联改革同西方援助挂钩的"哈佛计划"（实为"新马歇尔计划"）。"哈佛计划"开宗明义地说："苏联改革措施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西方的相互协作"，"如果没有这种协作，改革就会沿着不彻底的道路走下去，这将导致经济乃至国家本身无法控制的崩溃"；苏联事态的发展"将对整个世界的命运产生影响"。"计划"规定了苏联改革的方向。"计划"要求西方不仅"提供类似马歇尔计划的无偿援助"，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提供道义上的、智力上的和技术上的援助"。① "哈佛计划"的实质是乞求西方拯救苏联，而苏联则向西方的全球利益需求靠拢。1991年7月，戈氏又亲自出马到伦敦列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向西方乞求援助。

事实证明，内政和外交是相互衔接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调整对外政策，是为改革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随着外交成就的取得，他又想利用所取得国际威望来推动国内改革，压制与他不同的改革主张；最后在国内危机深化和他本人地位削弱时，又企图借西方的支持以稳定国内局势，帮助他渡过难关。这个过程在外交上表现为一步步倒向西方，苏联从一个与美抗衡的超级大国沦为乞灵于美国的战略伙伴。

① 《消息报》1991年6月24日。

3．东欧剧变产生了强烈反弹效应，加速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最初对苏联原来的势力范围东欧的做法是积极支持东欧各国党内所谓的“改革派”取代原有的领导，期望东欧国家能跟上苏联改革的步伐并继续保持同苏联的紧密关系。但是，这些国家中长期追随莫斯科的执政者一旦受到莫斯科的冷淡，那里长期受到压制的对现状的不满、对共产党政策的不满以及对苏联控制的不满便迅速爆发，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急剧膨胀。出乎戈尔巴乔夫的意料，东欧各国在1989年下半年掀起了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苏联(控制)的浪潮。结果，东欧国家很快走上了否定共产党、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进行社会改造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迅速崩溃。

东欧的剧变对苏联产生了强烈震撼。正是从那时起，苏联社会也进入了剧烈动荡的质变时期。

首先，苏联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开始迅猛崛起，他们利用东欧剧变大作文章。同时，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和对苏共的不信任情绪亦大大增长。苏共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成百万的党员纷纷退党，表明苏共的地位和作用已受到严重侵蚀。戈氏最初还坚持一党制，但东欧剧变后，在迅速壮大的反对势力的推动下，1990年上半年苏联也开始采用西方式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民族和道德危机的日益加剧，注定了执政的苏共在多党竞争中失败的命运。在1990年3月至6月的一系列选举中，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许多共和国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夺取了大权，中央的权力被架空，苏共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到1991年下半年终于在苏联也发生了苏共遭禁止和联盟解体的剧变。

东欧剧变后苏联社会发生的剧烈动荡一方面表明，苏联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放弃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是引发苏联和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也表明，苏共长期推行控制东

欧、向东欧国家强加苏联模式的政策到头来是自食恶果；东欧社会主义失败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先兆，前者加速了后者的进程。

四、基本教训

从苏联对外政策的失误和错误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教训。

1. 对时代和世界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也许需要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资本主义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尽管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但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经济、科技、军事上仍占优势。社会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有着光辉的前景，但目前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还不够成熟。苏联的教训说明，囿于马列主义有关时代的某些论点，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战胜资本主义问题上急躁冒进，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就会犯“左”的错误。而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前景，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因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挫折而动摇，就会犯右的错误。

2. 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大大发展起来，才能壮大和巩固，显示自己的优越性，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着眼点，应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资本主义世界尚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条件下，人为地去推动世界革命，制造紧张局势，人为地扩大同资本主义世界过度的对抗，不仅会从根本上背离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利益，而且会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危害。

3. 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闭关锁国，必须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关键是处理好同资本主义国家既对立、又共存的关系，既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又要有高度的灵活性和策略性。

4.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建设应立足于防御，不应超过国民经

济的承受能力。为此，应减少与外部世界不必要的军事政治对抗，尽可能消除这种对抗，对于不可避免的对抗也应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加以缓解，做到有利、有理、有节，以便把资源集中用于经济建设。军队建设应着重质量，军费开支应适度。与西方对抗过度、军费开支负担过重以致大大影响经济发展，这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

5．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个别领导人由于错误判断形势而在对外政策上作出错误的决策，会给国家带来严重而深远的影响。如苏联少数几个领导人作出的入侵阿富汗的错误决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教训从反面说明了对外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一个国家是何等的重要。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上，作为一个大国，尤其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决策机制；建立一支长期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具有相当水准的专家队伍，对世界基本形势、各地区形势和具体问题经常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即使对已付诸实施的政策方针，也应提倡在内部继续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利于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纠正。

6．苏联的教训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严格遵行和平外交政策，绝不能搞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和势力范围，不能搞集团政治，力量小时不能搞，力量发展后也不能搞。在国际关系中不应突出各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而使之影响到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在很长时间内自以为力量强大，在世界上搞“以我划线”，搞势力范围，到处树敌，结果陷于极大的孤立和被动，终至走向反面，从超级大国的地位上跌落下来。

撰稿者　许志新

责任编委　徐葵

苏联剧变与苏联民族政策

在苏联剧变和联盟解体的诸多原因中，民族问题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本文从苏联历史上长期潜伏着严重的民族矛盾与危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路线导致民族问题危机爆发、值得重视的几点教训与启示三个方面，探讨民族问题在苏联剧变与解体过程中的作用。

一、苏联历史上潜伏着严重的民族矛盾与危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概略地了解沙俄帝国时期的领土扩张和民族关系状况，将有利于我们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基础和深厚背景与现实危机的联系有更深刻的认识。沙皇俄国是经过几个世纪的侵略兼并，由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扩张成为地域横跨欧亚大陆、包括100多个民族的以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庞大军事封建帝国。非俄罗斯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

13世纪末，在蒙古军队的侵袭和压迫下，罗斯各公国处于衰落状态，而莫斯科公国则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人口和经济发展较快等因素，成为各公国的政治中心，莫斯科公国的扩张也从此开始，到14世纪末公国领土扩大了一倍。1480年伊凡三世通过一系列兼并，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1547年伊凡四世大公自封"沙皇"，从此莫斯科公国改称沙皇俄国。当时沙俄只是偏居欧洲东北角、面积只有280万平方公里。伊凡四世对内镇压、对外扩张，

实行严酷的军事封建统治。他在位30多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通过战争将俄国版图扩大了两倍。17—18世纪之交，彼得一世进行一系列改革，国民经济纳入了侵略战争轨道，制定了一套侵略扩张的方针：不但要征服欧、亚大片领土，还要控制波罗的海、黑海的出海口，打通从中亚到印度的通道。在他统治时期，占领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将边界推进到太平洋沿岸，版图扩大到1500多万平方公里。18世纪以后，从叶卡特琳娜二世经亚历山大一世，到尼古拉一世都遵循了侵略扩张道路。通过战争，俄国边界向西北、西、西南、南部分别扩展了800—1600公里以上。从瑞典获得的领土比其剩下的领土还大；从波兰得到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从欧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属地）；从亚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从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本土；从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等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合。① 以后经过亚历山大二世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中国东北和西部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中国吞并的面积相当于7个法国，侵占的面积相当12个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同时在中亚还征服了土库曼和几个汗国。

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的370多年间，21代沙皇不断侵略扩张，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王朝覆灭，俄国版图从28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280万平方公里，扩展8倍多。若与13世纪末的莫斯科公国比，领土扩大了17320倍，平均每年扩张领土54000多平方公里。其殖民地面积仅次于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殖民主义国家。由于俄国是从农奴制度发展成为军事封建帝国的，并且统治着数以百计的民族，因此对异族的压迫和奴役非常残酷，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

① 参见马克思：《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34页。

民族。在广大非俄罗斯地区，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官吏担任；一切官方事务都用俄罗斯语办理；书报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文出版；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文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被迫俄罗斯化，并经常遭受蹂躏和屠杀，致使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非常激烈。列宁曾愤慨地指出："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打破了民族压迫的世界纪录"，① 1917年2月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各被压迫民族独立自主的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纷纷建立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沙俄帝国分崩离析。

列宁曾就沙俄帝国的民族特点指出：沙俄帝国有别于其他西欧国家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以大俄罗斯民族为核心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多、人种多、语言多以及历史上俄罗斯民族对广大非俄罗斯民族的殖民统治，使沙俄帝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十分复杂，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间的各种历史积怨是沙皇俄国发展过程中一直十分敏感和微妙的因素，国家政权在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上的各种举措常常会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苏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与此同时，各被压迫民族在无产阶级革命推动下，强烈要求实现民族独立自主。1917至1921年相继建立了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独立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捍卫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实现各民族联合和团结，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各苏维埃共和国在自愿、平等、民主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联，作为沙皇俄国的取代者，不能不在很多方面承袭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而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和解决民族问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92页；第22卷第354页。

题，始终是关系到苏联国家稳定的重大因素。苏联建立后，苏联党和政府在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建设中取得了许多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是，由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民族关系复杂性和民族工作的艰巨性，加之苏联在处理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着许多失误，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与建国前的民族矛盾纠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民族问题危机的潜在隐患。

(一)形式上联邦制，法律上双重主权，实际上中央高度集权，造成严重的民族矛盾。长期潜伏着民族离心倾向

1、苏联宪法规定了联盟与共和国的双重主权，为各民族共和国独立提供了合法依据。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宣言和条约规定，每个民族都享有自决权，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随后，1924年苏联第一部宪法规定，苏联是各主权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盟，加盟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利，苏联保护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退出苏联。1936年和1977年苏联宪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这样，苏联是各主权共和国联合的统一主权国家，而各加盟共和国也是享有主权的国家，形成了双重主权的格局。一般说，世界上其他联邦制国家没有双重主权国家的规定，加入联邦的实体只享有一定范围内的地方自治权，而不是主权国家。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留下来的英联邦，才是主权国家的联盟，但这不是统一联邦制国家　而是邦联。因此，苏联宪法的上述规定是联邦制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缺陷。

2．规定联邦制是向中央集中统一的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为后来背离联邦制原则提供了依据。十月革命前，列宁始终坚持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民主集中的单一制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国内外出现十分尖锐和复杂的形势，为了防止各民族分裂和捍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才主张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的统一联邦制国家。同时，从1918至1920年，列宁几次提出联邦

制是向民主集中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①。1919年3月俄共(布)8大通过的党纲也规定，按照苏维埃方式实现各共和国联合的联邦制国家，这是各民族共和国走向完全统一的中央集中制国家的过渡步骤。但是这种过渡需要多长时间和如何实践，列宁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阐明，后来的苏共其他领导人和苏共纲领也未作进一步阐述。从列宁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要反对冒进的观点看，联邦制向中央集中统一的单一制国家过渡将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片面地理解了列宁的联邦制思想，认为建立联邦制国家仅是为了解决当时复杂民族问题的权宜之计，并把列宁关于联邦制是向集中制的过渡形式的观点作为执行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依据，从而导致背离联邦制原则，造成积弊深厚的民族矛盾。

3．背离联邦制原则，实行中央高度集权制，加深了各共和国与联邦中央的矛盾。苏联作为联邦制国家，按照宪法规定应实行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分权制，而如何合理地划分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权限，发挥各共和国的主动性、积极性，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1924年苏联宪法规定，联盟中央在全苏行使外交、国防、对外贸易、交通和邮电方面的权力，批准全苏国家预算、统一货币制度、信贷制度、税收制度，制定全苏其他各种立法原则；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经济、财政、内务、司法、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检查监督和民族事务等方面的权利。但在列宁之后，联邦制原则很快就成了纸上谈兵。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苏共党内围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场斗争中 斯大林违背列宁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加强了个人集权地位，形成了党内高度集权领导体制。并把党内高度集中的组织领导原则运用到国家体制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0页，《列宁选集》第4卷第272—273页。

上。其结果，联邦制原则遭破坏，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完全丧失，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中央往往过分强调全苏统一的国家利益，轻视各民族地区的特殊利益，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只能严格按照联盟中央统一指令行事，没有任何自主权，从而造成全苏利益和各民族共和国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削弱了各民族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凝聚力。

（二）对社会发展阶段不切实际的过高估计，忽视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1. 斯大林过早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提出消灭了产生民族纠纷的社会阶级基础，忽视了民族矛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1924年1月列宁刚逝世，5月俄共（布）13大政治报告在谈到民族关系问题时认为，关于各民族权利平等、各民族经济和文化平等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①。此后，从1928年起加速推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实行国民经济的全面社会主义改造。到3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阶级结构和经济所有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②。随之，1939年联共（布）18大决议提出，苏联“实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③。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认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各民族之间的“互不信任的心理已经消灭”，“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④。斯大林这样估计当时苏联民族关系的状况，显然是

① 参见苏联《哲学问题》1988年第9期，第32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99页。

③ 《苏共决议汇编》第5分册，第11页。

④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88—89页、第103页。

不符合实际的。

2. 赫鲁晓夫宣布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断言苏联已解决了民族问题，否认民族矛盾，并且人为地加快各民族的接近。1959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1大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建设时期，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我们最近的明天"①。接着，他在1961年苏共22大上又宣布20年内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进而，赫鲁晓夫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已完全和最终地获得了胜利，已转入共产主义建设阶段，因此，已经"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在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仍然是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他强调苏共今后的民族政策是促进各民族"更加全面接近"，"使各民族达到完全的一致"，因而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疆界也愈来愈失去原来的意义②。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奉行的是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方针，否认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否认各民族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错误地估计了苏联民族状况。

3. 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已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人为地加快各民族的融合。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提出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苏联正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形成各民族的共同和一致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生活，各民族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正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各民族的利益已经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而后，他在1972年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宣布，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③苏共今后的民族政策是促进各民族进一步接近和实现各民族完全一致。

---

① 《苏共二十一大主要文件》中文版，第40页。

②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50—253页。

③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43页。

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过高估计和对民族关系状况的错误认识，数十年来苏联领导人在民族关系方面总是对实际存在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视而不见，总是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从而忽视了各民族的特点和特殊利益，忽视了民族矛盾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

4．强行改变民族地区边界，留下了难以解决的民族隔阂和隐患。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提出在革命胜利后应按民族特征划分民族自治单位和地域自治单位，确定自治区、自治州以及地方自治的管辖范围。在划分行政区域时，要对当地居民的经济情况和民族成份进行认真的考察，而且要充分照顾到民族历史传统的边界①。但是在苏联建立过程中和苏联建立后，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之间在划分边界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发生过争执和纠纷。苏联领导人以行政命令方式强行解决民族边界分歧问题，这在族际关系中埋伏下隐患，直到苏联解体时，还有70％的民族边界存在争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个共和国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斗争。1920年4月和11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相继成立，当时俄共(布)中央外高加索局于1921年7月4日曾决定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划归亚美尼亚共和国，斯大林又命令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归并到阿塞拜疆共和国。从60年代至今，这两个共和国一直为纳戈尔诺—卡巴赫地区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 以致于发展到两共和国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内战，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在中亚和其他地区也存在领土纷争。1989年7月在塔吉克边境伊斯法拉地区，塔吉克人与吉尔吉斯人为争夺耕地发生械斗。1990年6月在吉尔吉斯边境奥什市，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因争夺领土发生斗殴。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为了撒马尔罕和布拉哈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278—279页。

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在其他共和国之间也发生领土之争，苏联解体后摩尔多瓦提出要从乌克兰收回一个州和一个港口的要求，白俄罗斯向立陶宛提出收回过去的领土。这些领土争端的发生，都是过去苏联政府采用行政命令方式任意划分行政区划造成的后果。

俄罗斯联邦与其他共和国的领土纷争以及俄罗斯联邦内部不同自治区域之间的领土争端也很激烈。如俄罗斯联邦与乌克兰之间关于克里米亚半岛、科利沃尔斯、顿巴斯地区的争端；俄罗斯联邦与哈萨克之间关于竖季兹湖地区大片领土的争端；俄罗斯联邦与白俄罗斯之间关于威特比斯州3个区、哥美里州6个区及斯摩棱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区的争端，俄罗斯联邦与爱沙尼亚之间关于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和纳尔瓦河地区的争端。这些领土纠纷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的。此外，俄罗斯联邦内部不同民族自治地区之间也发生不少领土争端，最为严重的是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与毗邻的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为争夺普里戈罗特地区和弗拉季的部分地区领土发生的冲突等。

上述因领土之争引起的各民族地区之间的冲突表明，如果过分考虑全苏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不顾及民族地区利益，任意划分和修改民族地区的边界，那么由此留下来的许多问题很难解决。而在最近几年的形势下只能起着加剧民族矛盾的作用。

（三）用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矛盾

1．长期以来苏联把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问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加强国防力量，苏联加速实行工业化，特别是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损害了农民利益，引起了各共和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加剧了民族矛盾，还在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在这种形势下，1928年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一文中提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而且日益强大的苏维埃政权

将执行孤立这些分子的政策"①。后来在1933年和1937年，斯大林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尖锐化不仅反映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而且反映在民族关系上。1934年他在联共（布）17大上提出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民族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进而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因此要坚决打击地方民族主义②。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仍旧坚持用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

2. 斯大林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30年代初，苏联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使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高加索等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出现严重的饥荒，饿死500—900万人③，引起了这些地区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对此，斯大林采取大批流放农民和镇压富农的措施，加深了民族矛盾。在1937至1938年肃反运动中，各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的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而受到迫害和镇压，大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受到清洗和迫害。苏联政府曾于1920年、1926年和1932年三次承认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独立，但1939年8月与德国签订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1940年6月和8月又派兵进驻三国，以武力方式强迫加入苏联。并将20多万"不可靠的"当地民族居民强行迁移到西伯利亚等地。1941年至1944年，苏联政府借口某些小民族中有少数人"背叛祖国并且与德国法西斯合作"，强制把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11个小民族大约500万人赶出家园，强制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过着受各种限制的艰难生活。1948年，苏联政府因怀疑国内"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与国际犹太人反动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

②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9—320页。

③ 参见《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

组织有联系，把犹太人从政府机关、科研机构清除出去，封闭了许多犹太人的学校、剧院和报刊。1952年底，斯大林听信克里姆林宫一医生的诬告，逮捕了许多著名的犹太人医学专家，指控他们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受雇于国际犹太人反动组织”，以从事医学为名，实际上搞暗害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为此大批犹太人遭受迫害。阶级斗争扩大化产生严重后果，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政治取向造成了极深的消极影响。

3．赫鲁晓夫压制和镇压非俄罗斯民族维护自主权和反抗活动。赫鲁晓夫上任后，为了适应所谓改革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在民族关系上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因而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出现了要求民族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思潮。有人公开批评苏共的民族政策，主张脱离苏联控制。对此赫鲁晓夫没有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采取了压制和镇压措施。例如，1959年8月拉脱维亚共和国政府一批领导干部反对把下放给共和国的权力收归中央，坚持共和国独立自主发展和管理经济，赫鲁晓夫下令对拉脱维亚共和国中央和首都里加市的领导班子进行清洗，解除了24名主要领导人的职务。1961年格鲁吉亚哥里市居民举行集会和示威反对拆除斯大林铜像，苏联当局派出军警进行镇压，激起了当地民族的愤怒。1961至1964年，在乌克兰多次出现以知识分子、党和国家机关干部、高等学校师生为核心的从事维护民族自主权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地下组织，主张乌克兰独立自主，反对苏联中央控制。苏联当局下令逮捕这些组织的主要成员，判以重刑。甚至对基辅大学师生举行纪念乌克兰杰出诗人谢甫琴柯的活动，也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名，加以阻止或取缔，对其组织者绳之以法。在其他共和国多次出现要求维护民族自主权和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群众活动，同样也遭到苏联当局的打击或镇压。这些做法更加激起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和加强了对中央的不信任。

4．勃列日涅夫压制或镇压少数民族捍卫自主权的反抗活动。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尽管他宣称“已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但实际上民族冲突接连不断发生，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对待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和反抗活动，继续采用压制或武力镇压。例如，1965至1967年，在乌克兰又出现“乌克兰民族阵线”等地下组织，要求扩大共和国自主权和保护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基辅市高等学校师生多次集会反对推广俄语，要求发展乌克兰民族语言文化；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撰写《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批评苏共的民族政策。苏联当局指责这些活动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加批判，逮捕和审讯了数百名组织者和参加者，伊凡·久巴被判处重刑。1968年4月，乌兹别克奇尔奇克市克里米亚鞑靼人举行大规模集会，要求返回家园和恢复民族自治权利，300多人被捕。1972年3月苏共中央通过决议批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市的工作 借机打击和清洗了要求维护民族自主权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姆日阿瓦纳泽等200多名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干部被清洗，许多知识分子遭到批判。1972年5月，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因撰写《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歌颂乌克兰历史和文化传统，被撤职批判，受他牵连的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干部50多人被清洗。1974年12月，苏联当局逮捕了“爱沙尼亚民族阵线”成员十几人。1975年4日。阿塞拜疆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自治州委书记阿鲁久尼扬等人因所谓“庇护民族主义”被解职。同年11月，波罗的海舰队“警戒”号驱逐舰上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士兵因反对民族歧视发生哗变，遭到镇压。

长期以来由于苏联领导人把大量民族矛盾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简单归结为阶级矛盾，用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结果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挫伤了少数民族感情，加深了民族矛盾，从而在苏联民族关系中种下了不和的种子。

(四)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根深蒂固激发了非俄罗斯民族主义，民族矛盾加剧

1．列宁坚持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妨碍实现各民族平等

和团结的主要危险。十月革命前，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时提出，沙俄帝国是以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享有比其他民族高人一等的特权，是统治和压迫民族，因此，"镇压被压迫民族运动的长期历史，数百年的历史，'上层关于这种镇压的系统的宣传，造成了大俄罗斯民族的那种偏见'"①。十月革命后，列宁又明确指出大俄罗斯主义是沙皇实行民族殖民统治的历史产物，"因为许多世纪以来大俄罗斯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影响下，养成了一种丑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偏见"，②。在苏联建立过程中，列宁又着重强调沙皇对小民族的民族殖民统治在俄罗斯人中间造成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人认为其他民族都是落后无知的"异族人"，因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妨碍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要危险，他宣布要"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③。鉴于这种情况，列宁坚持过去被压迫民族根据民族自决权原则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其目的就在于消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实现各民族完全平等的联合。

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长期存在，激发了民族矛盾。列宁过世后，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极少批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主要矛头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致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更加根深蒂固，对加强民族团结和改善民族关系产生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歪曲沙皇征服非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继承沙俄帝国意识。1934年7月，斯大林在评述恩格斯的《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时为沙皇向外扩张辩护，认为恩格斯写作时"过于兴奋而忘记了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实"，片面地"夸大了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扩张性"④。1952年10月，苏共19大总结报告认为在二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24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5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4页。

④ 《斯大林文选》，第658—662页。

次大战中苏联收复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领土，强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四共和国归并苏联，收复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这样的国界最符合苏联历史的真实①。这等于说，凡是过去沙皇征服过的领土都应归入苏联版图。1954年12月1日《真理报》发表关于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提纲认为，俄罗斯帝国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各民族发展中起到了重大进步作用，是苏联各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靠山。1978年3月31日《真理报》发表关于亚美尼亚加入俄国版图150周年决议强调，亚美尼亚人及南高加索其他民族之所以归并俄国，因为"俄国是他们摆脱伊朗和土耳其压迫的希望和救星"。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苏联历史学界纷纷著书撰文为沙皇征服非俄罗斯民族竭力辩护，把沙皇说成是被征服民族的"救世主"。

二是吹捧俄罗斯是苏联的伟大民族和领导民族，实际上是对其他民族的歧视。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招待红军将领时提出"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②。1957年8月27日，赫鲁晓夫在《文艺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的讲话中强调，俄罗斯领导其他各民族推翻了沙皇统治，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而应当高呼"俄罗斯母亲"。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4大上说，俄罗斯是苏联的"伟大民族"，因为它在各民族统一联盟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975年10月21日全苏中等和高等学校学习俄语的经验和实践会议提出，苏联是各民族以"伟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联合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三是有意突出俄罗斯人的丰功伟绩，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归功于俄罗斯人。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招待红军将领时强调俄罗斯是"领导苏联其他民族战胜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而只

---

①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第176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中文版第428—429页。

字不提其他民族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斗争中的贡献。1957年8月27日，赫鲁晓夫在关于文艺要同人民生活保持联系讲话中认为，是俄罗斯人帮助其他民族克服了几百年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根本不提其他民族对俄罗斯发展的帮助。1972年《共产党人》杂志第8期发表纪念苏联成立50周年文章说，俄罗斯民族为其他各民族“开辟了摆脱社会压迫和贫困的新道路”，实现了“向文明和进步的飞跃”。1982年12月，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成立60周年大会上强调，“没有俄罗斯民族的无私援助”，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不可能取得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四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凌驾于其他共和国之上，违背各共和国平等原则。列宁在创建苏联时就坚持各民族共和国必须一律平等的原则。1922年苏联成立条约和苏联各个时期宪法规定，加入联盟的各共和国都是平等的。但实际情况是，从苏联成立到80年代中期，各非俄罗斯共和国的共产党都设立自己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直属苏共中央领导，唯独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一直没有自己的共产党领导机关，而俄罗斯联邦的地方党组织直属于苏共中央俄罗斯局领导，并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俄罗斯局主席。与此同时，尽管在形式上俄罗斯联邦也设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但并不设置共和国政府的管理机关，而由苏联中央政府代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的职能。由此可见，实际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中央，苏联中央政府就是俄罗斯联邦的政府，从而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处在中央领导地位，其他共和国则处在附属地位。这种状况表明，苏联实际上还是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国家，背离了列宁坚持的各民族共和国平等原则。

五是强制推广俄语并作为苏联的国语，在语言方面制造了新的不平等。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果把某个大民族的语言强加给其他民族，就势必造成民族语言的不平等，破坏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苏联建国之初，苏联党和政府在各种决议和命令中都规定要全面保障各民族的语言平等。1924年颁

布的苏联第一部宪法更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联盟国家的一切法律和决定都要以各民族语言和俄语同时颁布。但从30年代起，苏联开始在广大非俄罗斯地区强制推行俄语，并把俄语规定为各民族学校的必修课。

50年代以后，苏联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加快俄语的推广。一是由苏联官方宣布俄语为各民族的统一交际语言和非俄罗斯民族的第二本民族语言。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提纲》提出，俄语是各民族交往的统一语言。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宣布俄语已成为各民族的第二本民族语言。1972年12月，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强调，俄语已成为各民族相互交往的共同语言。二是苏联与共和国颁布决议规定各非俄罗斯民族必须学习俄语。上述《提纲》规定，各共和国中等学校要认真学习俄语。按照苏联中央的旨意，1972至1981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等共和国相继作出决定，在中小学，中等和高等专业学校开设俄语必修课。1983年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又通过关于改进各共和国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俄语学习的补充措施的决议。三是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共和国多次召开全苏俄语学术会议，为加速推广俄语制造理论根据，大造社会舆论。上述这些做法实际上是强制各民族共和国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必须学习俄语，甚至有些共和国还为学龄前儿童开设俄语学习班。结果，非俄罗斯民族语言受到歧视。如80年代初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当地民族语言学校大大减少，许多青少年的本民族语言水平越来越低，以致于不会使用本民族语言会话、阅读和书写，造成青少年一代与老一代人之间语言隔阂。强制推广俄语引起少数民族的强烈不满，加深了民族矛盾。60年代以来苏联发生过多次反对推广俄语的事件。1965年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在《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提

出，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是加速俄罗斯化的表现，是剥夺其他民族权利的一种行为。1972年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科·尤达欣认为把俄语作为吉尔吉斯人的第二本民族语言是强制俄罗斯化。1976年贾巴里泽在格鲁吉亚作协8大上批评在高等学校规定必须使用俄语教课书的做法是语言同化。1978年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发生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反对苏联当局取消当地民族语言，推广俄语和歧视非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做法。由此可见，苏联政府强制推广俄语，官方规定俄语是各民族统一的交际语言，这是引起少数民族不满，加深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

几十年来，苏联领导人竭力歌颂沙俄帝国的历史，宣扬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和丰功伟绩，有意赋予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以中心地位，这实际上就是力图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这样，大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特权地位，其他少数民族则处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其结果必然伤害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激起非俄罗斯民族反抗大俄罗斯主义及其中心地位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

2．地方民族主义是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防御形式"。长期以来，由于在苏联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根深蒂固，实际上非俄罗斯民族与大俄罗斯民族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作为"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防御形式"的地方民族主义①普遍存在。一般说，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表现是，对历史上压迫和奴役过他们的大俄罗斯民族怀有强烈的不信任心理和猜疑情绪，片面地夸大本民族的特点，竭力维护本民族的"特殊利益"，隐蔽地或公开地要求民族独立或民族分离。因此，非俄罗斯民族与大俄罗斯民族以及联盟中央政府经常发生各种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例如，1965年8至9月，在乌克兰的基辅、利沃夫、敖德萨等城市曾出现"60年代集团"这一民族主义组织，其成员

① 参见《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86页。

主要是知识分子和一些党员干部，他们秘密集会，散发传单，主张乌克兰独立。这个组织的活动实际上得到文艺界上层领导人的支持。1967年在乌克兰伊凡—弗兰科市出现一批知识分子组成的“乌克兰民族阵线”地下组织，散发传单鼓动市民和军队中乌克兰士兵起来反对“压迫者俄罗斯人”。此后，在基辅、哈尔科夫、利沃夫等城市多次出现青年工人、学校、市民和科学工作者要求乌克兰民族独立自主的活动。1970年《吉尔吉斯大学文选》发表《列宁与民族自决权》文章认为，即使“一些民族要求独立或分离是与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利益相对立，任何人也无权进行强制干涉”。1972年2月，格鲁吉亚社会科学界一些著名人士为“过去从事反苏反共活动的民族主义分子和孟什维克头子若尔丹尼亚辩护”，第比利斯市党代会上有人为30年代初逃亡德国的民族主义作家罗巴基泽说好话。1974年5月，在亚美尼亚埃里温市出现“亚美尼亚统一党”地下组织，这个组织的行动纲领是反对俄罗斯人统治苏联，争取亚美尼亚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国家。1975年在立陶宛社会科学界出现代表民族主义思潮的“合流论”，主张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共和国在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俄罗斯人统治，实现三个共和国脱离苏联成为独立国家。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共和国也发生过类似的民族主义活动。

地方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是引发局部地区民族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关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消极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苏联长期在各共和国之间实行有计划的移民政策，鼓励各民族居民自由迁徙，致使各加盟共和国人口都是多民族组成的。加盟共和国主体大民族往往表现出“地方老大哥的情绪”，其他对小民族和外来民族抱以歧视态度。例如，在阿塞拜疆共和国，主体大民族阿塞拜疆人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大多数居民亚美尼亚人抱有大民族主义偏见和排他情绪，因此1975年该自治州的亚美尼亚人集会要求自治州脱离阿塞拜疆而加入亚美尼亚共和国，引起与阿塞拜疆人的冲突。在格鲁吉亚共和国，主体大民

族格鲁吉亚人的沙文主义引起了小民族阿布哈兹人的强烈不满。1978年5月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把格鲁吉亚语规定为国语而强制小民族学习，抗议歧视阿布哈兹民族语言文化和排斥阿布哈兹族干部，要求自治共和国脱离格鲁吉亚。

地方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的另一方面突出表现是鼓动民族独立和进行分裂统一国家的活动。60至70年代，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吉尔吉斯等共和国发生的民族主义活动，都是共和国主体大民族的人带头隐蔽的或公开的要求民族分离和独立，进行分裂统一国家的活动。不过，由于当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采取高压政策或武力措施，地方大民族主义分裂活动才被制止，但民族分离主义作为一股分裂统一国家的危险思潮一直潜伏着。

（五）联盟中央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限制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削弱了联盟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中央集中计划过多，限制了共和国经济发展的活力。30年代，苏联形成了联盟中央部门集中管理体制，由中央集中管理包括重工业部门的所有企业、基本消费品的大中型企业，只有纯属地方意义的工业企业归共和国管理。1936年中央工业企业的产值占全苏89％，地方工业企业的产值只占全苏11％。直到50年代初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变，这表明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限很小。

1957年赫鲁晓夫推行经济改革，试图实行中央与共和国分权，把一部分经济管理权下放给共和国和地方。1959年各共和国的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管辖的工业产值占全苏工业产值的比重有明显上升，共和国管理经济的权限也有所扩大。可是，由于经济改革出现混乱和地方主义膨胀，中央又采取措施加强集中管理，收回了不少管理权，因此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央过分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问题，各共和国的经济自主权仍很小。

勃列日涅夫上任后，1965年提出中央部门原则与地区原则相

结合的管理体制，在对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总的按部门原则管理的同时，兼顾地区管理原则，扩大共和国的经济管理权限。执行的结果是，归联盟中央各部管理的工业产值占全苏50%，归联盟兼共和国部、共和国部管理的工业产值也占全苏50%。但是，如果考虑到其他制约因素，如联盟兼共和国部、共和国部管理的企业实际上由中央管理；归共和国管理的企业生产品种、数量和分配都需按中央批准的计划执行，而共和国无权自主决定；用于生产的通用物资供应由苏联国家供委统一管理和分配，共和国有权管理和分配的只限于本共和国企业生产的并在本共和国内消费的产品。这样，从表面上看共和国管理的企业的产值占全苏工业产值的比重不算小，但共和国有权支配的产品占全苏工业产值的比重充其量不到10%。与此同时，各共和国农业生产也由中央集中计划来控制，各共和国要按照中央统一指令性计划安排生产任务，农产品由中央根据统一计划进行调配。

总的看，从3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联盟中央统一集中计划过多，各共和国管理经济的权限过小，限制了各共和国自身经济发展的活力，导致各共和国的利益受到损害。

2. 许多共和国经济结构单一化，人民生活相对贫困。由于中央集中计划过多，共和国的自主权过小，全苏实行专业化劳动分工和工业生产布局不合理，导致许多共和国单一经济结构和畸形发展。例如在中亚地区，哈萨克的铅、锌、铝、铜和铁等矿产品以及粮食和畜产品在全苏占重要地位，但加工工业落后，基本上是原料加工和初级产品的基地。乌兹别克的棉花和生丝产量分别占全苏的61.8%和47.5%，而棉织品和丝织品仅占全苏5.8%和6.7%，显然是低层次的经济结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三共和国同样也是棉花、生丝、羊毛等农产品和石油、天然气等初级产品供应地。在外高加索地区，格鲁吉亚的葡萄酒、茶叶、柑桔分别占全苏95%、70%、99%，其他工业落后，农业也不发达。阿塞拜疆主要工业产品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石油化工的初级

产品，农业以棉花为主，占农业产值71%，但纺织业并不发达。摩尔多瓦基本上是水果园，水果产量占全苏12.6%，葡萄酒工业比较发达，还生产生丝、向日葵、蔬菜等农产品，也是属于低层次经济结构。

这么多共和国经济单一化，主要工农业产品停留在初级水平，因此它们在全苏经济中地位低下，人均国民产值和国民收入、人均消费明显低于全苏水平。中亚地区五共和国人均国民产值和人均消费大大低于俄罗斯，除哈萨克外，其他共和国仅相当于俄罗斯的一半左右。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落实到劳动者个人身上，便表现为职工和农庄庄员劳动报酬的差别，单一经济的共和国劳动人民生活相对贫困。除波罗的海地区三国由于历史原因职工和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高于俄罗斯外，其他共和国的劳动者收入都低于俄罗斯。中亚、外高加索和摩尔多瓦等九个共和国与俄罗斯的差距更大。

3. 全苏经济结构不合理，长期机械地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方式，致使消费品生产落后，影响各族人民的生活提高。另外，长期实行单一计划经济，致使各民族之间不能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去加强相互之间的横向联系而使各民族相应受益，更不能使各民族感受到全苏统一市场经济给他们带来的共同利益。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中央集中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制约了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因而导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日益下降，以致于出现停滞状态。进入70年代之后，苏联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许多地区生活处于相对贫困状况，因此联盟国家已失去对各民族的凝聚力。

二、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导致民族问题危机爆发和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缺乏了解，更没有认识到长期以来潜伏的民族问题危机。他在“新思维”理论指导下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引发和加剧了潜伏的民族矛盾。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急剧膨胀，致使尖锐的民族矛盾同国内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统一的多民族联盟国家发生剧变和解体。

（一）忽视长期潜伏的民族问题危机，对民族分离主义丧失警惕性

1．错误地估计民族关系现状，忽视潜伏着的民族问题危机。戈尔巴乔夫在他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缺乏民族工作的经验，而且受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苏联美化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的深刻影响，对国内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对民族关系状况盲目乐观。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政治报告中涉及到民族关系问题时基本上重复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提法，认为长期以来苏共在民族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和丰富经验。因此，在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得到确立，并已进入亿万人的意识之中。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的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成的”①。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仅仅轻描淡写地提到，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可能会出现民族矛盾的问题。直到1987年11月，他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讲话还认

① 《苏共二十七大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为"民族问题在苏联解决了"。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根本没有认清过去长期以来潜伏下来的民族矛盾和问题，更不可能意识到随着他的"新思维"改革路线的实施会引发民族矛盾的大爆发，导致民族问题危机。

2．对民族分离主义失去警惕性。苏共27大刚结束，1986年4月在俄罗斯联邦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就发生了民族冲突。接着，当年12月因苏共中央撤换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的职务，激起了哈萨克人的民族情绪，阿拉木图市数百人上街示威，高喊"俄罗斯人滚出去，哈萨克斯坦属于哈萨克人"的口号，成为轰动苏联的阿拉木图事件。这两次民族冲突并未引起苏联领导人的警觉，只将其作为以往解决民族问题所遗留的某种消极后果而轻描淡写地加以解释。1987年和1988月8月23日，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共和国首都两次同时发生大规模群众集会，抗议1939年苏联政府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划分势力范围的附加秘密协定书。从1988年4月起，在波罗的海地区三共和国陆续建立了人民阵线，进行民族分离和独立活动。这种具有明显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本应引起戈尔巴乔夫的警惕，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制止。但当1988年10月1日爱沙尼亚人民阵线举行成立大会时，戈尔巴乔夫却委托参加成立大会的爱沙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维亚利亚斯转达他对人民阵线的祝贺，并"祝愿人民阵线支持改革成功"。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为其他各共和国成立民族主义组织开了绿灯。此后，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中亚诸国等共和国也都相继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各种人民阵线组织，甚至在许多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自治专区也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组织和团体，总数达数万之多，为政治多元化提供了组织基础，为民族主义的政治性发展创造了条件。民族分离主义在苏联各地发展如此迅速，与戈尔巴乔夫的纵容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实行错误的改革政策，助长了民族主义泛滥

1.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错误政策，引发了民族主义泛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完善，而是对苏联过去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全盘加以否定，试图用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来改造苏联社会，这是导致各种民族主义泛滥成灾的基本原因。一是在“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对苏联历史大加否定，使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势力得以迅速聚合为政治势力。二是把苏共看成是过去苏联国家的“专横官僚主义体制”的服务工具，从竭力贬低苏共的领导作用到取消苏共的合法领导地位，为各种民族主义政治势力攻击和否定苏共执政的历史提供了合法的口实。三是实行多党制，为各种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建立自己的组织或政党提供了条件，也为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各地夺权提供了机会。

2. 非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的急剧膨胀，使联盟国家的生存面临威胁。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打着恢复民族自主权的幌子，竭力谋求民族分离和民族独立，破坏统一的联盟国家。苏联各民族共同生活在统一联盟国家中已经有70年的历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已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总的说各民族在统一的联盟国家中都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改革，使得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急剧膨胀，这股势力，全然不顾多年形成的各民族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趁着苏联进行全面改革和实行中央与共和国分权之机，大搞民族分离和独立活动。

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首先是从波罗的海地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共和国开始的。1988年秋天，这三个共和国民族主义组织举行成立大会并制定了行动纲领，相互协调和统一行动。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三个共和国的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人民阵线组织的活动，甚至还有不少党政领导干部也支持或参与人民阵线的活动。这种情况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纵容，

致使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得以恶性发展。从1989年起，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加紧进行民族独立活动。5月立陶宛、爱沙尼亚通过共和国经济独立的法令，7月拉脱维亚通过共和国主权宣言，宣布其境内的一切自然资源为本共和国所有，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拉脱维亚与苏联的关系将通过签订协议来确定。8月23日，三个共和国同时举行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提出就三个共和国脱离苏联问题进行全民投票。12月11日，三个共和国的部分苏联人民代表发表呼吁书。公开谴责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附加秘密协定书，要求苏联政府承认此条约和协定书从当时签订时就无法律效力。上述这些要求的实质就是从经济和政治上为三个共和国独立作准备。然而，苏联领导人在民族主义的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并没有采取恰当、切实、有效的措施维护国家的统一。11月27日苏联议会经过激烈辩论后通过了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共和国经济自主法，12月24日苏联第二次人代会就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作出决议，承认这项条约和协定书"违犯了列宁主义对外政策原则"，宣布从签订之日起"在法律上就是无效的"，苏联议会这样做的结果进一步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20大决定立陶宛共产党组织脱离苏共成为独立政党；1990年3月11日、3月30日和5月4日，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分别通过了共和国独立宣言，宣布三个共和国为独立国家，宣布苏联宪法在三个共和国无效。恢复1918年至1940年期间的各自的宪法，从国名中取消"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字样。

在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共和国带动下，1990年8月23日、1991年2月19日和4月9日，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三共和国也宣布独立。与此同时，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公布主权国家宣言，到同年12月15日，其他八个共和国也先后通过了主权国家宣言。俄罗斯联邦等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宣言的主要内容是：①宣布本共和国为主权国家，独立解决自己国家的对内对外的一切重大问题；②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高于苏联宪法和其他法

律；③可以自愿同其他共和国结成联盟，有权自由退出苏联；④共和国境内的领空和一切自然资源为本共和国所有；⑤有权建立自己的国家银行，确立自己的财政、信贷、税收和价格制度。其中有些共和国还提出建立自己的军队。卡累利阿、科米、阿布哈兹等自治共和国也通过了自己的主权国家宣言，宣布自治共和国的法律至高无上，有权停止执行苏联和所在加盟共和国的法律，而且阿布哈兹、巴什基尔、鞑靼、布里亚特、楚瓦什、雅库特等自治共和国宣布升格为加盟共和国，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宣布为独立国家，甚至还有许多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也通过自己的主权宣言。从此，民族分离主义在苏联已经成为一种无法抑止的势力，各共和国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在向联盟中央争夺权力问题上结成了统一战线，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法律大战"，使联盟中央一切法令和决定都无法实施，从而导致联盟国家走上解体的道路。

3．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恶性发作，加速了联盟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并没有针对长期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采取任何有力的政策和措施。相反，在1989年 9 月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仍坚持要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新联盟国家，强调"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是整个联盟国家的凝聚力量，对于克服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因此进一步助长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恶性膨胀，以致构成苏联解体的最主要威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恶性发作的主要表现，一是大造"吃亏论"的舆论，竭力主张复兴俄罗斯。在苏联70多年历史中，实际上俄罗斯是联盟国家的核心，其他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则是卫星。俄罗斯人在社会中实际上享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特权。但是俄罗斯的"民主派"人士却到处散布俄罗斯人"吃亏论"，说俄罗斯是个"大奶牛"，其他民族靠吮吸奶汁养肥了自己，而俄罗斯人却深受其害，高呼"救救俄罗斯"，并提出所谓"全面振兴俄罗斯"。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选举时，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等大城市选举会上常常有人高喊"请

投俄罗斯人代表的票”。在这种“吃亏论”的煽动下，一些俄罗斯人提出甩掉其他共和国，全力发展和振兴俄罗斯的口号，这样就更加伤害了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激起了民族分离主义情绪。二是俄罗斯联邦带头通过主权国家宣言，向联盟中央夺权。此前波罗的海三国虽然发布了主权国家宣言，但尚不致产生全局性的影响。而俄罗斯联邦通过主权国家宣言，后果则大为不同。俄罗斯联邦通过主权国家宣言后，其他11个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很快也纷纷通过了主权国家宣言。这样，俄罗斯联邦的主权国家宣言实际上等于向正在燃起的民族分离主义烈火上浇油。三是在1991年“8·19”事件之后，俄罗斯联邦的领导人以苏联各民族人民的“救世主”的姿态出现，攫取联盟中央领导权，取代联盟中央发号施令，宣布由俄罗斯联邦来控制苏联各个要害部门，接管苏联军队、核武器和苏联各部门的财产，实质上是以俄罗斯来取代苏联。同时，在复兴俄罗斯的口号下在俄罗斯联邦挂起沙俄帝国的白蓝红三色旗，甚至向其他共和国提出领土问题。这种明显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和一系列的错误做法，更加激起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加剧了各民族共和国的独立倾向，进而加速了苏联的剧变和解体。1991年底，利加乔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回顾苏联这段历史悲剧时曾说：“我还要指出一个原因：这就是我们犯下的错误，是领导犯下的错误，我们没有及时看清联盟国家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我们总以为，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是保守者和改革者之间的矛盾。但是，国家的主要危险却是民族分立主义，还有民族主义运动，它们最终瓦解了苏联。”从苏联民族危机引发社会动乱、加剧政治剧变并最终造成联盟解体的发展过程看，利加乔夫的这一席话确实是发人深省的。

（三）实行多党制，为民族分离主义夺权提供了合法机会

1.“政治多元论”为产生民族主义政党提供了理论依据。长期以来，苏联一贯反对和批判政治多元论，认为它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各种修正主义理论的特征”。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把它

作为“革命性的倡议”大加宣扬和实践。这就不仅为苏共内部存在不同政治派别和实行多党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各种民族分离主义政治组织或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合法依据。

2．实行多党制为民族主义政治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合法的政治保障。苏联宣布实行多党制后，形形色色的政党大批涌现，到1991年7月新成立的全苏性政党达20多个，各共和国中成立的各种政党达500多个。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共和国新出现的政党中大多数是从民族主义组织演变而来的。它们大都以民族利益的“卫士”自居，举起民族主义大旗，以廉价的许诺去争取当地民族居民的支持，发展壮大自己的组织，鼓动民族分离和独立。甚至有些共和国的共产党实际上也变成了民族主义性质的政党，利用民族主义争取支持。

3．公开自由竞争的选举为民族分离主义夺权敞开了大门。1988年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决定实行公开自由竞争选举制，同年关于修改苏联宪法的法令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每个选民都可以自由提出候选人，可以将不受名额限制的候选人列入选票，候选人可以自由开展竞争活动，选举结果完全由选民意愿决定。应当指出，1989年和1990年苏联各地人民代表选举时，由于在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舆论多元化的思想理论影响下，在揭露苏共历史问题和错误的诱导下，苏共领导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被严重歪曲甚至被否定，党员思想一片混乱，党内派别斗争加剧，苏共的威信急剧下降。在这种形势下实行公开自由竞争选举，对苏共当然是十分不利的。1990年3月，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共和国在大选中，立陶宛民族主义组织争取改革运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人民阵线上台执政，苏联共产党在这三个共和国首先丧失政权。到1991年“8·19”事件之前，苏联共产党事实上已在7个共和国丢失了政权。“8·19”事变失败后，苏联共产党被取缔。多数共和国的政权实际上已被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所把持。

（四）实行主权国家联盟，为各共和国独立提供了基本条件和良好机会

1．联盟中央与共和国之间权益划分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如前所述，过去苏联宪法规定国家结构是联邦制，实行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分权制。但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联盟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戈尔巴乔夫在试图改革联盟中央高度集权领导体制时，提出了“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的口号，后又改用“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的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就没有强大的联盟”的折衷提法，但这些口号都遭到不少共和国的反对。1990年11月公布的新联盟条约草案规定苏联是各主权共和国的联盟，承认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仍然遭到反对。最后在1991年8月20日签署的新联盟条约中规定，苏联在国际关系中是主权国家，各加盟共和国在国际关系中也是主权国家，实际上把苏联变成邦联国家，这为各加盟共和国争夺独立国家地位，把共和国置于苏联之上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为民族分离主义抛弃统一联盟国家提供了借口。

2．提出主权国家联盟的主张，为共和国独立和联盟解体铺平了道路。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1989年9月苏共民族政策纲领提出改革苏联国家体制和建立新联盟国家的问题。随后，在围绕建立什么样新联盟国家以及如何划分联盟中央与各民族共和国之间权限问题上，党内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戈尔巴乔夫在这场斗争中的三个重大问题上妥协让步。一是违背列宁的党建原则，承认各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政党。苏共28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各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政党，它们可以与国内外其他政党和社会运动建立关系；苏共中央核心领导机构政治局由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人联合组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可以不执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因此，苏共失去了对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而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也纷纷打起民族独立自主的旗帜，与联盟中央争夺国家主权。二是在国家名称

上发生重大变化。1922年苏联成立条约以及后来苏联宪法都规定国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新联盟条约》正式文本规定国名是“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取消了“社会主义”字样，突出了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意味着，新联盟国家的性质和结构形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是在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的权利划分上大大削弱了联盟中央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各共和国的权力。按照体现列宁关于联邦制思想的1924年苏联第一部宪法规定，联盟中央主要行使外交、国防、对外贸易、交通和邮电方面的权力，批准全苏国家预算、统一货币制度、信贷制度、税收制度，制定全苏其他各方面问题的立法原则，而其他经济、财政、内务、司法、文化教育等方面国家管理权归共和国行使。而《新联盟条约》则规定，联盟中央可以行使外交、国防方面的权力，开展联盟对外经济活动并协调各共和国的对外经济活动；批准和执行联盟预算，负责货币发行；负责联盟的黄金储备、金刚石和外汇储备；领导宇航研究工作；管理航空运行、联盟的通信、信息、测绘、制图、计量、标准化和气象系统；管理核动力；通过和修改联盟宪法，实行宪法监督权。但是，联盟中央的这些权利都必须在各共和国共同参加制定决策和共同参加管理的条件下才能实施，实际上联盟中央没有一项能够单独决定和实施的权利，已经变成了各共和国的协商和协调机构，从而为各共和国独立和苏联解体奠定了法律基础和铺平了道路。

（五）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被迫承认各共和国的经济主权，为共和国谋求独立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这几年中，苏联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各共和国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1988年和1989年，在戈尔巴乔夫推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时，各共和国陆续发表主权宣言，并首先要求共和国经济独立自主。在经济形势恶化和联盟与共和国的矛盾加剧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并最终承认共和国经济主权。一是承认土地和其他

自然资源归共和国所有。过去苏联宪法规定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统一联盟国家所有，没有在联盟与共和国之间划分所有权。在各共和国要求经济自主权的压力下，在1989年9月通过的苏共民族政策纲领和1990年3月公布的《苏联所有制法》中，对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规定为共和国与联盟共有。后来，在各共和国争夺经济主权的浪潮冲击下，新联盟条约规定，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都归共和国所有，是共和国不可剥夺的财富。二是承认联盟预算由共和国控制。原来，联盟预算与共和国预算的收入主要靠所属企业的利润缴税，1991年改为统一利润税。为了扩大企业财权和提高共和国预算所占比重，规定统一利润税的税率为45％，其中22％上缴联盟预算，23％上缴共和国预算。但仍遭到俄罗斯等共和国的反对，于是又改为凡位居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的税收全部上缴共和国预算，然后再根据联盟的需要向联盟预算上缴一定比例的收入。这样，联盟预算实际上就由共和国控制，致使联盟财政完全依附于共和国财政。三是承认共和国境内的几乎所有企业都归共和国所有。过去，苏联的国营企业属于国家，在各级政权之间划分的只是企业的管理权，而不是所有权。1990年苏联开始所有制改革在《苏联所有制法》中规定，把原来对国营企业的分级管理转为分级所有，形成了联盟、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等所有的企业。但各共和国为了争夺经济主权，对这种划分很不满足，它们在主权宣言中纷纷声明位于其境内的所有企业包括联盟所属企业都归本共和国所有。尽管联盟通过各种法令与共和国争夺企业所有权，但联盟所属企业实际上已被共和国控制。最后，新联盟条约完全肯定了各共和国的这一要求，而联盟管理的部门只能控制通信和核动力，还有与共和国共管国家动力系统、天然气和石油管道、交通运输等极少的经济部门。其他经济部门都归共和国管理。这样，原联盟企业除极个别的之外全都归共和国所有。上述经济权限的丧失，使联盟失去了赖以独立存在的物质基础，联盟的命运将取决于共和国。

（六）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苏联民族矛盾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导致苏联民族危机大爆发和苏联解体的外部因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认为，引发和加剧苏联国内矛盾是遏制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而苏联对外政策的失败则是促使其内部演变"最强大的力量源泉"。所以，把苏联国内民族问题作为薄弱环节实施突破，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苏实行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图谋，其主要特点为：

① 以多民族特点为战略缺口。美国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关注，在苏共20大后明显加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不仅使肃反扩大化和卫国战争期间对非俄罗斯民族的伤害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强烈情绪，而且也为西方敌对势力提供了谋求铁幕裂隙的契机。尽管赫鲁晓夫时期希图通过篡改历史和美化民族关系来掩盖苏联的民族矛盾，但西方敌对势力却从中嗅出了潜在的危机，作出了"民族主义注定要成为阻止共产主义继续前进的障碍"的判断。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僵化体制的弊端和长期高压下的民族矛盾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美国一些人相当敏感地意识到"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和多民族构成，为在苏联各族人民中宣扬批判现状的政治观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他们对造成苏联的社会消极因素长期存在的三大关联条件进行分析时，把"苏联国家的多民族特点"列为首要条件，并断言这一特点"使其必然存在着裂口和漏洞"①。

② 以非俄罗斯民族为战略重点。美国透过苏联长期宣传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而且是"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的美化宣传表象，觉察到非俄罗斯民族中普遍存在着历史积怨和现实不满。认为这种潜在的且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不仅有助于遏制苏联的对外政策，而且"最终可能在内部引起危险的内向爆炸"。因此，他们确认，"非俄罗斯人的政治热望乃是苏联的致命弱

①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第116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年版。

点”。而这种“政治热望”“在外部世界的鼓励下”会“变得更加活跃。”所以，他们认为，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攻势，“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身上”①。

③ 以苏联解体为战略目标。首先，通过瓦解东欧，以取得美国对苏联在欧洲地缘政治战略竞争中的外部优势；其次，“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应将火种引入苏联的领地，以加强内部要求民族共同决策的压力。”这种压力将促使苏联实行分权，使各非俄罗斯共和国享有更大程度的“经济自决权”，进而“转化为日益增长的政治自决权”要求。其结果必然促使非俄罗斯民族在“波罗的海沿岸一些共和国，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混合文化地区，当然还有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共和国的边缘地区”爆发与俄罗斯人控制的联盟政权的“正面冲突”。在这种情况下，“非俄罗斯人坚持任何重大的民族权利的要求，都会对俄国的领土优势构成挑战”。而一旦形成这种局面，“大俄罗斯帝国的解体也会最终到来”②。其次，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得手，是借助于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而实现的。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分析苏联改革后所发生的变化时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这种变化会有多大，属于什么性质，来得多快——这些取决于他，也取决于我们。”这一估价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取向、改革走向，是美国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能否奏效的关键。就民族问题而言，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似乎是专门针对美国利用苏联民族问题的图谋而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一点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有力量、不软弱、不解体的因素”。戈尔巴乔夫视为优势和不可能的因素，恰恰是美国作为弱点和可能性开展攻势的目标。对这种截然相反的判断，当然不能因苏解体的

①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第117页。

② 同上书，第226页。

现实而简单地论是非，苏联的解体并非不可避免，美国的图谋也绝非必定实现。苏联改革中爆发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有历史沉淀的积弊及其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厚背景，也有西方敌对势力长期施加影响的作用，但苏共倡导的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却是造成社会危机转化为政治演变的决定因素。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导致了苏联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动，宣扬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了苏联社会性质的变更，鼓吹政治多元化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造成苏维埃联盟政治统一的瓦解，试图以邦联化取代联邦制的导向加速了联盟国家的解体，等等。戈氏的这些行径，不仅为苏联社会政治演变提供了具有决定作用的动力，而且他本人在这一过程中取悦、求助和依赖西方的思想行为演变，也决定了他在美国的战略图谋下按照美国既定的对苏演变思路完成苏联解体过程的必然性。这就是造成美国的战略图谋与苏联的现实演变如此吻合的"不幸言中"现象的根本原因。

三、几点教训与启示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民族问题涉及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各方面，是影响全局的具有战略性的重要因素。在苏联的剧变与解体中，民族问题起到了诱发社会动乱和加剧政治剧变的重要作用。

苏联民族问题危机的形成绝非偶然，是经过长期历史积累，又同各种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十分错综复杂。这种危机在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的具体条件下全面爆发了。研究民族问题在苏联剧变与解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防止片面性和简单化，要正确地认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教训，这样才能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下面就苏联民族问题危机的特点提出我们当前能够认识到的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与启示。

（一）解决民族问题的决策必须遵循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坚持科学的正确引导

民族与民族问题有其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自身规律。民族与民族问题要在阶级与国家消亡之后才能消亡。因此民族问题在社会总问题中是一个长期存在，又同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非常复杂的重要问题。俄国的十月革命废除了存在几百年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民族压迫制度，苏联的建立，从政治制度和法律上确立了各民族的平等地位。这只是为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前提条件，能否得到解决还要靠实践。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如何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上，列宁在1922年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真正的无产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非常谨慎”，必须采取关心和让步的态度，这是“无产阶级团结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的要求，“对待民族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创造条件来排除在这一方面引起冲突的一切可能。”①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执政初期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列宁制定的民族政策。但不久，随着理论上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过高估计，在对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不符合实际的片面性，认为民族“平等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各民族之间互不信任心理也“已经消失”，各民族“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因而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不但未考虑到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的特点和情况，而且往往将民族问题作为阶级矛盾处理。赫鲁晓夫在宣布 20 年建成共产主义的同时，宣称苏联已经解决了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各民族更加全面接近，已经形成有共同特征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勃列日涅夫也宣布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

① 《列宁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868、863页

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估计显然不符合实际，而当一些民族共和国中出现要求自主权的活动时，他们就认为这是阶级问题，对之采取镇压措施。在他们这种思想指导下作出的决策，不但不会推动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进程，反而会刺激起狭隘的民族情绪，加深民族矛盾，使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更加复杂。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民族问题上同样抱有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认识。他在《改革与新思维》中说："如果没有基本解决民族问题，就不会有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际上象现在这样一个苏联了"①。结果是当他提出"公开性"、"民主化"以后，两种民族主义迅速泛滥，民族分离主义不断膨胀，长期历史积累的民族矛盾与对立，在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大气候下，起到了引发和加剧社会动荡的作用。

列宁晚期提出的对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指示，未被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所认识和理解。他们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原则论断，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地看待和简单化地处理民族矛盾，而且他们制定的很多政策长期带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和利益，使得民族矛盾不断积累，造成了严重后果。由此可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遵循民族问题的自身发展规律，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坚持科学决策、正确引导。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切实保证民族平等原则的实现

十月革命前后，俄国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根据这一情况，列宁作出了建立联邦制国家的决策，这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不能把已经存在的各共和国团结起来，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不可能站住脚。按照列宁的主张，在1922年建立了苏联，1922年的联盟条约和1924年的宪法上对中央与各加盟共

---

① 《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45页。

和国的权限划分虽然作了规定，但列宁尚未来得及解决联盟条约实施中的一些问题。斯大林继承了领导职务以后，片面强调中央集权和忽视共和国权利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在实施联盟条约和宪法过程中，一方面出现了联盟中央与俄罗斯共和国中央一体化的情况，实际上是俄罗斯领导其他加盟共和国；另一方面未能兑现联盟条约和宪法中有关权限划分的规定。最终形成了带有一定封建色彩的包括政治和经济的高度集权体制，联邦制徒具形式。这就不仅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而且大大遏制了民族共和国发展各项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妨碍了各民族共和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影响了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削弱了这个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吸引力和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为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市场”；为后来民族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在联盟中央和各民族共和国权限划分问题上，戈尔巴乔夫逐渐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在“改革”的名义下，屈服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地方分主主义以及国际敌对势力的压力，毫无原则地扩大共和国的自主权和独立权，放弃党对全国的统一领导，使联盟中央失去了宏观控制能力，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崩溃与解体。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好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划分问题的根本途径。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体制，高度的中央集权与过份分权的无政府状态，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映在国家管理体制和权益划分上，能最大限度发挥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能最充分发挥地方各民族干部和群众的主动性与主人翁精神，其标志是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发展全国和各民族共和国的社会生产力，提高全联盟的综合国力。中央过份集权和权利过份分散，都会招致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严重后果。

培养和任用各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各民族共和国的主要领导职

务和参与中央事务的管理领导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民族干部的作用至关重要。苏联建立以后，培养和任用了大批各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各级领导工作。他们对维护苏联的统一，发展各共和国建设事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但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时期，大批民族干部被打成民族主义分子遭到清洗、受到迫害；以后又派了俄罗斯人担任各共和国党的第二把手掌握实权，在中央集权体制的严格控制下，不少非俄罗斯干部感到有职无权，甚至产生受歧视和不平等感。无疑这一切都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加深了民族矛盾与对立情绪，长期累积起来，形成离心隐患。因此培养和任用民族干部必须建立在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群众路线基础上，防止将民族问题作为阶级斗争对待和处理，防止将思想认识问题作为敌对势力对待和处理。

坚持民族语言平等，反对强制推行俄语，防止任何民族语言享有特权。这是列宁主张的民族平等原则的一项重要内容。30年代后，在“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苏联领导人忽视法律上尊重各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权利的规定，强制推广俄语，力图使俄语成为各民族的国语。同时还出现了将非俄罗斯民族语言的拉丁字母俄语化的现象。列宁曾不只一次地强调民族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内容，反对大俄罗斯民族语言享有任何特权。他指出“用棍子硬逼着”其他民族学习俄语，其后果是“俄罗斯语言难以传入其他民族集团，更主要的还在于会加深敌对情绪”。列宁进一步指出“由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需要知道俄罗斯语言的人，不用棍子逼迫也会学会俄罗斯语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态度。苏共领导人违背民族平等的原则，通过强行推广俄语来人为加速各民族的接近和融合，必然会受到其他民族的强烈抵制。民族语言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任何强制措施都会刺激民族情感，引起逆反效应，增加民族矛盾与对立。苏联解体过程中，各共和国在民族主义支配下，

首先宣布本民族语言为国语，这是对强制推行俄语的一种惩罚。如果苏联在各加盟共和国都通用本民族语言和俄语，坚持任何民族语言不能享有特权，语言问题就不会成为如此敏感问题，更不会成为民族矛盾中的重要因素。

（三）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坚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认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

俄国沙皇几百年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统治，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列宁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主要障碍，号召党和人民“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程度不同地背离了列宁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始终没有完全摆脱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传统影响，许多政策明显带有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色彩，……致使沙俄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反而进一步加深。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始终是苏联民族问题的主要倾向，在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的矛盾中，前者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是这种矛盾被强制性的掩盖下来，潜伏下来，一遇适当的条件，便一发而不可抑止。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在苏联首先必须坚持反对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

一般说来，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对大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一种防御。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泛滥与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不断增强，存在着必然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没有独立滋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更不能认为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由大民族的民族主义造成的。特殊情况下，小民族的民族主义也会发展成为主要矛盾或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列宁曾多次强调对待民族感情、民族问题要特别谨慎，小民族的正当自主权利应当受到充分满足并得到保障。对待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思想来解

决。既要从大民族主义方面去寻找原因，又要从小民族内部去寻找原因，以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两种倾向，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用一种民族的民族主义来反对另一种民族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加盟共和国内以大民族主义来反对小民族的民族主义，都会导致矛盾的激化。

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为民族矛盾的激化和爆发创造了条件。在抛弃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同时，他的路线不仅导致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空前膨胀，而且导致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空前泛滥。苏联70几年民族政策和实践的首要历史教训是，没有遵循列宁临终前严肃告诫，同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进行斗争，而是助长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膨胀。同时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警觉，这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导致包括大俄罗斯民族在内的分离主义的迅速泛滥，终使苏联解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列宁曾多次论述过：私有制是产生民族压迫的根源，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消灭民族压迫。十月革命消灭了民族压迫制度，为实现各民族的真正平等与发展、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创造了条件。苏联在30年代中期已经消灭了私有制，成为一个完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上说，民族对立与民族压迫的基础已不存在，因而民族之间的对立、仇恨、压迫已经消失。但是消除产生民族差别和民族压迫的根源，与消除民族差别和民族压迫本身不是一回事，后者将要经历更复杂的漫长过程，特别是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尤其如此。因此，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使建成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放松反对各种类型民族主义的努力，同样需要谨慎对待和处理民族关系。苏联70多年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那里不但存在着民族歧视，而且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

民族压迫现象与因素。

苏联的教训表明，必须持续不断地坚持进行广泛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宣传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为基本依据，联系实际经常认真进行对现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与总结。进行教育的对象，不但是各民族广大干部与群众，更重要的是大民族的主要领导人与决策者。大民族的主要领导人不但自己要警惕民族主义的影响，而且在决策与实际工作中要不断教育各民族干部，坚持民族平等与团结，防止民族主义滋长。

（四）要严格区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界限，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只能通过宣传教育、疏导、协调等方法妥善加以解决。民族分裂主义则属于对抗性矛盾，应通过斗争和运用法律手段加以解决。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或象原苏联那样以一种民族的民族主义反对另一种民族的民族主义，只能加剧矛盾，把各族人民引向灾难。

苏联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和以后的建设过程中，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在少数民族地区把任何不满和要求维护自主权利的人，都打成民族主义危险分子；在卫国战争时期，将一些民族扣上“背叛”的帽子，强制整个民族迁移流放。在阶级斗争更加尖锐激烈的理论指导下，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简单化地作为阶级问题处理，造成长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不仅伤害了各非俄罗斯民族的感情、打击与迫害了民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而且使非俄罗斯民族逐步淡化了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使历史积怨与现实不满在民族主义情绪中不断聚合。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忽视了长期累积起来的民族问题危机这一重要社会问题。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民族分离主义面前，步步退让，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又助长了各种民族主义膨

胀与泛滥，民族离心与分裂情绪迅速滋长，造成全局性的混乱与失控。

民族、民族问题、民族矛盾与阶级、阶级问题、阶级矛盾是两类不同的概念，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民族问题与社会中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在民族压迫制度下，民族问题往往反映出阶级问题的本质。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特别严格区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界限。混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界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助长民族分离倾向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五）不断健全与完善民族法制建设，严格用法律机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

苏联的民族立法，体现在联盟条约和以后历届宪法及各加盟共和国宪法与法律之中，但都不够严格，又缺乏监督机制。关于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具有双重主权的规定，造成各共和国可随时"自决"出去的隐患，而又没有法律制约的程序。领导人的讲话与决策，往往脱离法律而高于法律，违反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这种讲话受政治形势与社会思潮的影响，唯主观意志或盲目乐观估价苏联的民族过程，用高压政策和美化宣传来制造民族和睦、民族趋同的社会氛围，不符合苏联民族问题的实际状况，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联盟法律，自觉或不自觉地破坏了法律的执行，使法律失去了权威性，形成了人大于法的局面。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受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影响几乎形成传统，给苏联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造成了隐患。戈尔巴乔夫背离了宪法所规定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承认民族共和国的经济主权并提出结成松散的主权国家联盟，这实际上为各民族共和国独立和苏联解体开辟了道路。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健全与完善民族法制建设，切实克服人大于法这一不正常的违法现象，用法律机制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这是苏联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又一历史教训。

（六）必须时刻警惕并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防止和抵制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民族问题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图谋

苏联民族危机的形成与爆发，主要原因在于自身，但与国际敌对势力的挑唆与支持也是分不开的。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矛盾隐患进行渗透、煽动，力图实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苏联领导人对此缺乏客观的清醒认识，不是“草木皆兵”，就是疏于防范，缺乏理论上的对策和实践上的有力措施。因此，当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致使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形成了以民族主义极端性为特征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西方敌对势力终于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步步得手，使经过几代人艰苦奋斗有70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政治、经济和民族危机以及国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的交相作用下，毁于一旦。

苏联剧变的历史说明，防止和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矛盾对社会主义实施的和平演变，除了要有一套正确的民族政策之外，关键在于发展经济，尤其是民族地区经济，以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和社会主义的向心力。只有充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并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坚强有力，长治久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所以得手，根本原因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搞好，甚至搞了很多非社会主义的事情，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纵观苏联民族问题危机的成因及其在苏联解体中的巨大破坏作用，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领导人长期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原则，是苏联民族问题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而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则为这场危机的爆发创造了条件。因此，苏联民族问题危机的出现，不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过时了，不是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原则失效了，而是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坚持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则所

造成的恶果。这并不是西方敌对势力所宣扬的共产主义大失败，事实上是放弃共产主义所导致的失败，这一点从苏联剧变、解体的教训中是显而易见的。

撰稿者　陈联璧　果洪昇　陈建樾

责任编委　郝时远

苏联剧变与苏联宗教政策

在苏联的剧变与解体过程中，苏联的宗教及其宗教政策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也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从苏联历史上的宗教状况，苏联70年的政教关系，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及其后果等方面，研究和探讨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

一、十月革命前的宗教状况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的宗教状况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沙皇俄国的宗教状况，另一部分是1922年至1940年先后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其它14个加盟共和国的宗教状况。

1917年以前，俄罗斯、格鲁吉亚以东正教为国教，中亚和高加索的六个加盟共和国绝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在波罗的海三国的天主教或新教为统治宗教。在这些国家里，教会与资产阶级国家或封建国家紧密结合在一起，教会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当时势力大影响广的宗教有以下一些：

（一）东正教　在斯拉夫人居住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在格鲁吉亚以东正教会为主。

东正教在公元5世纪传入格鲁吉亚并被宣布为国教。格鲁吉亚东正教会首脑称卡多利柯斯牧首。1801年格鲁吉亚并入俄罗斯版图，教会也随之并入俄罗斯东正教会，1917年二月革命后宣布自主，但正式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是在1943年。在20世纪初，格鲁吉亚东正教会有1527个堂区、41所修道院、2所宗教学

校、6所男子教会学校和2所女子教会学校，出版月刊《格鲁吉亚宗教通报》。

东正教于988年传入俄罗斯并正式定为国教。15世纪俄罗斯东正教摆脱拜占廷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控制成为独立教会，时称“第三罗马”。据统计，在1914年俄罗斯有东正教堂78767座，神职人员12万。男女修道院1025座、修士修女23000人。神学院4所，在校生1000人。正教神学校57所，在校生23000人。俄罗斯东正教会下属68个主教区，其中有的在国外。有高级僧正157人，其中都主教3人，大主教94人，主教121人。在中国、日本、伊朗、巴勒斯坦都设有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办有60种教会杂志。俄罗斯东正教会也是沙俄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占有土地570万公顷（其中34万公顷为神职人员私人占有），还开办了大量工厂、宾馆、旅馆、畜场、奶场。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享有无限的权利，它广设宗教法庭，打击排斥其他宗教和教派。沙俄帝国一半居民处于它的精神控制和奴役之下。

（二）伊斯兰教　该教主要分布在中亚和高加索，即现在的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塔吉克、哈萨克、阿塞拜疆、鞑靼、巴什基尔、达吉斯坦、克里米亚等地，还有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部分地区。于7世纪末至8世纪初由阿拉伯哈里发国家传入，但伊斯兰化的完成则持续到15世纪末。这些地区几乎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其中90%为逊尼派，10%为什叶派（阿塞拜疆和塔吉克的山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于18—19世纪先后并入俄国版图。沙皇政府对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实行殖民政策，经济和文化十分落后，如识字率在十月革命前的乌兹别克为1.5%，塔吉克为0.5%，土库曼为0.7%，吉尔吉斯为0.6%，有不少民族连文字都没有。绝大多数居民在阿訇、毛拉和卡迪的影响和严格控制之下，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无不打上伊斯兰教的烙印。据统计，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有清真寺24582座，仅喀山省一省就有清真寺1152座，毛拉2468人。在北高加索，神职人员占当地居民总数

约2—2.5%。在达吉斯坦有清真寺1555座、礼拜堂213座、伊斯兰小学580所。在中亚有清真寺26000座，如布哈拉市就有清真寺430座、伊斯兰经学校113座，差不多每10个成年居民就有1名神职人员；塔什干有清真寺300座，撒马尔罕有清真寺150座，安集延有清真寺387座。

(三)罗马天主教　14世纪自德国和波兰传入，有600年的历史。主要分布在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乌日哥罗德）。在俄罗斯、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摩尔多瓦、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也有分布。革命前，俄罗斯境内有天主教堂4233座，信徒1000万。18世纪末，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俄罗斯和梵蒂冈建立了官方关系，互设大使（1847年梵蒂冈单方面废除条约后，两国关系中断了一段时间），教廷大使一直存在到1917年。天主教的神职人员由梵蒂冈任命。革命前俄罗斯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大都是拉脱维亚人。此外还有东仪天主教，即希腊天主教。该教承认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接受教廷的领导，但保持东正教礼仪，自1596—1946年一直存在，主要分布在西乌克兰（利沃夫州等地），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也有信徒。

(四)基督教新教　最初分布在城市，后来发展到农村。教派众多，通称小教会和非传统宗教。主要有：浸礼派——19世纪自英国传入，分布于俄罗斯、乌克兰、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和高加索，1884年成立俄罗斯浸礼派联盟，革命前有2447座教堂，31000名教徒；耶和华见证派——最初流传于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1939年这些地区划入苏联，该派热衷于传教，组织极为严密，由长老领导；路德教——自德国传入，主要分布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此外在哈萨克、吉尔吉斯和鄂木斯克州、新西伯利亚州也有分布，革命前有200个团体、传教士103人；基督复临派——自美国传入，1886年首先出现在克里米亚，此外在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也有传播，革命前在俄罗斯有269个团体、传教士78人、信徒6085人（主要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初只

限于德意志人中)，1905年4月17日《宗教宽容宣言》颁布后才开始公开活动；卫理公会——自英国传入，主要流传于爱沙尼亚；五旬节派——自美国传入，流传于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归正派——也称加尔文教，主要流传于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州和立陶宛；门诺派——1789年由波兰移民传入俄罗斯，集聚于克里米亚，革命前有8万人，不对外传教。

（五）亚美尼亚教会　又称亚美尼亚格列高利教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3—4世纪由亚美尼亚贵族正式建立国家教会，303年在埃利温建立艾奇米亚金大教堂，宗教仪式中使用亚美尼亚语，信仰基督一性论，组织和礼仪接近东正教，为首者称卡多利柯斯牧首。十月革命前，几乎全民信教，1931年前有教会团体59个、教堂56个。

（六）旧礼仪派　又称旧教派，17世纪因反对教会改革和主张保持原有礼仪而从俄罗斯东正教会分裂出来。后来旧礼仪派又分裂出许多流派，信徒分布很广，主要集中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白俄罗斯、乌克兰、西伯利亚及苏联欧洲地区的北部。革命前在俄罗斯有教堂1268座，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矛盾很深。

（七）犹太教　据统计，1897年沙皇俄国有520多万犹太人，分两部分。一部分叫西部犹太人，是17世纪和18世纪自德国迁入的，分布于莫斯科、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另一部分是东部犹太人，集居在克里米亚和中亚细亚、立陶宛等地，属于正统派。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有6059座犹太教教堂，信徒526万。沙皇政府对犹太人特别仇视，常常对其进行镇压和残杀。

（八）佛教　又称喇嘛教，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自外蒙古传入，流传于俄罗斯东部的布里亚特、图瓦和西部的卡尔梅克蒙古族中。十月革命前俄国有184座寺庙、喇嘛24000人、信徒434000人。20世纪初还传播到俄罗斯欧洲地区，在彼得堡修建了一座喇嘛庙。

（九）萨满教　是流传于西伯利亚和中亚当地居民中一种原始宗教。革命前在俄罗斯大约有70万信徒。虽然后来被喇嘛教和伊

斯兰教代替，但人们日常生活中仍保留着这种古老信仰的痕迹。

据1897年人口统计，沙皇俄国居民的信教率几乎达到100％（99.97％）。①

在这样一个多宗教的和宗教影响颇深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疑面临着十分复杂和困难的社会条件，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不认真地对待宗教问题。

二、苏联70年来的政教关系

革命导师列宁十分重视俄国的宗教问题。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写下了许多光辉著作，提出了对待宗教问题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宗教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批判。但是他特别强调，不能把批判宗教世界观和同宗教偏见作斗争放在首位，这个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的根本利益。他说，应该把这种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实践联系起来，因为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天堂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一致比无产者关于天堂的意见一致更为重要。他提出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使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与教会分离，使宗教对国家来说成为私人的事情（同时他指出宗教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不是私人的事情）。在这些著作中列宁还多次提出关于无神论宣传的问题，指出这一宣传在于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使人们同这些根源作斗争。他还指出，进行无神论宣传、同宗教偏见作斗争不能伤害宗教感情。十月革命后列宁也正是以这些指导思想来处理俄国宗教问题的。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为了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法令和宣言。这些法令和宣言中有许多条文直接涉及到宗教问题。

《土地法令》（1917年11月8日）规定，把教会和寺院的土地

① 《文化、宗教、无神论》，基辅1991年俄文版第133页。

收归国有，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从而结束了教会的经济特权。《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1917年11月15日)宣布废除任何民族的和民族宗教的一切特权和限制，取消了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其它宗教的特权地位。《离婚法令》(1917年12月29日》和《婚姻、子女和办理户籍登记法令》(1917年12月31日)规定，离婚案件由宗教机关转为法院受理，婚姻和出生登记转由民政机关办理，宗教婚姻是私人的事情。《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1918年1月23日)是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文件，该法令取消了东正教的国教地位，确定了各宗教和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的平等地位以及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但剥夺了宗教组织的法人权利。依据这一法令及贯彻这一法令的有关规定，接管了教会学校，废除了所有学校的宗教课教师职位，到1918年关闭了所有宗教院校。1921年7月13日又通过专门法令，禁止在教堂和家中向不满18岁的少年儿童教授宗教课。1918年7月10日公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为保证劳动者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并承认所有公民有进行宗教宣传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上述各项法令触动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特权和其它教会的利益，因此遭到了俄罗斯东正教和其它宗教上层的疯狂反抗。1917年8月——1918年1月，俄罗斯东正教会召开全俄宗教会议，通过了许多与上述法令相对抗的宗教决定，新当选的牧首吉洪发布的此类牧函就达16种之多，他们力图恢复东正教会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把社会主义革命称为“敌基督的入侵”,把“两分离”法令说成是对教会的“公开迫害”,号召抵制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并同其各项决议作斗争，要求教徒团结起来“拯救教会”。他们对服从政府法令者以开除教籍相威胁。这次宗教会议还积极参与策划了科尔尼洛夫叛乱。到1919年底，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团有三分之一逃到邓尼金分子那里,后又为弗兰格尔效劳，1920年随残余白匪逃往国外，于1921年在南斯拉夫成立了“国外

俄罗斯东正教会”，继续从事反苏维埃活动。与此同时，其它各教会的上层也进行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活动。他们除攻击苏维埃政权，号召抵制、对抗苏维埃政权外，还与白匪相勾结。天主教会在彼得堡成立“天主教堂区理事会中央委员会”，唆使教徒抵制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措施，教皇也指示俄国天主教会阻止苏维埃国家法律的施行。伊斯兰教一些神职人员支持中亚巴马奇白匪，组织“先知绿色旗帜”圣战队。旧礼仪派在高尔察克军队中成立“圣十字”义勇军。在白匪和外国干涉者占领区，教会中的反动势力尤为猖獗。1918年11月在高尔察克统治下的托姆斯克2名高级僧正和26名教士纠集在一起，成立了“临时教会最高管理局”，要求教徒参加反苏维埃政权和支持高尔察克的反革命武装，1919年5月在邓尼金支持下，由11名高级僧正、23名神父组成了“东南俄临时最高教会管理局”，支持邓尼金的反苏维埃武装斗争。在苏维埃政权的严厉打击下，上述这些反抗均遭失败。

但教会上层与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并未结束。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维埃国家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面临着严重困难。农业歉收，总产值只等于战前的一半，工厂停工，运输业遭到破坏，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工人和农民中出现了不满情绪。特别是在俄罗斯，1921年的饥荒波及34个省，饥饿严重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但教会拥有大量贵重物品，如东正教的财富就能使一亿人免除饿死的威胁。为着解决燃眉之急，1922年2月26日苏维埃国家颁布了《关于没收教会贵重物品同饥饿作斗争的法令》。在没收珍品的过程中，俄共(布)在信教居民中作了广泛解释，也作了大量争取神职人员的工作，把没收珍品的时间和程序及时通知神职人员，并规定在没收过程中不得给祈祷仪式造成困难或侵害教徒利益。结果到1923年4月1日止，共收得黄金18普特，白银24733普特，珍珠1.3普特，宝石约2普特，其它贵金属95普特，金币4859卢布，贵重物品545件。国家用这些财物在国外为饥民购得300万普特粮食和食品，并购置了大批耕畜、农具等。这一措

施缓解了经济紧张形势特别是食品短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巩固苏维埃政权。

教会上层对苏维埃政府的这一措施极力反抗，称没收贵重物品是“亵渎神圣”行为。东正教会牧首吉洪号召教会将贵重物品隐藏起来并下秘令称“重要的不是给什么，而是给谁”。逃往国外的僧侣也召开会议，号召用饥饿和疾病来扼杀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国内外教会反动势力唆使下，部分黑帮分子在舒亚、莫斯科和其它一些地方挑起反对没收教会珍贵财物的流血事件。列宁对反动僧侣和反动资产阶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①。1922年5月牧首吉洪因犯有反苏维埃活动罪而被起诉和受到法庭审判，他在法庭上供认不讳。由于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1923年6月16日吉洪写信给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表示放弃反苏维埃的活动，转到忠诚于新政府的立场上来。1924年3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暂停此案审理。1925年4月7日吉洪在“遗书”中劝告东正教僧侣“别指望恢复君主专制制度，要相信苏维埃政权是真正的人民的工农政权，因而是牢固的不可动摇的……谴责对政权的任何反抗、反对政权的险恶阴谋、叛乱和仇恨”。自此以后东正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开始缓和。在对待新社会制度的态度问题上，虽然仍有一些神职人员和教派分子从事各种破坏活动，甚至组织反革命集团，但更多的教会人士在思考如何使教会活动适应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历史条件，这部分人的意见在教会中逐渐占了主导地位。1927年7月29日都主教谢尔基和6名东正教主教公会成员发表教牧宣言说：“我们应当用言行证明，对东正教冷淡的人们和东正教的虔诚信徒都可以成为苏联的忠实公民和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奉公守法公民”。与东正教相类似，其它许多教会也都纷纷发表宣言和声明，表示拥护苏维埃政府，遵守国家法律。

苏联共产党从建国不久还着力组织了“无神论宣传”工作。

---

① 详见《列宁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4期第193页。

就有270种2700万册，1930年为418种2050万册。还专门为工人、农民、红军分别撰写并多次出版了《反宗教教科书》。此外还筹建了反宗教博物馆，1927年有15个，到1933年达80个。在这种强大的反宗教宣传和无神论宣传的声势之下，不少教徒纷纷退教。据当时社会学家统计，不信教的居民在城市占四分之一，在农村占二分之一。在以后的统计中信教居民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虽说这种宣传取得了相当的效果，但也不可否认，这里边有着很大的虚假成份。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与教会上层作斗争与大力开展反宗教宣传和无神论宣传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教传统，对之还作出了一些专门的规定。如1919年1月4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因宗教信念免除兵役的法令》，规定"凡因宗教信念而不能参军者，根据人民法院决定，有权在卫生部门，首先在自选的传染病院或用其它相应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来代替一定的服役期限"。又如考虑到多数劳动居民的信教情况，在《八小时工作日法令》中除了规定革命节日和国家节日外，还规定某些最受景仰的宗教节日为非工作日，地方苏维埃有权根据当地工人和职员的民族宗教构成安排休息日。如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宣布星期五（主麻日）为休息日，在犹太教信徒、基督复临派信徒聚居的地区宣布星期六（安息日）为休息日等等。根据宪法规定，宗教团体的成员和其他公民一样可出版报纸和杂志。此外还容许在监狱和医院为重病员和濒临死亡者举行宗教仪式等等。

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时期，斯大林提出了"越是接近新社会，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理论。当时整个苏联党和政府的工作都是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理论无疑也指导了苏联的宗教政策和宗教工作。1929年4月8日俄罗斯联邦通过了《关于宗教组织的决定》，它实际上是一部宗教法规，一直实行到1987年。这个决定应该说是苏联建国后对待宗教问题的实践在法律上的总结，但它明显的受到当时"左"的指导思想

的影响，力图削弱宗教，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限制较多。1936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也反映了这一思想。其中第124条规定："为了保证公民信仰自由，在苏联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承认所有公民有举行宗教仪式和反宗教宣传的自由"。这一规定与1918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的"宗教宣传自由"完全不同，与1925年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也不一样，按照规定教徒的信仰自由只剩下"举行宗教仪式的自由"。法律规定如此，在对待宗教问题的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则走得更远。

1929年6月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提出了"同宗教做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有些无神论者甚至号召"痛击宗教和教会"，如1934年出版的《反对反宗教宣传中的机械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一书称"宗教组织是进行破坏和有害活动的阶级敌人的组织，宗教意识形态是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放弃对宗教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斗争就意味着纵容、帮助阶级敌人"。直至1940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和宗教自学小组反宗教教科书》还说："国内被粉碎的阶级敌人还没有被彻底打败。他们的避难所之一依然是散布反动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宗教组织。被赶出自己巢穴的男女修道者们，数以万计的各种教士——所有这些分子都在维持宗教，利用宗教偏见来制造事端"。对宗教问题虽然党内有不同看法，但上述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

在行动上，与农业集体化中的过火行为相呼应，当时在宗教问题上也发生了过火行为。为此1930年3月14日联共(布)通过的《关于同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中提出绝不容许用行政手段关闭教堂的问题，对反宗教狂热有所抑制，但由于总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并没有使这种状况扭转过来。1929—1930年共关闭了696座教堂，1931年12月5日在莫斯科炸毁了建于1812年的基督救主大教堂，其后又关闭了不少教堂和修道院，许多被毁坏，其中有相当数量是稀有的历史文物。这一时期很多地方还发生了没收神职人员的财产，教士和积极参与宗教活动的教

徒无端受到审讯和镇压，仅1936年这方面的投诉信多达42392件。至40年代还制造了大量的无教堂村、区、州。如俄罗斯联邦有25个州就没有一座东正教堂，在20个州中，每州平均不到5座教堂。在肃反扩大化时对教会的打击更大。据1990年版的米·尼·别斯索诺夫《当代东正教》一书透露，20年代和30年代之交，在被镇压的1000万人中，东正教神职人员占相当比重。许多教士和教徒因是“宗教世界观的代表者”而无辜受到迫害。

在卫国战争年代，苏联绝大多数的宗教信徒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与祖国人民一道共同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入侵。东正教会首脑谢尔基都主教于1941年 6 月和10月两次发表牧函，号召教徒起来保卫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到1945年为止，教会共捐献15000万卢布，先后组建了一个坦克纵队和一个空军大队。都主教阿列克西在被德寇围困的列宁格勒领导了教徒的爱国行动。其它宗教团体也相继效法。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党和国家肯定了宗教界的爱国行动，1943年9月5日斯大林接见了东正教会的主要负责人，使政教关系缓和下来。此时，苏联党和政府停止了反宗教宣传，解散了无神论者组织，允许开放教堂，开办宗教院校，恢复教会机构。俄罗斯东正教会1943年 9 月选出了新的莫斯科和全俄牧首。1943—1944年伊斯兰教也先后按地区成立了三个组织。1944—1945年浸礼派、基督复临派、旧礼仪派、佛教、天主教、亚美尼亚教会都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苏联政府对1929年的宗教法规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和补充，并成立了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两个国家机构。这一时期从总体上看，苏联政教关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苏联政府对个别教派的政策仍十分严厉，特别在卫国战争以后，对待原敌占区的宗教更是如此。虽然西乌克兰的东仪天主教会在卫国战争期间曾捐献10万卢布，但国家仍将其视为梵蒂冈的“代理人”、“法西斯主义的维护者”，1946年强迫该教信徒改宗东正教。1947年又在立陶宛关闭了所有修道院，有三分之一的天主教神父被驱逐出国。在白俄罗斯禁止注册新的犹太教

和天主教团体。从1948年到1987年在乌克兰没有注册一个东正教团体。战后还将信仰伊斯兰教的克里米亚鞑靼族等几个少数民族强制迁移。如此等等。此后，苏联宗教团体数量开始下降。据统计，1948年全国共有宗教团体20459个，其中东正教14189个。至1954年总数降为18475个，其中东正教13423个。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继续坚持“左”的一套宗教政策。1954年7月7日和11月10日，苏共中央先后通过了《关于无神论宣传中的重大缺点及其改进措施的决议》和《关于在居民中进行科学无神论宣传中的错误的决定》。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是：1.无神论教育工作要有战斗性和进攻性；2.既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禁止伤害教徒的宗教感情，又要坚决消除对宗教的消极态度，要揭露宗教的反动本质及其危害；3.反对宗教偏见的斗争必须持续不断进行，并且要有极大的顽强性。1959年8月21日《真理报》编辑部《反对宗教偏见》的文章说得更为清楚：“我们党对宗教的态度是根据这样一种观点来确定的，即宗教敌视劳动群众的利益，它是最保守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妨碍人民群众为改造社会而进行的积极斗争”，“宗教残余是加强各族人民友谊的障碍，它有利于维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情绪”，“举行宗教仪式，往往伴随着违反劳动纪律和国家秩序，损害国民经济，摧残人的精神”。60年代初，苏共提出了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计划，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宗教自然是没有地位的，从而更使宗教问题的矛盾尖锐起来。1963年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列·弗·伊利切夫在中央全会上做的《党的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任务》报告中说：“宗教是国内科学世界观的主要敌人，还有相当的居民阶层没有从这种残余中解放出来”。于是又对教会和教徒采取了行政命令手段，企图一举“消灭”宗教。在这一时期东正教会教堂数量锐减，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最为突出。就俄罗斯的情况来看，据统计，那里的东正教教堂数到1962年已由革命前的78767个下降到11500个，神职人员由3万人减少为1.3万人。在宗教问题上推行

的这些“左”的政策和措施，产生了消极后果；严重影响了党与信教群众的关系，加剧了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主义，使不少狂热宗教派别和组织转入地下，有的甚至与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其后以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为首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起的保卫人权运动，就有不少教会人士参加。

1975年赫尔辛基欧安会协议签署前，面对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和国内现实，苏联党和政府及舆论界也逐步意识到政教关系不仅影响国内政策，而且影响到对外政策，因此在基本的宗教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做了一些调整，稍稍有所放松。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对1929年的宗教法规进一步作了修改，取消了一些限制。刑法也相应作了修改。1976—1977年各加盟共和国参照俄罗斯联邦的法律也修改了自己的有关宗教法规。1977年苏联通过的宪法在第52条中增加了“保障苏联公民有信仰自由”的内容，同时还扩大了1964年成立的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权力(原有两个机构撤销)。对教会和教徒的政治压力有所减轻，宗教团体数量下降的速度开始缓慢起来(但依然在下降，据统计1966年全苏有宗教团体17507个，1976年下降为15687个，1985年下降为12438个)。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各教会同国家的关系基本上是正常的。它们支持政府的内外政策，积极开展国际友好交往，宣传苏联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时它们也在努力进行自我更新，强调宗教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一致性，还为和平基金、儿童基金做奉献，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受害者捐献3000万卢布等。

这几十年的时间中，苏联政教关系虽然有改善，但这方面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安定因素。这些不安定因素除国外宗教影响外，从根本上说还是长期“左”的政策造成的。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否定教会组织的法人地位；2.大批关闭教堂和宗教院校，使教徒不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3.大规模进行伤害教徒宗教感情的反宗教宣传；4.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肃反扩大化过程中也镇压和惩治了许多无辜的神职人员，战后对原敌占区宗

教组织和教会人士不加区别地镇压与迫害，强迫一些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少数民族迁徙它方；5.强制东仪天主教改宗东正教；6.对有些教派如五旬节派、耶和华派和依然信奉东仪天主教的教派不准登记注册；7.对民族地区的教派不平等，政治上不信任等等。凡此种种，都对政教关系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严重损害了苏联党和政府在信教群众中的威信，造成了深刻、复杂的矛盾。

总起来看，从1917年到1987年的70年中，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处理宗教问题的实践是有得有失。这70年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革命斗争和法制将沙俄时代为剥削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改造为与苏维埃国家合作、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相适应的宗教，这个阶段在20年代末基本完成。在这个阶段，苏联党和政府改造了与沙俄帝国紧密结合在一起、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和思想势力的国教——俄罗斯东正教以及其它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宗教。个别地方虽有过火行为，但总体上还是贯彻了列宁提出的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原则。因此取得了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和信赖，这对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赢得国内战争是有帮助的。改造旧时代宗教所取得的成绩为后来政教合作和建设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国家和教会正常相处的阶段。这一阶段中有成功的一面，特别是在卫国战争时期，政教关系是好的，教会发挥了保卫祖国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和错误，而这些矛盾由于长期积累，得不到正确解决，致使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总暴发，形成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在革命初期尚属没有经验，后来则是“左”的指导思想。归根到底是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宗教赖以存在的土壤，一味强调宗教是旧社会的“残余”，一味强调削弱宗教，有时甚至把反对宗教偏见的斗争放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它历史地产生，也将历史地消亡，受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人为地“消灭”宗教完

全是一种空想，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① 马克思又指出：“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② 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因而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这也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① 马克思，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1—592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6—97页。

三、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及苏联政教关系的根本变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在宗教问题上，开始他并无大的动作。1985年4月、10月两次中央全会和1986年苏共27大新修订的《苏共纲领》提出无神论宣传应当波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谴责利用宗教危害社会和个人利益的企图"。但这种宣传和批判做法上较前有所缓和。上述文件号召："绝对遵守对信仰自由的宪法保证"，"要改进无神论宣传的方式方法"，"不许侮辱教徒的感情"，要求深化无神论者和教徒之间的对话，贯彻使所有教会能够在法律范围内自由活动的路线，为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做出自己的贡献"。以后随着苏联社会的变动和历史上冤案平反活动的展开及教会的要求，也平反了宗教界的冤案并且陆续开放了相当数量的寺院教堂。

戈尔巴乔夫在宗教问题上的大变化是在他的"新思维"形成之后。1987年11月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新思维"的核心思想是"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新思维"要求人们以这一思想来衡量、审查苏联历史上的一切。依照这一思想，戈尔巴乔夫在宗教方面做了三件事：一是接见俄罗斯东正教会牧首和主教公会成员；二是大力支持东正教传俄一千周年庆祝活动；三是制定新的联盟宗教法。

（一）1988年4月29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和主教公会6名成员长达90分钟①，这是苏联政教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的信号。戈尔巴乔夫在接见时讲的主要思想是要教会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作用。具体有以下几点：1.承认苏联政府过去在宗教问题上犯了错误，现正在改正；2.充

① 见苏联1988年4月30日《真理报》。

分肯定俄罗斯东正教在历史上和在苏联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表示全力支持东正教传俄一千周年的庆祝活动；3.改革、民主化和公开性也包括教徒在内，不受任何限制；4.在全人类道德规范基础上进行广泛对话，以全面更新苏联社会；5.正在制订新的信仰自由法，它将反映宗教团体的利益。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在苏联报刊上得到大力宣传，并引起对过去的宗教政策和无神论宣传的全面围攻与批判，全盘否定七十年来的宗教政策和无神论宣传的声势迅猛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

（二）大力支持东正教传入俄罗斯一千周年的庆祝活动。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不但支持了这一活动，而且力求扩大影响，将它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活动。1987年10月，根据苏联政府的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将这一纪念日作为欧洲和世界历史文化的重大事件进行庆祝。戈尔巴乔夫对牧首的接见，苏联报刊、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介对庆祝工作的充分报道，为庆祝活动增加了色彩，形成了更为浓厚、隆重的气氛和声势。纪念活动的中心议程是召开俄罗斯东正教宗教会议。参加者来自国内的代表270多人，来自89个国家211个代表团的450余人。会议的各项报告和其它活动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从赞扬东正教过去一千年的作用转而论证怎样使其在今天发挥这样的作用；二是报告和发言的内容都集中在教会在当代社会中的责任和如何开展活动的问题上。涉及的问题主要有：1.宣称俄罗斯接受东正教是命中注定的，把“罗斯受洗”说成是斯拉夫民族形成的决定因素，称东正教为一切基础的基础；2.称东正教在一千年历史中始终充当着俄罗斯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充当着民族与国家团结合作的基本因素；3.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4.强调教会一贯与社会不公正现象做斗争，并认为有义务以该教信念为基础对社会加以改造。

（三）制定新的联盟宗教法律。1990年10月苏联颁布了《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这项新的法律与过去的法律和政策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可以说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对待宗教问题的重大转折。

该法体现的主要变化是：1.明确规定了宗教团体的法人地位，该法"宗教组织——法人"条规定"宗教组织自其章程（或条例）登记在册之时即被确认为法人"。这不仅与1918年和1929年法律相反，与1975年的法律也不相同，规定只要具备上述条件就是法人，不受其它条件限制。这样各宗教和教会从此结束了不具法人地位的历史，不仅在一般社会交往中有了自主地位，而且可以独立地举办各种事业。2.结束了剥夺教牧人员可选为苏维埃代表权利的历史。该法规定"宗教组织之工作人员与所有公民一样，有权参加政治生活"。3.新法规定教会可拥有财产，改变了过去历次法律都规定教会财产属于国家的提法。规定"宗教组织可拥有建筑物、崇拜用品、用于生产、社会和慈善事业之设施、货币资金"等财产，也可以"拥有国外产业"。不仅如此，宗教组织还可以进行经济活动与举办宗教事业活动，"有权建立出版、印刷、生产、修缮、农业与其它企业以及具有法人之慈善机构"。4.传教活动过去局限于宗教场所内，新法则完全打破了这个限制。规定公民有权传播宗教观念，父母有权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宗教组织有权利用其建筑物举办儿童与成人之宗教教育学校，有权出口、进口与传播宗教书刊与材料，有权利用群众性新闻手段等等。此外，除教堂外，举行礼拜与宗教仪式的场所也大大放开。5.在新法中还有三条引人注目，一是将宗教活动与无神论宣传等量齐观，规定"国家不资助宗教组织的活动和无神论宣传的活动"。二是取消苏联部长会议宗教事务委员会，把苏联国家宗教事务机关变成"信息与评审中心"，而评审委员会由"宗教学家、宗教组织的代表和人权问题专家组成"。三是部队官兵可参加宗教仪式，教士可到监狱感化犯人。

改变苏联长期"左"的宗教政策，改善共产党、政府与教会的关系，团结广大教牧人员和教徒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有益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无疑是苏联必须迫切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戈尔巴乔夫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歪曲了列宁

的国家与教会分离的原则，变为从根本上放弃对教会的引导和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在实际上听凭教会不受任何限制地自由活动，在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因过去反宗教宣传的错误而放弃宣传科学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神论的宣传，听凭教会对宗教的宣传。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这样做，是由其"新思维"决定的，也是由于他企图以此争取教会支持他推行的所谓改革，同时这也是他屈从于西方压力的一种表现。因为美国国会针对俄罗斯东正教传入一千周年的庆祝活动曾通过决议，谴责苏联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违背人权，要求它不得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不得迫害宗教。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作法得到了大多数教会对他的政治改革的支持，但教会并不以此为满足，要求更进一步。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就要求在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在军队中派随军神父，由于没得到解决而不满，此其一。第二，更重要的是随着对过去在宗教问题上的错误的揭露和对无神论宣传的批判，反对共产党的思想在教会中有了明显的滋长。第三是原来与政府对立的宗教势力更利用这一条件活动起来，他们中有的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相结合，挑起事端，使政教关系进一步复杂化。

四、戈尔巴乔夫宗教政策的危害和后果

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导致苏联宗教势力迅速膨胀，成为国内外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瓦解苏共、破坏社会主义的一种力量。

（一）宗教和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迅速扩大，并逐渐成为独立的社会势力。具体表现是：

1. 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场所成倍增加。1985年初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夕，苏联宗教团体共有12438个，其中俄罗斯东正教会6806个，格鲁吉亚东正教会51个，罗马天主教会1068个，路德教会580个，亚美尼亚使徒教会33个，福音基督徒浸礼会2294个，基督复临

安息日会342个，五旬节会235个，归礼仪派337个，归正会86个，卫理公会15个，伊斯兰教392个，犹太教91个，佛教2个，此外还有莫洛勘教会和门诺教会等。而到1991年宗教团体总数已达21284个，其中俄罗斯东正教会10267个，格鲁吉亚东正教会297个，罗马天主教会1465个，亚美尼亚使徒教会62个，路德教会657个，福音基督徒浸礼会2249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501个，归礼仪派379个，归正会97个，卫理公会18个，五旬节会704个，伊斯兰教1602个，犹太教114个，佛教16个，东仪天主教会1912个，独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811个，此外还有上述其它教会。这一时期还有救世军等一些教会重新传入。宗教院校由1986年的16所增加到1991年的52所，在校生由2511人增加到4565人。

2. 普遍建立教会慈善事业机构，并且发展迅速。在这方面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及其它各教都很积极，主要的活动对象是医院病人、家庭老人、残疾儿童以及外籍劳工组织，对这些人和组织"施善"。有些教会组织甚至接管了地方医院。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专门成立了教会慈善事业和社会服务处。

3. 教牧人员和教会知名人士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自1988年4月以来他们就强烈要求参加竞选活动。1989年春的选举中有7名宗教领袖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东正教4人，伊斯兰教、犹太教、浸礼会各1人)。1990年3月的选举中大约有283名教士当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其中东正教192人，伊斯兰教55人，佛教5人，五旬节派和路德派各12人，浸礼派5人，东仪天主教4人，卫理派2人，亚美尼亚教会1人)，有的还参加了宗教法的制定和讨论。有的已进入领导岗位，如东正教神父波格辛1990年7月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信仰自由、宗教信仰、慈善慈悲常设委员会"主席。

4. 大力开展传教活动，教徒参加宗教活动热情高涨，宗教影响进一步扩大。首先是大量进口和印刷宗教经典和传教读物。1988年西方宗教组织向苏联提供了100万册《圣经》，以后又有所增加。

沙特阿拉伯也为苏联穆斯林提供了100万册《古兰经》。国内有的出版社也以俄文或其它文字出版宗教经典和宗教书籍，还专门为青少年出版了《儿童圣经》，公开宣传宗教。其次是加强宗教教育，大量增加宗教院校和开办"主日学校"，教牧人员还到世俗学校宣讲神学课。主日学校首先在维尔纽斯开办，后来，迅速发展到全苏各地。这是一些教堂开办的非正规学校，吸收各种年龄的信徒参加。按一位神父的话说，它主要不是传授神学知识，而是培养信仰和加深信仰。到世俗学校进行宗教教育是违反宗教法的，但国家对此事早已不加过问。在社会动荡的形势下，在一片宗教宣传声中，鼓起了教徒的宗教热情。许多教堂在举行宗教活动时，教堂内外挤满了人群。在普通群众中宗教也成了热门话题，宗教书刊一出版就抢购一空。在不少共和国中，政府也多方抬高教会的地位。如俄罗斯总统于1991年中举行就职仪式时，就安排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二世首先上台致词祝贺。教会和宗教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广大人民群众，据民意测验（《莫斯科新闻》1990年第21期发表的抽样调查报告），对宗教组织的信任率1989年3月为13%，8月为22%，1990年1月上升为35%；1990年6月对东正教会信任率为63%，而同期对共产党的信任率却由38%下降到18%。

苏联宗教力量的复活和发展，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危机加剧，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嚣张，各种党派林立，社会动荡不安，共产党日益丧失领导权的过程中出现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宗教和教会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关系不可能是正常的，它们力图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势力。这一点俄罗斯东正教会表现得特别明显。该教最高领导机构主教公会常务成员、对外联络部主任基里尔都主教公开宣称：牧首主张，东正教会要全力发展自身力量，成为有重大影响的独立自主的社会势力；不是其它政治派别控制宗教，而是逐渐强大的宗教势力影响社会的进程。1989年10月东正教召开主教会议，制定宗教集权方针，认为"加强中央集权就会有强大

的教会"。根据会议通过的一项决议，教牧人员非经教会首脑同意，不能参加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人民代表的选举。教会还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教会的关系，说不应局限于"表面的、实用的水平"，更不应带有粉饰的性质，应在了解教会、教徒作用和意义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和心理角度改变过去的观点；教会与国家对话应是平等的伙伴间的对话。与此同时，对苏联过去的宗教政策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与谴责。当东正教内反对派攻击教会上层过去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合作立场时，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一再表白，说那是为了保护教会和教徒的利益，不得已而为之，称"在受刑的过程中我们早已学会了为刽子手进行祈祷"。①

（二）许多教会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符合教会的利益，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为苏联的剧变推波助澜。

在苏联剧变的过程中，宗教势力活动的表现形式与波兰等国不同，就其大多数宗教和教会来说，不表现为与政府的对立，而是表现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因为在宗教界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符合教会的利益。他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可以使宗教一步步放开手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天地。已故牧首皮缅谈到戈的改革时，曾向戈尔巴乔夫声明："我们对这有益进程全力予以支持"。在建立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的问题上，多数教会也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主张。1991年3月中旬，俄罗斯东正教、伊斯兰教、新教、犹太教和佛教等十一宗教团体代表组成的"倡议小组"曾经发表声明，希望保持联盟。不过该项声明也明确提出要抗拒"希望保持过去政治体制"的势力，认为"在革命后的时期里，我们所遵循的那些政治和思想手段已经耗尽，不可能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应有的历史前景"。显然他们所希望保持的联盟国家，已不再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苏联1991年的"8·19"事件问题上，教会明确站在支持戈

① 见1990年11月28日《文学报》。

尔巴乔夫一边。据《华盛顿邮报》、《善导》周刊和《天美社》等报导，事件当天俄罗斯牧首阿列克西二世两次发表声明，"要求信徒们手持圣像去示威"，"让戈尔巴乔夫总统出来讲话"。当时，苏联东正教的神父和罗马天主教的神父，曾联合起来，到苏联议会前示威抗议。天主教还为俄罗斯总统及其拥护者提供了向国内外发布消息的电台。（事后，莫斯科的罗马天主教会称"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天主教电台竟然在俄罗斯议会的顶层做起广播来"。）8月24日，俄罗斯东正教发表告全国东正教会教牧人员和教友书，声明称："我们坚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永远不是俄罗斯国家的意识形态，它企图用暴力把自己强加给人民，但人民已非暴力地把它唾弃了"。

（三）出现了一批宗教政党，成为促使苏联发生剧变的一支力量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特别是1990年2月确定实行多党制以后，在苏联出现了几个宗教政党。宗教政党的出现，还与教会成员构成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戈氏执政期间，一部分知识阶层的人士转向了宗教，他们希图到教会中去寻找"全人类的精神价值"。这部分人不同于旧式教徒，不只是满足于一般的宗教宣传和参加教堂仪式，而是着力于引导教会参与社会生活，力图以宗教思想改造社会，或者说借教会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利用宗教作为联系民众的纽带。这部分人是宗教政党的社会基础。此外还有一部分过去被关押判刑后来又被平反的教牧人员，也是宗教政党的积极组织者。宗教政党不同于教会，教会主要从事传教活动，而宗教政党，从根本上说是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这些宗教政党大多数批评教会与政府合作，有的甚至攻击教会依附国家。

据不完全的材料，苏联新成立的宗教政党主要有：教会与改革运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人民东正教运动、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拉脱维亚基督教使团、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统一运动、基督教企业主协会等。其主

要情况如下：

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　该党于1987年组建，它包括几个青年组织和一个出版社。由三人杜马领导，其成员分布于俄罗斯、乌克兰等共和国上百个城市，据称有1.7万人。主要为文化界人士、宗教界人士和教徒，其骨干队伍中有15名人民代表。该党建党之初就公开声明，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主张以文明复国为基础，加强人民的团结和统一。而实现统一的途径在于恢复传统的根——基督教。

人民东正教运动　1990年3月组建。下属有5个党。运动的主旨是以俄罗斯民族和宗教的传统复兴俄罗斯。如5党之一的东正教民族爱国阵线颂扬帝王制度和暴力政权，幻想铁腕人物，要求"帝王与人民的统一"。声称要粉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它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运动一概持敌视态度。5党之二的基督教爱国联盟，提出的座右铭是"东正教"、"爱国主义"、"公众性"。其解释是"要信仰，不要意识形态；要宗教精神，不要政治；要公众性，不要民主；要统一强大的国家，不要共和国联盟(即要恢复沙俄时的国家状况——笔者注)。第三个党叫拥护民族比例代表制联盟，它声称该党的任务在于唤醒俄罗斯的民族意识，把祖国从撒旦的占领中解放出来。

俄罗斯东正教君主立宪党　1990年成立。在同年5月19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诞辰日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员大多是莫斯科大学和历史档案学院的学生。该党声明，"反对共产党，反对改革"，与国家的无神论政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不懈的斗争，要求军队忠诚于君主和国家，保护东正教国家，宣称以非暴力手段恢复旧制度。

伊斯兰复兴党　1990年成立。主要成员系中亚和北高加索的穆斯林，领导人是瓦里阿赫穆德·萨杜尔。该党鼓吹保守信条，要在伊斯兰教被驱逐出来的地区恢复活动"，决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神权的统治地位"。

教会与改革运动　1989年成立。成员主要来自知识分子中的东正教徒，其中数十人是该教各教区神父。该党为首者格·雅库宁神父1976年曾因组织“保卫教徒权利基督教委员会”被捕，1987年获特赦，1990年被选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该党反对东正教依附于国家，其纲领和主张多是宗教性的，称自己是“俄罗斯东正教的社会性宗教运动，它在苏联宪法允许范围内活动”。其方针和活动除收集和印发有关受迫害致死的教徒材料政治性较强外，多为归还教堂、传教及办慈善事业等等，同时该党还提出“运动成员不能容忍分裂民族、教会和社会的宣传”，并要求为民族、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团结而努力。

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联盟　成立于1986年。是基督教三大派（东正教、天主教、新教）教徒联合组织。出版《基督教民主通报》、《宗教会议》（莫斯科）和《复活》（列宁格勒）。该党主席是奥戈罗德尼科夫，他1978—1987年被监禁，1987年平反。该党纲领说：“联盟是政治性组织，根据基督之训诫建立民主的公正社会”。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苏联各宗教政党的情况和主张虽然不尽相同，有的依然侧重于开展宗教活动，但多数有政治纲领并主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有的要求民族独立，实现神权政体，有的则主张回到沙俄时代。它们有个共同点，即反共和反社会主义。这些政党虽然多数还刚刚建立，势力不是很大，还没有在社会中占居重要地位，但已成为促使苏联发生剧变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四）俄罗斯民族以外地区的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苏联解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基本上是由一个主体民族组成的，而相同的民族又往往信奉同一种宗教，因此，宗教问题有时很容易导致成为民族问题，而民族问题往往又带有宗教色彩或兼有宗教因素。一定意义上说，苏联解体的过程，既是民族分立的过程，又是宗教复兴与聚集的过程。

前面我们谈到，苏联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和某些加盟共和国的大民族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表现，使得这种矛盾更加复杂和加深。大俄罗斯主义在宗教上的表现突出反映在苏联政府对待俄罗斯东正教和其它宗教的不平等态度上。这种状况直到新宗教法公布依然无大变化。如对东正教传入俄国一千周年及该教的外事活动大量报导，而对伊斯兰教、天主教传入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活动，新闻媒介则无声无息。伊斯兰教中心主任、莫斯科大清真寺伊玛目拉维·盖努特丁在1991年12月回答《真理报》问题时曾尖锐批评道："在这个国家里，至今仍在奉行沙皇帝国的意识形态，即只有东正教才是特殊的宗教，即国教"。

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乌克兰以及高加索、中亚地区的宗教问题也很突出，并且都与民族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一卡地区的矛盾主要是民族矛盾，但也与宗教问题有关。因为现属于阿塞拜疆的纳一卡地区，人们信仰接近东正教的格列高利教会，与亚美尼亚信仰相同，而阿塞拜疆信仰伊斯兰教，两教长期不和。鞑靼人和车臣一印古什地区的矛盾主要因为民族迫害被迁徙引起，但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受到歧视也是一个原因。

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在脱离苏联而独立的过程中，教会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三个国家有天主教（立陶宛在二次大战前80％的人信奉该教）和新教路德宗（爱沙尼亚1935年78％的人信奉该教；拉脱维亚有56％的人信奉该教，另有25％的人信奉天主教），其中天主教最为活跃。苏联政府于1945—1946年在立陶宛实行脱离罗马教廷的独立天主教计划，要求神父在效忠政府的宣誓书上签字，遭到多数人的拒绝，结果多数神父被关进监狱、送去劳改，5位主教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关进监狱，一位被枪决，只有一位留任，使教会转入地下。该教会的地下活动名目繁多，除了传教、办地下修道院外，还办了《天主与祖国》等许多地下刊物，经常向当地宗教、文化部门、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皇发出呼吁和声明。70年代

立陶宛的政教关系也相当紧张，1972年和1976年曾有两名天主教青年自焚，死前高呼“为了自由，为了天主”。举行葬礼时造成民族暴动，数千名青年袭击共产党党部和行政机关，升起原立陶宛国旗。军队去镇压，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从此矛盾更加公开化。自波兰籍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上台以来，更加鼓舞了立陶宛的天主教，因为立陶宛天主教神父中许多人属波兰血统，有的人还与约翰保罗二世素来相识，因此他们的活动更加大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为着从苏联分离出来，1989年8月23日在人民阵线策动下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横跨三国长达300多公里的“波罗的海之路”的人链活动，向苏联政府示威，要求恢复独立。三国的天主教会和新教都是积极参与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则从外面予以鼓动和支持。早在1979年5月他就说：“立陶宛教会有些像波兰教会，它在对抗，并且给我们做了榜样”。1990年三国相继宣布独立后，苏联政府立即采取了若干行动，形势异常紧张。此时教皇在三周内两次发表声明，并写信给立陶宛天主教会，称“在此震撼人心和充满希望的时刻，我的心与立陶宛教会贴得特别近。跨越了几个世纪和更换几代人之后，立陶宛教会仍然未改变它的初衷……”，等等。

在乌克兰从苏联分离的过程中，宗教同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该国主要有东正教和东仪天主教。其东正教隶属于俄罗斯莫斯科牧首公署。两者矛盾很深，乌克兰教会早就开始了争取摆脱莫斯科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乌克兰独立中得到了政府和“鲁赫运动”的支持，他们多次给莫斯科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西二世写信，要求给乌克兰东正教会独立）并于1990年10月争得了独立。这一斗争为乌克兰摆脱苏联也带来了相应的影响。但对乌克兰独立影响更大的是东仪天主教会。该教会主要分布在乌克兰西部，1946年有400万教徒，自苏联政府将它强行并入俄罗斯东正教后，绝大多数转入地下，遭到残酷的镇压。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该教会十分活跃，到1990年已有教堂1737座。自1988年以来它们就要求给以合法地

位，要求东正教归还40多年前没收的财产。为此一些信徒举行游行、集会，从西部到东部、南部进行宣传，争取其它教区的声援。1989年9月17日乌克兰西部10多万人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示威，要求承认被取缔的天主教会，而这一天恰恰是该地区并入苏联的日子，游行队伍是在原乌克兰兰黄旗帜之下行进的。11月26日又举行了15万人的游行，游行者手举约翰保罗二世画像，要求给该教会以合法地位。1991年3月31日，乌克兰天主教会领袖76岁的枢机主教卢巴切夫斯基结束了52年流亡生活返国，受到成千上万人的夹道欢迎，成为轰动一时的事情。不少人认为乌克兰东仪天主教会的复兴与乌克兰独立运动是携手并进的。

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由于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比较大，所以中亚几个共和国在开始时并不愿意从苏联分裂出去，不论是对主权共和国联盟还是对独联体，它们大多持积极参加的态度。但是那里有的穆斯林派别，主要是原教旨主义派别却在积极活动，另有所图。在1989年2月费尔干纳事件期间，曾喊出“伊斯兰万岁”，“穆斯林的旗帜万岁”，“霍梅尼万岁”等口号。半年之后，1990年2月，杜尚别市伊斯兰教的态度更为强硬，伊斯兰教头面人物参加了公开的活动，出现了绿色旗帜和主张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标语。虽然在苏联解体前这一地区该派势力还比较小，还没有构成整个地区闹分立的严重威胁，但它正像苏联伊斯兰教学家分析的，这毕竟是“一种思想，一面旗帜”①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到号召的作用。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复兴党在其周边伊斯兰教国家影响下一直在活动，它将在国家中起怎样的作用，其影响是否会波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已引起国际上的密切注视。

五、几点考虑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中，苏联政教关系的转折，宗教状况

① 见1991年11月28日，《消息报》。

的变化及其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提供了不少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政教关系怎样，宗教在怎样的方向上起作用，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路线和力量，在于是否有正确的宗教政策。

我们在以上几节中叙述和分析了苏联的宗教在苏联历史上不同时期所起的不同作用，也叙述和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宗教所发生的变化和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作用。为什么苏联宗教在苏联人民反抗希特勒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时期能起维护社会主义苏联的作用，而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年代却又对苏联的剧变和解体起了促进作用呢？这里的关键在于苏联执政党——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十月革命胜利之初，作为国教的俄罗斯东正教和其它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上层是站在反革命一边的，是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的，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但是经过一定的斗争，状况很快发生了改变，教会走上了与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出现了教会与国家合作甚至是协调的局面。这里最根本的一条是共产党手中握有政权，有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路线和措施，团结了人民群众，在宗教问题上一方面坚决打击了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同时又坚决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了广大教牧人员和教徒群众。在其后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有各种错误和失误，宗教问题上“左”的错误更是长期存在，对此信教群众日益不满，教牧人员更是怨声载道。但是由于共产党掌握着强大的政权，这些矛盾始终被压制着和潜伏着，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激化，局势总体上还是平稳的。当然这些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需要及时解决的，否则长期积累起来，总有一天会爆发。因此苏共作为执政党必须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认真修正工作中错误，以改善政教关系，巩固与加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可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不是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去改正苏共过去的错误，而是一味放宽宗

教政策，不加区别和分析地揭露苏联历史上"左"的宗教政策的错误。结果不是使教会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而是使政教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关系日趋紧张。这时各教的政治态度多数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部分支持政府，支持戈尔巴乔夫却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一部分则不与政府合作，自己另搞一套。后来国家虽然颁布了新的宗教法，但实际上等于放弃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让教会自行其是。这样就使宗教和教会摆脱了共产党的领导，并实际上也摆脱了国家的控制。由此可见，没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没有一个正确路线的党，没有一个牢牢掌握国家政权和实行正确宗教政策的党，就不可能使宗教发挥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作用。

（二）苏联宗教政策的右转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产物，也是苏联过去长期实行"左"的宗教政策的恶果。苏联近年的宗教政策不是一般地纠正过去"左"的错误，而是急剧地右转。戈尔巴乔夫所以这样做与宗教势力的斗争有关，与想争取教会支持他的改革也有密切的联系，而更关键的是他的"新思维"，他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很容易去美化宗教，过份夸大教会在"全面更新苏联社会"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的宗教政策之所以会被社会所接受，这同苏联过去长时间中在宗教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是有关系的。自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以后，除个别时期外，苏联宗教政策上"左"的倾向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在革命胜利之初，由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没有经验，有些规定就未必适宜，如规定教会没有法人地位、不允许教会有任何财产，不允许从事慈善活动等。而后来又规定教牧人员不得参与国事，不得被选为苏维埃代表，30年代肃反扩大化对教牧人员的镇压与惩治，大批关闭教堂、宗教院校、强制合并东仪天主教、迁徙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等等，以至人为地消弱乃至"消灭"宗教，这不仅伤害了教牧人员，也脱离了广大教徒群众，就是在不信教的人中也难于得到内心的赞许。人们

的积怨始终被潜伏下来，一旦有了机会就会倾泻而出，甚至会形成一股难于控制的力量，以至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宗教政策之所以会制定出来和被普遍实行，正是这两股力量结合的结果。苏联在宗教问题上的教训表明，右会带来恶果，“左”也同样会带来恶果，而且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政策就是时刻注意警惕两种倾向；发现倾向性错误要及时改正，以免引起无穷后患；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时，头脑要清醒，切莫被另一种极端所左右。

（三）苏联剧变的教训也告诉人们，在宗教问题上同样不能搞大民族主义，必须平等地对待各种宗教和教会。苏联是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宗教与民族又有着紧密的联系。苏联人口中俄罗斯族是第一大民族，占人口的一半，俄罗斯东正教是第一大宗教，而且在历史上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其它宗教在沙俄时虽被允许存在，但处于不平等地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废除了俄罗斯东正教的国教地位，法律规定各宗教一律平等，没有特权宗教。但由于十月革命后依然存在着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在宗教问题上也有所表现。在宗教政策上虽然长期犯有“左”的错误，这对各教都是一样的，但对东正教以外的宗教则更为严厉。而对这些宗教的不平等待遇和错误处置，引起了教种之间的尖锐矛盾。因为这些宗教与民族又结合在一起，所以就不只是政教关系的矛盾，而是又引起民族矛盾，或者说是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因素。而苏联许多民族又与各加盟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所以也是引起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与全苏矛盾的一个因素。因此在处理各教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一律平等，对于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处理上更应谨慎，应从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大局出发，切忌宗教工作中的大民族主义。

（四）要汲取苏联无神论宣传的教训，解决好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宣传教育之间的关系。苏联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无神论

宣传，除卫国战争和斯大林逝世前停止外，直到1987年，一直讲要和宗教作斗争，开展无神论宣传。苏联的无神论宣传不能说毫无效果，70多年来信教人数较之十月革命前明显减少，除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外，不能说没有无神论宣传的作用。但是苏联的无神论宣传值得总结的教训是太多了。苏联无神论宣传常常是和反宗教宣传联系在一起，而且这种反宗教宣传有时又直接和反宗教斗争联系在一起（20年代末和赫鲁晓夫时期都发生过这类情况），这种宣传无论从方式方法还是从内容上都直接伤害教徒的思想感情，失去了一大批群众。但宗教政策一放松，又停止了无神论宣传者组织和有关无神论的刊物。如卫国战争开始以后至53年情况就是这样。而1990年苏联的宗教法则又换了一副面孔，规定既不资助宗教活动也不资助无神论宣传，把无神论宣传同国家分离开来，表现了对宗教和无神论的超然态度。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始终没有解决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进行无神论宣传的关系问题。要么扣紧宗教政策，大搞反宗教的无神论宣传；要么放松宗教政策，停止无神论宣传；要么将宗教活动和无神论宣传等同对待。问题在那里呢？从根本上说就在于没有解决好两者的关系，或者是将两者对立起来，或者是把无神论和宗教等量齐观，认为无神论宣传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任务。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看来，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教牧人员和广大教徒群众和教育人民群众树立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双重任务。宣传这一世界观是它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这一世界观能使人开扩眼界，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团结一切人民为美好社会而斗争又是它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而不是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搞非此即彼。毫无疑问，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和宗教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但对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条根本原则，这就是要使这种对立服从于整个人民群众（包括宗教信仰者）的根本利益，使之居于次要地位。因此我们在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同时是可以也是

应该进行科学世界观（包括无神论）宣传的，但这种宣传不能简单化，短期化，而应是长期的、持续不断的且又是实事求是的。

（撰稿者　于本源　郑天星）

（责任编委　于本源）

附录

苏联历史大事年表

列宁时期

（1917年10月—1924年）

1917年

10月24日　彼得格勒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武装起义开始。列宁到斯莫尔尼宫领导武装起义。

10月25日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苏维埃政权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告俄国公民书》。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649名，其中布尔什维克390名，社会革命党160名，孟什维克72名，其他政党27名。

10月26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

10月27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上产生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加米涅夫为首任主席；组成了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任首届人民委员会主席。

11月2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内部形成的反对派硬说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能成功；他们完全丧失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本立场，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11月4日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米柳亭声明退出

中央委员会；诺根、李可夫、施略普尼柯夫等人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

11月8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通过决议，撤销加米涅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任命斯维尔德洛夫为该委员会主席。

11月10日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举行。

11月中旬　苏维埃政权接管国家银行。

11月底　苏维埃政权开始把资本主义大企业收归国有。

12月2日　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12月4日　苏维埃政府承认乌克兰独立。

12月7日　人民委员会决定建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任命捷尔任斯基为主席。

12月11日　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1918年

1月3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1月13日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合并为统一的全俄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布俄国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

1月15日　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

1月20日　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分离》的法令。

1月26日　颁布关于苏维埃俄国自1918年2月1日起实行新历（采用公历）的法令。

1月27日　在布列斯特谈判中德方提出最后通牒。

2月18日　托洛茨基拒绝德方最后通牒，德军在德俄战线上发动全线进攻。

2月23日　党中央会议经过激烈斗争之后通过列宁建议，接受德国的最后通牒。

3月3日　布列斯特和约签字。俄国退出第1次世界大战。

3月6—8日　俄共（布）第7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召开。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第1次代表大会。列宁作了政治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围绕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认为，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在俄国保持住无产阶级专政和十月革命的成果，而要促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需要同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因此，国际革命的利益不允许苏维埃国家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上述观点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批驳。大会通过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大会决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3月10日　苏维埃俄国首都从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

3月14日　全俄苏维埃第4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批准布列斯特和约。

4月30日　土耳其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

5月26日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召开第1次代表大会。

6月24日　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公开作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决定。

7月14日　全俄苏维埃第5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9月2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10月29日　全俄共青团第1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11月6日　全俄苏维埃第6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对苏维埃政权建立一年来的工作作了总结。

11月11日　德国投降，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

11月13日　苏维埃俄国宣布废除布列斯特条约。

11月29日　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

11月30日　成立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它拥有"动员国家的人力和资源用于国防的全部权力"。

11月底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

12月16日　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12月17日　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同日　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成立。

1919年

1月1日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1月16日　俄共(布)中央设立组织局。

1月21日　颁布"关于粮食产品采购"的命令。

3月2日　共产国际第1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批准共产国际的纲领，发表了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

3月16日　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加里宁继任主席职务。

3月18—23日　俄共（布）第8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俄共(布)党纲、军事问题、农村工作问题和组织问题的决议。大会确定了由中立中农转变团结中农的政策。大会还通过了党员重新登记的决议。

4月12日　《真理报》发表列宁《俄共(布)中央关于东方战线局势的提纲》。

6月1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联合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各苏维埃共和国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法令。

7月3日　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决定改组红军总司令部和南线司令部。

7月9日　俄共(布)中央发表致全体党员和全国劳动人民公开信——《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

9月26日　党中央宣布举行“征收党员周”。中部地区约10万人入党。红军部队约7万人入党。

12月2日—4日　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列宁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新党章。

12月5日　全俄苏维埃第7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苏维埃建设问题的决议。

1920年

1月初　红军解放察里津。

1月16日　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决定解除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封锁，恢复贸易关系。

2月2日　苏维埃俄国同爱沙尼亚签订和平条约。

2月25日　苏维埃政权在格鲁吉亚取得胜利，当地孟什维克政府被推翻。

3月29日—4月5日　俄共(布)第9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讨论了列宁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确定了列宁称之为第2个党纲的俄国电气化计划的基本要点。决定中央书记处为领导机构。

4月1日　工农国防委员会改称劳动国防委员会。

4月6日　远东共和国成立。

4月28日　阿赛拜疆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5月27日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

6月17日　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表对外政策声明，他说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这就是同其他一切政府实行和平共处。

7月12日　苏维埃俄国同立陶宛签署和平条约。

7月19日　共产国际召开第2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列宁起草的加人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

8月1日　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8月11日　苏维埃俄国同拉脱维亚签订和平条约。

8月26日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

9月2日　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成立。

9月22—25日　俄共(布)第9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俄国同波兰缔结和约条件的决议。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并确定由捷尔任斯基等6人组成该委员会。

10月14日　苏俄同芬兰签订和平条约。

11月初　在第5次全俄职工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挑起了关于职工会问题的争论、反对列宁的主张。

11月29日　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12月22日　全俄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报告指出，要把经济战线"作为主要的和基本的"战线提到首位。

12月28日　苏维埃俄国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缔结同盟条约。

1921年

1月16日　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缔结同盟条约。

2月25日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3月8—16日　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历史性决议。从而开始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大会还通过了《论党的统一》和《论我们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

3月21日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

5月21日　苏维埃俄国同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签订同盟条约。

5月26—28日　俄共（布）第10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列宁作了关于粮食税问题和关于工会第4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党

团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所制订的关于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决议草案。

6月22日　共产国际第3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12月19—22日　俄共(布)第11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会议通过了党在恢复经济方面的当前任务、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和关于清党的初步总结等决议。

12月23—28日　全俄苏维埃第9次代表大会。

1922年

1月27日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非常会议，批准列宁为团长的出席热那亚欧洲各国经济会议的苏俄代表团名单。

3月12日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3个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在第比利斯签订联盟条约，决定把3个共和国联合为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3月27—4月2日　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向大会作了关于实行新经济政策第1年情况的总结，提出“党的任务的链条中的主要一环是商业”。大会通过了关于清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中央总书记职务，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首任总书记。

8月初　俄共(布)中央成立由斯大林主持的专门委员会，研究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问题。

8月4—7日　俄共(布)第12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党在合作社中的任务、反苏维埃的党派、党章等问题的决议。

10月6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在莫斯科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实行联合的形式问题的决议。全会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必要联合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时各共和国拥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斯大林时期

(1924—1953年)

1924年

1月14—15日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全会讨论了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关于争论总结和关于国际形势和涉及党代表会议的一些问题。

1月16—18日　俄共(布)第13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国际形势问题和经济政策的当前任务问题，重申党内不容许派别活动的决议。

1月21日　列宁在莫斯科近郊高尔克村逝世。

同日　俄共(布)中央非常全会发表告全党和全体劳动人民书。

1月26日　苏联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召开，决定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出版列宁全集、批准第1部苏联宪法。

2月2日　任命李可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3月31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币制改革、军事、商业和消费合作社，以及关于召开第13次代表大会等问题的决议。

5月23—31日　俄共(布)召开第13次代表大会。会上宣读了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遗嘱。列宁信中强调必须保持党的统一，建立能够防止党分裂的稳固的中央。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不是偶然的，认为托洛茨基“过分自负”和非布尔什维主义，批评布哈林是一个烦琐哲学家。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党的卓越活动家之一，同时也指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后，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他曾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代表大会讨论了列宁的信之后，考虑到斯大林的功绩及其同反党集团进行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主张让斯

大林继续留在总书记的岗位上。

5月31日　苏联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0月12日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

10月14日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

10月27日　土库曼、乌兹别克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1925年

1月17—20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托洛茨基的言论的决议，并决定解除托洛茨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伏龙芝接任。

4月27—29日　俄共(布)第14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关于合作社、关于金属工业和关于革命法制等问题的决议。为了加强党在农村的工作，会议决定增派三千名共产党员到农村去工作。

5月3—20日　苏联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召开。

10月3—10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对外贸易、关于工资、关于工会工作和关于贫农工作的决议。

12月18—31日　全苏联共产党(布)第14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认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取得胜利是党的基本任务。代表大会宣布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标志着苏维埃国家进入了新时期。代表大会谴责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大会批准了新党章。大会决定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1926年

1月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出版。

2月1日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

4月6—9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问题。会议中，索科里尼柯夫和沙宁提出，应该优先发展农业，

过一、二十年后着手发展工业。这些建议被认为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如出一辙。

4月24日 苏与德签订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

7月14—23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监委联席全会揭露了季诺维也夫的派别活动，并撤销了他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10月16日 托洛茨基等6人发表声明，承认错误，表示要解散派别组织。

10月23—26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监委联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一些中央委员的派别活动和违反党纪所造成的党内状况的决定。联席全会解除了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担任的职务。撤销了托洛茨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加米涅夫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10月26—11月3日 联共(布)第15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党的任务、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的决议。

1927年

2月7—12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经济问题。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改选的决议。

4月13—16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召开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问题的决议。

7月29日—8月9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监委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关于经济和关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违反党纪的问题等决议。

11月7日 托—季联盟分子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反苏示威游行。

12月2—19日 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了工业化头两年的总结；制定国民经济第1个五年计划；提出农业集体化的任务，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98人党籍。

1928年

年初　苏联各地出现粮食收购危机。党和苏维埃政权在群众支持下，发起打击富农的运动。

4月6—11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粮食收购和关于采取实际措施消除因沙特事件而暴露的缺点的决议。

6月1日　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召开。

7月4—12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根据整个经济状况而采取的粮食收购政策、关于建立新的国营农场、关于改进培养新专家的决议。

8月1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建立大型国营农场的决定。

8月5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发表声明，指出“非战公约”把苏联排除在外，显然是反苏的工具。

11月16—24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28—1929年国民经济控制数字和关于吸收工人入党和调整党的发展的决议。全会号召全党同党内的主要危险—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1929年

1月20日　《真理报》发表列宁《怎样组织竞赛》一文。

2月9日　由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倡议的《东欧国家非战公约》签字。

4月16—23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全会斥责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撤销了布哈林《真理报》总编辑和托姆斯基工会主席的职务。

4月23—29日　联共(布)第16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

议讨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近期任务，清洗和审查党员等问题。会议否决了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所维护的五年计划最低方案。会议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

5月28日　苏联苏维埃第5次代表大会最后批准第1个五年计划。

6月5日　颁布《关于组织拖拉机站的决定》。

11月10—17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1929—1930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决定派大批工人去农村工作。全会决定把布哈林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12月5日　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1930年

1月5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决议规定，对反革命富农采取镇压手段；大富农和半地主应迁居到国家边远地区；多数富农户要安顿在本地区的边缘，在集体农庄以外拨给他们土地种。

2月1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巩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同富农斗争措施》的决议。

6月26—7月13日　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央政治、组织、检查和监察工作报告。大会宣布右倾分子的观点是与联共（布）党员的党籍不相容的。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社会主义开始全面进攻的大会。

12月17—21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讨论了193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会解除李可夫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由莫洛托夫继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1年

6月11—15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莫斯科市政建设发展》的决议。决定在莫斯科建造地下铁道，重新规划街道和广场。

10月28—31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铁路运输业》和《关于发展苏联商业和改善对工人的供应》的决议。

11月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莫斯科成立。

1932年

1月21日　苏联和芬兰签订互不侵犯与和平解决争端条约。

1月30日—2月4日　联共(布)第17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讨论了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2个五年计划。其基本任务是，最终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成分，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根源，并肃清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在最新技术基础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

8月7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保护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以及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议。

1933年

1月7—12日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审查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报告和党内问题。全会决定把腐化蜕变的反苏维埃分子爱斯蒙特和托尔马切夫开除出党。

3月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呼吁建立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34年

1月15日　车臣—印古什自治州成立。

1月26日—2月10日　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

行。大会讨论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2个五年计划。大会通过了组织问题和全苏联共产党（布）党章的决议。

5月7日 犹太自治州成立。

9月18日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

11月17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正式批准第2个五年计划。

12月1日 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刺。

12月20日 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成立。

1935年

1月17日 因被控与基洛夫被刺案件"有牵连"，苏联法院判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5—10年徒刑。

2月1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建议修改苏联宪法，并补充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等内容。

2月11日 全苏集体农庄突击手第2次代表大会通过《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

7月25日 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8月30日 斯达哈诺夫运动开始。

12月21—25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在工业和运输业中开展斯达哈诺夫运动》和《审查党员与更换党证》的决议。

1936年

3月12日 苏、蒙签订互助议定书。

6月1—4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了苏联宪法草案，并建议召开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进行审核。

10月25日 德、意在柏林签订合作议定书。

11月25日 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11月25日—12月5日　全苏苏维埃第8次非常代表大会审查并通过了新宪法。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他说“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2月5日定为苏联宪法节。

12月5日　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由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

12月8日　设立全联盟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

1937年

1月23日—30日　苏联法庭判处皮达可夫、拉狄克等13人死刑。

2月23日—3月5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问题。全会决定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党的队伍。

4月28日　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3个五年计划》的决议。

6月12日　苏联军事法庭把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7名高级军官判处死刑。

6月23—29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条例》。

8月23日　苏中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2月12日　苏联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

1938年

1月12日　第1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会议选出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苏联政府成员。加里宁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3月13日　布哈林被苏联法庭判处死刑。

3月17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建议召开国际会议商

讨反侵略措施，共同对付纳粹侵略。

3月13日　李可夫被苏联法庭判处死刑。

9月30日　《慕尼黑协定》签字。

11月14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宣传、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决议。

1939年

1月初　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部改组为航空、武器装备、造船和弹药等4个工业部。

3月10—21日　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确定了苏联共产党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任务。大会规定政治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完善苏维埃的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苏维埃国家在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职能。代表大会修改的党章规定，党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直接选举改为中央全会选出，并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和按着它的指令来工作。大会决定全苏联党代表会议有权更换1/5的中央委员。

3月18日　苏建议召开国际会议，由受德国侵略威胁的国家——英、法、波、土、苏等讨论反侵略措施。

6月2日　苏联政府提出苏英法三国条约草案。

8月12日　苏英法在莫斯科举行三国军事谈判。

8月23日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

9月1日　德军入侵波兰，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

同日　最高苏维埃第4次紧急会议通过《普通义务兵役法》。

11月1日　最高苏维埃第5次会议接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加入苏联。

11月30日　苏芬战争开始。

1940年

3月12日　苏芬签订和约。

3月26—28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听取关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关于对芬兰战争结果的报告。

4月8日　苏联政府照会德国政府，必须尊重瑞典中立地位。

6月17—21日　苏军开进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6月28日　比萨拉比亚和北布哥维纳加入苏联。

7月21日　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3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

7月31日　希特勒在贝尔霍夫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了对苏战争计划要点。

8月3—6日　最高苏维埃第7次代表会议通过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3个苏维埃共和国加入苏联的决议。同时通过成立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令。

10月2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建立共和国劳动后备军"的命令。

11月13日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访问柏林、同希特勒会谈。

12月18日　希特勒签署对苏作战的指令。

1941年

2月15—20日　联共（布）第18次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巩固国防和改进对工业和运输业的领导问题。会议把一大批中央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开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

5月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推荐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6月22日　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卫国战争开

始。苏联政府发表告人民书。

6月23日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决定建立苏联武装部队统帅部，任命铁木辛哥为主席。

6月27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动员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军队》的决议。

6月30日　成立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

7月3日　斯大林发表广播讲话，向苏联人民发出紧急动员令。

7月10日　苏联武装部队统帅部改组、由斯大林任主席。

7月19日　斯大林被任命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8月8日　斯大林被任命为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9月29日　在莫斯科举行苏、美、英3国会议。

10月19日　苏联国防委员会宣布莫斯科进入非常戒严状态。

1942年

1月8日　苏军9个方面军发动全面反攻。

2月13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动员有劳动能力的城市居民，在战时参加建设和生产工作”。

7月17日　斯大林格勒会战开始。

8月12日　苏、英首脑在莫斯科会谈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1943年

2月2日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

6月15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宣布共产国际解散。

8月21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从德寇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经济的紧急措施》的决定。

10月19—30日　苏、美、英3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问题和战后维护和平问题。

11月28日　苏、美、英3国首脑德黑兰会议。

1944年

1月27日　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苏联人民委员会关于扩大加盟共和国在国防和外交关系方面的权限的建议，并同意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全会同意以新国歌《各自由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代替旧国歌《国际歌》，并决定把《国际歌》作为联共（布）党歌。

9月21日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访问莫斯科，双方签订协同作战协定。

10月13日　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

1945年

2月4—11日　苏、美、英3国首脑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

4月30日　苏联军队把胜利红旗插上柏林市中心德国国会大厦。

5月8日　德国无条件投降。

5月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该日为“对德胜利日”。

7月17日—8月2日　苏、美、英3国政府首脑举行波茨坦会议，并发表《波茨坦协定》。

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

8月14日　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

1946年

2月9日　苏联人民委员会公布第4个五年计划。

3月1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把苏联人民委员会改称为苏联部长会议，把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人民委员会改称为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法令。

8月2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训练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人员的工作》的决议。

8月14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决议称，“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重大错误是把文坛让给了用其作品丑化和诽谤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民的作家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

8月26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话剧院剧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

9月19日　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办法》的决定。

1947年

2月28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

3月10日—4月24日　苏、美、英、法4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

9月22—27日　苏联等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波兰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2月1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进行币制改革、取消粮食与工业品配给制》的决议。

1948年

3月18日　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军事和技术顾问，苏南关系开始恶化。

3月20日　苏联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10月10日　发射第1枚苏联“P-1号弹道导弹”。

1949年

1月25日　苏、保、匈、波、罗、捷等6国“经济互助委员会”在莫斯科成立。

3月4日　苏联政府决定维辛斯基接替莫洛托夫任外交部长

3月29日　全苏列宁共青团召开第11次代表大会。

9月23日　苏联爆炸第1颗原子弹。

10月2日　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

2月14日　《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5月30日　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合并小集体农庄及党组织在该项工作中的任务》的决议。

6月19日　最高苏维埃会议选举什维尔尼克为主席团主席。

1951年

3月12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保卫和平法。

5月22日　苏波签署协定，波兰把卢布林地区的一块土地让与苏联，苏联将德罗霍贝奇省的一部分归还波兰。

1952年

3月10日　苏联照会美、英、法政府，要求召开苏、美、英、法4国会议、讨论德国统一和联邦德国重新武装问题。

10月5—14日　苏联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讨论并通过了马林科夫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萨布罗夫的第5个五年计划报告、赫鲁晓夫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卡冈诺维奇的修改党纲的报告的决议。大会决定，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苏联共产党，设立中央主席团代替政治局，撤销组织局。

赫鲁晓夫时期

（1953—1964年）

1953年

3月5日　斯大林逝世。

同日　苏联党和政府发表告党员和人民书。

3月6日　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全会通过12项决定，其中包括：任命马林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把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两个机构合并为苏共中央主席团，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14人组成；选举伊格纳切夫等3人为中央书记。

3月14日　苏共中央全会解除马林科夫的中央书记职务；选举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5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

7月2—7日　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把贝利亚开除出党，撤销其内务部长职务。

8月14日　苏联爆炸第1颗氢弹。

9月3—7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并选举赫鲁晓夫担任这个职务。

12月23日　苏共中央宣布贝利亚叛国罪，将其处决。

1954年

2月23日　苏共中央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赫鲁晓夫作的《关于进一步增加全国谷物生产和开垦荒地》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3月19—27日　全苏列宁共青团第12次代表大会召开。

3月25日　苏联宣布结束对东德的占领，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全部主权”，但苏军继续留驻东德。

4月26—7月21日　苏、中、英、法、美等5国外长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4月27日　伏罗希罗夫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0月6日　苏联外长要求立即召开关于德国统一、中立化和各国从德国撤军等问题的国际会议。

1955年

1月15日　苏联承认联邦德国的主权。

1月25—31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增加畜产品生产的决议》。

2月8日　马林科夫被解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布尔加宁取代。

2月9日　朱可夫元帅继任国防部长。

5月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废除与英、法两国的友好条约。

5月14日　苏联东欧8国政府在华沙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华沙条约》)。

5月15日　苏、美、英、法签订关于结束对奥地利占领的条约。

5月26日　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并进行会谈，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恢复苏南关系。

7月4—12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提高工业、实现技术进步和改进生产组织的任务》的决议。全会通过了于1956年2月14日召开例行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选举苏斯洛夫和基里钦科为中央主席团委员。

7月18—23日　苏、美、英、法等4国政府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9月9日　苏联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

11月18日12月19日　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

1956年

1月3日　苏联与南斯拉夫商定，苏联在南斯拉夫建造一座实验性核反应堆。

2月14—25日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听取和讨论

了赫鲁晓夫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作的第6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大会对党章作了部分修改并通过起草新党纲的决定。此外，在非公开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当选中央第一书记。大会通过了第6个五年计划。

4月18—27日　赫鲁晓夫访问英国。

5月2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16—18岁青少年实行6小时工作制》的法令。

6月1日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辞职，由谢皮洛夫接任。

6月30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7月14日　最高苏维埃公布《国家抚恤金法》。

9月30日　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铁托和匈牙利领导人格罗在雅尔塔举行会谈。

10月底至11月4日　苏军出动制止布达佩斯事件，纳吉下台，卡达尔出任匈总理。

12月20—24日　苏共中央全会讨论国民经济发展问题。通过《关于改进苏联国民经济领导问题》的决议。

1957年

2月13—14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组织管理》的决议。

2月15日　苏联外交部长谢皮洛夫辞职、由葛罗米柯继任。

3月28日　苏联与匈牙利在莫斯科签订协定，苏联向匈牙利提供经援、苏军继续留驻匈牙利。

5月7日　赫鲁晓夫向最高苏维埃提出设置92个经济区的改组工业生产的计划。

6月22—2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全会撤销马林科夫·卡冈诺维

奇和莫洛托夫的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解除谢皮洛夫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和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在表决上述决议时，莫洛托夫1人弃权。

7月28日—8月11日　第6届世界青年与大学生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

8月21日　苏发射世界上第1枚“州际导弹P-7号”。

10月4日　苏联发射世界上第1颗人造地球卫星。

10月26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马利诺夫斯基为国防部长，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长职务。

10月2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改进苏联陆海军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决议。全会撤销朱可夫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

11月14—16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宣言》。

11月16—19日　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

12月16—17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果》的决议。

1958年

2月25—2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

3月27—31日　苏联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伏罗希洛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3月31日　赫鲁晓夫接替布尔加宁任部长会议主席。

4月15—18日　列宁共青团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

5月6—7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加速发展化学工业，特别是合成材料及其制品的生产，以满足居民的需求和国民经济的需要》的决议。

5月24日　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通过《华沙条约缔约国

宣言》。

6月17—18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取消义务交售制和对机器拖拉机站工作的实物报酬以及关于新的农产品采购制度、采购价格和采购条件》的决议。

7月2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把加尔梅克自治州改组为加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命令。

9月5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召开苏共第21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解除布尔加宁的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

11月12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赫鲁晓夫将在苏共第21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的1959—196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提纲草案》的决议。

12月15—1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最近5年来农业发展的总结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生产任务》的决议。

12月2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体制》法令。

1959年

1月4日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问美国。

1月27—2月5日　苏共第21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苏联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7年计划)的控制数字》的决议。

6月6日　赫鲁晓夫宣称，除非西方国家同意建立巴尔干无核区，否则苏联将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3国设置火箭基地。

6月24—2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党和苏维埃组织以及国民经济委员会在执行苏共第21次代表大会关于加速工业和建筑业的技术进步的决议方面的工作》的决议。

9月9日　苏联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

9月15—27日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并

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会谈。

10月28日　苏联和美国在联大提出关于全面裁军的联合提案。

12月1日　苏、美等10国签署《南极条约》。

1960年

1月14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撤销内务部，将其职权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

1月15日　最高苏维埃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关于把苏联武装部队再裁减1/3，即120万人》的法令。

5月4—7日　苏共中央全会讨论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问题和组织问题。全会选举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波利扬斯基为主席团委员，科兹洛夫为中央书记。全会解除福尔采娃的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全会决定由勃列日涅夫接替伏罗希洛夫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第1副主席。

7月13—1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发展工业、运输业和在生产中采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决议。全会解除伏罗希洛夫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勃列日涅夫的中央书记的职务。

7月16日　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将在一个月内撤走在华的全部苏联专家。

11月　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发表了《莫斯科声明》。

12月20—23日　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并通过1961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和国家预算。

1961年

1月10—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提高人民物质福利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的任务》的报告。全会通过《关于召开例行的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和《关于1960年国家计划的

执行情况、关于生产和向国家交售农畜产品的社会主义义执务的行情况和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

4月22日　苏联发射了第1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宇航员加加林乘“东方号”宇宙飞船首次环绕地球飞行。

6月1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苏共纲领草案》和《关于苏共章程草案》的决议。

10月10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把图瓦自治州改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命令。

10月14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苏共中央向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

10月17—31日　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向大会作了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的报告。他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其主要任务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发展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育新人。宣称，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大会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纲领》和《苏联共产党章程》。31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选举赫鲁晓夫为中央第一书记。

1962年

3月5—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决议。

3月24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组农业管理》的决议。

4月25日　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关于制定新宪法的报告。

4月2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基里连科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10月—11月　加勒比海危机。苏联被迫撤出其部署在古巴的导弹。

11月19—23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发展苏联经济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决议。决议认为必须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因此，在苏共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设立中央工业生产领导局和中央农业生产领导局；在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分别设立领导工业生产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党委会。全会决定成立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并将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当选中央书记。

11月23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谢列平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并兼任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

1963年

6月16—19日　世界第一个苏联女宇航员捷列什科娃乘“东方6号”宇宙飞船环绕地球飞行。

6月18—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前任务。全会通过《关于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代表与中共中央代表会谈》的决议。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为中央书记。

7月　苏、中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7月19日　赫鲁晓夫在苏匈友好大会上发表关于战争与和平、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斯大林问题的看法。

8月7—16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苏思想工作干部会议。

12月13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加速发展化学工业是发展农业生产和提高人民福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的决议。全会解除谢尔比茨基的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并选举谢列斯特为主席团候补委员。

1964年

2月10—15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农业生产集约化问题。

2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执行二月全会决议的具体措施》的报告。

3月20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计划工作实践中粗暴破坏和不正常现象的事实》的决议。

4月　莫洛托夫被开除党籍。

5月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苏联关税法》。

勃列日涅夫时期

（1964—1982年）

10月14日　苏共中央全会"以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主席团委员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0月15日　苏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解除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11月6日　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讲话说，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了完全的最终的胜利，苏联正进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

11月1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把州、边疆区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合并、工业苏维埃和农业苏维埃合并》的决议。全会选举谢列平和谢列斯特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选举杰米契夫为主席团候补委员。阿朱别伊被开除出苏共中央。

12月9—11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柯西金作了《关于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报告。

1965年

3月24—2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的措施》的决议。全会选举乌斯季诺夫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

4月26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5月9日—胜利日—为休息日的法令。

5月9日　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庆祝苏联人民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

9月27—29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发展工业问题。柯西金作了改进工业管理，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和《关于召开例行的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选举库拉科夫为中央书记。

10月1—2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讨论工业管理体制问题。

10月4日　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条例》。

12月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改组党和国家监察机关》的决议。决议把党和国家监察机关改组为人民监督机关。全会选举谢尔比茨基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卡皮托诺夫为中央书记。

12月7—9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波德戈尔内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任命科瓦诺夫为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

12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机器制造业等一批企业开始实行经济改革的“新体制”。

1966年

1月5日　部长会议通过决议，从今年起由银行对集体农庄直接贷款。

1月25日　苏联成立一个制定新的劳动组合示范章程委员会，由勃列日涅夫担任主席。

2月1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1966年至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草案》的决议。

3月26日　苏共中央全会批准苏共中央向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3月29日—4月8日　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召开。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第8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决议。大会通过部分修改党章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取代中央主席团，中央总书记代替中央第一书记。

4月19日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所有集体农庄从1966年起实行货币报酬。

5月21日　勃列日涅夫参观太平洋舰队。

5月25—27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勃列日涅夫作了《土壤改良工作是我国建立稳定的农业生产的根本问题》的报告。

6月30日　苏联从7月1日起发行1966年国内有奖公债，利息为3％。

7月26日　苏联成立联盟一共和国社会治安部。

8月1日　苏共中央全会审查第7届最高苏维埃第1次会议的问题。

8月3日　第7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1次会议。柯西金作苏联政府内外政策一些基本问题的报告。

9月上旬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作出《关于改进全国专家的培养和完善对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领导的措施》的决定。

12月12—13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1967年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全会选举索洛缅采夫为中央书记。

1967年

3月14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将企业、学校和机关的工人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日改为每周工作5天和休息2天的命令。

4月21日　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北方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措施》的决定。

5月19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6月20—2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提纲》的决议。全会选举安德罗波夫为中央政治

局候补委员，同时解除他担任的中央书记职务。

7月14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及提高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措施》的决议。

9月5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在克里米亚居住过的鞑靼族公民》的法令。

9月7日　苏、匈在布达佩斯签订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9月2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福利的措施》的决议。全会解除谢列平的中央书记职务。

10月12日　最高苏维埃通过新的《普遍义务兵役法》。

10月31日　最高苏维埃发布大赦令。

11月5日　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发表告苏联劳动人民书。

12月底　苏联恢复赫鲁晓夫时期撤销的陆军总司令部，由国防部副部长帕夫洛夫斯基兼任总司令。

1968年

2月27日—3月4日　苏联工会举行第14次代表大会。

4月8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村镇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基本权限和义务》的法令。

4月9—10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全会选举卡图谢夫为中央书记。

5月14—17日　全苏经济工作会议在莫斯科召开。

7月17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华沙会晤结果》的决议。

8月21日　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10月30—31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苏共第23次代表大会和历次中央全会对农业问题的决议的执行情况》的决议。

12月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69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

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

12月19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批准《苏联人民监督机构条例》。

1969年

1月22日　苏联部长会议批准《苏联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条例》。

3月2日　苏军侵犯中国的珍宝岛。

3月20日　苏联向乌苏里江和黑龙江附近移民。

6月5—17日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莫斯科召开。

6月2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结果》的决议。

7月11日　最高苏维埃通过《劳动改造立法原则》、《预押条例》、《刑事立法原则补充修改法》三项法案。

11月2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11月25—27日　全苏集体农庄庄员第3次代表大会召开。

12月15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7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

1670年

1月15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加速发展西伯利亚石油开采工业》的决定。

4月21—22日　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6月14日　苏联举行第8届最高苏维埃选举。

7月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党在农业方面的目前任务》的决议。

7月7日　苏、罗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布加勒斯特签定。

7月13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召开苏共第24次例行代表

大会》的决议。

7月14—15日　第8届最高苏维埃举行第1次会议。波德戈尔内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会议通过《劳动立法原则》的决议。

8月12日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苏。双方签订了互不使用武力条约，确认了战后边界。

11月4日　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和查利泽等人组成"苏联人权委员会"。

12月7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71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

12月23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改进国民经济中的法权工作》的决议。

1971年

2月11日　禁止在海洋底部和海洋地层深处设置核武器及其他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签字。

3月11—12日　全苏集体农庄理事会会议，讨论农业和集体农庄生产管理方面的迫切问题。

3月14日　苏共中央公布《关于进一步改进各个地区和城市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工作》的决议。

3月2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并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向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3月30日—4月9日　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听取和讨论了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批准了1971—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纲要。大会通过关于部分修改苏共章程的决议。9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中央总书记，佩尔谢当选党监察委员会主席。

4月25日　苏联用1枚火箭发射了8颗"宇宙号"人造卫星。

6月3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提高工人和工作人员老年退休金最低数额，关于进一步改善集体农庄庄员退休供应

办法的命令。

6月11日　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举行选举。

9月3日　苏、美、英、法签订关于西柏林的四方协定。

10月25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布《关于进一步改善大学生以及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的物质生活和居住条件》的决定。

11月22—23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71—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草案和1972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全会选举索洛缅采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解除他的中央书记职务。

11月27日　苏联第1次制造功成火星人造卫星。

1972年

3月20—24日　苏联工会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

4月17日　关于禁止研究、生产和储存并销毁细菌(生物)和毒性武器公约在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签字。

5月1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国际形势》和《关于更换党证》的决议。全会选举波诺马廖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6月20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完成普及中等教育的过渡和进一步发展普通教育学校》的决定。

6月23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制》的决定。

12月18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73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全会解除姆日阿瓦纳泽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选举多尔基赫为中央书记。

1973年

1月16—18日　全苏高等教育会议举行。

4月2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发布《关于改组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

4月13日　苏共中央发布《纪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 2 次代表大会70周年》的决定。

4月26—27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苏共中央为实现党的第24次代表大会决议而开展的国际活动》的决议。全会选举安德罗波夫、格列奇科和葛罗米柯为政治局委员，罗曼诺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6月27日　苏联西伯利亚到欧洲部分的输油管干线竣工、全长2200公里。

7月17—19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国民教育立法原则》和《国家公证制法》。

7月30—31日　保、匈、德、波、罗、捷、苏、蒙等等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在克里米亚会晤。

12月10—11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74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

12月12—14日　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通过《关于1974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决定。

1974年

1月21日　苏发表《关于在奥布宁高能物理研究所建造世界第一座连续电子回旋加速器》的公报。

5月20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人民志愿纠查队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活动》的决定。

6月9日　苏联与葡萄牙建立外交关系。

7月24日　苏共中央全会审查了第9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 1 次会议的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10月9—10日　全苏保卫和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

11月6日　列宁原子能电站第1机组在列宁格勒建成。

12月16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75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全会解除了杰米契夫的中

央书记职务。

1975年

4月16日　苏共中央全会决定于1976年2月24日召开苏共第25次例行代表大会。全会解除了谢列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4月18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作出《关于对卫国战争中的残废者和军人阵亡家属的补充优待办法》的决定。

6月29日　世界上最大的热核装置"托卡马克10号"在库尔恰托夫原子能研究所投入运行。

7月30—8月1日　苏、美等35国领导人在赫尔辛基举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并签署了相应的文件。

12月1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76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

12月14日　发表苏共中央向苏共第25次代表大会提出《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草案的决定。

1976年

2月2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批准苏共中央向苏共第25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和向代表大会作的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的报告。

2月24—3月5日　苏共第25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勃列日涅夫向大会作了苏共中央工作总结和当前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任务的报告，西佐夫作了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柯西金作了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选举了党的中央机构。3月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当选中央总书记。

5月28日　苏美在莫斯科签订关于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

10月2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报告。他说五年计划中有些部分是相当紧张、困难问题很多。全会讨论

并通过第10个五年计划草案。全会选举里亚鲍夫为中央书记；解除乌斯季诺夫的中央书记职务。

1977年

2月9日　苏联与西班牙建立外交关系。

5月24日　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勃列日涅夫作了《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斯洛夫作了《关于苏联国歌》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解除了波德戈尔内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卡图谢夫的中央书记职务；选举鲁萨科夫为中央书记。全会决定勃列日涅夫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6月4日　公布苏联新宪法草案，交全民讨论。

10月3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宪法草案和全民讨论结果的报告》的决议。决定宪法草案提交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全会选举契尔年科和库兹涅佐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0月7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苏联新宪法。这部宪法被称为发达社会主义宪法。

12月1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1978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

1978年

2月2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中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呼吁书，建议发表一项有关两国相互关系原则的联合声明和举行双方相当高级别代表的会晤。

2月27日　苏、匈、保、捷、古、波、蒙、东德、罗、越等11国在布达佩斯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书记会议。

5月3日　苏联承认阿富汗新政权。

5月18日　葛罗米柯外长与阿富汗外长阿明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并发表公报。

5月4—7日　勃列日涅夫访问西德，苏德双方签署关于推进缓

和、睦邻和巩固和平事业的联合声明；发展和加深经济和工业长期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

6月27—29日　经互会第32次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

7月3—4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的决议。

11月1—8日　黎笋和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苏越双方签署为期2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和6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1月2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1979年国家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全会解除马祖罗夫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契尔年科为政治局委员，吉洪诺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戈尔巴乔夫为中央书记。

12月4—7日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总理塔拉基访问苏联，苏阿签订《友好睦邻合作条约》。

12月21—23日　葛罗米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万斯在日内瓦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谈判。

1979年

3月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开始选举。

4月1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第10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1次会议的问题。全会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维埃工作的报告和苏斯洛夫的讲话。全会解除了里亚鲍夫的中央书记职务。

4月18日　在第10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1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继续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库兹涅佐夫当选副主席。

4月26日　苏共中央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

6月29日　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发展高等学校和提高培养专业人才质量》的决议。

11月29日　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全会选举吉洪诺夫为政治

局委员，戈尔巴乔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27日　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

1980年

6月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召开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确定于1981年2月23日举行。全会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关于国内国际形势的报告。

7月20日　22届奥运会在莫斯科举行。此次奥运会因苏入侵阿富汗，受到许多国家抵制。

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1981年苏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基谢廖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解除柯西金政治局委员职务。

10月23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柯西金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决定吉洪诺夫继任部长会议主席。

12月8日　勃列日涅夫率团前往印度访问。

12月18日　原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逝世。

1981年

2月2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苏共中央向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

2月23—3月3日　苏共中央第26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勃列日涅夫作了《关于苏共中央的总结和当前内外政策任务》的报告；吉洪诺夫作了《关于1981—1985年和到1990年期间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3月3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继续当选中央总书记，佩尔谢当选中央委员会党监察委员会主席。

3月1日　戈尔巴乔夫50寿辰、被授予列宁勋章。

8月16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报告，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全会通过《关于1981—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报告》的决议。

11月1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通过《关于1981—1985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苏联社会发展》的法令。

1982年

1月2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逝世。

3月24日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表示苏愿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苏中可以接受的“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

5月24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苏联到1990年的食品纲要及其实施措施》报告，通过了《改进农业管理》等6项决议。全会选举安德罗波夫为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还选举多尔基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1月2日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向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颁发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

11月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逝世。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时期
（1982—1985年）

11月12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选举安德罗波夫为中央总书记。

11月22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1983年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全会解除了基里连科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选举阿利耶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为中央书记。

11月23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契尔年科当选为最高

苏维埃联盟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1983年

2月8—9日　经互会成员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书记和常驻经互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2月　《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发表安德罗波夫的重要文章：《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问题》。文章强调“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里，党和人民面临着宏伟的巨大的任务。总起来讲，这些任务可以概括地称为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随着完善的程度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我国现在处于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

3月14—15日　保、匈、东德、古、越、老、蒙、波、罗、苏、捷等1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书记在莫斯科开会并发表公报。

4月18日　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召开的各加盟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大抓农业生产问题。

5月　戈尔巴乔夫率苏代表团访问加拿大。

6月14—15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契尔年科就加强意识形态和群众政治工作的迫切问题作了报告。安德罗波夫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全会选举沃罗特尼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罗曼诺夫为中央书记，索洛缅采夫为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6月1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选举安德罗波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9月20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负责意识形态和国际问题的中央书记在莫斯科举行会议。

11月24日　安德罗波夫就中止苏、美在日内瓦的核谈判发表声明。

12月14—19日　戈尔巴乔夫率苏共代表团参加葡萄牙共产党10大，并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12月26—2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全会通过《关于1984年苏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和国家预算草案》的决议。安德罗波夫没有出席全会，作了书面发言。全会选举索洛缅采夫和沃罗特尼科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书记。

12月2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决定。

1984年

1月16日　葛罗米柯外长抵达斯德哥尔摩参加加强欧洲信任与安全和裁军会议。

2月3日　苏共中央就即将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发表告全体选民和公民书。

2月9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罗波夫逝世。

2月13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选举契尔年科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3月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选举运动。

4月10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改善人民代表苏维埃工作》和《关于改革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基本方针》的决议。

4月11日　苏联10届最高苏维埃第1次会议召开。契尔年科总书记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5月29—30日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主管组织和党务工作问题的中央书记会议在索非亚召开。

10月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改良土壤、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粮食储备的长期纲要》的决议。

12月20日　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乌斯季诺夫逝世。

1985年

1月8日　葛罗米柯外长与美国务卿舒尔茨在日内瓦举行谈判，双方商定恢复武器控制谈判。

1月10日　华约总司令、苏军元帅库利科夫对保、罗、匈、捷、东德、波进行访问。

2月1日　苏共中央召开关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的会议。

3月10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契尔年科逝世。

戈尔巴乔夫时期

(1985—1991年)

1985年

3月11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体会议。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当选后发表讲话时说，苏共将坚持苏共26大和以后几次全会的战略方针，将不断完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制，实行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扩大企业自主权。

4月23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召开例行的苏共27大及与筹备和举行27大有关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在经济领域要制订和实施重大政策，把经济集约化和加快科技进步置于整个工作的中心，改革管理和计划工作以及结构和投资政策；在继续发展集中原则的同时，还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核算，取消多余环节，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提高产品质量，使价格体系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全会选举切布里科夫、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索科洛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尼科诺夫为中央书记。全会决定于

1986年2月25日召开苏共27大。

4月25—27日　华约国家首脑会议在华沙举行，戈尔巴乔夫率团出席了会议。会上华约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使华约延长20年的议定书。

6月11—12日　苏共中央召开加快科技进步会议。

7月1日　苏共中央举行例行全会，解除罗曼诺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决定谢瓦尔德纳泽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正式委员，选举叶利钦和扎伊科夫为苏共中央书记。

9月2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雷日科夫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0月1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了关于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草案、关于苏共章程的修订、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和200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草案等问题。戈尔巴乔夫作了题为《党的政策——关心人民福利，关心和平与进步》的报告。报告中说：党纲新修订本注意了理论和政治上的继承性，忠于马克思主义，但同时批判地重新认识原纲领中那些没有经受住时间检验的提法。经验证明，不考虑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成熟程度，一味冒进并实行共产主义原则的种种做法必然失败。

全会选举塔雷津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解除雷日科夫苏共中央书记职务，因他已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全会还解除了吉洪诺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

11月19—21日　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12月24日　在苏共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上叶利钦当选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会议解除了格里申从1967年起担任的这一职务。戈尔巴乔夫参加了这次会议。

1986年

2月1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提交苏共27大审议的主要文件：政治报告；苏共纲领新修订本草案；党章修改草案；关于1986—1990和至200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草案。

全会选举叶利钦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解除格里申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解除鲁萨科夫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2月25日—3月6日　苏共召开第27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此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自苏共26大以来的工作，确定了"加速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提出社会进一步民主化问题，认为为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公开性；通过了《苏联1986至1990年和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通过了苏共纲领新修订本，批准了苏共章程；选出了新的中央机构。

3月6日　苏共27大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举行中央全会，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政治局委员有：戈尔巴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谢瓦尔德纳泽、谢尔比茨基。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杰米契夫、多尔基赫、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索洛维约夫、塔雷津。

苏共中央书记有：戈尔巴乔夫、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基赫、扎伊科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

6月16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五年计划和各级党组织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报告时说：目前改革本身进展缓慢。各级党委的任务是大力支持人们的社会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但是许多地方依然如故：对主动精神漠然置之，要不就公然反对。

10月11—12日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在冰岛举行会晤。

11月1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个体劳动法》，允许在生产和服务领域的一些项目中进行个体劳动，但禁止搞个人商业、禁止私人雇工。该法律自1987年5月1日起生效。

12月16日　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会解除库纳耶夫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俄罗斯人科尔宾为中央第一书记。当晚，阿拉木图有几百名学生上街抗议哈萨克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发生骚乱。

12月中旬　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萨哈罗夫，通知解除对他的流放，允许其返回莫斯科和参加政治活动。

1987年

1月27—28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报告，指出"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更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苏联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人道主义性质"，提出"对改革的态度，对实行改革采取的实际行动，是评价干部的决定性标准"。

全会通过了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决定。

全会解除了库纳耶夫政治局委员、齐米亚宁中央书记的职务；选举雅科夫列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斯柳尼科夫和卢基扬诺夫为中央书记。

6月25—26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关于"党在根本改革经济管理方面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作报告，指出"改革的目标首先是解决构成障碍机制主要环节的矛盾，从而使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不可逆转的加速力"；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目的是使经济增长从中间结果转向最终结果，转向满足社会需要，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使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建立可靠有效的反消耗机制；为此，必须实现从主要是行政领导方法向主要是经济领导、向管理的民主化、大力活跃人的因素过渡；经济管

理改革的方针是加强社会主义和民主；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要大力发展国内已经形成的公开性，即开放性的形势。

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

会上，斯柳尼科夫、雅科夫列夫和尼科诺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亚佐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索科洛夫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库纳耶夫被开除出苏共中央。

6月29—30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个法律草案：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草案（该法于1988年1月1日起生效）、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草案、对公职人员的不法行为向法院起诉法草案。

8月23日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发生居民上街示威事件，集会者要求重新评价1939年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提出三国退出苏联成为独立国家的政治主张。

9月16日　《真理报》刊登戈尔巴乔夫题为《现实性和安全世界的保障》的文章，提出建立国际安全体系的设想。

9月17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国营生产联合公司条例草案。

10月17—18日　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连续两天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游行的目的是支持毗邻阿塞拜疆的恰尔达赫卢村亚美尼亚族人的权利，要求关闭污染环境的化工厂和一座核电站。

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举行例行全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在会上发言，指责中央书记处和利加乔夫工作方式没有任何变化；改革缓慢，人民正在失去耐心；最近一段时期，政治局内明显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对几个政治局委员、几个政治局常委、还有总书记的阿谀奉承。叶利钦提出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叶利钦的发言遭到其他中央委员的批评，叶利钦最后承认他的发言是个错误。此后在11月11—13日召开的苏共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上，叶利钦受到批评并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常

委会委员的职务。

11月1日　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戈尔巴乔夫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一书。

11月2日　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作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空前攻击。

12月7—10日　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其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签署了中导条约，并表示苏联准备从阿富汗撤军。

1988年

2月17—18日　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题为《赋予革命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的讲话，提出"改革要求我们重新评价一些习以为常的鉴定，把已经走过的和准备踏上的道路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表达的进步的标准和建设新社会的目的加以对比"；"社会主义的任务是结束剥削阶级社会所固有的劳动者与社会隔绝，与政权、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精神价值财富相隔绝的状态"；为此，必须"多一点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一条是民主化，"这是达到改革目的的决定性手段"；"我们现在认识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是完全自然的，合乎逻辑的。这里所指的，自然不是取代现行体制，而是引入全新的结构和因素，使之具有新的内容和活力，以保证我国社会的顺利发展"。

全会选举新任命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斯柳科夫和苏共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原通用机器制造部部长巴克拉诺夫为中央书记；解除叶利钦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2月23—24日　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20万人示威，要求将阿塞拜疆境内居住着亚美尼亚人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

2月26日　戈尔巴乔夫就纳-卡州事件及其有关问题向阿塞拜

疆和亚美尼亚人民发出呼吁。

2月28日　一些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在阿塞拜疆苏姆盖特市发生冲突，造成32人死亡的流血惨案。

3月5日　苏联公布《合作社法》草案。

3月6日　4000多名鞑靼人在克拉斯诺达尔市举行示威，要求重返克里米亚家园。

3月13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列宁格勒工艺学院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长篇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要求肯定斯大林的历史作用，对当前国内政策提出了批评。

4月5日　《真理报》发表阿法纳西耶夫撰写的编辑部文章，题为《反改革势力的宣言》，文章指责《苏维埃俄罗斯报》3月13日刊登的安德烈耶娃的信是反改革宣言。

4月15日　《苏维埃俄罗斯报》编辑部发表文章，接受4月5日《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对它的批评。

5月7日　苏联14个城市的100多名代表在莫斯科集会，决定成立"民主同盟"，该组织自称是"反对现秩序的反对派政党"。

5月15日　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6月28日—7月1日　苏共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题为《关于苏共27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认为"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严重变形"，是苏联目前产生困难的根源，成了改革的"障碍"；将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论并列为苏共提出的三个"革命性倡议"；主张党政职能分开，改革苏维埃制度，恢复苏维埃的"全权"；提出改革干部制度；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确定其七大特征：第一，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第二，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第三，社会公正制度；第四，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第五，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第六，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第七，同各国建立正常和文明关系的制度。

会议通过了关于苏共27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关于苏联社会民主化和政治体制改革、关于实际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刻不容缓措施、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关于族际关系、关于公开性、关于司法改革等七项决议。会议决定实行国家权力中心从党的系统向苏维埃系统的转移，并成立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由它选举组成最高苏维埃，并决定增设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

9月3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研究改组党的机构的建议和干部问题。全会决定成立苏共中央六个负责内外政策的委员会：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主席：拉祖莫夫斯基）；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梅德韦杰夫）；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斯柳尼科夫）；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利加乔夫）；国际政策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法律政策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

会上葛罗米柯申请退休，全会表示同意并解除了他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另外，索洛缅采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职务，多尔基赫、杰米契夫和多勃雷宁分别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并宣布这四人退休。

全会选举梅德韦杰夫为政治局委员，选举弗拉索夫、比留科娃和卢基扬诺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中央书记，普戈被任命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10月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非例行会议，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0月6日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决定黄、绿、红三色民族旗帜可在民族节日和社会活动中使用，但不可代替立陶宛共和国国旗。

10月8日　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

10月22日　“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萨尤季斯”）成立。

11月16日　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一项对该共和国宪法第74条的修正案。根据该修正案，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权力机

关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停止使用苏联立法文件和其他法律，或是确定使用这些文件的限度。

11月2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举行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和全民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情况等问题。会议认为，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11月16日通过的法律和宣言中的一些条款不符合苏联宪法，是无效的。

1989年

1月1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提出了苏共苏联人民代表候选人。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就选举人民代表问题致党和苏联人民的呼吁书，强调苏共今后仍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把全部力量、集体的智慧和意志都投入到社会的革命变革中去，苏共将为发掘改革的智力潜力，为形成全面发展的社会积极性创造条件，主张彻底确立开放性、公开性、人道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

2月15日　苏联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工作。

4月8—10日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生流血事件，示威者要求格鲁吉亚从苏联分离出去，示威者与前来维持秩序的军队发生冲突，冲突中16人死亡，75名军警受伤，此后该市实行宵禁。

4月25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组织问题。122名已退休的苏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要求辞去他们的党内职务，全会接受他们的要求，并把一些中央候补委员递升为中央委员。

5月15—18日　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5月25日—6月9日　苏联举行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国家元首），卢基扬诺夫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叶利钦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6月7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两院联席会议上，雷日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受命组阁。

7月10日—8月初，苏联煤矿工人大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罢工

工人抗议商品短缺，生活条件恶劣，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

7月29—30日　近300名苏联人民代表成立“跨地区议员团”，领导人是叶利钦、萨哈罗夫、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

7月　《青年近卫军》月刊第7期以《关系到每个人……》为题，刊登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来信。来信指出苏联正在发生类似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那种进程；现在的改革说的比做的多；在恶意“贬低”斯大林及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背后，正聚集着已开始对列宁、马列主义、十月革命攻击的力量。

8月23日　波罗的海三国发生大规模示威，200万人跨越三国边界，手拉手组成600多公里的人链，抗议导致三国并入苏联的1939年苏德条约。

9月19—20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专门研究民族问题。会议听取、讨论并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所作的《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报告。报告承认苏联民族问题极其尖锐，要坚决回击破坏民族团结的一切行为。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28大于1990年10月召开，此提议获得全会通过。

全会通过决定，指出关于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受贿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会上，尼科诺夫、切布里科夫、谢尔比茨基、索洛维约夫和塔雷津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职务。

克留奇科夫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马斯柳科夫递升为政治局委员。普里马科夫和普戈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另外，会议还选举四名州委书记为中央书记。

11月15日　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大学生会议上发表讲话，在谈到最近民主德国发生的剧变时，他说苏联欢迎民主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11月26日　《真理报》刊登戈尔巴乔夫的长篇理论文章《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

12月1日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召开全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专程到会宣读了戈尔巴乔夫致立陶宛全体党员的呼吁书，并作了长篇发言，呼吁团结、反对分裂。

12月2—3日　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布什在马耳他举行非正式会晤。

12月9日　苏共中央就即将召开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等问题举行全会。全会决定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全会增选伊瓦什科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弗罗洛夫为苏共中央书记，并通过《致苏联人民和共产党员呼吁书》。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讲话时说，目前要求"十万火急"地讨论苏联宪法第6条的做法是别有用心的。

12月12—24日　苏联举行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

12月19—22日　立陶宛共产党召开第20次非常代表大会，会上发生分裂，主张立陶宛共产党独立的代表通过改组成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

12月25—26日　苏共中央举行非例行全会，讨论立陶宛共产党20大通过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立陶宛共产党20大通过的《立陶宛共产党独立宣言》和《关于立陶宛共产党地位的决定》等文件超出了党内关系范围，是对改革的打击。

12月31日　戈尔巴乔夫发表新年讲话，他说，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在谈到东欧发生的急剧变化时，他说"革命性革新的浪潮席卷了东欧"，在东欧各国所发生的戏剧性事件中，社会主义同民主相结合的必要性再一次得到了十分有力的证实。

1990年

1月13日　戈尔巴乔夫在视察立陶宛时发表讲话，说不应该象魔鬼害怕烧香一样害怕多党制，但多党制并不是万应良药。

1月20—21日　来自苏联各地的125名代表在莫斯科开会，决定成立苏共党内的"民主纲领派"组织。

2月5—7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戈尔巴乔夫就提交苏共28大的行动纲领草案作了报告，提出修改苏联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他说党革新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清除一切把党同专横官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的东西”；苏共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应当放弃数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放弃在内外政策中的过时模式和陈旧观点；党的地位不应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要为取得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党的革新要求对党进行深入、包罗万象的民主化，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点放在民主化，党员群众的权力上面”。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在苏联建立总统制问题，指出总统应有一切必要的权力把改革政策付诸实施。

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向苏共28大提出的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苏共行动纲领草案。该行动纲领草案提出，“我们正在同与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官僚专制体制决裂”，“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党认为自己的主要目标是：使人真正处于社会发展的中心，保障人具备应有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保证社会公正、政治自由、个人能得到全面发展及精神焕发”；苏共认为“根本经济改革的结果应当以计划市场经济来取代本身具有垄断性和缺乏主动精神、消耗大和经营不善以及忽视消费者利益的命令主义分配制度”；苏共并不想享有垄断权，“它愿意同一切主张革新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进行政治对话和合作”；“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立对于管理效率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在改革苏维埃联邦制的条件下，“共和国共产党在遵守苏共纲领和章程的同时，应当有可能制定自己的纲领性文件，独立解决组织、干部和财政问题，进行出版活动，有权直接参与解决全党生活的原则问题”。

全会还通过了苏共中央全会关于立陶宛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决定，认定该决议意味着立陶宛共产党同苏共在组织政治上的决裂，全会谴责这种行动。

2月10日　戈尔巴乔夫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并发表会谈公报。公报说，现在苏联、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没有分歧。戈尔巴乔夫向科尔表示，德国统一问题应由德国人自己解决。

2月12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会后发表一个正式公报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一致赞同在苏联建立民主总统制政权。

2月15日　拉脱维亚议会通过独立宣言。

2月24日　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萨尤季斯"）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获胜。

2月25日　莫斯科10万多市民举行集会，要求实行民主，加速改革进程，同时要求共产党领导人辞职。集会是激进派人士组织的。

2月27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多数票通过设立总统制。

3月3日　苏共民主派发表其《向苏共28大提出的民主纲领》，主张对苏共进行"彻底改革"，认为"极权的新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的超集中、反民主和严格等级制的结构，是同千百万普通共产党员和改革的需要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直接相抵触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造成党本身以及整个政治体制的非民主性质的主要环节"；目前的改革"应该成为旨在最终消灭现有制度，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民主改革总体的中心环节"；必须"把政权从垄断执政党手里转到苏维埃手里，实行党的民主化"，把"苏共变成在多党制、法制和议会制国家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议会党"。

3月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所有制法，承认所有制形成的多样性，从而取消了国有制的垄断。

3月11日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法令。"萨尤季斯"领导人兰茨贝吉斯当选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

3月11—16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三个重要决议：以立

法动议的程序向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宪法第6条和第7条的建议；指定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候选人，定于7月2日召开苏共28大。

3月12——15日　苏联召开第三次非常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中确定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垄断地位的条款；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第一任总统；选举卢基扬诺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会议还通过决定，宣布立陶宛最高苏维埃3月10—12日通过的立法文件是无效的。

3月24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布命令，任命由10人组成的总统委员会。

3月25日　爱沙尼亚共产党20大闭幕，会上作出爱沙尼亚共产党脱离苏共的决定。

3月　《工人阶级与当代世界》双月刊第2期发表戈尔巴乔夫的文章《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

4月3日　苏联议会通过《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法》和《紧急状态法》。

4月16日　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发表其向苏共28大提出的《苏共马克思主义纲领》(草案)，提出必须取消苏共这个"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党的现有模式，但不是取消共产党本身；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不一定导致多党制、议会民主制，而是实现真正的人民政权；苏共摆脱危机的条件之一是刻不容缓地把党从国家一经济机关改造成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政治组织，变成按自愿原则把赞成党的纲领目标和实际参加实现纲领目标的社会成员联合起来的组织；党应当直截了当地放弃政治特权要求，把议会斗争看作解决主要任务——通过在群众中做实际工作赢得劳动者信任的一种方式；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应"完全属于全民所有制"，在有限范围内允许"个体所有制"。

4月19日　苏联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削减天然气供应。之

后苏联对立陶宛的禁运扩大到食品、金属、木材、工业配件。

5月4日　拉脱维亚议会通过独立宣言。

5月12日　波罗的海三国首脑在塔林会晤，签署了三国合作宣言。

5月14日　戈尔巴乔夫发布两项命令，分别宣布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两国议会作出的恢复独立的决定无效。

5月16—29日　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5月31日—6月1日　苏美首脑在华盛顿会晤，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战略武器条约声明和一系列协议。

6月12日　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

6月13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企业法，该法于1991年1月1日起生效。

6月19—23日　俄罗斯共产党举行代表会议。会上通过成立俄共的决议，波洛兹科夫当选俄共中央第一书记。

6月20日　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通过乌兹别克主权宣言。

6月23日　摩尔多瓦最高苏维埃通过共和国主权宣言。

7月2—13日　苏共召开第28次代表大会。戈尔巴乔夫作了题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向苏共28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的报告。

代表大会通过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和苏共章程。章程中说，苏共“是一个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实施以全人类价值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纲领性目标的政治组织。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捍卫国际主义，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目标。苏共表达和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忠于社会主义选择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努力实现公民和睦和多民族苏联社会的团结。”苏共在纲领和章程基础上开展自己的工作。党、党的

所有组织在苏联宪法、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宪法和苏联法律范围内活动。

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经济改革、军事政策、农业政策、民族政策、青年政策、文化政策等一系列决议。

在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伊瓦什科当选苏共中央副总书记。

在代表大会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发表了关于退出苏共的声明，声称鉴于他已被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对俄罗斯各族人民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考虑到社会向多党制过渡，他不可能"只执行苏共的决定",因此宣布退党。

在代表大会期间，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也宣布退出苏共。

7月14日　苏共中央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戈尔巴乔夫、布罗基亚维丘斯、贡巴里泽、古连科、扎索霍夫、伊瓦什科、卡里莫夫、卢钦斯基、马萨利耶夫、马赫卡莫夫、莫夫西相、穆塔利博夫、纳扎尔巴耶夫、尼亚佐夫、波洛兹科夫、普罗科菲耶夫、鲁比克斯、谢苗诺娃、西拉里、索科洛夫、斯特罗耶夫、弗罗洛夫、舍宁、亚纳耶夫。

书记处成员有阿尼斯金、盖沃龙斯基、梅利尼科夫、捷普列尼切夫、图尔吉诺娃。

7月14—16日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苏，戈尔巴乔夫同他就德国统一问题最终达成协议，双方宣布，统一后的德国将享有"充分的主权","它有权独立地决定属于哪个联盟"的问题。

7月16日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

7月27日　白俄罗斯议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

8月23日　亚美尼亚和土库曼议会分别通过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

8月25日　塔吉克议会通过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

9月10—2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第4次会议讨论了向市场经济

过渡和联盟条约诸问题。

9月12日　苏、美、英、法及两德六国外长会议结束后，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并批准两个德国统一和重新取得全部主权。

9月21日　戈尔巴乔夫要求苏联议会授予他稳定国家形势的补充权限。

9月22日　俄罗斯议会发表声明反对授予苏联总统补充权限。

9月27日　戈尔巴乔夫发布稳定经济联系紧急措施的法令。

10月1日　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和两德外长在纽约签署宣言，宣布停止四国在柏林和德国行使权力。

10月8—9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国内局势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任务。全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国内形势和苏共在向市场关系过渡时期的任务问题》的决议，主张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形成市场的基础结构。

10月9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结社法》。

10月15日　戈尔巴乔夫获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

10月20—21日　“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举行成立大会，通过政治宣言，“运动”章程和一系列决议。

10月2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保证苏联法律效力》的法律，重申在联盟范围内苏联法律高于共和国法律。

同日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苏联机关文件在俄罗斯境内生效法》，规定苏联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和文件、总统令等需经其批准后才能在其境内生效。

同日　哈萨克议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

11月17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稳定国内局势的八点建议。

12月1日　苏联总统发布命令，宣布一些加盟共和国就国防问题通过的法令无效。

12月10—15日　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主权宣言。

12月1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对待联盟条约的立场和党组织目前任务。戈尔巴乔夫发表题为《为革新我们的联盟国家而斗争》的讲话。

12月17—27日　苏联召开第四次人代会。20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上提出辞职。22日会议通过全民投票法草案。24日会议通过保留国名和关于国内形势的决议。25日会议通过联盟条约基本构想。26日会议通过修宪案。27日亚纳耶夫当选苏联副总统。

1991年

1月中旬　立陶宛支持和反对立陶宛独立的两派力量发生严重对立，苏军进行干涉，造成流血冲突。

1月14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帕夫洛夫为苏联总理。

1月1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别斯梅尔特内赫任苏联外长。

1月31日—2月1日　苏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声明。声明认为国内社会危机已达到危险的界限，有可能爆发破坏性的社会震荡，因此有必要在全国刻不容缓地恢复宪法秩序。

2月1日　苏联总统关于军队和民警协作在大城市巡逻的命令生效，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六国拒绝执行这项命令。

2月5日　戈尔巴乔夫就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决定就立陶宛国家未来问题举行共和国居民民意测验一事发布命令，认定其没有法律依据。

2月19日　叶利钦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苏联总统立即辞职。

3—5月　苏联爆发历史上第二次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

3月7日　苏联联邦委员会通过新联盟条约草案，并把它作为蓝本提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

3月10日　“民主俄罗斯”在莫斯科组织数十万人群众集会，支持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

3月17日　苏联就联盟前途问题举行全民投票，参加投票的人中有76.4%的人赞成保留联盟。

3月28日—4月5日　俄罗斯举行第三次非常人代会。叶利钦作了《关于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以及摆脱危机的措施》的报告。会议通过决定，否决了叶利钦关于护法机关、武装力量、国家机关、大型企业等“非党化”的主张。

3月31日　苏、波、匈、捷、保、罗达成的关于解散华沙条约军事组织结构的协议开始生效。

4月9日　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国家独立宣言。

同日　戈尔巴乔夫主持召开联邦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提出反危机纲领：(1)采取措施，维护和革新苏维埃国家体制；(2)立即恢复行政机关自下而上的纵向隶属关系；(3)卷人民族冲突的各方立即停止暴力，进行谈判；(4)宣布暂停罢工、群众集会和其他使国家局势不稳定的政治行动。

4月11日　苏共在苏联司法部正式登记。

4月23日　戈尔巴乔夫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阿塞拜疆、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9个共和国领导人就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即9＋1声明），指出必须采取一致行动，在签订新联盟条约和通过新宪法之后，筹备和进行联盟权力机关的选举。

4月24—26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内局势和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和《关于共产党员在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中的工作》的决定。会上部分与会者对戈尔巴乔夫提出尖锐批评，迫使戈尔巴乔夫提出辞职要求，后经政治局讨论建议全会不讨论这一问题，经表决获得通过。

5月21—25日　第四次俄罗斯人代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批准共和国总统法和俄罗斯联邦宪法修正案。

5月下旬　苏联呼吁西方在今后五年里向苏联提供2500亿美元的援助。

6月12日　俄罗斯举行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获得57.3%的选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同日　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市同时选举市长，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分别当选两市市长。

6月17日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苏联总理帕夫洛夫作关于国家形势和内阁计划的报告，并请求议会在1991年授予内阁特别经济权，遭到戈尔巴乔夫强烈反对，议会驳回了帕夫洛夫的请求。

6月20日　戈尔巴乔夫会见欧共体主席德洛尔，双方探讨了西方在互利合作范围内支持苏联改革的问题。

6月28日　俄罗斯议会批准俄罗斯部长会议关于不执行苏联内阁关于制定1992年经济计划的决定。

7月1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私有化法》，根据该法，到1992年年底，苏联将有一半工业企业脱离国家控制。

同日　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签署议定书，宣布停止1955年5月14日在华沙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1985年4月26日签署的延长该条约有效期限的议定书的效力。

7月2日　谢瓦尔德纳泽、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人开始筹建“民主改革运动”。

7月3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新联盟条约发表声明，认为签署该条约是克服国内严重政治、经济危机，实现民族和睦的基础。

同日　谢瓦尔德纳泽向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书面退党声明。

7月8日　戈尔巴乔夫和9个共和国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讨论戈尔巴乔夫即将对伦敦的访问等问题。

佐夫等八人组成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于8月19日发表告苏联人民书，并由亚纳耶夫发表命令，说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由亚纳耶夫从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并宣布在苏联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这一事件，不到三天，即告失败。

8月20日　爱沙尼亚宣布独立。

8月21日　俄罗斯联邦召开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

8月22日　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宣布该共和国独立并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

同日　叶利钦签署法令，宣布苏联武装部队里的苏共基层组织为非法。叶利钦还发布命令，暂停《真理报》、《苏俄报》、《公开性》、《工人论坛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等苏共报纸的出版。

8月22日　戈尔巴乔夫从克里米亚飞回莫斯科。

8月23日　叶利钦签署命令，宣布中止俄共的活动。苏共中央大楼，苏共莫斯科市委大楼场被查封。

同日　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摩尔多瓦总统发布非党化命令。

8月24日　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

同日　叶利钦发布命令，没收俄罗斯境内的共产党和克格勃的档案。

同日　叶利钦签署法令，承认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独立。

同日　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宣布该共和国独立。

8月25日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宣布该共和国独立。

8月26—31日　苏联举行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讨论“8.19”事件后苏联的局势、联盟命运及经济状况等问题，通过了《关于防止政变的首要措施的决定》和《关于政变后国内形势的决定》。

8月27日　摩尔多瓦宣布独立。

8月30日　阿塞拜疆宣布独立。

8月31日　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两共和国宣布独立。

9月2—5日　苏联举行第五次非常人代会。大会通过三项文件：关于苏联和10个共和国领导人声明中提出的过渡时期重要措施的决议；过渡时期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法；人权和自由宣言。

9月9日　塔吉克宣布独立。

12月1日　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通过该共和国独立的决定，同时克拉夫丘克当选共和国总统。

12月8日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宣布苏联已不复存在。

12月13日　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5国首脑在阿什哈巴德会晤并发表声明指出5国准备以创建国身份加入独联体。

12月21日　独立国家首脑会议在阿拉木图举行。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土库曼、塔吉克、乌兹别克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格鲁吉亚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不复存在，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等文件。

12月25日　19时38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上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此不复存在。当晚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12月2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代表们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宣言，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撰稿者　王大成　潘德礼

责任编委　张　森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苏联剧变研究
作者＝
页数＝３７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